

■ 记忆丛书

**Essays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Literature and Review**

Qi Zhi, Editor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

文献与综述

启之 主编

美国华忆出版社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Essays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Literature and Review

Qi Zhi, Editor

Remembering Publishing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

文献与综述

启 之 主编

美国华忆出版社

Copyright © 2019 by Remembering Publishing

**Essays by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Literature and Review**

Editor: Qi Zhi

ISBN: 978-1-951135-04-1 (P- 平装本)

978-1-951135-05-8 (E- 电子本)

LCCN: 2019 917300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RememPub@gmail.com

书名： **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一）：文献与综述**

作者： 启之 主编

出版： 美国华忆出版社 奥斯汀·得克萨斯州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字数： 362 千字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這是一個龐大群體的
吶喊：中國人決不允許
文革的災難重演！

李銳



纪念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

序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

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短，算得上成果的东西不多，也就一两本书以及若干文章而已。借用陈伯达常说的一句话，我不过是文革研究中的一名“小小老百姓”而已。不过，主编先生诚邀我为此煌煌四卷作序，“小小老百姓”虽然不胜惶恐，但也只得向鲁迅学习，写一篇“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维护思想独立、学术自由者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

九年前（2009年4月27日下午），我在清华大学文北楼的309室演讲时，谈到了两种文革研究者：一种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对从事这项研究的历史学者来说，目前的形势好得很，可能还越来越好。证据是，一些重点大学开设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课程。另一些人则是相当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形势糟得很，而且会越来越糟。理由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了，说真话的文章无处发表，且年轻的一代对历史明显缺乏兴趣。

九年后，当我为这本书写序言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当年的悲观主义者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们的远见卓识在今天都一一落到了实处——大学开设的文革课被叫停，有关文革的著作完全无法出版，研究文革的博士们毕业就得改行。这本论文集从香港转战台湾，直到逃到海外才落户。

不过，忆苦思甜会让我们从悲凉之雾中走出来——四十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汽车拉我们去看了一场名为《沙漠的春天》的电影。我们留学生普遍认为这

部电影很糟糕，简直傻透了。回学校的途中，我在校车后排找到了老师，想跟他交流交流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说：“老师，您得承认，今天这部电影真不怎么样。”老师跟我打起了官腔：

“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按照 1957 年对六种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来判断，这部电影好极了。经过文革的锻炼，特别是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中国电影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性第一位、艺术性第二位把握得很好。”虽然他的逻辑我能听懂，但我当时还年轻，我在想，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能说句实话吗？但是那位老师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现在的中国，还会拍《沙漠的春天》吗？还会有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老师吗？还会用这种荒唐的逻辑为傻透了的作品辩护吗？不会，完全不会了。今天中国的银幕上，放的是好莱坞大片；中国的电视上，放的是“跨界喜王”；今天大学的教师们，最喜欢妄议国政。今天盛行的逻辑是以一元统率多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这么一番今昔对比，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中国有了巨大且惊人的进步。

正是这一进步，使这本论文集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成为可能。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掩盖言论管制的严酷现实，也并不是对曲线出书的艰难困苦视而不见。我的意思是，中国的学者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这么说，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这四卷本，不就是成绩？不就是光明？不就是中国同仁勇气的凝聚吗？

随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关于毛时代的有价值的学术出版物的日渐稀少，这本论文集的价值更加突出。它成为备受期待的、毛时代文献的重要补充。这洋洋百万言，是中国学者们严肃的研究成果——这里的“严肃”并不意味着冷峻、枯燥或者沉闷，而是尽责、真实和坚定的体现。这里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高校、研究院所批准的学术课题，也不是国家拨款支持的研究项目，而是来自民间、业余、退休的作者之手。在这些作者中，有耄耋老人，有年轻的 80 后，有业余写作的史学教授，有改行从文的工程师。从文革的参与者到外部的观察者，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如同《记忆》一样，这本书是百科全书式的，它记录了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到山高皇帝远的边疆，从乌合之众的暴力到“三

支两军”的维稳，从集体的大屠杀到文艺的雅俗体制等一切内容。而对于此书的主编而言，这本书则代表着孤身的耕耘和韧性的苦干，意味着数年心血的付出和无数小时的付出。

2006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一位研究文革的著名中国学者指出：“文革研究断档，后继乏人……在最应该了解文革的人群（大学生、研究生）之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文革。也就是说，未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失忆的一代’，而文革则会成为‘失传的学问’。”（吴迪，引自郝建编《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页173）今天，摆在各位面前的这四卷本的论文集告诉我们：十年后的今天，文革研究非但没有断档，而且80后、90后已经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当文革六十周年到来的时候，他们将成为学术主力。只不过，他们得学会游击战，而且要不断地转移阵地。

二

四十年前，在复旦念书的时候，我最讨厌上政治课，尤其是批判修正主义的课——辞典上的解释，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改。可在课堂上，我们不但要批判苏联对马列主义的修正，还要拿起笔做刀枪，批判宋江、孔老二，以及农民起义的头领方腊。这些古人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与修正主义有什么关系？

有一次，政治老师要求我们批电影《武训传》，有位胆大的同学（就是在《记忆》第四期中《197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出现的那位瑞典学生，叶XX）提出：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看了电影再批。老师马上驳斥了他的这种反动谬论：这条语录不能用在地方，因为毛主席也说过这个电影是坏的，它就是糟得很，同学们要相信毛主席。

为了逃避政治课，我把自己锁到四号楼（现已拆）的男厕里，可是老师还是用钥匙开了门，把我找过去上课。那时我很苦闷，怀疑自己来到这个怪地方，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这只是私字一闪念，我很快就战胜了逃跑主义，决定留下——我要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这个奇怪的国家，它是什么样的制度？

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想看看，它到底能奇怪到何种程度，它的奇怪有没有极限？三十年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就写在我和老马合著的那本《毛最后的革命》一书之中。

我的答案大部分来自政治史。如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还会有新的解释。此书主编对此深有体会：“人亡政息，但文化不息。……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新生事物消失了，但是，它的精神仍旧活着人心之中，而且版本更新，升级换代：梁家河取代了韶山冲，输出革命变成了输出模式，‘艰难探索’取代了‘十年浩劫’，歌德效忠继续奏响主旋律，毛时代的文艺母题提升为新时代的红色文化，革命传统加冕为文化软实力……乌托邦走了，中国梦来了；‘群专’关张，‘喝茶’兴旺；梁效臭了，贾桂吃香；无法闭关锁国，就搞媒体管制，网络封杀，海关检查；放下了阶级斗争，捡起了‘预防式管控’；昔日的无良政治带来了今天的无信经商，邓氏的实用主义，承袭了毛式的不择手段……”

当年毛泽东从需要出发，生造出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则欣然接受了这个新词儿，当造反派利用这个新词儿，把他们批得七死八活的时候，他们仍旧拥护这个“强为之名”。其实，真正名副其实地“革”了中国文化之“命”的，并不是当年走上街头“破四旧”的青年或喜欢折腾的激进分子，而是毛后这四十年盲目“改革”，因为它不但在“破”字上狠下功夫，而且还在“立”字上立了新功！还好，这本论文集的第二卷集中了十五篇文章，专门讨论文革文化。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创举。以往的论文集总是把政治看成老大，排在第一；把文化看成可有可无的小不点儿，排到老末。最近几年，文化的身价看涨，四个自信之中，就有一个文化自信；五个创新之中，就有一个文化创新。政治是硬气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文化是软实力——“温水煮青蛙”，“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三

五年前，我曾经给《记忆》写过一封信，全文如下——

《记忆》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好！

在多种多样的有关文革中的惨案报道中，提到非

正常死亡的知识分子的文章多，提到非正常死亡的工人的文章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后一类人太普通，他们的“命”被认为不太值钱呢？还是因为前一类人“名”气大，所以纪念他（她）之死的“历史意义”更大？

琢磨了一两周后，我觉得不妨试试用两张档案中的故纸来校正“纠偏”这个“主旋律”。毫无疑问，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死难，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文革也害死了更多的工人、农民等草根民众。附上的名单是我从潘家园的小贩那里买到的，它们仅仅是一大堆详细史料的冰山一角。我相信，尽管是一角，也足以提醒我们的历史学家：千万不要忘记民间悲剧！

编安！

沈迈克

2月18日

这封信，作为读者来信刊发在2013年2月28日《记忆》第94期上，第95期刊登了我附上的名单。尽管，《记忆》此后没有刊发同类的名单，但是，它做了类似的事——刊登了一些草根的回忆录，记载下了毛泽东时代带给这些人的苦难。而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文集中的地方文革卷，这些作者多来自民间，出身草根，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是，他们的优势——亲身的经验，广泛的人脉，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以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足以使这些养老金领取者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最罕见，也最优秀的史学家。

刘少奇写过好多文章，最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现在已经成了对这位国家主席的反讽。刘少奇说过好多话，留给今天的，大概只有他跟王光美说的那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往常对我是个空洞的概念，而在这卷中，我体会到了它具体而实在的含义。

四

每人都会有一个与别人意义不同的文革——脑子里的，肚子上的，书架上的，嘴上说的，心里想的。三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位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轰动神州学界的新观点，说文革并

非只有一个，而是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还说前者是权力斗争，后者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文革不光有一个，也不光有两个，而是有上万个。在这里万是“极言其多”。

但是，不管你怎么理解文革，也不能把文革单独揪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批斗。那是“懒汉哲学”。文革不是孤立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文革是半个世纪前的若干年当中，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一小部分。同时，还不要忘了，文革也是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片段。在这个大语境中研究文革，才不至于滥竽充数。

“懒汉哲学”的另一个表现，是把文革当成一抓就灵的工具。不管谈什么问题，只要一贴上文革二字，似乎就迎刃而解。文革成了“解释”和褒贬当代中国史的“捷径”。有了它，发挥它，可以绕过或避免接触很多棘手而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因果关系，本来是应该认真追究和实事求是地解释的，但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或不肯这样做，于是，干脆“赖”到文革身上。古代叙利亚有个阿里巴巴，今日的学界没有，以为喊一声“芝麻开门”，学术的大门就会打开，历史的答案就尽现眼前，只有傻子才会相信这种简单化的办法。

应该琢磨的是，作为人类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那一“整块”该怎么去理解和概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名言，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2018年10月3日

编者前言

启 之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北大国政系、历史系利用11月的一个周末悄悄地组织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周一，有司即要求组织者交出与会者的名单。

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独立研究者口耳相传，于3月下旬在北京密云开了三天会，会后编了一本集子。私人出资，美国溪流出版，只带进来十六本。

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美、德、法、澳、日、香港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回忆录纷纷出版。国内封会噤声，文革研究者唯有诉诸笔墨。此论文集远赴美国付梓，迟至2019年问世。出书后，作者看不见样书，读者买不到纸版，带书回国，海关罚没——呜呼，“厉害了，我的国！”

—

近十年来，文革研究出现了三种趋势：一是从通史转向专史；二是从官方转向民间，三是从政治转向思想文化。专史是通史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官家的方志专史，多政治而少学术，重应景而轻长久。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单位史和地方史，在闺阁不在庙堂，在民间不在官府。这三个转向的关键在作者。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归纳为“三多一少”。

三多：一是亲历者多。40后和50后占了一大半，这些人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多为当年的大学老五届和中学老三届。二是老者多。百分之七十的作者年纪在古稀上下，他们均已退休。少数人吃低保，大多数是养老金领取者。三是业余多。这些作

者所学专业与史学无关，其中理工出身者不在少数，周孜仁毕业于重庆大学，学的是电机专业。杜钧福北大物理系出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生，专业是“等离子体物理受控聚变”。石名岗太原机械职工大学毕业，学的是机械制造，干的是锅炉，职称是高工。蒋健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教的是“过程计算机控制系统”，研究项目是“卫星导航”。他们的专业离史学远得不能再远，他们投入文革研究，不是教学的需要，不是领导的安排，而是出于兴趣和责任。他们不但挣不上钱，评不了职称，还要做出各种牺牲——从贴钱费力，到失去安全感。

我所说的“一少”，指的是60、70后少。在近五十位作者中，这一年龄段的只有五人，比80后少一半。尽管人在体制内，吃的是专业饭，但是，他们的文革研究被限制，课程被取消，学术成果无处发表。有关研究只能在下面悄悄进行，专业也成了业余。

这“三多一少”意味着，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亲历者、老而退休者和业余者之手。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

本书分四卷，第一卷“文献与综述”，第二卷“思想与文化”，第三卷“高校与地方”，第四卷“政治与群众”。收文56篇，共计150余万字。作者以大陆学人为主，也包括港台和欧美澳的华裔学者，意在展示中华学人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

第一卷“文献与综述”，分两类。一类是对文革研究成果的全景式扫描，如，王芳的《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概述》和徐友渔的《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近20年进展综述》，前者集录英文成果，后者专注中文资讯，二者稍有交叉，或可互补。另一类是专题性的概括与述评。如蒋健的《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周孜仁的《文革集体屠杀述要》，丁东的《近十年文革口述史一瞥》，卜伟华的《各省区市地方文革简述》，杨隽的《北京“老红卫兵”研究》。后者之中，填补空白的是石名岗的《文革时期的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余汝信的《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和吴迪的《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成文将文革中的省级干部分为地方（其中支持文革、领头造反的叫“革命干部”）、军队和群众三类。在介绍这三类干部的“山头”和政治态度后，作者将革委会成立前后各省一把手的情况做了梳理：一、文革前的29个省区党委书记，有26人被打倒或下台，占总数的90%，说明“走资派”占多数。二、文革前有军衔的干部担任一把手的占总数的17%。革委会成立后，军队干部增加到20个，占到总数的近69%，说明军队势力崛起。三、从1967年5月到1968年，军队干部在革委会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从16%-66%-85%。说明局面越来越难控制。四、在20个军队干部出身的革委会主任中，四野人最多（9人）。说明四野干部的地位特殊。接下来，成文介绍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革命干部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斗争中立了新功；军队干部则从不理解——高层在“二月逆流”中抵制文革，基层在“二月镇反”中挑战文革——到支左紧跟。关于群众干部，作者以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徐景贤、陈永贵、李顺达为代表，讲了他们的造反原因和经过。文章最后概述了这些人的命运：军干退出地方政权，革干、群干被淘汰出局，劳模淡出，“三种人”遭到清洗，“走资派”成了“还乡团”。这些人的结局似乎应和了杨继绳的观点：官僚集团胜利了，毛失败了，造反派承担了失败的后果。

这些年，香港出了不少文革名人的回忆录。对中共军队与文革关系有着专门研究的香港学者余汝信，对境外出版的文革书籍也有着深入的考察。其《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一文，介绍了原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包括其子陈晓农）、王力、戚本禹三人1993至2016年间撰写的五本著作。通过勘查比较，作者指出：“这些著作披露了被官方扭曲或屏蔽的若干重要史实，对人们了解文革的内情有莫大帮助，但也存在着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只谈‘好’事不涉‘坏’事，对自身言行的撇清等这一口述回忆类史料常见的缺陷。”

作者澄清了王力所讲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指出了陈晓农对陈伯达回忆录的改写，纠正了戚本禹关于“秘密窃听”和“严慰冰案”的编造。作者提醒人们：父子对话类的作品，如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邱会作之子程光的《心灵的对话》，存在着以作者自己的思维重塑父辈形象等问题，难以作为严肃史料使用。文章最后指出：虽然陈、王、

戚对文革的看法不同，但是，他们的回忆提供了不同于官方的、可供研判的有用信息。这里面有个规律：回忆的真实性，与作者反省的程度成正比。

在独立的文革研究中，地方史是一大片洼地。除了内蒙古、山西、天津、上海之外，其他省区尚无系统、完整的地方文革史。到哪里去找资料？各省区都有哪些文革著述？特点如何？哪些人在研究？有哪些成果？……举凡有关地方文革研究中的问题，庶几可在《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中找到解答。作者提供的资讯虽然远不够完整全面，但这项庞杂烦琐、没人重视的工作，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开端。

三

文革政治永远是学界与坊间的热门，一个毛泽东就能说上一千年。但是，真正对现实中国有影响的，不是中南海内外的权谋和争斗，而是毛时代的那套思想观念、制度规范、社会风习、集体无意识。文革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文革不但砸烂了旧世界，还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思想、制度、文化是一棵藤上的瓜。

解剖这个“瓜”，深挖这根“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大体上循着思想和文化这两个方向展开。李泽厚对古今思想史的梳理，王若水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李洪林对思想运动史的勾勒，何家栋、黎澍对封建残余的论述，何方对延安整风及个人崇拜的分析，曾彦修对中苏体制的比较，张宣三、盛禹九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唐少杰对东欧新马代表人物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著作的评介等等，都是从思想入手，探索文革的源头。

王学泰关于“游民文化”的研究，李慎之对这一成果的高度肯定，朱厚泽对“党文化”的思考，钱理群对“毛泽东文化”和“新的国民性”的辨析，叶维丽、马笑东关于红色大院的回忆，戴伟、罗治、唐燕等人对“红色教育”追问，则是从制度、风习切入，剖析“毛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虽有不少有识之士，步老一辈的后尘“剖瓜挖藤”，但是，从思想/文化方面研究文革，始终是支流小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海外学者避短扬长，早就把文革文化列为重要的研究领域，阐释空间巨大，足以发挥其审美体验的文革文艺，是多数研究者的兴趣所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王斑从个体经验出发，以“新左派”观点为理论支撑，深情地赞美了文革中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在高度肯定文革的同时，对改革开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春苗》《决裂》《年轻的一代》等文革电影体现了对特权阶级的批判、对社会平等的追求”。《海港》体现了劳动者的国际主义情感。”“朝鲜影片《苹果收获的季节》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消灭三大差别的前提下，以社会平等为目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的爆发蕴含了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批判与校正。”“七十年代的戛然而止与八十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干扰了七十年代开始的这场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验。近二十年来，中国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并依靠国家资本主义开发‘崛起’为亚洲新的超级大国，这种径路背离了七十年代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想，也背离了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初衷。”¹ 奥克兰大学教授保罗·克拉克在其著作中以更宏大的学术雄心，分门别类地讲述了文革中的各种文艺产品的生产、传播和“商品化”过程，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江青及其追随者致力于文化的现代化。文革期间，多样性的文化不但大量生产，而且不断地发展创新，而老百姓也以巨大的热情消费着这种新文化。² 无独有偶，海德堡大学教授芭芭拉·梅嘉乐则在其获奖的著作中，³ 通过各种途径强调“文革文化体验的多样性、复杂性甚至‘真实性’”。与努力推翻“八亿人八个样板戏”的保罗一样，这位新生代女学者对“文革文化中的创造、

1 见傅蕾：《文革文化中的视听艺术——倾听中国文革：音乐、政治与文化延续性读后》，《记忆》237 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参见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保罗·克拉克 (Paul Clark)：《中国文化大革命：一种历史》(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P2-P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芭芭拉·梅嘉乐 (Barbara Mittle)：《继续革命：解读文革文化》(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解放和叛逆色彩”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大胆想象。¹ 这些研究成果与国内的新老“左派”相呼应，使国内学界“剖瓜挖藤”的工作受到了困扰，为中国文化的清理和重建带来了新的挑战。

“群专”关张，“喝茶”兴旺；梁效臭了，贾桂吃香；无放闭关锁国，就搞媒体管制，网络封杀，海关检查；放下了阶级斗争，捡起了“关口前移”和“预防式管控”²；昔日的无良政治带来了今天的无信经商，邓氏的实用主义，承袭了毛式的不择手段……

表层现象之下，藏着深层心理；钱理群认为这是“新的国民性”——

毛泽东思想事实上根本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以至语言方式，极为全面而彻底，进而在民族精神、性格、气质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毛泽东文化”……它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毛泽东文化经过长期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灌输，在中国大陆已经形成了民族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³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权力制造知识，知识依赖话语。毛泽东文化是中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系统共同生产，合力推出的产品。文革不过是将它推向了极端。因此，研究文革的思想文化要把十七年包括在内。第二，后毛时代为“新的国民性”添加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舞台。因此，“新的国民性”应该成为文革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本论文集的意义之一，就是它第一次集中地探讨了“毛泽东文化”，解释了后毛泽东时代“版本更新”的由来。“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这

1 孔锐才：《大众体验的迷失——评梅嘉乐的〈继续革命：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读书》2014年10月。

2 “预防式管控”是香港大学教授阎小骏的提法，他认为，后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稳定，主要依靠弹性的“政权吸纳”和刚性的“预防式管控”。后者“是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发现、识别、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大变动时代在社会层面上不断涌现的对政权的潜在挑战力量和潜在破坏因素，并把它们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见《中国何以稳定》页23-24，香港：三联，2017。

3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页15，台湾，联经，2012。

句调侃之语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化研究本来就包罗万象；二是跨学科现象在这里普遍而活跃。社会学、文艺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美学、思想史，等等，许多社科人文学科都与文化有交叉。从表面上看，这一卷装的东西也确实庞杂：日记、小说、绘画、电影、“大民主”、写作组、道歉和解、文艺母题、文物古迹、身体与心理，等等，但是，作者们通过这些表象，揭示了文革文化的架构和思想观念。

样板戏始终是文革文艺研究的一大热门。西方学者更把它当作“红色文化”的代表而大书特书。但是，很少有人探究生产样板戏的文化体制。杨健从毛时代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体制入手，发现了文革文艺的雅俗二元结构——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是“宫廷雅部”，以“工农兵文艺”为代表的是“民间俗部”。前者是文革意识形态的权威，后者是配合政治任务的工具。二者建构了一种崭新的文化等级。文革凭什么“文化创新”？凭的就是这个理念和体制。诸如此类的，令人脑洞大开的创见，杨文中还有不少。

很多人认为“四大”（“大民主”）一无是处，很多人又怀念“四大”，把它作为歌颂毛时代的理由。赵园以其特有的随笔式风格，谈了群众的“自发性”，谈了官方的“去政治”，谈了“四大”的悖论——不但不能包容“异端”，甚至不能容忍“另类”。无独有偶，吴思在谈“超极权”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吴思所说的“大民主”侧重于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他所说的悖论是“真正的民主将摧毁大民主，进而像苏联、东欧那样推翻极权制度”。（见第四卷，吴思的《“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

赵文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一部分，是对“四大”功效的分析。作者告诉人们，“四大”（尤其是大字报）揭露了干部的特权，戳穿了“为人民服务”的假面，暴露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恩怨，撕下了政治的神秘帷幕，促使人们去寻求历史真相。它还把高层的“黑话”来了一个大曝光，启发人们对体制、主义和现实做深入的思考。“后文革”的精神危机、信仰缺失，近缘即在“四大”的“揭秘”。但是，“四大”也“使人之于人的怨毒与嫉恨，得到了恣意释放的机会。”这一释放浸渍着社会风气，文革后继续发酵。

姜学斋之文，可以看作是对赵园的补充。他首先剖析了革

命大批判的论证方法。并以毛泽东的《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以及毛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评论为例，指出毛的“非常论证法”和断言法，违背逻辑。前者以绝对化、简单化为特征。后者则是没有论证，只有结论；没有说理，只有断言的“印象式点评”。这两种方法发展到文革，成了“大民主”主要的说理方式。大批判能持续十多年，端赖媒体配合。配合之法一是“围剿”，二是“对比”。大批判令人厌烦，但是人们烦的只是那不变的语气、腔调和词汇。它的论证方法以及这方法后面的思想体系，仍旧是在人们的厌烦之中深入人心。

姜文还谈到了写作组、群众组织和媒体在大批判中的作用。写作组是毛晚年的一种执政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宣教机构，写作组的任务是重新解释历史。群众组织是写作组的补充，其传播平台众多，传播手段灵活多样，信息覆盖面大。其全盛期的影响不逊于只能依赖官办报刊的写作组。关于写作组的问题，金光耀在《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文有更专门的讨论，可以与此文互参。

好多知青坚持“青春无悔”，很多老革命（包括“两头真”）也无悔当初。你问他：如果你知道后来会有大跃进，会饿死几千万人，会发生十年浩劫，你还会投身革命吗？这些老人十之八九，都会像李慎之那么回答：我还会选择这条路。这是一种什么心理？什么认知？徐贲在《文革后遗症的“双重思想”和“认知失调”》中做了解答：“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信仰越是幻灭，或者越是意识到信仰的荒诞，越是可能会坚持这个信仰（行为或看法），这二者之间是失调的。坚持信仰其实是削弱失调感的一种方式。”

毛泽东思想指的是毛正确的思想，不包括毛错误的思想。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充斥当下。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徐贲一针见血：这是乔治·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这种思想“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并以为都正确的想法或信念”。“双重思想”是“认知失调”的表现方式之一。它是洗脑的结果，洗得越彻底，持此思想者就越会对这些矛盾麻木不仁。

顺便说一句，在解剖毛文化的华裔学者中，徐贲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博览覃思，熟悉西学，善用他山之石，剖析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其书其文，常有启蒙振聩之功，应该引起学

界的重视。

在物质、风习、制度和思想、心态等文化诸层面自由穿行且融会贯通者，是《毛泽东执政春秋》一书的作者单少杰。他为本卷贡献的是《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讲的是红卫兵刨坟鞭尸的虐行，中篇讲的是暴民毁佛，愚众造神；下篇是全篇的精华所在，讲的是文革遗风：“唯成败论”与“猫论哲学”，“政治戏子”与“戏子文化”。之所以将此文置于本卷之首，是因为作者通过某些物态的文化现象，揭橥真相，针砭时弊，且通幽洞微，深入到心理和精神层面。

四

文革是从学校开始的，各地的大中专校院在文革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尤其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亲自扶持的北大、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北京高校。举凡文革中的重大问题：文革与社教的关系，中共上层的分歧和动向，群众运动的兴衰，知识群体的表现和遭遇，斗批改的开展和结局，工军宣队的作用以及“教育革命”的后果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一窗口，一窥究竟。

然而，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这些学校都在回避、掩饰、歪曲这段历史。北大校史馆除了编写《校史馆展览导读》和一百年前的史料外，没有拿出一部与文革有关的东西。而由副校长、党委书记王学珍挂帅编撰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在将反右至文革的历史粗略化处理的同时，还站在派性立场上，制造了多处错漏讹误。北大党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是化腐朽为神迹，把毛时代的折腾美化为“在曲折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之路”（这是该书第八章的题目）。

清华为迎接 90 周年校庆，由校史和校志两个单位编出了两本包括文革的书：《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出版社，2011），《清华大学志（1911—2010）》（清华出版社，2001）。但是，这种“忠实、全面地记载了清华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的重磅级图书，对文革十年仍是欲言又止。校方组织编写的三卷本 150 多万字的清华校史（1911—1949，1949—1978，1978—今）。在第二卷中设了专章，用了七万多字讲了清华在“文革中的磨难与抗争”。

但是，书稿审查多年不获通过，该书主编，原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孙殷望，抱憾而逝。

《北京师范大学记事（1902～2011）》（北师大党委办、校长办编，北师大出版社，2012）是校方为纪念建校110周年编写的纪事体校史著作。然而，这部记载学校的重要活动、重要事件、重要成就的大书，只用了14页就打发了文革十年。校史上的重大事件：1966年谭厚兰第一张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工作组的进驻与撤离，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师大的活动被刻意掩蔽。1967年震惊高层的9.7事件，1968年7月火烧工五楼也被悄悄抹去，至于所有被迫害致死亡者则无一字提及。

上述情况意味着，要留下本校真实完整的文革史，只能靠民间的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近年来，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四中、北师大二附中、清华、北大、地院、北师大、人大、复旦等校的文革亲历者，纷纷加入民间著史的队伍，日记、回忆、文集、评论、大事记、史料整理、非正常死亡统计等各类书籍文章，充盈坊间。仅《记忆》就刊发了60期（包括中学）的学校文革专辑。

这些文字的特点是回忆多，分析少；史料多，研究少；收入本书的三篇文章虽然在学术上不那么“高大上”，但是很有代表性。北大哲学系李清昆的文章，让我们知道了北大社教与“第一张大字报”之间的联系；清华大学唐少杰谈清华“教育革命”的文章，提供了毛泽东教育改革的样板。北师大刘明对该校文革特点的总结，对认识一般高校的文革有普遍意义。

五

在文革研究中，地方文革是一个更大的空白。29个省市自治区，有本地区文革史的寥寥无几。换一句话说，在文革通史方面，民间成果占了主流，而在地方史方面，则是官方的一统天下。

就中共最重视的“生存权”而言，仅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就没有任何一个省区市做过统计。被迫害致死而留下姓名的，只是老干部和贤达名士、教授大家。平民大众，草根黔首，尤其是那些“政治贱民”，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正是因为没有普遍而权威的统计，歌颂文革，怀念毛时代才有了现

实基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年一主编的《文革大辞典》，由全国五百余党史研究者撰稿，稿件中对各省市死难人数多有述及。此书编毕而不准印刷。最应该，也最有能力做这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至今没有拿出一个哪怕是最粗简的文革死难者数字，而官史则在“宜粗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尽量掩盖这场浩劫对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

这本论文集的另一个价值，就是第一次将地方文革研究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上日程。旨在凝聚散落在各地的民间学者，为他们搭建起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推动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从而为填补上述空白提供可能。这一卷收入的文章，分别研讨了山西、山东、陕西、河北、云南、安徽、湖南、四川、新疆等省区的文革历史。

晋鲁两省的文革研究，领先全国。三年前，当我读到自印书《文革中的山西》时，就不禁为民间的卧虎藏龙而感慨。这次编书，我特意邀请此书的作者石名岗、李辅赐稿。虽然从未谋面，但二位慨然应允。石名岗的《文革后的文革——山西的“倒清查”运动》一文，叙述了“四人帮”垮台之后，以王谦为首的山西省委打着“揭批清”的旗号，在陈永贵的支持下，对支持谢振华、反对“四人帮”和所谓“反大寨”的干部、群众进行的“倒清查”。

石文揭示了几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文革的责任主要应由上层来负，而掌权者多嫁祸于下层。二、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不是看当事人在文革中的表现，而是看其清查时担任的职务。由此导致了真正的“三种人”逃脱法网，而反“四人帮”的人却成了清查对象。

李辅的《“一月革命”风暴：山西夺权》一文，详细地讲述了1967年1月刘格平在中央的授意下，向山西省委夺权的过程。遗憾的是，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在最后关头割爱。

研究山东文革的学者，在诸省区中人数最多，学历最高。这一卷收入了一内一外，一中一青的两篇文章。张业赏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山东文革的第一人，其博论写的就是山东文革。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简述》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山东省革委会产生的背景、过程、人员构成和组织机构的演变。对革委会的性质、职能、与军队的关系，以及在经济中的作用，都

做了有益的探索。

同是研究山东文革，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崔金珂，将目光投向了造反干部的派性。作者认为，文革使以前隐藏在干部内部的派性公开化、大众化；宗派主义成为省区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个舞台上，是干部，而不是学生和工人，成为造反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山东的案例说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右派干部在运动初期对于造反行为的支持，成为造反派政权稳定局势的重要的内部条件。而造反派政权与中央文革领导人的宗派主义联系，则为其提供了外部的夺权合法性。问题是，正是由于内外宗派主义联系的变化和地方派性政治的冲突发展，严重影响了造反派政权的走向。”

安徽是地方文革研究中的弱项。董国强、李嘉树以其《从“夺权”到“军管”——安徽文革运动初探》填补了空白。两位作者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梳理了中央和地方各种政治势力在特定的制度和文化框架中进行的互动。安徽群众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两派围绕夺权和“支左”的纷争，以及中央、省市、驻军诸方领导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影响，构成了此文的主体。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文革意识形态自身的模糊性，和不同阶段政策导向的自相矛盾，是导致那些原本具有相同社会身份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和个人不断分化重组的关键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群众派性斗争与十年文革相伴始终。作者的这一观点，与社会学“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或有相类之处。

地方史和单位史的最小单位，在农村是生产队，在城镇是居委会。刘小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层——文革初期湖南岳阳燎原居民革委会的政治生态》一文，为这一微观研究举行了奠基礼。作者依据燎原居民革委会留存的大量原始文件，就这一组织的结构与职能，做了多角度的考察，并以“四清”“清队”“一打三反”三个政治运动为对象，集中揭示了居民革委会主导下的“政治运动与人员清查”之间的关系。

作者指出：居民革委会既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前沿阵地，也是“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组织保证。尽管只是城市基层社会一个细胞，居民革委会同样会给民众造成严重的伤害。文革中制造的大批的冤、假、错案，有相当部分出自包括家庭妇女的普通民众之手。

四川文革的重点在成都和重庆，重庆文革的重点是武斗。

法国洛林大学博士迟淼以其传播学专业的敏锐，将研究重点投向了武斗中的死者。她的《记录无名者》一文，从时间、空间、死亡原因三个维度揭示出《重庆文革武斗死难者名录》编撰者在收录死难者时所考量的主要因素、棘手难点和模糊地带。根据具体事例，作者提出一些新概念，如“时间中的时间”“后死亡时间”等。虽然这些概念有待检验，但这种将哲学视角引入文革史学研究的尝试值得鼓励。

云南文革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是“沙甸事件”。四十多年来，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评论等文献资料已经不少。周孜仁根据自己的亲历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辨析了这些记述的真伪，为这一事件梳理出一个更清晰的源流、真相和结局。

作者指出，沙甸事件是从1960年代以来民族政策左转的必然产物，“四清”工作队强行关闭清真寺是事件的导因，这一事件不是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和云南文革两派之争纠缠在一起。派斗因素和民族因素相互激荡，最后酿成了用军队剿灭平民的国家暴力。

陕西文革隐秘而诡谲，而研究陕西文革的学者，唯白磊一人而已。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白磊以其《革命的纷争：1966-1968年西安造反派别的兴起与分化》一文揭开了隐藏在尘埃之中的历史，叙述了1966年至1968年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西安地区发生的众多事件与各种势力的纷争，再现了文革第一阶段的陕西历史。

在河北文革的研究者中，余汝信是一重镇。他在《河北“三支两军”述略》一文中，详细深入地叙述了“三支两军”在河北开展的过程和其中的问题。其独特贡献在于，“一般被视为造反派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在河北地区的支左中，陈伯达却站在支持保守派的多数军事单位一边，对三十八军多有指责。这一现象，打破了我们曾经固化的思维，诱发了我们更广角度的思考——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展阅此卷诸文，让我们有理由欣慰于将来，地方文革研究的前景似乎并不像有些人估计的那样暗淡。刘小萌、迟淼、崔金珂、白磊、孙言诚等人之作，虽然仅为一文，但有着奠基性和方法论的意义。某些省区，如江苏、安徽、云南、青海，在不久的将来，都有望独立成书，成为地方史著作中的领跑者。

单少杰指出：文革不是“国难”而是“国耻”。“国难”

是外族强加于中华民族的，“国耻”是“中国自己折腾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见第二卷单少杰文）其作践的，首先是自己的人民。反思文革，就要记住“国耻”，而记住“国耻”的最好方式，就是每一个单位都有一本王友琴式的《文革死难者》，每个省区都立一块杨继绳式的“墓碑”。本卷的历史学家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这本书，修建着这块碑。

六

第四卷政治与群众。这是文革研究中最持久、最热闹、最有争议，因此也最吸引眼球的领域，大体上围绕着“高层政治”和“群众运动”两个层面展开。高层政治复杂且隐秘，在资料封锁、档案冻结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利用公开的资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难题，也是挑战。

何蜀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考》一文，接受了这个挑战。通过梳理“资反路线”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毛时代由褒到贬的演变，作者指出：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在毛的辞典中从来就是一个含糊多变的概念。“资反路线”同样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准确含义的，仅仅为了一时政治需要而生造出来的概念。毛“炮打司令部”加给这条路线最核心、最具体的罪名只是“压制不同意见”，而“压制不同意见”恰恰是毛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大法宝。

印红标对文革的“三次发动”的发现，唐少杰关于文革特色的描述，余汝信对军队与文革关系的研判等文，对精英政治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在群众运动的研究中，红卫兵是恒久话题。米鹤都以社会学的“权威主义人格”为理论支撑，分析了“老兵”现代迷信的思想来源。作者对“老兵”崇拜心理与民众的“东方红”情结的区分，最有理论价值。米鹤都讲的是整体，袁梦倩讲的是个案——武汉红卫兵李乾打死两个所谓“流氓”，被判20年。出狱后，李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作者的采访。根据这些文本，作者探讨了历史创伤的体验与修复，施害者的忏悔与反思，事件的真相与追责。关于“忏悔机制”的分析是文中的亮点。

上山下乡一直是群众运动研究中的热门，刘小萌利用官方档案、统计数据，以及新编方志中的相关史料，对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进而探究知青“受迫害”现象与“非正常死亡”间的关系。作者指出：文革时期官方语境下的知青“受迫害”问题，主要指侵犯知青人身权益的各类刑事案件，而并不包括在“阶级斗争”理论教唆下，专制权力对知青实施的政治“迫害”。正是这一点，集中反映出文革当权者在处理知青“非正常死亡”案件时的严重局限。

孙佳雯，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博士，像她的导师，著名汉学家潘鸣啸一样，一直关注着上山下乡运动。她关于黑龙江与云南兵团的比较研究，避易就难，另辟天地。在对两个兵团的历史、构成、行政机构与知青群体进行了全面比较之后，她指出了两个兵团在集体性格上的差异，并且用社会学的方法，建构了一个知青群体的“差序层级”模型，用“集体记忆”的理论论证了南北两个兵团的历史形象与两地知青分别的精神面貌。在这部四卷本的文集之中，能够提供新的研究方法的作者不多，孙佳雯是其一。

关于群众组织，长期以来，造反派一直受重视，保守派受冷落。李逊的《保守派浅论》可谓空谷足音，适足引起人们对这一派别的重视。而金大陆对“上海工总司”文献的解读，则为造反派研究开辟了新路。

最后，要说一说吴思的《超极权：文革研究纲要》。在这四卷本中，成思想体系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单少杰的《大革命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篇就是这篇。在我近年来看到的专业文章中，此文至少有四个之最：一最宏观，二最全面，三最富理论色彩，四最简括。说它最宏观，指的是作者站在两套思想体系，两种社会模式的高度观察文革。说它最全面，是因为作者不但考察了文革的政治，还考察了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教育（他对极权与超极权塑造的新人进行了区分，认为“新人有两个层次。一是极权层次，二是超极权层次。”其中对两种新人的描述和定位颇有新意）。说它最具理论色彩，是因为作者建构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超极权”（领袖、官僚集团与群众的三角结构）。据此，作者对历史做了新颖独到的解释（“文革是以极权秩序为超越对象，以超极权秩序为建构目标的政治运动”，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不但“双脱离”——既脱离

了群众，也脱离了官僚。而且是“双损害”——既损害了官僚，也损害了群众。）。作者提出、借用了一些新概念、新术语（将以前提出的“官家主义”与极权主义相比较；用电脑术语将超极权的现实版分成 2.2-2.5 和 2.8 五种版本）。说它最简括，是因为此文行文简约，观点概括，尚未展开，仅是提纲。

七

我开头提到了作者队伍的“三多一少”，到 2026 年，文革六十周年的时候，这时的“三多一少”就会变成“半多两少”——30 后（86-96 岁）全部退出，40 后（76-86 岁）基本退出，50 后（66-76 岁）还能继续著书立说的恐怕要减少一半以上。60 后、70 后本来就少，难以担当主力。那时的主力应该是 80 后，他们的年纪在 36-46 岁之间，正是治学的好时候。

但现实不容乐观——国内的 80 后博士毕业就得改行，能在业余坚持下去的恐怕凤毛麟角。不管国人怎么痛心疾首，“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将成为长久的事实。被认为一定会成为“显学”的文革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成为超冷门。清代的文字狱之火，由顺治点燃，在康乾手里成了燎原之势，其威力垂百余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固然鼓舞人心，但历史的换季非人寿可期。

于是，有清一朝学人，不再指望春天，而回到了远古，躲进了考据。经世之学，反思之作只留给了隐姓埋名、年近垂暮的“清初三大家”。“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有先贤在前，有责任在肩，无论怎样冰封雪飘，无论怎么寒风怒号，修建长城的民族，总会有“知耻而后勇”者。

2018-10-3 一稿

2019-8-7 修订

目 录

1	序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沈迈克
7	编者前言	启 之
1	199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概述	王 芳
47	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 ——近 20 年进展综述	徐友渔
69	文革中的军队 ——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余汝信
87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干部的情况综述	石名岗
125	各地文革特点简述	卜伟华
175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26 个省区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吴 迪
249	文革集体屠杀述要	周孜仁
277	中央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	余汝信
311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蒋 健
383	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刍议	唐少杰

399	近十年文革口述史一瞥	丁 东
411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 ——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杨 隽
449	作者简介	

199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文革研究概述

王 芳

一、引言

受政治环境、资料的开放程度与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思潮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学界¹对文化大革命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其成果较之国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颇为可观。国内由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文革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虽有渐热之势，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相应于文革之重大性，成就仍不算乐观。因此，了解西方的研究现状，并借鉴其可取之处便显得很有必要。

徐友渔于 1995 年发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³使我们对西方的研究状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其他综述性文章则侧重点各有不同。⁴时至今日，西方学界新观点、新视角不断涌现，需要我们予以更全面的梳理。基于此，笔者将首先概述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然后展现几个重要论争点，着重介绍 1990 年代以来的研究，以增进我们的了解。又因成果众多，难免挂一漏万，故只择其要论，尚祈读者谅解。

二、发展阶段分析

国外文革研究发展状况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密切相关。后者几乎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同步，其发展至今，形成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机构和研究刊物，涌现出一批知名学者。⁵总体而言，美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则紧随其后。⁶

1.1990 年代以前

1966 年至 1970 年初，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起初带有较明显的政治倾向，⁷ 对文革的研究主要服务于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需要。由托马斯·W·鲁宾逊（T.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即美国政府智囊团兰德公司的一项重要成果。⁸ 除《中国季刊》《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等刊物对文革作出迅速反应外，⁹ 另一批成果被结集出版。¹⁰

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对外宣传和信息资料，学者们的资料来源主要依靠中国官方渠道。¹¹ “毛主义”¹² 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除少数著述作个案分析外，受制于资料的付阙，¹³ 学者们基本上只能作概括性描述与分析，集中探讨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官僚机构，如分析文革期间党、政、军系统的作用及其所受到的影响等。整体上，这时期的作品倾向于根据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来判断中国政治的走向，对于“社会”层面的文革动态则关涉不多。

197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前，首先是关心亚洲委员会的许多年轻左翼学者就文革产生强烈共鸣，对文革的同情态度导引他们指责老一辈学者的“政府立场”。随着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 1979 年中美正式邦交，西方学界迎来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春天”。文革期间流散出来的大量非官方资料，¹⁴ 以及得以与从中国内陆前往香港的人进行接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学者们注意到文革时期爆发出来的社会矛盾。由此，在研究范式上，学界从一般转向具体，也更倾向于采用“由下而上”的研究方法（a bottom-up approach）来探讨中国的政治分歧和社会冲突。文革前流行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模式显然已不适用于中国，遭受诸多批评，¹⁵ “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¹⁶ 受到青睐。¹⁷

1978 年始，中国国内发生重大变化，学者们的兴趣更多地转移到对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研究，加之中美关系的好转使得美国国内对于学界的资金支持减少，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的文革研究一度冷淡。80 年代后期，由于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兼受惠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学者们能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实质性的档案查询与田野调查，使

得这一阶段成为“发现‘真正的’中国的时期”。¹⁸ 国家意识形态对西方学者的影响早已是强弩之末，开展学术性的研究成为共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¹⁹ 的兴起以及资料来源的极大丰富，促使西方的文革研究向更扎实、精密的方向深入发展，触角从省、市延伸到县、镇、乡村，研究的时间段不再局限于文革前二三年，一些作品甚至将文革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联系起来。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地区性、专题化研究增多；不光政治学家，具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背景的学者也被吸引到这片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研究与纵向历史考察。学者们开始反思“多元主义”模式，倾向于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探讨文革，注重对非正式结构的发掘，试图揭示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及其产生的影响。

2.1990年代及以后

1990年代及以后，有关文革的研究以著作为主，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数量明显减少，但经过前几个阶段的积淀，这一时期的研究更为成熟。下面笔者将分类叙之。

（1）研究计划与会议

1991年到1997年，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和麦克夸尔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运作了一个有关文革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一场由魏昂德于1996年7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召开的“回顾文革”的会议。²⁰

2003年6月8日至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以“作为历史的文革”为主题的会议，9篇论文（作者均为年轻学者）被结集出版，²¹ 代表了这一时期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受到学界重视。2006年6月9日至10日，在香港举办了“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的国际研讨会议。西方学者提交的论文，涉及文革期间的外交、“毛主义”等。²² 2008年12月，“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大革命”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举行。与会者主要是美国学者和华裔学者，研究者试图探寻文革对艺术教育与科学的影响，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并讨论了文革对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²³

2013年4月12-13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与音乐

专题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²⁴ 2015年1月9-10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联合举办“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会议。西方学者提交的论文选题涉及文革期间的经济活动、中共话语体系的建构、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以及伤痕文学等。²⁵ 2016年4月，“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观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科隆大学举办。以英文书写的论文涉及文革期间的派系冲突、宗教，1975年的军队整风运动、暴力镇压等。²⁶ 2016年11月6日，日本静冈大学和学习院女子大学联合研讨会《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资料、新方法、新知见》在东京举办。²⁷ 魏昂德等西方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2）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

外交资料方面：199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整编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的协定（1919-1990）》；2008年，美国出版《美国对外关系文献第十八卷，中共，1973-1976》，此项资料主要反映美国加强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背景与过程，²⁸ 为研究文革期间中美关系的学者们提供了便利。1999年、2001年、2005年，宋永毅和周原编纂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二、三部分分别出版，共计112卷。²⁹ 资料范围涉及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品种丰富，有些甚至是全套收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2006年，由郭建、宋永毅、周原编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词典》出版。³⁰ 内容涵盖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涉及这期间的专有名词、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运动，并包含一份大事记及与文革有关的资料、研究成果清单（以英文世界为主），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大便利。2015年，该书经修订后再版，并增加了中文世界与文革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清单。³¹

（3）研究状况

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之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资料的应用、研究内容和研究主体上既体现某种延续性，又呈现出新的变化。

在《作为历史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等学者们指出：“档案与公开出版物，官方与非官方的原始资料，以及大量可资利用的口述史已经允许现在的文革研究基于对细

节和细微差别的掌握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³²应该说，1990年代以来，在资料的使用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可能是对档案和口述史料的格外重视。

随着相关档案的解禁，加之中国民间流传出来的一些档案资料，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可能，《作为历史的文革》一书本身即体现了这一点；另外，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逊所著《无产阶级的力量——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和余伟康（Eddy U）关于上海的中学研究也尽可能地利用了有关部门的档案；³³周杰荣（Jeremy Brown）等编的论文集《毛主义在基层》，也较大限度地使用了档案资料。³⁴这些资料极大地提高了推翻旧说、创建新论的可能性。

对口述史的重视由来已久，但一些学者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尤其是1970年代的口述资料可能是需要被质疑的，一来当时的受访者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再者，他们存在较大程度的同质性，其代表性也需要被重新审视。此外，亲历者多已年迈，时间上的紧迫感也促使学者们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与应用。

地理上，学者们继续关注北京（学校）³⁵，不再局限于广东³⁶、上海³⁷、云南³⁸等几个城市，而是扩展到天津（小靳庄）、浙江、山东（即墨县）、西藏³⁹等地，对湖北武汉的文革亦有专题性研究。⁴⁰此前关于精英人物的研究多集中在毛泽东、刘少奇、江青、华国锋等人，⁴¹这一阶段除继续关注精英政治外，更多的研究转向基层社会。一些研究结合普通人物的生命历程，呈现了大政治环境下，个体与社会、国家的博弈、互动关系。⁴²这类著述或许暗示了西方学界对普通人物史的关注。此外，非政治史层面上的叙述越来越多，反映了学界的另一种研究趋向。

这一阶段出现的几部作品颇受国际学界瞩目。一是由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合编的巨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⁴³二是由麦克法夸尔与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合著的通史性著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该书史料丰富，许多来自他们从中国民间获得的私人藏品；内容上尽管着力于重建中国高层政治的历史，但也呈现了普通群众尤其是学生红卫兵的作用，对不甚被学界研究的“清查五·一六”与“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也倾注了一定篇幅。⁴⁴此外，魏昂德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的脱轨》

虽然不是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著，但其分析视角给人启发。作者以毛泽东为核心，阐释了那个时代频发的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原因。魏昂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从苏联引进的经济体制是两个相当重要的解释因子，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通过这些政治和经济结构，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同时也引发了意料之外的灾难性后果，包括文化大革命。⁴⁵

在研究主体上，除了一些老一辈学者依然关注文革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在中国留学或生活过，甚至亲历过文革的学者成为后起之秀，譬如沈迈克、裴宜理等。一批海外华人学者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及学术著作在文革史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如王绍光、金秋、高默波等。再者，中西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一些著作由双方共同完成，充分发挥了中外学者各自的优势，显示了文革研究不可阻挡的国际化趋势。

三、几个重要问题

截至目前，有关文革的研究涵盖甚广。大体上，研究内容和研究热点虽依时而变，但在一些问题上一直存在学术对话。因篇幅所限，下面仅就几个突出议题展开讨论。同时，为呈现199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新发现，对于之前的成果也将稍做介绍。

1. 学生、工人：人们之间为何对立？

文革期间，人们之间形成所谓的“派别”并相互对立甚至发生武斗，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目前，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两个主体。那么分歧为何产生呢？较为经典的解释模式有两种，即以李鸿永（Hong Yung Lee）为代表的“利益团体”模式及以魏昂德为代表的“政治网络”模式。

作为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早期代表，李鸿永的精彩分析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广州红卫兵为例，认为学生造反派（李鸿永称之为“激进派”）主要来自“资产阶级”（bourgeois）家庭，保守派则由出身好的人构成。前者要求改变现有政治秩序，后者作为既得利益者倾向于维持现状；且提到“激进派工人的特征与造反派学生的特征相似，唯一可能的区别是工人的不满更多体现在经济上”，大体上，合同工、临时工、非技术工、辅助工、徒工、半工半读的

工人（或学生）以及那些来自小厂（如手工业）的工人构成了激进派工人的主要力量。⁴⁶ 陈佩华（Anita Chan）、罗森（Stanley Rosen）、乔纳森·安戈（Jonathan Unger）等人就学生的派性形成对这一观点做了重要修正，⁴⁷但在理论模式上未有出新。

魏昂德在其影响甚广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认为是共产党在工厂创造的垂直的政治网络关系（“依附—庇护关系”）导致了工人的分裂。文革期间，表现为一方是支持企业党领导的“保守派”，主要由党员、积极分子和劳模组成，另一方是“造反派”，包括在过去被打击过而心怀不满的非积极分子，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偶尔犯了点政治错误或与领导关系不佳而前途无望的人。⁴⁸ 魏昂德笔下大多数造反派的“不满”主要源于物质上的被剥夺和（或）工作上的不稳定，因此，虽然魏的分析角度有别于李鸿永的利益团体取向，但实际上却与之不谋而合。⁴⁹ 需要指出的是，魏昂德的这一研究之旨趣并不在于剖析文革期间工厂的派性问题，不过，作为“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其在关涉这一问题时，所强调的乃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制度塑造了个体行为（尽管也关注到了二者之间的互渗关系）。显然，这一论调带有较为浓厚的“结构决定论”色彩。

此后，裴宜理及李逊等独辟蹊径，试图解释不同的工人团体的行动逻辑。她们发现了“经济主义派”。研究表明：上海工人分裂成了三派，即造反派——挑战党的权威，保守派与之相反，经济主义组织要求社会经济的公正待遇。人们为什么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分裂？裴等分别用文化心理（造反的个性）、政治网络和团体利益等概念予以解释，认为三者中任一理论都无法单独体现文革中的复杂情形。⁵⁰ 魏昂德在一篇书评中尖锐地指称：如果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运动的社会起因及特征是什么？”那么她们的研究则给予了令人满意的解答，但这一项研究并没有实现对于建立一种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性解释的目的。在魏昂德看来，较之理论创新，作者们对史实的重建之贡献似乎更大一些。⁵¹ 笔者认为，作者们的分析路径有益于启发后来者的思路，但将工人划分为三派的做法未免失之简单，也过于泾渭分明。所谓“保守派”“造反派”的成员组成及行为动机需要给予更为细致的研究；另外，该研究主要是围绕1966年到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时期，此后，

造反派内部继续分化，这一现象尚需得到进一步解释。针对这一问题，董国强和魏昂德以南京“一月夺权”风暴为例，认为这与相互敌对的造反派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地位不同有关。⁵²需要指出的是，该文着力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层面的互动关系，充分展现了文革的复杂面向。

魏昂德通过对北京高校的调查亦发现了“利益团体”和“政治网络”模式的局限性。文革初期，党的各级权威被打倒，政治网络即不存在了，且学校里支持和反对工作组的人往往家庭出身或社会地位都较好。魏昂德认为，派别的形成与红卫兵在工作组入驻学校时期的个人经历有关。面对易变的政治环境，学生不得不作出新的选择以避免成为政治牺牲品。⁵³这样的分析似乎暗含着作者视个体为理性行动者的假设，然而，“自利”取向是否就能完全解释学生们的行为呢？郑小伟（Xiaowei Zheng，音译）将研究进一步深化，并糅合了非理性因子，认为清华学生在1966-1968年间的行动与分裂，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激情、政治信仰和群体为生存而做努力造就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行动主义（activism）和分裂。这些因素所起的轻重作用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⁵⁴或许可以说，这一研究体现了作者对于理性选择理论⁵⁵与政治文化⁵⁶等理论的综合考量。

董国强与魏昂德以南京师范附属中学、南京大学以及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几个个案为例，再次挑战了“利益团体”模式中强调的群体团结，认为来自北京的含义模糊的政治号召，使得那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具有共同立场的人们难以在变化莫测、高风险的境况下作出相似的政治抉择。作者们还发现，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受中央第四机械工业部与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生产业务归前者领导，党组织关系则隶属于后者。这两级领导在“四清运动”期间的矛盾使得文革前该厂的干部、工人内部即已发生分裂，并成为文革时该厂出现两派对立群众组织的重要诱因。⁵⁷

杨丽君（Yang Lijun，音译）认为，魏昂德和董国强关于派系分化的最新研究（包括前述魏昂德对北京红卫兵的研究）尽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群众冲突，但作者并不赞同对“利益团体”理论模式予以否定。其表示为了更好地理解文革，我们必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前的历史尤其是“四清运动”给予更多关注。如上文所示，其实董、魏早已发现“四清运动”对文革派系的影响，只是杨丽君以山西省榆次市一国营棉纺厂为

例，对此给予了更深入的探讨，并直截了当地指出：文革期间派系的起源与“四清运动”密切相关，最初的群众冲突出现在“四清”干部与“四不清”干部之间，且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整个文革时期。不过，杨文的重点和亮点乃在于探讨派系领导人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作者分析了派系领袖如何形成，在派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们在与其他派别竞争时，是如何动员各种资源的。⁵⁸ 这些问题使派系研究进一步精细化。不过，笔者认为仅仅关注“四清运动”是不够的，还需追溯“四清运动”以前的历史，并从官僚系统、派系领导人、派系普通成员等各个层面进行多维探视。

最后，我们尚需注意的是，文革期间，并非所有的组织（或成员）都始终如一地“坚守”在一个阵营之内，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的派别也绝非仅有保守派与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内部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即便有“经济主义派”的存在，我们似乎也还应考虑到“老保守派”“极左派”，以及“逍遥派”，等等。如果对这些所谓的派别不予以重视，就容易使研究显得“大而化之”。

2. 个人与集体：暴力何以产生？

除“派性分歧”外，暴力冲突是文革期间的另一显著特征。晚近的文革研究者开始追问“红卫兵为何会对自己的同学与老师施暴？”“群众组织之间为何会发生冲突？”等问题。

一些学者试图将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与其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 Solomon）、陈佩华、卢西恩·派伊（Lucian W. Pye，又译为白鲁恂）从文化心理视角出发，分别用“权威家庭结构”“权威人格”及“道德义愤感”等关键词解释暴力的产生。⁵⁹ 另有学者也分析了红卫兵的成长环境与个人经历，但更细致地考察了他们对“人权”“正义”尤其是“阶级斗争”等概念的理解，并试图在这种思维方式与暴力行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⁶⁰ 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红卫兵暴力行为的理解，不过，学者们基本上将“红卫兵”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就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并非所有的红卫兵都参与了暴力行动。因此，我们应将未参与暴力者也纳入考察范围，方能使结论更具说服力。

另一些学者从更理性的层面予以探讨，试图以制度、政策、权力结构等为切入点，构建一种结构性解释。乔纳森·安

戈分析了毛时代的教育体制，认为文革期间学生组织之间的暴力反映了“不同学生团体之间基于向上流动问题的竞争与利益冲突”。⁶¹ 林恩·怀特（Lynn T.White III）侧重考察工人和邻里团体（neighborhood groups）。其以上海为个案，从基于“家庭出身”之上的“贴标签”政策，单位里上下级的“庇护-依附”关系，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等三个层面来解释文革前两年的城市暴力。⁶² 这令读者对文革期间的暴力缘起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问题是即便三个政策之间相互作用，但人们为什么非要以暴力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此外，作者过于倚赖报纸类资料，也使得微观维度的集体行动很难得到较好地说明。⁶³

鲁修元（Lu Xiuyuan，音译）指出文革中的大规模暴力，是人们对政府控制下的惩罚（punishment）和纪律（discipline）的双重策略反应的结果。⁶⁴ 还有研究者很自然地将暴力与毛泽东及其政策联系起来，如沈迈克即认为毛泽东对1967年的暴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其“武装左派”的政策加剧了暴力冲突。⁶⁵

集体屠杀是暴力的极端表现形式，亟待引起重视。苏阳（Yang Su）将广东、广西的集体屠杀事件与湖北的情况作比较后，发现集体屠杀在省与省之间差异巨大，这取决于各省群众组织与政府关系的模式。在两广地区，造反派被排除在新的地方政权（革命委员会）之外，致使胜利的一派更有可能放纵暴力行为以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作者提醒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屠杀是地方政府镇压的产物而不是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此外，即使集体屠杀最为严重的广西和广东，县与县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越贫困越偏远的县越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屠杀事件，这可能与国家无法控制基层官僚并对他们的行为问责有关。作者认为中央高层在屠杀事件中扮演了倡导性的角色（如宣扬阶级斗争论），然而，其政策同时又谴责地方上发生的极端暴力，作者视之作为一种无端失序的表现，并指出文革中集体屠杀的悲剧根植于国家倡导和国家失灵的吊诡之中。基于这样一种分析，作者提出了“社区模型”（the community model）理论，以挑战西方主流研究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所使用的国家政策模型。“社区模型”除考虑国家层面的政治和制度因素外，对地方上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条件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⁶⁶ 考虑到文革运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研究视角无疑是可行的。此外，作者对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法的运用，增强了结论

的可信度，亦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路径。然而，尽管作者对国家和社会在地方层面的互动给予了关注，但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譬如对中央高层、地方官僚、基层官僚与暴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作更精细的讨论：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关系？再如，两广地区的暴力事件历时不短，中央高层通过哪些途径知悉？何时知悉？中央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有何反应？为何有这些反应，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等等，都需进一步解答。

文革中，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武斗），对于这一现象，目前学界似乎甚少研究，也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外，以上研究，基本上将暴力缘起限制在毛时代的范围内考察，事实上，学生或民众的暴力行为在毛时代之前也时有发生，它们之间是否有所不同或相似？如有，应该如何解释这种异同？传统文化的规训譬如宽容、友爱、尊师尽孝等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或消逝？暴力情状下人们的心态如何？等等，似可进一步深掘。

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场怎样的运动？

1968年，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⁶⁷其作为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动之初就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学者们主要探讨了这一运动的性质、起因、过程及结果。下面，笔者将对此做一简要介绍。

就运动性质而言，有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一场为解决现代化的压力而产生的“中国式的大试验”，这一压力正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⁶⁸我们不难从中体味该观点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则认为这是一场“有着明确的政治思想目标的‘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毛泽东本人紧密不可分的。”⁶⁹“为什么要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是学者们争论较多的问题。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认为有两类目的，其一，经济方面，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集中和就业的压力以及促进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其二，意识形态方面，是为了改造城市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创造新人，反对特权，缩小“三大差别”（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⁷⁰潘鸣啸不否认这两类目的的存在，但不认

可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或经济学家们对这一运动所赋予的“合理性”，⁷¹ 其认为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1968年以后，经济动机虽然继续存在，“但下乡并不是唯一的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⁷²

1978年，著名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即知青上山下乡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包括党内、军内干部，城市青年及他们的父母、农民等）的全部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中国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能力呢？海伦娜·K·芮妮（Helena K. Rene）结合大量口述访谈与文献资料，认为高度有效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在推动上山下乡政策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⁷³

就运动的结果而言，伯恩斯坦认为知青下乡使农村在日常习俗、农业现代化、教育等方面受益，不过，要估计这种受益的分量如何却很难，这种贡献的全部价值是否超过了所有下乡工作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确定。⁷⁴ 应该说这种评价是较为谨慎的，毕竟作者所占有的资料有限，此外，文革刚刚结束也使得作者无法估计这一运动将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乔纳森·安戈对这一运动所造成的影响的估计明显要比伯恩斯坦更为悲观。他认为这场运动的代价是沉重的，引起了下乡知青、他们的父母以及农民的极大不满，也导致更多的城市犯罪活动，同时，使得学校的教育遭到破坏。⁷⁵

周雪光结合数据分析和对“社会分层”的考量之后，认为1967-1978年不利的“下乡”政策持久地影响了知青个体（individuals）的生命历程包括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官僚阶层有一定的能力降低这一政策对他们的子女所造成的消极影响。⁷⁶ 周文的研究颇具意义，使人们将视线转移到这场运动对知青自身的影响。不过，面对庞大的知青群体，数据分析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且周雪光文章中的个体乃是一种集合形式，我们无从得知真实的个体的状况。潘鸣啸基于翔实的文献与口述资料，在对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全方位以及更为细致的考察后，认为大体上，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显得相当负面。运动仅有的数项正面效应根本不足以抵消其给国家、全社会，尤其是给知青们带来的损失，一些恶迹昭彰的后果，影响深远。至于其正面意义则在于它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迫使毛泽东的继承者进行改

革，也令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与国家制度性质有关联的相当一部分问题。⁷⁷

韩起澜（Emily Honig）和赵晓剑（Xiaojian Zhao，音译）具体探讨了上山下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呈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面向。他们发现知青、知青家长和城乡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使文革期间的紧缺物质——从电线、广播器材到拖拉机、工业机械——从城市运往农村，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⁷⁸

海伦娜·K·芮妮（Helena K. Rene）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制造了复杂的公共行政，而这与文革本来的目标即遏制官僚主义是相悖的，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上山下乡在管理方面最大的失败是未能充分地保护知青使其免受伤害。此外，其对中国的行政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如腐败的扩散）。⁷⁹ 杨国斌梳理了红卫兵一代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经历，探讨了其内在的行动逻辑。认为红卫兵在参与上山下乡运动时期，思想发生了转变，地下文化运动诞生，且表明这种思想转变与文革结束后的激进主义如1970年代后期的民主墙运动有关联。⁸⁰ 1990年代，知青的集体怀旧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杨国斌认为怀旧实际上是知青对中国现代化环境变化的一种文化抵制形式，是知青身份建构的一种工具，其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转向以社会和文化为主，即从一种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⁸¹

以上这些作品还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譬如：哪些人下放，哪些人未被下放？选择标准是什么？自愿下放的青年有什么样的真实动机？被迫下放的青年，其政治态度如何？知青如何融入当地生活？这一运动激起了国家与社会不同层面的哪些矛盾？等等，这让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过程及结果有了更多的认识。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如函授学校等的作用与影响等值得探讨。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已有叙述或回忆中，大多是个人的苦难史，事实上，另一部分人的回忆却是相对美好的，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同，似乎也是可以继续追问的。

4. 城市之外：文革对乡村的影响究竟有多深？

除以上几个问题外，“文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学界

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研究者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并就其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作了较多探索。前述相关综述性的文章已有论及。随着研究的具体化、微观化，一些学者努力探寻“文革对于乡村的影响”。

鲍姆（Richard Baum）于1971年即就此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其主要依据文革时期的中国官方报纸和省级广播信息，认为“从1966年春到1968年秋中（mid-autumn），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便有，也是呈‘扩散型’的，越是靠近城市、铁路、公路或港口的地方，受文革冲击的时间越早”。“直到1968年秋到1969年冬农村开展‘斗批改’运动时，文革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才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concrete reality）”。⁸² 鲍姆聚焦于农村并能予以较为细致的考察，在当时大多数作品以研究中国高层政治为主的状况下显得颇为难得，但作者成文时文革尚在进行中，且资料有限，因此对文革影响的观察难免失当。乔纳森·安戈即认为文革前两年，运动就深入到了偏远的乡村，只不过镇（town）和县（county）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些农村发生了暴力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村内或村与村之间，且多与红卫兵或下乡知青的鼓动有关。⁸³ 简言之，文革对乡村（countryside）的影响要远大于鲍姆此前的估计。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魏昂德和苏阳开始对鲍姆和安戈的研究就时间、空间和原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他们依据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数千种县志，发现文革期间农村人口的死亡数字在75万到150万之间，相似数字的人受伤，360万人遭受了一定形式的政治迫害。伤亡事例绝大部分发生在1968-1971年，在普遍的造反和派性冲突结束之后以及暂时的地方权力机构建立之时。1968年以后，文革对农村的影响要比城市更为严重，且这种影响跟与城市的距离关系不大，城市的政治事件迅速而广泛地波及县城，对乡村的影响自然也就不远了。⁸⁴

一些学者针对“文革是一场灾难”的叙述，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高默波在《高家村：现代中国的农村生活》中探讨了高家村从1949年到1990年代中期的变迁。作者认为对高家村的农民来说，文革是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因为这一地区的教育、卫生、文化生活、体育活动等都处于最好的时期。⁸⁵

韩东屏以即墨县为例，认为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对于当地的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⁸⁶

无论如何，关于文革对农村的影响的评判需要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包括核心档案以及扎实的田野调查与合理的分析之上，以个案推演全局的做法难以令人信服，考察时亦需注意不同的地域与不同时间段上的差异，以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

5. 大陆之外：文革在海外的影响

文革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不光对中国大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还波及海外。

纽约城市大学历史学、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的书揭示了文革对法国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认为法国最优秀的一群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政治，“毛主义”被他们用作变革法国社会的工具。⁸⁷ Richard Curt Kraus 的《文化大革命：一个简短的介绍》结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呈现了文革与全球其他地方激进青年运动的关系。⁸⁸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以毛泽东的“红宝书”为切入点，重新审视二十世纪的全球史。具体而言，作者们探讨了“红宝书”在世界各地如坦桑尼亚、印度、秘鲁、苏联、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南斯拉夫、德国（东德和西德）、法国等地的影响，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精神原子弹”如何威胁着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⁸⁹

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考察了文革作为一种国际现象的修辞和现实状况，并呈现了文革在海外被理解和诠释的方式，阐释了毛主义及其实践对西欧和北美的反文化运动的不同影响。在欧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毛主义激发了达达主义（Dadaist）学生的抗议活动，培育了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争取权利的激进主义，并为城市游击队的恐怖主义提供了合法依据。在同时期的美国，它又为广泛的反种族主义民权运动以及狭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建设推波助澜。尽管毛泽东希望发动一场全球范围的持久革命，但从长远来看，西欧、美国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加速了激进左翼的分裂，而在1980年代及之后，则巩固和强化了右派的势力。⁹⁰ 还有一些研究则探讨了文革与1967年香港“五月风暴”之间的关联，⁹¹ 以

及文革对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漫画界的影响。⁹²

6. 文革“遗产”：文革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关系

更多的学者探讨了文革之于中国本土的意义，尤其着力于寻找文革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其实，早在 1985 年，裴宜理和 Christine P.W.Wong 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改革的起源要追溯到文革及其后果。⁹³ 1990 年代以来，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考察越来越多。经济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以中国 2000 多个县的新数据为分析基础，研究了四川、广东、江苏等省的县级工业化情况，认为毛时代农村劳动力所积累形成的技能资本加速了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而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发展正是延续了这一过程。⁹⁴ 冯客（Frank Dikötter）认为市场经济在来临之前，存在着一场由下而上的“静悄悄的革命”。冯指出文革晚期存在的许多分散的抵抗行动最终颠覆了计划经济。从内地一些最穷困的农村到沿海较为富庶地带的村民们与市场重新连接起来，这种静静的结构性的革命通常意味着得到了当地官员的默许（如果不是积极的协助）。总之，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设计师是人民，而不是邓小平。与中欧、苏联的领导们一样，邓小平除了顺应潮流外别无选择。⁹⁵

不光是经济层面，Richard Curt Kraus 还呈现了文革期间中国在中国文化以及外交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强调文革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⁹⁶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康浩（Paul Clark）的研究显示，文革时期文化上的“革命”是承上启下而非断裂的，是整个 20 世纪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⁹⁷ 德国学者巴巴拉·米特勒（Barbara Mittler）持相似观点，她认为文革期间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宣传艺术，而应被视为更广泛尝试创造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化的一个发展，其源头可追溯至 19 世纪晚期，且对当代中国仍产生着影响。⁹⁸ 在李洁（Jie Li）和 Enhua Zhang 编的论文集《中国的红色遗产》中，有学者探讨了文革时期的海报及其于文革结束后在民众中引起的不同反应；亦有涉及文革博物馆和纪念品的研究。⁹⁹

在政治方面，安舟（Joel Andreas）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今中国被“红色工程师”所统治。其以清华大学为例，认为文革前具有文化资本的旧的精英和具有政治资本的新精英，经过

五六十年代的抵牾，因文革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团结，并在文革后转变为一个新的阶层（**new class**），此即新的专家技术型干部（**technocrat**）的崛起。¹⁰⁰ 魏昂德则认为文革显著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减轻了市场化改革可能受到的阻碍；1970 年代中期，毛泽东在第二次打倒邓小平之前，曾短暂任命邓小平负责政党和经济的重建工作，无意中使其成为后毛泽东时代重建和恢复工作的领头人；再加上外交关系的变化等，这些都使得文革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奠定了政治基础。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相比，这一遗产的影响尤为显著。1980 年代苏联的政治环境截然不同，戈尔巴乔夫在根深蒂固的官僚利益面前，试图实施类似的改革，却最终导致苏联崩溃解体。¹⁰¹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后毛泽东时代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lexander C. Cook 展示了这一事件如何为转型时期社会公正的新模式奠定了基础，亦指出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内在的局限性。¹⁰²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者吴一庆试图反思文革及探索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起源。作者重新解读了文革期间出现的一些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不满的民间激进思潮，认为这些思潮最终对党和国家的权威造成了威胁，为此，中共不得不在 1970 年代末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消极政策。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共的合法性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新的矛盾，即社会和政治的再分化。毛泽东企图通过发动文革阻止革命的变质以及预防社会主义滑向资本主义，然而这恰恰是文革的后果之一，即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一个控制着文化、政治与经济的新的精英集团——“权贵资本主义”出现了。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作者认为我们应从文革和社会主义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即：没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制度和积极的民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不仅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且在历史上也是不可行的。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作者强调对资本和国家权力、对资本积累和官僚统治逻辑的批判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对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要求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提出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批判。¹⁰³ 越来越多的西方著述将文革与文革后的中国社会联系起来考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视野，但吴著的批判性历史视角似乎与众不同。该书出版后，获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最佳学术著作奖，值得关注。¹⁰⁴

另一些研究者在著作中似乎暗示了一种观点，即认为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败。这种失败的原因何在？余伟康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认为文革时期在学校层面爆发的冲突充分证明了中国的问题在于反官僚制，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在这方面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中国的组织空有现代化的外壳，却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技术效率。¹⁰⁵ 作者指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不过，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能否用来解释中国，或者说中国的组织建制究竟是不是反官僚制的，似乎值得商榷。此外，吴畅畅探讨了文革、1975年宪法等与20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宪政争论之间的关联。¹⁰⁶ 还有学者以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文革与邓小平改革时代的关联。¹⁰⁷

文革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其本身又是历史变迁的一部分。就文化大革命的“遗产”而言，现有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一些问题仍有待发掘，譬如文革对当年的儿童（包括小学生）、原造反派或保守派的子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烙印也许会越发明晰。

四、几个观察维度

研究文革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弄清文革，文革的所谓“活化石”意义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为我们探索社会冲突和历史变迁的动力机制及民众的行动逻辑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下面，笔者将就以下几个观察维度，评介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

1. 历史事件与政治运动的动力机制

探索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始终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课题。作为一场有着大规模群众参与的运动，且能持续十年之久，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这场运动还包含多次历史事件与政治运动，它们各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值得被重视？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为学者们提供了充分的观测对象，学者们的研究也为我们展现出文革的不同侧面。

澳洲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亚洲研究系教授孙万国（Warren Sun）与腓特烈·泰韦斯（Frederick C. Teiwes）教授围绕林彪事件，在探讨中国精英内部的政治游戏时，突出了毛泽东的作用。两人认为毛泽东缔造了一个集权政治体系（totalistic political system），在这个体系内，他的个人意志掌控着每一件事。¹⁰⁸更多的研究表明，毛泽东的作用是有限的。一些学者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官僚制理论（bureaucracy）和克里斯玛权（Charismatic authority）中寻求灵感，认为两者之间的共同作用以及相互冲突导致了文革的发生，并影响了其发展。¹⁰⁹

除精英层面的考量外，另一些学者还注意到普罗大众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王绍光、武丽丽认为毛泽东具有克里斯玛权威，而地方官僚势力、群众组织及个体却有理性的一面，因而毛泽东能够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却不能始终控制它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运行。¹¹⁰Elya J. Zhang 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普通群众的参与，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持续十年之久。¹¹¹

在制度层面，一些正式结构被认为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沈迈克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对1966–1979年间的政治进程和政策结果有明显的决定作用。¹¹²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对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其在文革时期的功能。¹¹³于新璐（Yu Xinlu，音译）考察了1965–1969年间中国的媒体如何被用来发动文革并使之继续发展；¹¹⁴Tuo Wang 的《文革与装模作样：政治与表演之间的动力》探讨了社会控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行机制，系统分析了在看似混乱的文革时期，国家如何利用政治仪式、革命性修辞、公共集会等动员普通民众。¹¹⁵余伟康以上海的中学为例，分析了文革前教师的录用、升迁机制以及收入差异等，认为文革时学校职工间的冲突根源于文革前的反官僚制（counter-bureaucracy）特征的教育体制。¹¹⁶

还有一些学者从“派系”等非正式层面来论证中国政治的动力。帕梅拉·路拜尔（Pamela Lubell）对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了梳理，阐释了“革命伦理”在这一事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认为文革的本质是所谓“白区党”和“红区党”的派性冲突。¹¹⁷黄靖（Huang Jing，音译）结合1949年前后的中共历史，揭示了派系对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和决策过程的影响。¹¹⁸ 不同于认为个体具有高度理性的认知以及学界盛行一时的“结构决定论”思路，美国弗吉尼亚州 Old Dominion 大学历史系教授金秋通过采访一些关键证人和参与者，探讨了个人的性格与喜好、经验、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等和“林彪事件”中的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¹¹⁹

2. 政治精英及其内部矛盾

政治精英是国家运行的关键性角色。尽管西方学界在早期对政治精英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受制于资料的欠缺，尤其是档案的不开放，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文革时期政治精英的了解依然模糊不清。地方官僚如何应对这一场运动？政治精英在运动中有什么不同的反应？中央高层内部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予以关注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

众所周知，文革初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一场破坏性极大的运动。一些研究试图挖掘政治精英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性作用。如 Dahpon David Ho 的研究表明，在“破四旧”运动期间，中共高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对地方上的文物保护起了关键作用，并较为详细地呈现了山东曲阜的地方官员如何利用革命修辞以图保护孔庙。¹²⁰ 与之类似，Denise Y. Ho 以上海为个案，反映了地方官僚在中央文革小组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创建的政治空间里如何控制政治运动所带来的破坏，并通过适应革命的修辞来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作者进一步认为，在文革期间，存在一个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合法化运动以保护历史古迹和文物。¹²¹

有学者注意到文革中的地方干部与宗教发展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研究表明，在政治高压的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依然对农村日常生活和农民的行为具有较大影响，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宗教呢？王晓璇（Wang Xiaoxuan，音译）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反思宗教政策与地方实施之间存在的脱节。其以浙江瑞安县为例，发现 1958 年以来根除宗教活动的运动只是加剧了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政府并未完全实现控制宗教的目标。文革中，瑞安的基督教教会数量甚至显著增加。作者认为宗教政策的模糊不定（甚至前后矛盾）与基层干部的执行不力为宗教活动提

供了生存空间。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宗教政策使得直接控制和管理宗教的地方干部经常手足无措，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基层干部与普通村民类似的传统宗教观念，这使得干部不仅成为实行宗教控制的目标，亦是实行宗教控制的阻碍，因为他们自身通常也参加宗教活动。¹²²S. A. Smith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王晓璇的结论。作者发现文革中，由于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忙于参加学习班，因而未能注意到宗教组织的“复活”。此外，一些官员和党员认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并不矛盾，有的甚至参加了宗教团体。¹²³

以上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地方官员行为逻辑的认知，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官僚系统并非铁板一块。董国强和魏昂德的研究更清晰地呈现了这一特征。他们考察了1974年南京的“批林批孔”运动，呈现了南京的老干部群体与把持地方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这与杭州、武汉等地的运动形势不同。¹²⁴Richard Kraus 通过对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于会泳（曾任中国文化部部长）的职业生涯与个人命运沉浮的探究，分析了文革期间的文化政策，展现了中国政治内部的深刻矛盾。¹²⁵一些西方学者往往将文革理解为“极权统治”下的“权力斗争”，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Alessandro Russo 对此并不满足。他向读者呈现了1975-1976年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如何评价文革等问题上的政见冲突，试图提醒人们重视这两年对中国未来局势的重要意义，此外，他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¹²⁶

总的来说，关于精英政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对中央高层核心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还需继续挖掘，且我们对较低层级或文革中新上升的中共领导人（如庄则栋、乔冠华、毛远新、张铁生）也知之不多。¹²⁷文革中，中央各部门（或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党政军内部及其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都需进行专题研究。再如，文革初，全国大多数地方及单位的党政干部均受到冲击，为什么有些官员却安然无恙？其中存在怎样的选择机制？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3. 毛主义国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前述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研究重心逐渐从精英政治转向普罗大众，这固然与资料的日趋丰富有关，但也体现了

西方学界在研究取向上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普罗大众是城乡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日常生活可以折射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无法达到的部分。¹²⁸ 学者们通常有意或无意地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¹²⁹作为问题导向，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类研究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关注国家对社会层面的影响。如 Anne-Marie Brady 以“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由北京的部分外国专家构成）为例，从外交政治的角度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政策变化如何影响了1966—1969年期间这一组织内部成员的命运。¹³⁰ 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的周杰荣以天津为个案，考察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并结合当时的国家政策，反映了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以及文革时期城乡分裂状况下的个人经历，认为整个毛泽东时期，农村较城市而言，处于更劣势的地位。¹³¹

其二，国家与社会的互渗关系。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些研究以长时段的历史为经，将广阔的社会与政治变革相联系，体现了两者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再现了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农民的生活逻辑。¹³²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个体与社会及国家的博弈、互动关系。如乔纳森·安戈以杨曦光为个案，考察了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以及杨曦光如何走上文革之路及其在文革中的表现，看到了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如何影响了个体的政治观点。¹³³ 魏昂德根据最新的原始资料，以原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为个案，探讨了文革初“工作组时期”的政治如何影响了红卫兵的分裂，证明家庭背景并不是决定个体行为选择的关键性因素。¹³⁴ Elya J. Zhang 以李庆霖在文革中的命运起伏为切入点，考察了个体如何应对周身环境的变动，个体的选择是怎样形塑了其角色，文革给他及其后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¹³⁵ 周杰荣以河北、河南几个农民为例，呈现了农民在1960年代至1979年间如何应对阶级标签的变更及其在文革中的遭遇。¹³⁶

其三，强调社会层面的自主性。这一种研究取向关注社会层面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自我逻辑。如余伟康以上海的中学为例，发现学生在批判、斗争教师的同时，教师也利用这一机会去攻击他们的同事包括学校党委领导，一些教师甚至是红卫兵运动的实际领导者。¹³⁷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林立，其印发的各种传

单、小报等呈“井喷式”发展。沈迈克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关注，分析了文革前两年群众组织“信息网络”的运作模式，并将整个毛泽东时期这种非官方的文化空间纳入考察视野。作者的研究暗示文革初期这一现象的发生，至少表明社会层面的信息交换和获取在文革前即已存在。¹³⁸

一些研究清晰地表明国家对社会控制是有限的。如何江穗(He Jiangsui, 音译)围绕山西杨家沟村一个地主的死，分析了1968-1969年中国农村的道德困境，作者发现共产党统治后所灌输的“阶级斗争”意识，从来没有被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边缘人物——杨家沟村民所完全接受。¹³⁹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对乡土中国的影响(或控制)其实是有限的，社会层面具有一定的弹性和自主性，文革至少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对历史的延续性造成多大影响。美国学者James Palmer以唐山大地震为切入点，指出中国政府未能迅速对唐山大地震作出积极反应，加之民众的痛苦遭遇以及1976年发生的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事(如周恩来的逝世、所谓“四人帮”的活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1976年民众对文革的不满与抵触达到了顶点。¹⁴⁰沙青青以一本日记为例，考察了文革背景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基层民众的震后心态。原本作为革命生活政治仪式的日记写作在文革末期逐渐转向为个人化表达需求，¹⁴¹这表明基层民众并不往往是被动地被国家形塑的。

冯客的新作描绘了文革时期发生在基层的“悲剧”故事，并鲜明地呈现了这一时期不被政权所容许的社会活动在民间如何继续存活。这些活动包括收听地下电台、参加地下歌唱社、读书会、文艺沙龙等；地下工厂和民间市集有所复苏；基督教和佛教仍保留了很大的力量，信徒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等等。简言之，文革时期，民间社会存在各种各样对国家控制的规避和抵制活动。¹⁴²这些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于文革的认知。

4. 非政治史的叙述

1966年以来，西方学界对于文革的研究大多从政治史角度切入，关注精英政治、政策的制定、历史事件与社会运动等。我们对政治运动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当时的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了解甚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著述不再紧盯政治层面，而向社会生活史、新文化史¹⁴³方向发展，大大

拓展了文革研究的范畴。

在社会生活史方面，马丁·金·怀特（Martin K. Whyte）探讨了文革期间中国的城市生活，简要评论了文革时期市民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社会秩序、风俗习惯、文化娱乐、家庭生活、亲属关系上的改变以及文革对市民的心理所造成的影响。¹⁴⁴另有学者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考察了文革期间（1966-1976）中国的社会空间转型。作者认为乌托邦的共产主义愿景和城市发展实用主义共同推动了城市转型，这种转型很难用成功或失败来界定，其对文革后的政治领域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作者亦提醒我们尽管杭州的许多社会空间特征在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但我们还是应注意区域差异。¹⁴⁵

陈佩华、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合著的《毛邓体制下的陈村》，反映了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对村庄的冲击，作者们结合村庄的权力斗争情况，展现了陈村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社会变迁史，包括陈村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演变。¹⁴⁶孙沛东以广东省为例，探讨了文革时期的民众日常着装。一般而言，文革时期的着装被认为具有同质化和禁欲主义特征，但作者表示自文革初，民众就通过有意无意地日常着装“越界”行为表示抗争，并以此显示动机、阶层、性别和地域层面的差异。¹⁴⁷

一些作品关注了文革时期的婚姻与性活动。西方学界历来就毛泽东时代阶级与婚姻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的张卫国（Zhang Weiguo，音译）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作者依据在河北三县三十个村庄收集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了阶级分类如何影响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的择偶和婚姻模式，其指出：虽然婚姻主要发生在同阶层之间，跨阶级的婚姻确实存在，不过，文革期间，对立阶层之间的结婚率相对于文革前和文革后要更低。阶级的政治分类对不同的经济群体（如地主和富农子女、中农和上中农子女、穷人）和性别群体的婚姻影响不同。这可能表明中国革命通过这种阶级分化的婚姻习俗重塑了社会分层体系以及代际阶层流动的途径。¹⁴⁸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文革至少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对历史的延续性造成多大的影响。如韩启澜（Emily Honig）通过对文革期间的“性”（sex）的考察，认为“婚前性行为、婚外

恋、色情文学、卖淫、流产等现象在‘文革’中也存在”。¹⁴⁹ Heather Worth 等人结合中国 4 个城市的 31 名中国同性恋男子的口述访谈，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文革期间（1966–1975）同性恋男子的生存经历。作者们认为虽然同性恋男子受到严重的迫害，但混乱的局面在较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人身自由以及探索同性关系的机会。¹⁵⁰ 该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了以往学界甚少研究的同性恋群体，从而有助于读者了解毛泽东时期的政治与性活动及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只是一个初步探讨，但却具有开拓性意义，值得重视。

在文化艺术方面，西方一些学者对文革期间的音乐活动做了较多探索，研究主题包括革命歌曲、西洋音乐、地方戏曲、农村音乐、少数民族音乐、音乐与传承、音乐与国际关系等。¹⁵¹ 康浩致力于体现文革时期的文化维度。通过对样板戏、电影、革命芭蕾舞剧、经官方出版的小说、地下文学、美术甚至建筑等的考察，作者呈现了文革时期艺术上的创新与成就，推翻了“八亿人看八个戏”的一般性认知。¹⁵² 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文革“灾难”形象之外的另一面，使读者对文革和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全面的理解。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等主编的《动乱中的艺术：文化大革命（1966—1976）》和巴巴拉·米特勒（Barbara Mittler）的文章《八亿人民八个戏》也对文革时期的艺术发展进行了探讨。¹⁵³ 此外，Yu Youn Ju 研究了文革期间的海报（posters）展览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用来控制社会的一种有效方式。展览会显示了海报在宣传毛泽东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体现了普通群众对中国未来所寄予的希望，并影响了文革后中国的艺术发展。¹⁵⁴ Stephanie Hemilryk Donald 探讨了 1949 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海报在中国电影中的运用情况。¹⁵⁵ 还有研究专门探讨了文革中的音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民众、艺术家、政治领导人等的持久影响。¹⁵⁶

在医疗卫生与科学方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小平（Fang Xiaoping，音译）结合档案及口述史料，以浙江省为个案，探讨了 1968–1983 年间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中所起的作用，呈现了这一体制的变迁过程。作者强调，作为国家政策的实践者以及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赤脚医生在社会主义农村医疗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有别于“赤脚医生是中医”的一般性认知，方小平认为

赤脚医生实际上加速了西药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并保证其影响到中国最偏远的村庄；赤脚医生奠定了农村医疗卫生的基础，即科学化、医疗制度化与专业化，而这些依然是当今中国农村医疗的关键主题。¹⁵⁷ 西方学界关于赤脚医生的学术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因此，该研究显得颇为重要。不过，香港城市大学学者范家伟（Ka-wai Fan）指出，尽管作者关于农村医疗的西方化论证引人入胜，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譬如这一结论是否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赤脚医生的回忆相符？¹⁵⁸ 事实证明，该学者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¹⁵⁹

Sigrid Schmalzer 为我们展现了在“依靠群众”的口号下，1971-1978 年期间古人类学的发展。作者认为普通群众在这个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¹⁶⁰ 在另一本论文集中，作者还呈现了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间中国的农村青年与科学实验运动。¹⁶¹ ChunJuan Nancy Wei 和 Darryl E. Brock 编的论文集探讨了科学与文革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关系，主张重新评估文革。研究对象包括数学、宇宙学、航天工业、赤脚医生制度、人口政策等，反映了文革期间科学与科学家的命运，并将其根源追溯至五四运动，又将其影响延展至文革之后。¹⁶² 以上这些研究改变了我们对文革的刻板印象，丰富了我们的认知。

新文化史除偏重于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或文化层面外，也倡导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¹⁶³ 某种程度上，这也属于一种政治文化视角。有学者分析了文革期间的公众批判会，探讨了“语言”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旧的社会秩序被急遽改变时，“革命者”也需要寻求简单的一致的话语以实现其目标。¹⁶⁴ 一般认为，文革是“去性别化”的时期，Rosemary A. Roberts 以样板戏为例修正了这一观念，其探讨了文革时期性别和性别特征的符号学意义，认为即使看似无性别或男性化的现象，实际上充满了传统的性别意义和价值观，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作者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阳”和“阴”的概念，认为前者代表男性、善，后者代表女性、恶，样板戏中的“革命”和“反革命”，分别具有男性化和女性化色彩。¹⁶⁵ 有学者则从民族志的角度呈现了文革以来官方对重庆红卫兵墓地悼念活动的态度变化轨迹，进而阐释国家话语和公共道德的演变。¹⁶⁶

众所周知，文革亦是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挥到淋漓

尽致的时期。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欧洲学者雷大年（Daniel Leese）的著作——《表演的政治与僵化的偶像：中国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崇拜》，深入探讨了《毛泽东语录》的由来以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运作、结果及其存在的问题等。¹⁶⁷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宗教，通过聚焦于文革期间的仪式活动，呈现了这一政治宗教与中国传统宗教和西方市民宗教之间的异同。研究表明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政治领导人利用仪式作为一种夯实权力的工具，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在文革结束后，政治宗教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依然存在。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影响力明显下降。¹⁶⁸庄爱莲（Woei Lien Chong）主编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叙述和后毛时期的反叙述》论文集中，荷兰历史学界德海尔（Barend J.ter Haar）分析了传统神话学范式（甚至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¹⁶⁹荷兰汉学家兰斯伯格（Stefan R.Landsberger）通过对偶像、符号和仪式的探讨，研究了毛泽东的神化过程。认为1966-1969年期间，毛泽东的形象体现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海报中，但是从1969年到1976年，有关他的画像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而到文革迅速落幕后，毛的大幅画像再次出现，这是使他的继任者华国锋合法化的一种努力。¹⁷⁰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西方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所谓“记忆的转向”。在这种趋势下，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被纳入史学研究。¹⁷¹德国汉学与政治学家娜拉·索斯密卡特（Nora Sausmikat）分析了女性“老三届”（文革时曾下乡的女性知青）的生活经历，结合她们的自传，探讨了文革后的主流话语如何强烈地影响了她们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她们也在设法创造性地改变她们的叙述，以便保持这样一种感觉，即她们的经历不管是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有意义的。¹⁷²沈迈克认为，这种对记忆和话语分析的路径，体现了文革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¹⁷³文学或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认为是对“记忆”的一种折射。秦丽雁（Liyan Qin，音译）选取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两部较有影响的小说加以比较，结合两位作者的经历，分析了二者为何对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农村经历有截然不同的描述。作者认为，文革尽管已经结束，但它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¹⁷⁴一些

研究者从政治学和记忆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宋彬彬道歉事件的背景、结果和影响，认为对于文革的记忆仍然是不同记忆团体和多样化叙事的战场，是文革中各种斗争的延续。¹⁷⁵“记忆”的“隐喻”何在，与历史的勾连在哪里，仍是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五、余论

综上所述，西方学界就文革研究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受篇幅和能力所限，一些研究不能一一列举，譬如关于文革时期的对外关系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不过，大多数学者将此时的外交政治置于冷战史的背景下考量，因有相关综述性文章，¹⁷⁶笔者在此不做赘述。总的来看，新资料的发现、新的史学理念的引入以及研究主体的变化都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革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宏观的叙述与微观的研究兼而有之，在“眼光向下”的认知下，更注重微观层面。

一些学者视角各异、观点有别，很大程度上与他们采用的理论模式或受模式的影响程度有关。诸如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1990年代以后被借用较多的理性选择理论、政治文化理论等之于文革研究（或与之相关）的应用情况，一些著作已有评介，¹⁷⁷在此不做详论。任何一种理论框架的出现或使用，总会受到或多或少的批评与质疑。如同学界反思的一样，各种模式或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是需要被考量的。同时，在谨慎使用的情况下，我们也应乐观地看到，不同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提问方向和观察途径，作为一种认识工具，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政治进程及个体的政治行为，导引我们走向历史的宏深面向。这种理论视野，也是值得中国本土学者借鉴的。

除理论上的优势外，西方的文革研究数量之多，涉猎之广也应得到重视，其甚至在一些尚未被本土学者开发的议题上也都多有关注，值得我们学习。不过，作为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运动，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人）尚且对文化大革命存在或多或少的“隔阂”之感，而西方人要理解文革可能就显得更加不易。受中西文化背景、制度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著述难免会体现出一些偏见或不足。不过，随着中西学界的交流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有中国背景的学者

（如前所述）加入文革研究的队伍中来，这一缺憾可能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西方学界”主要指美国，兼及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另，所讨论的文革研究成果主要指1990年代至2016年间的英文类著述，其中有少量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

2 因划分标准各异，西方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止时间尚存分歧，除与中国官方规定的“文革十年”保持一致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文革实际上是1966-68年。持这一看法的代表者有：Lynn T.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1; Anita Chan, "Images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The Changing Perspectives of Canton Students", *World Politics*, 34: 3 (Apr., 1982), pp. 295-323。另一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文革的跨度应为1966-69年，如：Robert Michael Field, "Slow Growth of Labour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Industry, 1952-1981",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6 (Dec., 1983), pp. 641-664; [法]潘鸣啸 (Michel Bonnin) 著，欧阳因 (Annie Au-Yeung) 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页4。为方便讨论，本文所指的文革为1966-1976年。

3 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二十一世纪》，总31（1995年10月号），页79-91。

4 如李长山：《德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3期，页38-41；康松编译：《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3期，页14-15；刘小萌：《西方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页29-32；徐友渔：《一代人的外部形象——西方学者对中国红卫兵的研究》，载《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页268-283；邱新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载金大陆、金光耀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页621-637；李环、蔡灿煌：《他者眼中的文革音乐文化》，《中国音乐学（季刊）》，2012年第1期，页24-31。另，陈鹤：《新世纪以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页99-100）中有部分内容涉及西

方研究成果：王朝晖撰写的《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回顾了美国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并试图挖掘1966-1969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认知因素；佟新、沈旭的《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页42-54）涉及不少西方学界相关成果；此外，王景伦撰《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侯且岸撰《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书中，均有一定篇幅讨论海外学界对文革的研究状况。

5 参见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6 [澳] 腓特烈·泰维斯（Frederics C.Teiwes）：《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页72-73。

7 裴宜理撰，黄育馥摘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页64。

8 Thomas W. Robinson (ed.)，*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参见王朝晖撰：《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页5。

9 参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页80。

10 Michael Oksenberg，*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 in Review*（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8）；John Wilson 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Cambridge,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 1970）；Richard Baum and Louise B.Bennett（ed.），*China in Ferm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11 郑宇硕、罗金义编：《政治学新论：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402。

12 “毛主义”的概念最先由哈佛学者史华慈（B.Schwartz）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一书中提出，试图说明毛个人的思想是不同于马列主义传统的又一种“主义”。这一概念后来成为西方文革研究中的重要词汇。西方有关“毛主义”的研究状况，参见毕剑横：《国外毛泽东研究评介》，《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页81-86；尚庆飞：《西方学者视域中的“毛主义”：文本阅读与模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页58-67；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页39-45。

13 这一时期的资料较少，但美国较重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如汤遣文、马唯一：《有关红卫兵和“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料》，Tang, Raymond N., and Ma, Wei-yi, *Source materials on Red Guards*

and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n Arbor: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另,美国国务院将其收集的“红卫兵”出版物分两批分别转交给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美国图书馆协会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4 1975、1980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先后共编成28卷《红卫兵资料》,向公众开放,是西方同类型资料中最全面的一种。English titl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Red Guard Publications. 20 vols*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5); *Red Guard Publications, Supplement I. 8 vols*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80)。

15 如邹谠即认为“极权主义”带有政治色彩。这一模式不仅是学术上发展的结果,亦与冷战有关。是为了适应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斯大林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需要提出的。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为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23。

16 又称“利益团体”(group interest)模式。多元主义假定权力的分布是分散的,认为社会中包含许多与官员有联系的团体,它们在利益和价值方面相互冲突,各种集团通过自己的资源即支持率取得影响力,因而直接、主动、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构成了基本的政治生活秩序。见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页15-23。

17 这种范式的转变及研究对象的变化,可参见 Lu Xiuyuan, “A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Popular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67: 4 (Winter, 1994-1995), pp.533-563。

18 [美]特里尔·E.劳兹(Terrill E. Lautz),齐克彬译:《中国研究的再创新:新人新貌——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50周年学术会议而作》,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77-78。

19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5。

20 见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HUP, 2006), P.x. 本书中文版见关心译、唐少杰校《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9年)。

21 Joseph W. 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 由 China Study Group (中国研究小组)、Monthly Review (《每月评论》杂志)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一同举办。参见:<http://chinastudygroup.net>。(2011年检索)

23 据了解，此次会议没有形成专门的论文集。该会议信息参见乔君、陈鹤、翟亚柳：《二〇〇八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页113-114。

24 会议论文收录于 Paul Clark, Laikwan Pang, and Tsan-Huang Tsai (eds.),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25 参见：《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http://icscc.fudan.edu.cn/index.php?c=fwxz&a=show&id=421>。（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2017年8月检索）。

26 参见：《记忆》（科隆会议专辑），总期162，2016年7月31日。

27 参见：麻生晴一郎：《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在中国发生的现象》（2016年11月21日），<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4003>。（2017年8月检索）

28 David P.Nickles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18, China, 1973-1976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8) . 详情参见乔君、陈鹤、翟亚柳：《二〇〇八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页114。

29 Yuan Zhou (ed.),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 Newspapers*. 20 vol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99) ;Yongyi Song (ed.),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40 vol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Yongyi Song (ed.),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52 vol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30 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anham, Maryland, Toronto and Oxford: The Scarecrow Press, 2006) .

31 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ed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econd edition)*, (Lanham·Boulder·New York·Lons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

32 Joseph W.Esherick, Paul G. Pickowicz and Andrew G. Walder(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26.

33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 Eddy U, *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4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5 如魏昂德和郑小伟(音译)探讨了北京红卫兵的派性分歧,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Xiaowei Zheng, "Passion, Reflection, and Survival: Political Choices of Red Guards at Qinghua University, June 1966-July 1968",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29-63;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另, 安舟以清华大学为个案的研究还可见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1: 4 (Aug., 2002), pp.463-519; "Institutionalized Rebellion: Gover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5 (Jan., 2006), pp.1-28.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即有学者关注北京地区的文革, 如 Victor Nee and Don Layma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36 如李鸿永、陈佩华等人以广东为例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 1975), pp. 645-683;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 1980), pp.397-446.

37 如 Nee, Victor, "Revolution and Bureaucracy: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Nee, V. and Peck, J.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1975), pp.322-414; Andrew G.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38 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考察了1967-1980年间云南省省级领导的人事变动情况, 认为中央与地方层面的领导人会因利益的考量而彼此依附, 前者很大程度上通过任免省级精英夯实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后者则并非始终与前者保持一致。地方领导会根据政治情势选择或变换“庇护人”, 同时, 创建新的地方同盟, 寻求更低一层次(县)的支持。见 Dorothy J. Solinger, "Politics in Yunnan Province in the Decade of Disorder:

Elite Factional Strategies and Central-Local Relations, 1967-1980",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pp. 628-662.

39 Jeremy Brown, "Staging Xiao jin zhuang: The City in the Countryside, 1974- 1976",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153-184;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 1976* (Armonk: M.E.Sharpe, 1990); Dongping Han,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Ru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Jimo County", *Modern China*, 27: 1 (Jan., 2001), pp. 59-90; Melvyn C. Goldstein, Ben Jiao and Tanzen Lhundrup,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ibet: The Nyemo Incident of 196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作者主要考察了文革期间西藏的“尼木事件”，认为其与汉藏民族矛盾没有关系，而与公社化、粮食政策以及群众组织“造总”与“大联指”之间的派性斗争有关，在这一斗争中，个别群众组织头目试图利用藏民对转世神灵的迷信以夺取权力。)

40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英文版：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1 Ross Terrill, *Mao: A B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Pye, Lucian W,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Lowell Dittmer, *Liu Shao-chi'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Witke, Roxan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Michel Oksenberg and Sai-cheung Yeung, "Hua Kuo-feng's Pre-Cultural Revolution Hunan Years, 1949-66: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Generali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9 (Mar., 1977), pp.3-53.

42 如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1 (Jan., 1991), pp.3- 37; Andrew G. Walder, "Tan Lifu: A 'Reactionary' Red Guar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0 (Dec., 2004), pp.965-988; Elya J. Zhang, "To Be Somebody: Li Qinglin, Run-of-the-Mill Cultural Revolution Showstopper",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211-239.

43 [美]R·麦克法考尔、费正清编，俞金尧等人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译）

44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45 Andrew G.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6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64 (Dec., 1975), pp.645-683; 另见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8, p.340.

47 见 Stanley Rosen, Comments o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 1977), pp. 390-40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P. 397。可参见: 徐友渔: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 页 86-87。

48 魏昂德著, 龚小夏译: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年), 页 274。

49 Jonathan Ung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 2007), pp.109-137.

50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189-196.

51 Andrew G. Walder,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lizabeth J. Perry, Li Xun, " *The China Journal*, No. 39 (Jan., 1998), pp. 115-118.

52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3 (September 2010), pp.675-692.

53 Andrew G. Walder,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2 (May, 2002), pp. 437-471. 又, 魏昂德的这一观点在其新书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中有较为详尽的阐述。

54 Xiaowei Zheng, "Passion, Reflection, and Survival",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63.

55 不同于社会结构决定个人行为的宏观分析取向, 理性选择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微观行为机制的研究方法, 着重强调个人的能动性。关于该理论的阐释可参见何高潮: 《政治现象与政治学研究: 一个理性选择论的看法》, 载郑宇硕、罗金义编: 《政治学新论: 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 页 53-83;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著, 陈义彦等译: 《政治学方法论与途径》(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7年), 页 75-105。在文革研究领域, 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可作为运用这一理论的代表作。

56 学者黄秀端认为, 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认知 (perceptions)、信念 (beliefs) 和价值 (values), 皆曾被称为政治文化。有关该理论的阐述可参见黄秀端: 《政治文化: 过去、现在与未来》, 载谢复生、盛杏媛主编: 《政治学的范围与方法》(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0年),

页 253、254、278。

57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no. 65 (January 2011), pp. 1-25.

58 Yang Lijun, "From the 'Four Cleans' Movement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Origins of Factional Conflict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3: 3 (December 2015), pp.1-24.

59 参见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页 213-217。

60 Jing Lin,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1), pp.163-164.

61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35.

62 Lynn T.White III, Policies of Chaos, pp.8-9.

63 Anthony Oberschall, Review: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 2 (Mar., 1991), pp. 207-208.

64 Lu Xiuyuan, "A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Popular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acific Affairs*, 67: 4 (Winter, 1994-1995), pp. 533-563.

65 Michael Schoenhals,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Great Chaos'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 (Jun., 2005), pp. 277-300.

66 Yang Su, *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译：《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的集体杀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另，作者关于该主题的较早研究，见 Yang Su, "Mass Killing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Study of Three Province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96-123.

67 这一运动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本文仅探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

68 [美] 托马斯·伯恩斯坦著，李枫等译：《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年出版），页 1。英文版：Thomas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69 [法] 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北京，中国大百科，2010 年 1 月），页 419。另，如

前所述, 潘认为文革只有三年, 即 1966 年 5 月到 1969 年 9 月。因本文探讨的运动与潘所指为同一事件, 故而并不受到影响。

70 [美] 托马斯·伯恩斯坦著, 李枫等译: 《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 页 1-10。又见 Thomas P. Bernstein, "Urban Youth in the Countryside: Problems of Adaptation and Remed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9 (Mar., 1977), pp. 75-108.

71 认为这一运动具有合理性成分的代表如下: Pi-chao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 Educated Youths, and the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4: 3 (April 1972), pp. 361-386; D. Gordon White, "The Politics of Hsiangsiang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9 (Jul. - Sep., 1974), pp. 491-517.

72 潘鸣啸: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页 21, 419, 420。

73 Helena K. Rene, *China's Sent-Down Gene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cies of Mao's Rusticati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74 [美] 托马斯·伯恩斯坦著, 李枫等译: 《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 页 248-285。

75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p.168.

76 Xueguang Zhou and Liren Hou,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 1 (Feb., 1999), pp.12-36.

77 潘鸣啸: 《失落的一代: 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页 418。另可参见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社会学研究》, 2005 年第 5 期, 页 154-181。

78 Emily Honig and Xiaojian Zhao, 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22 (June 2015), pp.499-521.

79 Helena K. Rene, *China's Sent-Down Gene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cies of Mao's Rustication Progra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76-179.

80 Guobin Ya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

81 Yang Guobin,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29: 3 (Jul., 2003), pp. 267-296.

82 Richard Baum,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Anatomy of A Limited Rebellion", in Thomas W. Robinson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 367, 454-464.

83 Jonathan Unger,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th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153 (Mar., 1998), pp.82-106.

84 Andrew G. Walder and Yang S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3 (Mar., 2003), pp.74-99.

85 Mobo C.F.Gao, *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London: Hurst and Co. Publishers, 1999; also issued by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99.) 高默波关于文革的正面评价还可见: Mobo Gao, *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Ann Arbor, MI: Pluto Press, 2008) 在这一研究中, 高认为文革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如它鼓励草根参与管理, 激发了民主意识; 提高了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 提升了妇女地位, 发展了大众文化等, 其最终改变了中国社会。

86 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1966-1976*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Dongping Han,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Ru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Jimo County", *Modern China*, 27: 1 (Jan., 2001), pp. 59-90.

87 Richard Wolin,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88 Richard Curt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9 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0 Julia Love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Legaci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227 (September 2016), pp. 632-652.

91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s.),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92 Erik Esselstrom, "Red Guards and Salaryme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omic Satire in 1960s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4: 4 (November 2015), pp.953-976.

93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uses, Content, and Consequences,"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no.2.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2.

94 Chris Brama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ral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95 Frank Dikötter, “The Silent Revolution: Decollectivization from Below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27 (September 2016), pp.796-811.

96 Richard Curt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7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8-9.

98 Barbara Mittler,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2), p.10.

99 参见 Li, Jie, and Enhua Zhang (eds.), *Red Legacies in China: Cultural Afterlive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

100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另, 安舟的类似观点还可见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31, No. 4 (Aug., 2002), pp. 463-519.

101 Andrew G. Walder, “Bending the Arc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Paradoxical Legac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27 (September 2016), pp.613-631.

102 Alexander C. Cook,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ial: Mao and the Gang of Fou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03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04 宋国庆、董国强:《社会主义中国的危机与转型——评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二十一世纪》,总期 156 (2016 年 8 月号),页 119-120。

105 Eddy U, *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106 Wu Changchang, “Debates on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Legac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27 (September 2016), pp. 674-696.

107 Alessandro Russo, “Mummifying the Working Clas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Fates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27 (September 2016), pp. 653-673.

108 Frederick C.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相似的论调还可见: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March 2007) .

109 Joel Andreas, "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3 (Jun., 2007), pp.434-458.

110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Wu Lili, *The Dilemma of Charismatic Authority: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同一主题的研究见:武丽丽、赵鼎新:《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载《二十一世纪》,总期101(2007年6月号),页58-70。

111 Elya J.Zhang, "To Be Somebody: Li Qinglin, Run-of-the-Mill Cultural Revolution Showstopper",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238.

112 Michael Schoenhals, "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 1966-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5 (Mar., 1996), pp.87-111.

113 [瑞典]沈迈克著,黄语生译:《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页97-105。

114 Yu Xinlu, *The role of Chinese medi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5-1969)* (Ph.D.Dissertation, Ohio University, 2001) .

115 Tuo W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veracting: Dynamics between Politics and Performance* (Lanham, MD: Lexington, 2014) .

116 Eddy U, *Disorganizing China: Counter-Bureau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117 Pamela Lube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the Sixty-One Renegade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New York: Palgrave, 2002). 有关本书的评论可参见董国强:《道德原则冲突下的囚徒困境》,《二十一世纪》,总期118(2010年4月号),页152-156。

118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

119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20 Dahpon David Ho,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Resisting the Destroy the Four Olds Campaign, 1966-1967,"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64-95.

121 Denise Y. Ho, "Revolutionizing Antiquity: The Shanghai Cultural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7 (September 2011), pp.687-705.

122 Xiaoxuan Wang, “The Dilemma of Implementatio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90”, in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59-278.

123 S.A.Smith, “Redemptive Religions Societies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1949 to the 1980s”, in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49-351.

124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No.212 (December 2012), pp. 893–918.

125 Richard Kraus, "Art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e Minister Yu Huiyong", in William A.Joseph, Christine P.W.Wong, and David Zwei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219-241.

126 Alessandro Russo, “How Di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The Last Dispute between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1975”, *Modern China*, 39: 3 (May, 2013), pp.239-279.

127 William A.Joseph, Christine P.W.Wong, and David Zwei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84.

128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 年第 1 期，页 78。

129 佟新与沈旭曾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介绍了西方学界的文革研究成果，不过，其文章主要涵盖 20 世纪 70 年代—90 年代间的部分著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完善。参考佟新、沈旭，《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一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 期，页 42–54。

130 Anne-Marie Brady, "Red and Expert: China's Foreign Friends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in Woei Lien Chong and Lowell Dittmer (eds.),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P.93-137.

131 Jeremy Brown, *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 Negotiating the Div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32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first ed.1984). 经修订后, 中文版于 1996 年出版, 陈佩华、赵文词、安戈: 《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农村》(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33 见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 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1 (Jan., 1991), pp.3-37.

134 见 Andrew G. Walder, "Tan Lifu: A 'Reactionary' Red Guar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0 (Dec., 2004), pp.965-988.

135 见 Elya J.Zhang, "To Be Somebody: Li Qinglin, Run-of-the-Mill Cultural Revolution Showstopper",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211-239.

136 Jeremy Brown, "Moving Targets: Changing Class Labels in Rural Hebei and Henan, 1960-1979", in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51-76.

137 Eddy U, "Leninist Reforms, Workplace Cleavages, and Teacher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7: 1 (Jan., 2005), pp.106-133.

138 Michael Schoenhals,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f 1966-1967, in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30-258.

139 Jiangsui He, "The Death of a Landlord: Moral Predicament in Rural China, 1968-1969",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124-152.

140 James Palmer, Heaven Cracks, *Earth Shakes: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and the Death of Mao's Chin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

141 Sha Qingqing and Jeremy Brown, "A drift in Tianjin, 1976: A Diary of Natural Disaster, Everyday Urban Life, and Exile to the Countryside", in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79-195.

142 Frank Diköt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6) .

143 关于社会生活史和新文化史的介绍, 可参见项义华: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学科定位》, 《浙江学刊》, 2011 年第 6 期, 页

33-41; 周兵:《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页152-158;张仲民:《追随伯克:文化史的学术史与方法论》,《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页144-148。

144 [美]R·麦克法考尔、费正清编,俞金尧等人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页713-726。(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译)

145 Zhu Qian, "China's Pre-reform Urban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Hangzhou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36: 2 (Dec., 2014), pp.181-203.

146 Anita Chan, Richard Madsen,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first ed.1984). 经修订后,中文版于1996年出版,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农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147 Peidong Sun, "The Collar Revolution: Everyday Clothing in Guangdong as Resista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227 (September 2016), pp. 773-795.

148 Weiguo Zhang, "Class Categories and Marriage Patterns in Rural China in the Mao Era", *Modern China* 39: 4 (2013), pp.438-471.

149 Emily Honig, "Socialist Sex: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Modern China*, 29: 2 (Apr., 2003), pp.143-175.

150 Heather Worth, Jing Jing, Karen McMillan, Chunyan Su, Xiaoxing Fu, Zhang Yuping, Rui Zhao, Jia Cui, Angela Kelly-Hanku & Zhang Youchun, "'Under the Same Quilt': The Paradoxes of Sex Between Me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4: 1 (2017), pp.61-74.

151 详情参见李环、蔡灿煌:《他者眼中的文革音乐文化》,《中国音乐学(季刊)》,2012年第1期,页24-31。

152 Paul Clark,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153 Richard King with Ralph Croizier, Shengtian Zheng, and Scott Watson (eds.), *Art in Turmoi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Vancouver: UBC Press, 2010); Barbara Mittler, "'Eight Stage Works for 800 Million People':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Music—A View from Revolutionary Opera", *The Opera Quarterly*, 26: 2 - 3 (March 2010), pp.377-401.

154 Yu Youn Ju, *Revolutionary voices: Cultural Revolution posters from the Crane House* (M.A.Masters,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2008).

155 Stephanie Hemilryk Donald, "Red Aesthetics, Intermediality and

the Use of Posters in Chinese Cinema after 1949”, *Asian Studies Review*, 38: 4 (2014), pp.658-675.

156 Paul Clark, Laikwan Pang, and Tsan-Huang Tsai (eds.), *Listening to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usic, Politics, and Cultural Continuit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157 Fang Xiaopi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

158 Ka-wai Fan, Review: Fang Xiaoping,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2: 4 (November 2013), pp. 974-975.

159 如在王胜对河北省深泽县的研究中，一位赤脚医生即口述回忆，当时在一些病案中，西药不如中药有效、受欢迎。见王胜：《赤脚医生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原因分析——以河北省深泽县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页112。

160 Sigrid Schmalzer, "Labor Created Humanity: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on Its Own Term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185-210.

161 Sigrid Schmalzer, "Youth and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 in 1960s-1970s Rural China", in Jeremy Brown and Mathew D. 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54-178.

162 Chunjuan Nancy Wei, Darryl E. Brock (eds.), *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

163 高卫红：《关于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的几点思考》，《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7期，页89-90。

164 Ji Feng Yuan, Koenraad Kuiper and Shu Shaogu, "Language and Revolution: Formula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19: 1 (Mar., 1990), pp. 61-79.

165 Rosemary A. Roberts, *Maoist Model Theatre: The Semiotic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

166 Everett Y. Zhang, "Grieving at Chongqing's Red Guard Graveyard: In the Name of Life Itself", *The China Journal*, No.70 (July 2013), pp. 24-47.

167 Daniel Leese, *Performative Politics and Petrified Image: The Mao Cult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emen, 2006)

168 Jiping Zuo, "Political Religion: The C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Analysis*, 52: 1 (Spring, 1991), pp. 99-110.

169 Barend J.ter Haar, "China's Inner Demons: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emonological Paradigm", in Woei Lien Chong and Lowell Dittmer (eds.),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p.27-68.

170 Stefan R.Landsberger, "The Deification of Mao: Religious Imagery and Practic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yond", in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pp.139-185.

171 邓京力:《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族创伤——读柯文 *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页139。

172 Nora Sausmikat, "Resisting Current Stereotypes: Privat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Former Rusticated Women", in *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narratives*, pp.255-283.

173 [瑞典]沈迈克:《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浅论今日欧洲“文革学”的几本新作》,《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7年10月,页52。感谢沈迈克亲赐此稿。

174 Liyan Qin, "The Sublime and the Profan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Fictional Narratives about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pp.240-265.

175 Chris Berry, Patricia M.Thornton, Peidong Su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ries and Legacies 50 Years 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 227 (September 2016), pp. 604-612.

176 关于文革时期外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肖军:《80年代以来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页102-111;唐小松:《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5期,页116-128;陶季邑:《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述评》,《史学集刊》,2006年第6期,页27-33;陶季邑:《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页86-94;何慧:《国外学术界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最新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页115-119。关于这一时期外交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可参看《中共党史研究》杂志每年关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述评,如:翟亚柳、乔君、陈鹤:《2010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

页 103-104；陈鹤：《2014 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第 10 期，页 92-93；翟亚柳、乔君、陈鹤：《2015 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10 期，页 117-118。

177 可参见李英明：《中共研究方法论》（台北，扬智文化，1996）；郑宇硕、罗金义编：《政治学新论：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谢复生、盛杏媛主编：《政治学的范围与方法》。

关于文革的回忆、记录和研究

——近 20 年进展综述

徐友渔

按照大多数中国人的算法，2016 年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动 50 年，结束 40 年的周年纪念。在这一年，除了文革发生地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关于文革的发言、研究论文、回忆和资料在各种研讨会、刊物、媒体、网站上如井喷般涌现，对其庞杂、丰富的内容作整理、介绍，并对近 20 年有关文革的研究和发表情况加以梳理、归纳、总结提炼，将有助于对文革的理解与研究。本人不揣冒昧，尝试这一工作，由于水平和资料阅读条件的限制，挂一漏万的情况难免，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可以把进入 21 世纪前后几年当作文革言说的分水岭和新起点，在文革 30 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日本等地的文革研究者、经历者、关心者、社会组织、刊物、媒体等发表了大量有关文革的论著、评论、回忆和其他文字。在这之前，关于文革的言说基本上出自西方，而从这时起，中文言说处于主导地位。¹

利用电子手段搭建文革言论的平台，是 1996 年之后的新现象、新特点。由《华夏文摘》编辑部于 1996 年春季提议，网站《网上文革博物馆》于 1999 年 10 月正式建立，在此前后，网刊《往事》《记忆》《昨天》等陆续面世，使许许多多文革的研究者、经历者、关心者有了说话的地方和交流的平台，尽管它们还没有形成巨大的传播空间。《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于 2002 年出版发行，该资料库提供了 3000 多万字可检索的关于文革的第一手材料，为文革研究者和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这 20 来年，大量有价值的书籍成批地出版，它们不但加深、拓宽了人们对于文革的了解，甚至改变了固有的文革图景。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介入文革很深而且当时握有权势的人物撰写的回忆录，比如所谓“林彪集团干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又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的回忆录，再如当时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自然有自我辩解之词，有意无意地歪曲性叙述，对事情原委的错误解释，但它们的价值是无可否定的，它们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了印证、比对、分析，从而探索真相的可能。高文谦在 2003 年出版的《晚年周恩来》对于揭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以及上层权力关系格局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材料。还有群众组织头头（比如黑龙江的范正美，内蒙古的高树华，上海的徐景贤和沈福祥，安徽的梁守福，重庆的李木森，湖北的杨道远和魏绳武，北京的孔丹，等等）的回忆录，文革中进行思想理论探索而受到镇压者（比如湖南的杨曦光，广东的王希哲和刘国凯，湖北的鲁礼安，等等）的回忆录，其中包含的史料之丰富，观察之犀利，反思之深刻，让研究者和后来人感慨不已。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起，以香港的各家出版社为基地，出版了不少严肃认真或者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著作，比如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1999），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2003），印红标的《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2009），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2010），启之的《内蒙文革实录》（2010），徐海亮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0），等等。

与材料的急剧膨胀和极大丰富相对应，这 20 年研究的突出特点是话题的多元和观点的分歧，经历文革的一代人大多已届晚年，一吐为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而学术研究的规范和传统尚未形成，因此在各个方面呈现多为自说自话状态。这说明，文革的研究和言说，目前还处于探索成长期。

地区、部门、学校、事件的文革话题

30 年来，以中国各个地区、部门、学校、事件为话题的文

章、书籍、回忆录、资料大量涌现，常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势。

材料最丰富的要数对于上海文革的回顾和论说。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6），她与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1997），李逊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对于上海的文革进程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何蜀的“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2月号）、李逊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2月号）、王锐的“‘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31日，第55期）、顾训中的“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4月号）对于上海文革运动的性质、事实、群众组织、风云人物都做了新的解读，表现了重新认识文革的努力。基于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电子刊物《记忆》在2010年11月15日和2011年12月29日（总第62和79期）作出两期“上海文革专辑”，刊载有关上海文革各方面情况的文章十多篇。还应提及的是，由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的《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出版了自印本，它包括《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上、下）》《叶昌明工作笔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文献汇编》《上海红卫兵大串联史料选》和《复旦大学文革大事记》。

董国强在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和江苏省的文革运动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论文有：“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性与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9月30日，第54期），“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6月30日，第63期）。他采编出版《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2009），网刊《昨天》在2012年8月30日第8期刊出“董国强南京文革研究专辑”，其中包括董国强所写的“南京大学文革造反第一波”等3篇文章，他与Andrew G. Walder合写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等4篇文章。该刊还在2012年12月30日第12期发表两人合写的《1974：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另外，董国强还在《记忆》上发表《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2011年1月30日，总第67期），《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2011年7月30日总第73期）。乔晞华的著作《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则对南京一起发生在运动初期的具有独特性的事件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

对某个省区的文革运动有多种论著加以反映或研究的情况还有：内蒙古（除启之的著作外，还有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杨海英的日文和中文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广西（《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晓明的《广西文革痛史钩沉》，《昨天》于2014年4月30日总第33期刊出广西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4篇）；四川（《昨天》于2013年4月30日总第16期、2013年12月30日总第30期、2014年8月30日总第38期刊出四川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14篇）；青海（《昨天》于2015年7月30日总第55期、2016年5月30日总第70期刊出青海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15篇）；山西（赵瑜著《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石名岗执笔《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昨天》于2013年7月30日总第19期、2013年9月30日总第22期刊出山西文革专辑，包括有关文章10篇）。

文革中，有些大学或中学的运动特别引人注目，这些学校的校友们又有心回顾、反思当年的历史，于是这些学校的文革历程被反映得比较充分。这样的大学有清华大学（除了蒯大富的回忆录，还有对立派头领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叶志江的《走出文革》，以及孙怒涛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邱心伟、原蜀育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昨天》于2015年4月30日总第50期推出清华文革回忆反思专辑，《记忆》于2010年10月10日总第59期、2010年10月20日总第60期推出清华大学文革专辑，共收材料12篇）；北京师大女附中因为有打死校长卞仲耘事件而引起强烈关注和校友的积极反响，成为全国的关注点（《记忆》从2010年4月28日总第47期到2014年1月15日总第106期共

6 期发表有关材料 30 余篇)。

关于部门文革运动的书，引起重视和评论的有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恽仁祥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

引起集中关注和讨论的文革重大事件有如“二月镇反”(徐友渔的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昨天》2016 年 5 月 30 日总第 69 期的“二月镇反”专辑辑录文章 10 篇)和“七二〇事件”(见《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从 2006 年 3 月 20 日总第 322 期到 2007 年 7 月 18 日总第 422 期上多篇文章，前面提到的徐海亮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更是作出了翔实、周密的辨析)。

西方研究者对 1967 年香港发生的左派造反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中国季刊》上一篇题为“香港 1976 年暴乱：殖民地总督的外交与内政前线”的文章分析了香港总督戴麟趾、英国驻北京使团、伦敦英国外交部对待香港暴乱态度的微妙差别，以及港督的强硬压制态度如何占据上风，港英当局是如何抓捕左派、取缔左派报纸和关闭左派学校的。² 类似而更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见论文集《香港五月的日子：1967 年的暴乱和突发事件》。³

对农村文革的研究出现了新篇章。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5 卷中，作者断言文革基本上没有波及中国农村，徐友渔在书评中提出异议。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苏阳根据对 1520 个县的县志研究再次断定，说文革对农村影响甚微的观点不正确，情况正好相反。作者粗略统计，中国农村在 1968—1971 年期间死亡人数在 75 万至 150 万之间，造成终身残疾者的人数与此相近，遭受政治迫害这人数为 360 万。⁴ 陈意新在探讨农村造反运动的原因时，通过对两个农村点的梳理，把源头追溯到四清运动。作者的结论是：四清运动是理解农村文革造反运动的关键。⁵

文革研究的重点转向对于各个地区、部门、学校、事件的更具体、更详细的研究，表明文革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以前的叙述和研究集中在最上层的决策和权斗，以及个人回忆和对于个人遭遇的描述，而缺少对于“中间层”的了解，其实，“中间层”的情况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对文革的全方位研究势必要发展到重点关注“中间层”。

对暴力、武斗、迫害、屠杀的聚焦

文化大革命与其名称相反，不是一场有关文化的革命，而是充满了暴力、武斗、迫害和屠杀，但在有关文革的叙述和研究中，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反映了这一点，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特点的意义也没有深入发掘。

王友琴在2000年10月创立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她尖锐指出：“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观的中心。”她孤军奋斗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暴力和迫害问题进入人们视野的中心。

王友琴还记载和分析了北京大学文革期间由于暴力迫害造成的死亡，她指出，虽然63人多数死于自杀，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死亡之前受到的各种残酷殴打和虐待。⁶唐少杰则分析了清华大学非正常死亡中自杀居多意味着什么。⁷张晨晨在分析文革初期的暴力时强调文革与之前17年之间的连续性，1966年夏天的暴力主要是单向性的、具有仪式性的、并不着眼于权力争夺的身体迫害。⁸至于北京其他单位和全国其他地方的非正常死亡，在《昨天》的2013年11月30日总第25期、2016年6月30日总第72期的非正常死亡专辑中有进一步的反映。

文革中的武斗是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也构成了所谓“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方面的叙述、讨论和分析相当多，文革中重庆的武斗十分突出，《昨天》的2014年6月30日总第35期和36期（增刊）、2015年9月30日总第57期刊登3期重庆武斗专辑文章11篇。而该刊在其2014年3月30日总第31期的武斗专辑第2集中则集中描述了虐杀俘虏的事件，另一武斗专辑是在2012年3月31日总第3期，上面有关于武斗的文章11篇。

宋永毅在《文革大屠杀》的前言中指出，文革中的大屠杀是“中共的国家机器行为”。徐友渔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一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视无睹，这是另一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一重耻辱。”

《当代中国研究》在10余年的时间内发表了多篇关于暴

力与屠杀的论文：宋永毅的“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吴迪的“1967年内蒙古‘造反派’与内蒙古军区的冲突——文革中军队向学生开的第一枪”（2002年第3期），苏阳的“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2006年第3期），林启山的“文革时期湖南省邵阳县‘杀黑风’事件始末”（2009年第3期），申晓云的“文革中枪杆子里面出革委会——广西‘武斗’真相”（2013年第1期）。

关于文革中的暴力、武斗、迫害和屠杀，最有分量的两本书非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和明镜出版社出版的史料《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莫属，这是两部篇幅巨大、内容沉重的书。《血的神话》详细描述了那场发生于1967年秋季，造成道县一县死亡4519人，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15000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杀人的大悲剧。丁东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1967年的道县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当局编撰的官方内部档案资料，详细记载了广西文革，特别是其中发生大屠杀的全过程，包括人吃人的骇人听闻的惨剧。宋永毅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这一机密档案的出版将给文革研究带来不少新课题和新挑战。确实，广西的杀人和吃人风潮无可置疑地揭示了文革中长期不为人知，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认的极端违反人性的一面，它们将使任何美化文革的说辞不攻自破。

在《二十一世纪》2016年6月号总第155期的“文革五十周年专辑”中，有两篇文章讨论上述话题，一篇是宋永毅的“广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另一篇是严飞的“政治运动中的集体暴力：‘非正常死亡’再回顾（1966—1976）”。

对文革的总体评价

对于众多的文革研究者来说，萦怀于心的大问题是要对它做出一个总体评价，包括回答这样的问题：文革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它给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当时间正是逢十的周年纪念时，对这类问题的兴趣和热情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文革发动 40 周年的 2006 年，“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 3 月 24—26 日举行，与会者讨论了关于文革评价标准问题，丁东在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中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颂扬文革；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批评和谴责文革，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开始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⁹

《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总第 93 期做了一期“文革四十周年”专辑，艾恺（Guy Alitto）在“文革：四十年后的破晓”中自问自答：“再过一百年，历史学家将如何铭记和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我的论点是，毛泽东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反现代化）。文革将首先作为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反现代化’现象而被人们所铭记。”在回答文革是权力斗争还是理想的冲突这个问题时，他说：“再过一百年，人们在研究文革时也许不会那么看重权力斗争的一面，而会把文革中体现出来的毛主义的理想蓝图看成是最主要的。”¹⁰

法国社会学家杜兰（Alain Touraine）在回答“能否将文革视为一场社会运动”时回答说：“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将其界定为‘反社会运动’，即它与社会运动背道而驰。”“第一，文化革命不是从基层发起的运动，它主要是由毛发动的；第二，文革模式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所谓‘炮打司令部’，即是说号召全体人民起来铲除那些需要被铲除的人，那么这就只是战争模式、矛盾对抗模式，而不是社会冲突的模式；第三，文革运动已经没有共同的认同，因为它是文化价值层面的运动。”¹¹

白霖（Lynn White III）在文革 30 周年时指出，对于文革的实质和起源存在争论，结论取决于对文革的定义，他认为文革最重要的特征是大规模并且持久的政治强制（包括暴力）。文革的发生与其归结为思想意识，不如归结为社会形势；关于文革发生的责任，与其追究领导人个人，不如追究社会集团；文革起因既不是短期的，也不是长期的，而是中期的。¹²

谈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描述、总体评价、发生原因分析以及责任追究等问题时，我们必须提到关于文革的三部鸿篇巨制，以下简要介绍它们的文革观。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发动的外部原因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反对斯大林、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内部原因则是毛泽东对于形势的估计，他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他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尤其是在高层掌握权力的领导人。

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中主张，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社会中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一个庞大的、追求私利的官僚集团，毛泽东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他在运动初期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在运动后期为了恢复秩序又支持官僚遏制造反派。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和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而最终的胜利者是官僚，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冯克（Frank Dikotter）在《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 1962-1976》（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People's History, 1962-1976）中从社会层面这样描述文革：不论是平民还是精英，许多人在运动初期因为被揭发和恐惧而自杀；在个人崇拜的风气中，各地、各单位掀起制造毛主席像章的狂潮，与此同时，牟利的动机普遍存在，黑市交易火热；从1967年底起，置身于运动之外的“逍遥派”发展壮大，他们热衷于听音乐、看小说、旅游，黑社会和犯罪团伙在城市蓬勃发展；文革中政策朝令夕改，使得农民的自发生产活动有可能回归市场，在有些地区，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集市贸易都非常活跃，计划经济和公社化管理形同虚设。

重新审视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出人意料的事件，同时也是意义最深远的事件。林彪事件刚一发生，中共中央就为这一事件的性质、起因、情节等提出了一整套说法。这些说法不合情理，

难于令人信服。早在1993年，作者之一为吴法宪女儿的一篇题为“林彪事件：20多年之后”的文章就对官方的说法提出强烈挑战，并考虑事情另外可能的真相。¹³接着，这位作者又出版专著，以对林彪事件当事人的大量采访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情况的熟稔为基础重新解释林彪事件。她的主要论点和林彪女儿的观点一致：针对毛泽东的活动不应该由林彪负责，主要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干的。¹⁴

林彪事件本身属于宫闱政治，异常诡秘，要还原事件真相很不容易。但在林彪事件发生30多年之后，研究者们还是纷纷质疑官方旧说，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毛泽东指控说，林彪及其追随者提出设国家主席，这是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王年一、何蜀对此表示不认同。二位作者缕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党内高层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指出不只是林彪，而且是大多数人都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没有当国家主席的意图，毛散布说林想当国家主席缺乏事实根据。毛打倒林彪，不是林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是另有原因。¹⁵

针对官方把林彪“九一三”出逃事件定性为“抢班夺权、叛党叛国、仓皇出逃”，王年一、何蜀、陈昭著文认为，林彪外逃事件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作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九大之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地位迅速上升，有“羽翼丰满、尾大不掉”之势，习惯于大权独揽的他感到惴惴不安，他采取以下方法逼迫林彪：明批陈伯达，实指林彪；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所谓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以削弱林彪的军事指挥权；以敲打黄永胜等人的手法剑指林彪，逼林认罪；最后，南巡“打招呼”，公开去林意图。¹⁶

对于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质疑和争论的声音更多，涉及的问题有：林彪是否有谋害毛泽东的阴谋，林彪是否有武装政变的阴谋，所谓“九八手令”是否真的出自林彪，林彪是否真有“南下广州另立中央”的打算，林彪是否企图外逃苏联，等等。许多论者认为，官方给出的说法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不能令人信服。¹⁷

《记忆》从2011年3月30日总第74期到2011年11月30日总第78期推出“九一三”专辑或专论“九一三”事件的文章，5期共刊出文章近40篇，除了学者的研究性论文，还包括“林

彪集团”成员及其子女的文章、对话，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与感受。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林彪事件在广大人群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人们对于官方的解释并不相信，文革路线由此而走向破产。

已故著名史家高华对于林彪部属及其子女和一些论者同情或正面评价林彪的主张提出异议，他认为，林彪从深居简出状态出山强力支持文革，既有毛泽东拉的一面，也有他的权力野心的一面；林彪及其集团在文革中并非一味消极应付，而是利用时机大力追求政治权力的扩张，兴风作浪之事不少；在林彪及其集团的权力膨胀对毛泽东的绝对垄断权力形成妨碍和威胁时，毛林的矛盾开始发展加剧，并以林彪和妻儿的悲剧性死亡结束。他认为，评价林彪事件应考察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1950年代之后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¹⁸

21世纪以来，关于林彪事件的书籍大量涌现，比如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2004），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2006），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2006），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2012），启之、何蜀编《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周年后的回忆与思考》（2012），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2013），等等。当然，这些书的价值和真实性是参差不齐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但中国人的有关研究却起步很晚，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见有关知青的文艺作品。与之相对照，西方学者的重视程度要高很多，人们至少可以见到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发表于70年代的学术专著《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乡下的迁移》（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此书于1993年以《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为名翻译出版，在中国仍然是知青研究的先声。

进入1990年代之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字骤然涌现，有分量的研究性著作也不断问世：刘小萌、定宜庄、史为民、何岚著《中国知青事典》在1995年出版，定宜庄著《中

国知青史——初澜》，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在1998年出版。在2009年，有关知青研究的大部头著作的出版呈现大面积丰收之势：潘鸣啸著《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繁体字版，法文原文版2004年，大陆简体字版2010年，英文版2013年），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顾洪章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在10年之后经修订再版。以上著作，有的全方位地呈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全面分析了运动的起因、问题、结束、后果，并与文革前的知青下乡动员、苏联的类似运动作了对比，有的收入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2009年这三个时期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代表性论述，有的披露了官方的有关决策过程和原始资料，总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10多年的努力，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形成了高潮。

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引起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动运动的原因何在？伯恩斯坦夫人在《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前言中用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来加以解释，潘鸣啸认为仅仅经济解释是不够的，他认为还有意识形态原因（再教育和缩小“三大差别”）和政治原因（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从伯恩斯坦发表的对《失落的一代》的书评看，他同意并赞扬潘鸣啸的观点。¹⁹

《二十一世纪》2013年4月号做了一个“知青与当代中国”的专题，回应中共18大后“知青从政”的广泛议论。潘鸣啸在“‘文革一代’上台执政：差异何在？”中指出，与利益相比，代际因素的分量并不是很重，18大登上最高位置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是典型的知青一代，由于自身经历，他们会有新的领导风格，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突破与创新。徐友渔在“上山下乡对知青一代思想形成的影响”中说明，下乡后目睹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耳闻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和后果，使知青告别了以前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化教育，但对中国现实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拥抱人类政治文明，那还需要有对于世界大势与潮流的把握。丁东在“知青经历和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中从具有底层经验、深知农民疾苦、习惯毛式语言、时露江湖习气等方面分析了具有知青经历的从政者的精神特质，并指出，知青时代的遗产中包

含某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因素需要认真清理而不是盲目赞美。

《昨天》2015年5月30日总第51期是知青专辑，发表文章9篇，其中马昌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逆历史潮流的反现代化运动”指出，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走的是一条与加速城市化进程的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在强制性政治动员之下，知青的基本人权（温饱权、受教育权、择业权、选择居住地权、满足文化娱乐精神需求权）被剥夺或践踏；知青下乡实际上是与农民争地争粮，并把城市文革中搞阶级斗争和极左的做法带到农村；许多知青在身体健康、家庭婚姻生活等方面造成终生无法弥补的创伤。

《记忆》在2015年12月31日总第146期推出知青专辑，发文章5篇，在2016年12月15日总第177期推出上山下乡专辑，发文章4篇。其中任国庆在“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年祭——民族灵魂之管窥”中得出结论说，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来观察，它是反文明运动；放到人性立场去考量，它是反人性的运动；放到法律层面去考量，它是一次政府违法行为。也有人论及知青下乡的正面作用，在一篇题为“在毛主义的中国下乡知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文章中，作者论述了知青下乡后对当地经济、技术、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不仅是知青带去了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派出知青的大城市、知青们有权力、有资源的父母和亲戚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和地位而给予知青接受地的巨大支援，这包括物资、技术、资金、培训各个方面。²⁰

潘鸣啸在“中国知青‘失落一代’受限的、扭曲的然而鲜活的记忆”中详尽分析了上山下乡知青在时隔几十年之后的集体记忆，这代人顽强地想要表达记忆的努力和官方竭力控制、扼杀记忆的压制行动形成对抗和拉锯战，作者认为，对苦难岁月的记忆有可能导致赔偿的要求和对执政合法性的动摇。²¹

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和一代人的思想转向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思想高度统一，毛泽东思想指导一切，但运动开展不久很快就出现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和文革指导思想不一致的主张和理论，这是年轻的文革参与者自主思考的结果；而在学生退下政治舞台的前后，经历文革的一代人中开始出现

了怀疑、反思、批判、反对文革的倾向。对异端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内容的描述与分析，对一代人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和过程的剖析，是近20年文革研究的一个重大主题。

宋永毅早在1996年《二十一世纪》8月号上就发表“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他介绍了遇罗克在《出身论》，李一哲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中追求人权、平等和民主的思想，还介绍了湖南“省无联”、湖北“北、决、扬”，上海“中串会”等组织的激进思潮，以及文革中其他有影响的非官方思潮。次年，宋永毅和孙大进编辑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出版，该书收罗了文革中出现的主要异端思潮的原始资料，并在“总论”中阐明了异端思潮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各种异端思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诉求，并指出读书运动和社会考察在促进异端思潮成熟时所起的作用。

徐友渔在发表于1996年《二十一世纪》10月号上的“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一文和《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指出，经历文革的年轻一代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根本转变发生于文革期间，而不是文革结束之后，更不是有人到西方留学之后，思想转向的原因是：一、文革政治的无原则、阴暗、残忍令人反感；二、被迫上山下乡看到的贫穷、落后的现实使“制度优越性”的教条破灭；三、林彪事件对旧信念的巨大的破坏性作用；四、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和异端思想对同代人的影响。

宋永毅在《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上发表“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青年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他指出，最先使青年人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比如对于巴黎公社原则的推崇，提倡独立思考，打出人权牌和民主牌等等，而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使异端思想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中对于文革中青年一代的民间思潮、怀疑思潮、反叛思潮等作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梳理。

不少人对于文革中的读书活动，对于思想探索和思想立场的转变作了具体、生动、精彩的回忆和记叙，下面是随手从网站上摘录的例子。

文贯中（上海市徐汇中学高三年级）：“无辜的反动学生难忘的农村岁月”（华夏文摘增刊，第二四八期）；阿城：“听

敌台”（华夏文摘增刊，第五四八期）；葛岩（西安第七十一中学）：“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华夏文摘增刊，第五五七期）；奚学瑶（北大学生）：“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七四期）；千山暮（安徽芜湖第一中学，高三，19岁）：“关于文革的一次口述史访谈”（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六六期）；唐燕：“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华夏文摘增刊，第八七三期）；阎淮（清华学生）：“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与反思（下）”（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二期）；叶文宪（安徽，高二）：“插队散记”（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http://mjls.hk.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66>）；吴明明：“插队记零”（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http://mjls.hk.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123>）。

杨国斌的《中国的红卫兵一代和政治积极性》是研究异端思潮、下乡经历、地下读书运动，一代人思想转向和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新著，他在书中把下乡经历描述为对于红卫兵一代人是一个去神圣化、常规化、肯定日常生活价值的过程，使得这一代人的激进主义减弱，并在后来成为改革政策的社会基础。²²

文革的社会生活史视角

从地域文化和社会生活史视角研究文革，是近年来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研究者刚开始是不得已采纳这种方式，然后逐渐感受到其好处，最后认为这是正确的和值得提倡的方向和方法。这种视角的提倡者和践行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2011年7月3日，文革电子刊物《记忆》编辑部对他进行了采访（见2011年12月30日，总第79期）。他说，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方便和高层档案不开放，谈论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很大，在“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倡导各地学者进入文革区域史研究，不仅存在可能性和可行性，甚至是相当正确的路径。”

金大陆的著作《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于2011出版，内容涉及人口、婚姻、计划生育、接待外地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外出串联、服饰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记忆》编辑认为，该书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

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其实，作者的这种研究路向早在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6月号上的文章“上海文革时期毛泽东像章的流通和生产”中就显露端倪。他发现，文革期间毛泽东像章的功能除了表征对领袖的爱戴与效忠，还具有收藏、交换功能，成为在黑市上投机的紧俏商品。

几乎同时，徐贲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上发表“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揭示了文革期间物品的夸示性、表演性联想和仪式化消费行为的现象，并指出，那种认为文革中物品分配是按照公正和平等原则进行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董国强也倡导在精英和上层政治研究之外开辟“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他在“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和“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反思文化大革命”（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明镜出版社，2016年）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在这种视角下取得的研究成果见之于他与 Andrew Walder 合写的一系列论文。

《记忆》在2009年4月14日总第20期推出“文革婚恋专辑”，包括5篇文章，涉及工人、农民、知青、大学生、黑五类、知识分子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其目的也是对文革研究的拓宽视野、变换角度能有所帮助和启发。

《昨天》在2014年10月30日总第41期推出“文革民生专辑”8篇文章，从各个方面描述了文革期间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2017年1月30日总第84期推出“农村文革专辑”，选登有关农村生活文章4篇。徐海亮在“社会视野下的初期武汉文革”（载于《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中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武汉文革的“50天”，分析既往社会历史与政治文化在文革中的投影，诉说造反骨干在现实生活中的疑惑，剖析家庭出身、党员身份等传统思维对造反工人行为的影响，力图以社会学的眼光来解说文革前的社会分化如何发展为文革中的社会对立。

孙沛东在“衣领革命：文革中在广东作为抵抗的日常服饰”

一文中认为，至今文革研究的主流还是关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很少谈及日常生活，她根据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和照片研究文革中的服饰时尚，她指出，尽管人们一般认为那时单调划一，禁欲主义盛行，但其实日常服饰还是一种有意无意地抵抗与表现手段，表达了人们对于多样性、个性化、性别特征与区域融合的追求。²³

性问题也得到关注和研究，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的性：回头看文革”的论文在考察了文革中各个社会群体的性观念和性经验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一般认为经济改革之后特有的（或在1949年之前才有的）现象——婚前性行为、婚外情、色情文学、强奸、卖淫、弃婴——事实上在文革中也存在，尽管其原因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²⁴

有学者在支持从社会生活史角度研究文革之余，也对这种研究中出现的琐屑化、碎片化倾向表示担心。

文革对世界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不但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对邻国和世界上一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那里的骚乱和社会动荡。近20年来，论述文革在国外的反响和冲击的文章不断见于学术刊物。

《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的8月号和10月号连续两期推出“文革对世界的冲击”专论，包括7篇论文。其中，日本学者桥爪大三郎在其论文“红卫兵与‘全共斗’——兼谈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中总结说，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与日本新左翼和“全共斗”之间有如下的共同点：一、两者都以美苏冷战结构为前提，对苏联的作用表示异议；二、与第一点相比，反美因素相对弱化；三、两者都仅仅是基于群众造反的运动。这里，“全共斗”是日本大学生造反组织“XX大学全校共斗会议”的简称。法国著名学者高达乐（Claude Cadart）在“法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中提出，法国毛派知识分子大体有这么几类：沙龙式花花公子和富家子弟的毛主义、学院教授专家式的毛主义、思想大师的毛主义、新闻记者和信息操纵者的毛主义。他还认为，二战之后，法国左派和极左派知识分子的两大罪过是，先是向斯大林主义倾倒，然后又拜倒于毛主义权

威之下。

程映虹发表了多篇论述文革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冲击的论文，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中，他指出，中共在文革期间执行了一条输出革命的路线，向他国大力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在东南亚地区发动武装革命，在拉丁美洲国家发动和支持游击战，训练非洲的叛乱分子，在全世界煽动革命，全面出击、四处受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在“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1期》）中，他详细描述了左派组织“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亦步亦趋地追随中国文化大革命，放弃议会斗争形式，大搞街头运动和群众斗争，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搞内部攻击和分裂，终于被历史淘汰的过程。

费明在“金马伦的‘红色’往事——我所知道的‘马共’和大马华侨”（《记忆》2011年10月21日总第77期）中说，马来亚共产党在文革前就已经存在，但不成气候，文革开始后，马共像注射了兴奋剂，无论是组织形式、革命手段、宣传口号，都和以往大有不同，马共游击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大力开展武装斗争，把整个金马伦变成了大马的井冈山，并从山区向平原和城市渗透。当然，文革结束，形势变化，马共游击队最终下山投降。

文革 50 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2016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除了中国大陆地区，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社会团体、媒体和刊物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举办活动、出版书籍和发表专辑，纪念和反思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2016年4月22—24日，题为“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地方文革史新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科隆大学举行，来自德国、瑞典、法国、奥地利、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的3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瑞典文革研究专家沈迈克在会上做“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2016年夏季的形势”的主题讲演。

2016年5月14日，由天问联合学会主办，世界华语出版社、

九一三研究会协办，在美国纽约举行“文革五十周年（1966—2016）北美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两部关于文革的新书一部是《红祸》学术论文集，另一部是《红墙》纪实文集。此前一天，由天问联合学会主办，纽约当代中国艺术家协会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协办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文革：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在纽约开幕，5月21日，“文革50年反思图片展专题研讨会”举行。图片展的成功使得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有关机构发出邀请，在该国再次展出。

2016年6月24—26日，主题为“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举行，这是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70多位学者，会议论文集《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上、下卷）在2016年年底出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组织了一整套纪念活动：从9月到11月，举办一场为期两月的文革文物展，题目为“文化大革命：宣传艺术和历史记忆”。在9月22日的开幕式上，放映电影《中国—红色之子：1968年文革期间的中国内幕》，这是一部珍稀的纪录片，为澳大利亚影片制作者 Roger Whittaker 在1968年旅华期间拍摄。接着，由杨国斌教授做题为“从事文革：忠诚、暴力与异见”的讲演。

2016年10月28—29日，美国杜克大学举办题为“在亚洲和亚洲之外的文化革命”，会议集中讨论了文革在中国、泰国、印度、南亚、秘鲁和发达工业国家的影响，会议上展出了与文革有关的文物，与会者还参加了中国大陆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拍摄的纪录片《调查父亲》在美国的首映式。据会议报道，当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在报告中讲到林昭和朗读她写的血书时，会议的气氛到达了高潮。

日本是中国近邻，受文革的影响很大，日本知识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态度积极。2016年10月16日，日本明治大学举办“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的有日本学者石井知章、矢吹晋、土屋昌明、铃木贤，中国学者徐友渔、宋永毅等。

2016年12月2日，日本东京学习院女子大学、静冈大学主办题为“文革五十周年——新资料、新方法”的研讨会，与会者60多人，来自日本、中国、美国、台湾等地。会议组织

者杨海英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大屠杀蒙古人基础资料》共9册到2016年出齐，他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在边疆和国际社会》也在2016年出版。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在2016年12月10日举办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的定位”的研讨会；日本专修大学在2016年12月11日举办文革研讨会，会议缘起是该校教授土屋昌明和“中国六〇年代和世界”研究会主编的论文集《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在2016年11月30日出版，该校邀请作者就该书未涉及的话题进行讨论，中国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应邀参加了两个会议并作了发言。

2016年12月7—9日，由法国洛林大学等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梅斯召开，会议名称是“中法交叉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后续”，中国文革网刊《记忆》参与了合作办会，中国学者3人出席该会。

《当代中国研究》在2016年第2期发表“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选登了马若德（即麦克法夸尔）、李洪林、宋永毅等12位作者的论文。特刊编委会强调研究、反思、批判文革的现实意义，因为，“直到今天，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都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响。”

《中国季刊》2016年9月号实际上是一期纪念文革50周年的专号，这期除了书评之外，12篇论文全部谈文革。马若德在前言中写道，中国患了遗忘症，他引证桑塔亚那的著名格言：“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是会重复过去的”，遗忘文革将使文革回复，从未疯狂的人将变得疯狂，从未受压迫的人将受到压迫或者压迫别人。Chris Berry、Patricia Thorton、孙沛东3位作者在其合写的导论“文革：50年的记忆与遗产”中说，打通两个30年的说法以及在公共言论空间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限制极大地妨碍了对于毛泽东晚期和文革中重大事件的反思。魏昂德在“中国历史的曲折路径：文革的悖论性遗产”（*Bending the Arc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Paradoxical Legacy*）中认为，文革产生了其发动者未曾料到的后果，即创造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条件：它削弱了抵制改革的官僚的力量，它导致经济濒临崩溃，国家贫穷落后，使得改革显得十分紧迫，为了反制苏联而采取倒向美国的战略，对比中苏改革历程和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作为，情况一目了然。魏格林（Weigelin-

Schwiedrzik) 等 3 位作者在“谁之罪：文革 50 周年前的记忆和政治”一文从政治学和记忆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宋彬彬道歉事件的背景、后果与含义，认为关于文革的记忆仍然是文革中对立群体的战场，老红卫兵力图把自己和父辈说成是文革的受害者，而追随毛的前造反派力图改变党的否定文革的决议，用文革的目标来对比当今不公正的现实。

2017 年 1 月 8 日，题为“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法国的文革研究者在大会上发言，会议对公众开放，到会人数甚众，讨论气氛热烈。

注释：

1 参见徐友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页 6—8。

2 Ray Yep, “The 1967 Riots in Hong Kong: The Diplomatic and Domestic Fronts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 *The China Quarterly*, Mar. 2008, pp122—139.

3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ed), *May Days in Hong Kong :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Andrew Walder and Su Y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 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Mar. 2003, pp74—99.

5 陈意新：《文革初期农村的造反运动——安徽老瞿村和定远县的案例》，《二十一世纪》，2016 年 8 月号，页 61—77。

6 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页 42—55。

7 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同上，页 56—64。

8 张晨晨：《文革初期的集体暴力》，《二十一世纪》，2008 年 12 月号，页 52—61。

9 郝建编：《文革四十年祭—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页 62—64。

10 艾恺：《文革：四十年后的破晓》，《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页 4、5。

11 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1996 年 8 月号，页 28、29。

12 白霖：《对中国文革的解释》，《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2期，页149—151。

13 见 Stephen Uhalley Jr, Jin Qiu, “The Lin Biao inciden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later”, *Pacific Affairs*, Fall 1993, pp386—398.

14 参见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 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春季号，页137—152。

16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夏季号，页137—154。

17 参见丁凯文：《“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夏季号，页141—159。

18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页69—87。

19 Thomas Bernstein, “Book Review: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The China Quarterly*, Jun. 2014, pp574—576.

20 Michel Bonnin, “Restricted, Distorted but Alive: The Memory of the ‘Lo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Educated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16, pp752—772.

21 Michel Bonnin, “Restricted, Distorted but Alive: The Memory of the ‘Lo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Educated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16, pp752—772.

22 Guobin Ya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16, p16, p114.

23 Sun Peidong, “The Collar Revolution: Everyday Clothing in Guangdong as Resistanc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Sep. 2016, pp773—795.

24 Emily Honig, “Socialist Sex: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Modern China*, Vol. 29, No.2, 2003, p171.

文革中的军队

——中共军事力量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余汝信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 1929 年 12 月为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¹中共建政后，毛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绝非单纯地被视为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相反，更多的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文革十年尤甚。1966 年 5 月文革开张在即，毛就指定其“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²

本文为笔者写作中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暂名）一书的前言。此书以时间为序，以纪事本末为体，力图完整地记载十年文革风暴中人民解放军作为毛的政治力量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并力图还原其与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

为叙述方便，笔者依据十年间（并上溯至文革前一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负责人两个层面，将此一历程分为若干阶段。

一、文革前夕

本时段为 1965 年 1 月至 12 月一整年。

1965 年初，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到 447 万。³这一支全球人数最多，绝对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军事委

员会指挥的庞大武装力量，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保证。

1965年，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声誉日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如毛泽东早在1963年12月所言，“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⁴自1964年初至1966年文革前夕，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农林政治部、财贸政治部、基本建设政治部、外事政治部和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单位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1965年2月，调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萧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陆定一兼）、中共党组书记，以改组、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具有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雏形。

这一年，已经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与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措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使军队正规化建设遭受重创，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一年，随着毛泽东对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愈见不满，对党内第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予厚望。1月初，林彪取代党内第五号人物陈云，成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1月底，林彪的艺术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2月中，毛泽东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⁵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炙手可热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指为觊觎军内更高权力的“野心家”，遭到毛泽东、林彪的合力清洗。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有61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⁶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唯性格上有明显缺陷，一为独

断专行，惯于揽权，二为不注意团结同志，易得罪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要害问题。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⁷

二、毛—林—（周）—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

本时段由1966年1月至1967年上半年，约一年半时间。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秉承建政以来的一贯作风，对军队大权（包括但不限于作战行动，一定级别以上部队调动，一定级别以上人事任免等）一人独揽。

林彪名义上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唯自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具体的“三支两军”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时期，周恩来在军队中并没有任何职务，唯其以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对军队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忽视。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当甩手掌柜。

上海会议后，1965年12月29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同年5月，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原毛泽东—林彪—（周）—罗瑞卿（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军委秘书长）的军委领导架构，被毛—林—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三驾马车”所替代。

进入1966年，罗瑞卿问题升温。3月4日—4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以“彻底弄清罗瑞卿的问题”。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为罗问题定调称：“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了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

不堪设想。”⁸

在中央正式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曾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系统负责人谈话，⁹将毛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要况及时通报他们，告诫他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全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林彪取代刘少奇取得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被戴上毛“亲密战友”的桂冠。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现役军队领导人在政治局中的分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至于军内文革，原来的设想是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¹⁰此计划三个月后发生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革问题发表指示称，“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真正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这次大整机关运动，从全军范围说，要搞两、三个月，各单位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大体准备从九月份开始。”¹¹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讲了相同意思的话。8月16日，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唯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设想很快就被突破。

1966年9月，毛泽东同意将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有关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打招呼。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初，贺龙问题呈公开化，贺于1月中旬失去人身自由。1967年9月，毛同意对贺龙立案审查。贺于1969年6月9日在关押状态下病逝。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汹涌澎湃的造反洪流，其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1966年底，在文革狂潮冲击之下，中共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然动摇。翌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更深层次的分崩离析局面，各地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受冲击最小而相对而言尚表现为强而有力的、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从而承担稳定局势的重任。

1967年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军队在文革中“三支两军”的基本任务。唯“三支两军”的作用并非平行的，“三支”中最重要者是支左，“两军”中重点是军管。

文革期间，军队介入地方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就广度而言，以1967年初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31个军、1个军级指挥部为例，沈阳军区陆军八个军“三支两军”负责范围为：第十六军负责吉林长春市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二十三军负责黑龙江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及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牙克石等地区；三十八军负责吉林通化地区；三十九军负责辽宁鞍山市、营口市及海城、复县、新金、盖县、盘锦等地区；四十军负责辽宁锦州、朝阳、阜新地区；四十六军负责吉林省吉林、延边地区；五十军负责辽宁丹东地区；六十四军负责辽宁本溪、抚顺地区。北京军区陆军六个军：第二十一军负责山西省；第二十四军负责河北唐山地区；第六十三军负责河北石家庄地区；第六十五军负责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六十六军负责天津市；第六十九军和河北省军区共同负责河北保定地区。济南军区陆军三个军：第二十六军负责山东烟台地区；第六十七军负责山东青岛地区；第六十八军负责江苏徐海地区和山东临沂地区。南京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十二军负责江苏苏北地区；第二十军负责浙江省除舟山群岛以外地

区；第二十七军负责江苏苏州、镇江、常州、无锡地区；第六十军负责江苏南京地区。福州军区陆军两个军、一个指挥部：第二十八军负责福建晋江地区；第三十一军负责福建厦门、龙溪地区；闽北指挥部负责福建福安地区。广州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四十一军负责广东汕头地区；第四十二军负责广东惠阳地区；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省和广西桂林地区；第五十五军负责广东湛江地区和广西柳州地区。武汉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一军负责河南开封地区。昆明军区陆军两个军：第十三军负责云南滇南地区；第十四军负责云南滇西地区。成都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五十四军负责四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

1967年2月，第三十八军调防至河北保定地区，第二十一军调防至陕西省，第六十九军调防至山西省，调防后的三个军各自负责所在地区的“三支两军”。6月，第五十军调防至四川成都、乐山、绵阳地区，负责此三个地区的“三支两军”。7月，第十二军根据中央决定入皖支左。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赴赣支左。8月，第二十军代行浙江省军区职能。此外，年内各野战军的“三支两军”地区范围多有所扩展。

1967年1月后展开的“军事管制”，是在原有的地方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的一种非常措施。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事代表。

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例，1967年3月至5月间，由中央批准实施军管、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8个，按先后顺序为江苏、广东、浙江、云南、安徽、青海、福建、西藏，占总数的28%。8个省、自治区军管会中，由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担任主任的占了大头共有5个，大军区副司令员任主任的2个，省军区政委任主任的1个。此后，省、市、自治区一级再未实行军管。

1967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其中国防工业6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初期由军事科学院、空军和海军各负责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3月后军事科学院人员大部撤出，继由空军、海军、总后和总参接替其军管任务。国防工业口以外的部（委）共39个，

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8个，军管小组3个，派出军事代表的18个。派遣人员方面，由总参机关负责的7个，总后5个，海军4个，空军3个，炮兵2个，装甲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部各1个，工程兵5个，通信兵2个，高等军事学院1个，先军事科学院后为工程兵1个，北京军区2个，南京军区1个，多部门或其他3个。担任部（委）军管机构领导或军事代表的军方派遣人员，级别相差甚大，最高级别者为各军兵种或大军区副职，最低为团级干部。

国务院21个直属机构中，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国家档案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情况未详外，其余机构及国务院秘书厅共18个单位全部实行军事管制。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个，军管小组4个，派出军事代表13个。派遣人员中，由总参机关负责的3个，总后8个，空军、装甲兵、防化学兵部及政治学院各1个，多部门或其他3个。

1968年4月至8月间，对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分别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组织部虽未实行军管，但早已于1967年5月派驻由军方组成的业务组以负实际领导责任。

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1967年4月，军委决定，对大军区级的军队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任命原上将、当时已无军内职务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为军管会主任，曹广化（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1968年10月，对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了不符常理的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陆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为副组长。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偏于保守，追求稳定为其必然。故而，在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军事机关、部队往往倾向于维护旧秩序的保守一派。1967年1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颁布，使军队自以为拿到了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军委八条”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唯中央以至毛泽东本人，对于在文化大

革命中何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谓“右派”，何谓“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制定、公布一个严格的统一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也难以有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这就为各地军事机关留下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换言之，划分标准全凭各地军事机关主观地自行掌握。而各地军事机关（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以至人武部）一般来说，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分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接近，关系天然地较为亲和，这就难免与保守派的对立面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稳健一派的对立面激进一派，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月底至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大小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又以新疆、福建、湖南、内蒙古、广东、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为甚。

1967年4月6日，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军委十条”，对“军委八条”引发的军队对造反派、激进派的无情镇压进行纠偏。“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任意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等等。“军委十条”解救了造反派，却又引发了其对军队及保守派的报复。军队及保守派不服，两派矛盾加剧，武斗频仍。7月，在倾向保守派的武汉军区眼皮底下，发生了武汉地区部分保守派群众与军人围困毛泽东及中央要人居住的东湖客舍，要挟中央改变对武汉地区既定政策的“七二〇事件”。该事件是社会两派矛盾激化反映到军内的一次总爆发。它使毛不得不夜半三更仓皇离开住地，转移到空军机场，并且打破十年来不乘飞机的惯例，清晨即离汉飞沪。这一事件对毛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使毛看到事态演变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性，促成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逐步从“乱”走向“治”。

全国范围的武斗最终平息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经历了年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军队的介入反而加剧了两派矛盾，但总体来说，对于平定大局而言，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此外，军队对各地的无政府乱状亦加以压制，典型的如湖南道县事件。1967年7-9月间，道县发生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零陵地区其他10

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 9,323 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 4,057 人，未成年 2,862 人，另致伤残 2,146 人。8 月 29 日，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炮兵团（代号 6950 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 月下旬基本得以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 10 月底陆续结束。¹²

在军内，“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在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受萧华、杨成武及年初成立的新军委文革小组实际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又称“反三军派”）与受军内实力派¹³支持的保守派（“老三军”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形成了势力强弱不一而相互对峙的局面，唯这一局面很快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得以打破。毛泽东、林彪表态支持了参加 5 月 13 日演出的“老三军”（“演出派”），冲击演出的“新三军”（“冲派”）随即一蹶不振，萧华在“五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也正式宣告倒台。

三、毛—林—（周）—杨成武时期

本时段由 1967 年 9 月至 1968 年 3 月，为期很短，仅有半年时间。毛、林、周的作用与影响力基本与上一时段相同。

1967 年 8 月，由于萧华的倒台，加上叶剑英、徐向前¹⁴自批判“二月逆流”后在军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三驾马车”仅余杨成武一人。此时，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 4 人组成军委办事组，9 月，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初，“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¹⁵

“五·一三事件”之后，杨成武的日子亦不好过。1967 年 9 月间，江青曾几次大发脾气，指称原热心为江办事的杨成武

整了她的黑材料，杨要“放长线钓大鱼”。¹⁶年底前，毛泽东在“绝对权威”的问题上又不点名地重重敲打了杨。¹⁷文革以来位高权重的杨成武¹⁸实质上存在的“华北山头”倾向引致毛、林及部分军队实力派人物的警惕与不满，最终酿成了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倒台。

四、毛—林—（周）—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本时段由1968年3月至1971年9月，为三年半时间。仔细区分，又可分为两个子时段：1968年3月至1969年4月，为林彪尚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名分时期；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林彪已失去此名分。而毛、周的作用与影响力与上两时段相同。

1968年3月25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经毛、林同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成员的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三天后，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毛泽东的话里，隐含有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¹⁹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一方面发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一方面将军队的“支左”方针调整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号称“一碗水端平”，以促进“革命大联合”，促成“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多由军队作主导。到1968年9月，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批军队高级干部担任了省一级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由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由军委常委谢富治担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担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由江西省军区政委（原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担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由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担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六军政委王淮湘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二十军兼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由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担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由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担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由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担任。以上现役军队领导干部共 20 人，占同级革委会主任人数几近七成。其余原地方领导干部 9 人，除河北李雪峰、广西韦国清早已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外，1967 年 5 月后，黑龙江潘复生兼任沈阳军区政委，山东王效禹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山西刘格平、天津解学恭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河南刘建勋兼任武汉军区政委，陕西李瑞山兼任兰州军区政委。

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文革发展到“斗、批、改”阶段。所谓“斗、批、改”，以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²⁰在此前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全国性的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两年多时间没有消停。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各级革委会尤其是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主导，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群众受到无端的猜疑和批判，逼、供、信盛行一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臭名昭著者如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在江苏掀起的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历时三年多，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 26 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 13 万

多人），死伤6,000人（其中被逼死打死2,540人）。江苏省1957年反右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江苏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反右斗争伤害面的20倍。作为清查“五·一六”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1,560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389人，被判刑16人，被迫害致死21人。²¹又如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在内蒙古领导的“挖肃运动”，根据官方不完全的统计，“在全自治区共挖所谓‘内人党’346,220人，刑讯武斗致死16,222人，致严重伤残87,188人。”²²唯对内蒙古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滕海清却未有受到应得惩罚，事后且平调至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其中现役军队领导人13人，占52%（四野系5人占20%）。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部分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1969年3月，毛泽东借中苏边境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珍宝岛事件”，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使全国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

1969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已呈逐年递增趋势。1969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持续上升。1969年间，陆军增加了三个军部（陆军第十一军、第十九军、第二十九军），组建和改建了30个陆军师。第二炮兵组建了第五十六基地。总后勤部组建了20个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海军组建了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组建及扩编水警区各1个。空军组建了空军第十一、第十二军2个军部，组建了8个航空兵师，2个高炮师。²³

196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队的部署调整。10月，军委发布命令调整列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的13个军和17个技术兵种师的部署，加强了“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²⁴至年底，北京军区达8个野战军的兵力，加上沈阳军区6个军，兰州军区2个军，“三北”地区共有16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

军总数的 44%。

至 1969 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加至 631 万余人，²⁵ 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1969 年 9 月中下旬，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研究苏联的战备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各项具体措施。毛、林、周分别到会强调：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全军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根据毛、林的指示精神，军委办事组向全军发出国庆节期间加强战备的指示与部署，要求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驻大城市部队的车辆和石家庄、张家口方向的部队，适当向附近农村疏散，加强机场等要地防护。10 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赴武汉，林彪随后疏散至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主持党、政、军工作。10 月 17 日，林彪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出指示。²⁶ 依照这个指示，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涉及部队约有陆军 90 余个师、520 余个团，海军 430 余艘舰艇，空军 4100 余架飞机。此阶段部队战备工作进入最紧张时期，达到了最高潮。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 1970 年 4 月底稍有缓解。²⁷

自 1967 年初始军队以“三支两军”修复地方走资派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力架构，加之 1969 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亦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视其为“尾大不掉”。加之林彪对毛的“不断革命”渐生厌倦，毛有意在激进派文人中另选最能深刻领会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者。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加，反而却有被架空的明显迹象。相对于其在党内唯一的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分，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但没有被予以第一副主席的名分，更未如十年前新军委成立时一样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0 年 3 月。毛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6 月，经毛同意国务院由文革前的 90 个单位精简为 27 个单位，各新

单位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唯虚设的国防部未有如其他部门般任命负责人。林彪直至此时对外仍沿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义，在政权体系中地位低于中共第三把手周恩来。周试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向毛提议解决此一问题，8月，周与陈伯达、康生向毛提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²⁸ 唯毛有意不予回应，及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虽称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坚持不给予其“副元首”的尊称。

在1970年8、9月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庐山会议之后，毛明里狠批陈伯达（并无辜牵连李雪峰、郑维山），实质剑指林彪。毛逼迫军委办事组诸成员为庐山事检讨再检讨，最终目的也是逼迫林彪低头就范，唯林不为所动。整整一年后的1971年8、9月间，已铁心抛弃林的毛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毛、林关系濒临绝境。历史上毛的整人手段使林一家（林立衡除外）心生恐惧，令林与妻、子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于9月13日00:32在海军山海关机场乘专机强行起飞逃出境外，02:25在蒙古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五、毛一叶、邓时期

本时段由1971年9月至1976年1月，为四年又四个月时间。叶剑英被毛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在此一阶段渐告淡出。

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破产。毛顷刻间一脚踏入黄昏岁月，他的事业由此从“辉煌”走向破败。“九一三事件”之后，红极一时的被视为林彪一系的军人遭到清查清洗，“批林批孔”持续经年，军队的高、大、上形象黯然失色。

1972年8月21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

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自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至此，军队“三支两军”工作结束，各地方权力重新回到文革前当权的地方官僚们手中。

“九一三事件”后，军队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1973年12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1月，邓更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邓、叶主持下，同年6-7月间，举行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军队消“肿”，三年减少兵员160万，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海军精简17%，空军精简16.4%，各军区及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成绩不俗。正当其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起，使精简整编和整顿工作没有全部完成即被迫中断。²⁹

六、毛、华—陈锡联时期

本时段由1976年2月至10月，为期八个月。陈锡联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年1月，毛泽东取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又决定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部分兵力，未费一枪一弹，一举抓获“四人帮”，清除了在中央的文革极左派全部势力。笔者曾言，“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决的支持和参与，1976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³⁰

如此说来，结束文革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页79。

2 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1966年5月7日。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页306。据该书披露，447万人中含陆军338.5万人，海军18.2万人，空军43.3万人，公安部队30.3万人。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页455。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1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页482。

6 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7 王任重日记，1965年12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页1400。

8 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时的讲话，1966年4月8日。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页46。

10 总政治部《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转引自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页242。

11 林彪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和干部路线等问题的谈话（节录），1966年8月10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1987年8月，页417。

12 谢承平：《湖南道县“文革”杀人大案揭秘》，载《上海法治报》2010年12月24日。

13 指（但不限于）空军的吴法宪、余立金，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二炮的李天焕、总后的邱会作及北京军区的郑维山。

14 徐1967年1月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5 军委办事组1967年10月15日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见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16 陈虹：《我参加饶漱石专案组的遭遇》，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17 1967年11月3日，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在官方主要媒体上发表。12月17日，毛泽东借批复湖南一份报告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提出严厉批评。

18 杨成武与萧华1967年3月成为军委常委，在此前后均为中央碰头会成员。

19 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20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1968年9月7日。

21 丁群：《冤狱遍地的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载《文史精华》2009年第1期。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1980年11月2日。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14。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13。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15。

26 这个战备指示经军委办事组下达全军时冠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标题，即后来所说的“一号命令”或“第一个号令”。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页107-109。

28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页279-280。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征求意见稿，2001年7月，页273、286-288。

30 余汝信：《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

文革时期省级领导干部沉浮录

——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群众干部的情况综述

石名岗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是指内部，当权派是指领导干部，至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提供一个明确可行的标准，这就把所有的干部推上了风口浪尖。干部之间的内斗成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内容，而领导干部的起落成败，则关系到各派力量的消长，由此增大运动的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研究文革中的领导干部的作用和命运，对深入认识文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省级领导干部为考察主体，中央干部，其他干部，包括部委的领导干部也有不可避免的涉及。

一、干部情况概述

（一）文革中省级干部的类型：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干部

干部是路线、利益、思潮的载体，要详细论述干部在文革中的功能，首先应当对干部进行分类。文革中的省级干部有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及群众干部三类。下面分别叙述。

地方干部，指中共建政后，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事企等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有的还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地方干部是文革对象“走资派”的主要载体，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冲击。

军队干部，指中共建政后，在军队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人。而军队在文革历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队干部的意向不可忽视。

群众干部指的是在“三结合”中被选入省级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这些人分两类，一类是文革中造反组织的领袖，一类是文革前受到国家表彰的劳动模范。前者的最高代表是王洪文，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后者的最高代表是陈永贵，官至国务院副总理。

（二）三种干部的“山头”

由于中共发展历史原因，三类干部有自己的“山头”。

就地方干部而言，“山头”就是各个时期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陕北四大根据地。抗战时，从山西开始，主要开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鲁西、鲁南、胶东、渤海、滨海等）、华中（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等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南下或西上干部大多来源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战略区，大致区域是西北、西南为晋绥、晋冀鲁豫所占，中南为四野干部和部分晋冀鲁豫所占，上海、江浙、福建为山东、苏北所占。

除根据地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有北方局的地下工作系统。

就军队干部来说，“山头”可概括为五个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一野）、中原野战军（二野）、华东野战军（三野）、东北野战军（四野）、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军委直属）。

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一野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主要有红二、六军团组成。抗战时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晋绥野战军，后与陕甘宁联防军合并成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

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二野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编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三野的前身是中央苏区长征后留南方的部队，由项英、陈毅负责。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解放战争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

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四野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下辖红一、三等军团，到陕北加入红十五军团。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 115 师。解放战争 115 师大部进入东北，成为东野，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

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军委直属）由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组成。晋察冀野战军由 115 师一部（聂荣臻）扩大而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

就群众干部来说，其“山头”没有地干、军干那么久远，大多是在文革中形成的。有两种分法可以参考。

一是按他们所拥护、追随的干部的“山头”划分。如上海王洪文，文革一直跟随张春桥，可以划在柯庆施（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线上；又如山西李顺达，文革中一直与军分区站在一条线上，应归于军区“山头”。

二是可按“造反派”与“保守派”分为两个“山头”，这是在老保皇派（指官办的群众组织，大多在批判资反路线后解散）消亡之后，由造反派队伍分裂而形成的。这种分法不是绝对的，首都“三司”是造反派的代表、首都“一司”“二司”是保守派的代表。从思潮上讲，清华团派和四一四派是两个山头的代表。

两种“山头”划分之间似乎没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但是群众组织没有干部进行支撑是无法长久存在的，他们的政治态度总是被他们拥戴的干部所决定。

（三）三种干部的政治分类

按路线分类，路线所指是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修正主义）之分。早在建政初期，党内就产生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分歧。大跃进之后，又出现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争论，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是这种争论的一次大爆发。

按对文革的态度分类。文革十年，革命者、被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这种立场是在变化的。

从文革的实际进程看，文革目标不仅仅是反修反资，而且下层群众也有着急切的反腐反官僚的愿望。这就使文革有了一个矛盾的目标，反修反资具有反进步的倒退作用，反腐反官僚

具有反封建的进步作用。所谓“走资派”是两者的载体，很难让一般人区分开来。

如果群众干部按对文革的态度分类的话，就是在“走资派”数量上的分歧问题。

造反派干部认为“走资派”占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其思想代表作是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矛头指向“红色资本家阶级”，欲实现公社理想，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保守派认为“走资派”是极少数，其思想代表作是清华四一四派周泉纁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反对矛头对准大部分干部，思想基础在实质上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

因之，不能把群众干部的观点简单地看成“派性”，其实派性中包含着有关中国命运的大道理，只不过体现在一些似乎细微的问题上。

文革中把支持文革、领头造反的地方干部称为“革命干部”。其余的干部毛泽东似乎是在考察，是否“走资派”，“交给群众先斗一斗”再说。实际上大部分地方干部对文革持有抵触态度，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走资派”，也不愿意作文革的对象。至于那些认真落实六十年代初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和“三自一包”政策的干部，他们在主观上也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认为是“权宜之计”。

军队干部自成系统，不参与地方事务，但在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之后，军队开始大规模介入文革。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部分军队尤其是地方军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站在了保守派一边，原因当然是军队干部与原来各战略区的地方干部息息相关。

二、各省革委会成立前后干部的分布

从1967年1月开始，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夺权并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历时二十个月左右，可见建立新政权之复杂之艰难。我们在此把革委会成立前后各省一把手的情况分列如下（按革委会成立时间为序），供读者了解干部分布和各类干部对文革进程的影响。

（一）1967年1月至4月

1.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月31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潘复生，出身山东分局。革委会主任潘复生。

2. 山东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2月3日。省委原第一书记谭启龙，出身华东局（新四军）。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原青岛市副市长，出身山东分局渤海区。

3. 上海市，公社成立时间：1967年2月5日，2月23日，公社改为革命委员会。市委原第一书记陈丕显，出身华东局（新四军）。革委会主任张春桥（1971年中央正式任命），市委书记处原书记（分管文教、宣传），出身晋察冀。

4. 贵州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2月13日。省委原第一书记贾启允，出身晋冀鲁豫太岳区。革委会主任李再含，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大校，出身二野。

5. 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3月18日。省委原第一书记卫恒，出身晋冀鲁豫太岳区。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山西省原副省长，出身北方局，山东分局渤海区。

6.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4月20日。市委原第一书记彭真。出身北方局。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上将，公安部部长，出身红四方面军，晋冀鲁豫太岳区，二野。

（二）1967年8月至12月

7. 青海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8月12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杨植霖，出身北方局。原省长王昭，出身华北军区野战部队19兵团。革委会主任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出身四野。

8. 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1月1日。自治区原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出身北方局内蒙古工委、晋察冀，上将。革委会主任腾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少将，出身红四方面军、三野。

9. 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间：1967年12月6日。原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出身晋冀鲁豫冀鲁豫区。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出身八路军120师、晋绥、晋中。

（三）1968 年

10. 江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1 月 5 日。省委书记处原书记、省长方志纯（第一书记杨尚奎 1966 年 5 月下台），出身中央苏区、南方游击队，新疆统战、中央卫戍司令部。革委会主任程世清，26 军政委，少将，出身红 25 军（十五军团）、115 师、新四军、四野。

11. 甘肃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1 月 24 日。自治区原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出身红 26 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革委会主任冼恒汉，兰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将，出身一野。

12.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1 月 27 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文敏生（1966 年 9 月原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出身新四军。革委会主任刘建勋，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出身晋冀鲁豫。

13. 河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2 月 5 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林铁，出身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李雪峰，1967 年 1 月至 4 月在天津主持工作，出身晋冀鲁豫太行区。

14. 湖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2 月 7 日。省委原第一书记王任重，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出身中央苏区、115 师，华北军区 19 兵团。

15. 广东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2 月 21 日。省委原第一书记赵紫阳，出身晋冀鲁豫。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上将，出生红一军团、115 师、四野。

16. 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3 月 6 日。原代理省委第一书记赵林，出身北方局、晋绥。革委会主任王淮湘，16 军政委，出身八路军山东纵队、四野。

17. 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3 月 23 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江渭清，出身中央苏区、新四军、三野。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红四方面军、八路军山东纵队、三野。

18.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3 月 24 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江华，出身红三军团、八路军山东纵队、东北局。革委会主任南萍，20 军政委，大校（64 年少将），出身北方局、八路军山东纵队，三野。

19. 湖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 年 4 月 8 日。省委代

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黎原，47军军长，大校（64年少将），出身陕甘宁、四野。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10日。自治区原第一书记杨静仁，出身陕甘宁。革委会主任康建民，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少将，出身二方面军、晋绥、华北军区。

21. 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4月18日。省委原第一书记李葆华，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李德生，12军军长，少将，出身四方面军、129师，二野。

22. 陕西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1日。省委原第一书记霍士廉，出身陕甘宁、山东纵队、华东局。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原陕西省第二书记，出身陕甘宁、东北局。

23. 辽宁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10日。省委原第一书记黄火青，出身中央苏区、中央党校、晋察冀冀热辽分局。革委会主任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四方面军、129师，二野。

24. 四川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5月31日。省委原第一书记廖志高，出身红军总政治部、四川地下党、中央直属队。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原西藏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将，出身红一军团、115师、晋冀鲁豫冀鲁豫区，二野。

25.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14日。省委原第一书记阎红彦，上将，1967年1月8日自杀。出身西北红军、留守兵团、二野。革委会主任谭甫仁，昆明军区政委，中将，出身一方面军、115师、四野。

26. 福建省，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19日。省委原第一书记叶飞，上将，出身南方游击队、新四军、三野。革委会主任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上将，出身鄂豫皖红二十五军、115师、四野。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8月27日。自治区原第一书记韦国清，上将，出身一方面军、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纵队、三野；书记处原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贺希明，出身新四军。革委会主任韦国清。

28. 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自治区原代理第一书记周仁山（短期），出身陕甘宁。革委会主任曾雍雅，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少将，出身一军团、晋察冀、四野。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1968年9月5日。

自治区原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中将，出身六军团，120师，一野；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出身北方局、晋察冀。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出身一军团、115师、四野。

（四）小统计

从以上资料可知：

其一，文革前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除潘复生、韦国清、张国华（调四川）外，二十六个被打倒或下台，占总数的近百分之九十，说明当时大形势的判断是“走资派”占多数。潘复生、韦国清、张国华的情况多少有点特殊。潘复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突然单独造反，原因至今不明，也可能是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自悟”的，也可能是像传言一样，说他与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高干子女有联系，得到了“内部消息”；韦国清没有倒霉是中央及周总理保的缘故；张国华是军人，中印边境反击战的指挥者，西南边陲重镇需要他坐镇。

其二，文革前有军衔的干部担任一把手的有：乌兰夫（上将）、阎红彦（上将）、韦国清（上将）、王恩茂（中将）、张国华（中将）。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但乌兰夫、阎红彦、王恩茂、韦国清主要负责地方党政工作，文革革委会成立后，军队干部数量增加到二十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实际上，即便是地方干部做一把手的地方，部分省份也进行了军管，说明军队是文革的稳定力量。

其三，1967年5月前成立革委会的六个省市的革委会主任中，只有贵州一个是军队干部，占百分之十六。这一年5月到年底，三个省中有两个是军队干部，占百分之六十六。整个1968年，二十个省中，军队干部占十七个，达到百分之八十五。说明从1967年8月开始文革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控制。

其四，在二十个军队干部出身的革委会主任中，一野2人；二野3人；三野4人，四野9人；华北军区2人。说明四野干部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三、革命干部在一月革命风暴的作用

政权是一切革命或动乱的要害问题。文革既然是革命，或

者是“动乱”，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政权问题。

到1966年底、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解决地方政权问题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应该是十分混乱，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敌我阵线不分明，中央也不知道该怎样夺权，由谁夺权，夺谁的权；二是各省的领导干部都正在被造反派围攻，干部也和造反派一样正在分化中。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地出现了重点策划和自发夺权两种情况，实际上无论哪种情况，在夺权中，所谓革命干部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7年1月5个省、市发生的“夺权”斗争在文革史上被称为“一月革命风暴”。各自的夺权时间分别是：山西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青岛1月22日，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山东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贵州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黑龙江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上海1月6日（上海夺权没有明确时间，各组织在2月5日商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1月6日是上海反经济主义大会的时间，后来确定为夺权时间），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联名。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李再含（军队）、张春桥等革命干部表现得特别突出，使得这几个省、市的夺权有了各自的特色。

（一）山西特点：秘密奉旨

山西省夺权是重点策划的典型，而刘格平具备了重点策划的充分必要条件。秘密奉旨的意思是，中央本身也没有解决是否夺权、靠谁夺权、夺谁的权、怎样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但中央在策划地方省份夺权时，要求的条件是敌我基本分明。这个条件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策划夺权者认为夺权者是自己人；另一方面被夺权者至少不是自己人，山西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山西就是一个试验品。

刘格平，行政三级，时任山西省副省长，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因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1965年被贬山西。刘格平之所以是自己人，与他的一个经历有关。1934年刘格平被捕，进入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与刘澜涛、薄一波、杨献珍等六十多个共产党员关在一起。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紧迫，需要大量干部，

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负责）决定，被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可履行一个自首手续出狱。当时有六十一位党员履行了手续出了狱。而刘格平没有履行手续，一直到1944年才出狱。文革初期，六十一人被打成“叛徒集团”，刘少奇被打成“叛徒集团头子”，刘格平成为“活证据”，自然成为“自己人”。另外刘格平曾在康生领导的山东分局渤海区工做过，又是“老熟人”。

卫恒，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按山头出身于薄一波领导的晋冀鲁豫太岳区，文革前还用公款补助过安子文的岳父，与彭薄安陶集团关系密切，自然“至少不是自己人”。

12月（当为10日——作者），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刘格平返并后，积极联络了在山西不得势的几个外来干部刘贯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原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犯错误贬到山西）、袁振（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市委原第一书记）、陈守中（太市委书记处原书记，原为包钢党委书记）、刘志兰（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左权、陈守中夫人）、何英才（省委常委、政协副主席），写了五人大字报，公开亮相抨击山西省委。刘格平还联络总理打过招呼的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商讨夺权事宜。

1月12日晚，刘格平等五位干部及张日清、一些群众组织领袖在刘家开会，会间刘贯一提出夺权，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开始临时召集队伍工人、学生几千人，对省委、省人委机关进行了夺权。赴晋大队的邢晓光起草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人民日报》1月25日刊登该通告并配发社论），提出“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口号，夺权后，省委原的绝大部分领导被关进监狱。

山西的夺权有着标杆作用。其意义在于它提出“一切权力归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明确了领导机构。另一层意义是它创造了“革命三结合”（军、干、群）的夺权及政权形式。从过程上看，山西夺权更像一次政变。

（二）上海特点：自然夺权

上海是自然夺权的典型。张春桥、姚文元及群众干部徐景贤都是理论工作者，自然不能像革命家刘格平那样粗鲁，所以上海的夺权要自然的多。张春桥、姚文元早就是“自己人”了，1966年5月，张春桥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成员。

按徐景贤回忆录《十年一梦》的记述，还真无法说出上海是哪一天夺权的。下面是上海的夺权过程。

1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急告全市人民书》，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该文件是由当时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签发的。

1月6日，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获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等十余位上海市委领导人。会议结束时，由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位女红卫兵，代表各造反派组织宣读了三条通令：

1）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2）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3）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这次大会后来被认为是上海夺权的标志，其实这次大会并未宣布夺权，而是等待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在1月5日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后，上海似乎一直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也就是处于一种“革命”状态。一方面是多个造反派组织走马灯式的宣布夺权而未遂。另一方面是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革命家”们在协调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力争实现最大的“革命大联合”，并寻找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形式。从这一点上讲，上海的一月革命像巴黎公社革命，更像一场“革命”。

上海的一月革命终于在2月5日结出硕果。经各组织协商，

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会上发表了上海公社宣言《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三）山东特点：自下而上

山东是自下而上的典型。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代表性人物，时任青岛市副市长。1966年8月25日，青岛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八·二五”事件，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只有青岛市政府副市长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得到毛泽东赞赏。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康生的养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生，因此有了政治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等人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效禹在青岛市“夺权”。1月22日，王效禹发动夺权，驻青岛部队67军支持了夺权，成立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并中央承认。

1月底的济南，各路人马为夺权激战正酣，局面甚乱。王力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市夺取山东省委的“权”。1月31日王带领由22人“轻骑”（青岛夺权代表团）突袭济南。青岛代表团发表《呼吁书》：“全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

1月2日，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指挥部、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等25个群众组织2000多人在济南军区八一礼堂集会，宣布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去省委、省人委夺权。期间，济南军区的部队支持了夺权。其后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作为一个级别较低的地方干部，王效禹是一个善于捕捉时机、也捕捉到了时机的人，但正因为他的级别低，引起了许多老资格干部的轻视、敌视及鄙视，为他的以后工作造成了障碍。

（四）贵州特点：公开奉旨

贵州是公开奉旨夺权的典型。公开奉旨的含义是，是否夺权、靠谁夺权、夺谁的权、怎样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中央已决定以“革命三结合”的方式进行夺权，并且“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江青语）。

李再含，时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在邓振新编著的《贵州风云》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李再含的：“毛泽东并不知道李再含何许人也，他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介绍才知道李再含其人的。当时李再含身为贵州省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军队代表，既给省委第一书记先后写了六封信提意见，又避开省文革领导小组向中央先后发了18份电报，反映了贵州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王力觉得李再含能这样做很不错，便向毛泽东推荐。这是毛泽东赞赏‘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的缘起之一”。¹

贵州的夺权实际上是中央指挥的。1月24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派飞机接李再含、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十一人到达北京部署夺权。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说：“李再含1月下旬到了北京，在江青处受领了回去夺权的任务。江青对他说，差不多的地方都要夺权。”²

1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及外地红卫兵四十个组织联合行动，夺取了贵州省委和省人委、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称“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2月13日，贵州省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担任主任。

（五）黑龙江特点：自觉革命

黑龙江是自觉夺权的典型。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全国第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单独带头造反的人。

文革开始后，潘复生对各地批判“三家村”持保留态度，尽量在保护受到冲击的一些干部。但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了“教育”，有所自悟，态度起了变化。

潘复生后来回忆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是文革中全国著名的造反组织，哈军工有许多中央高干子女，消息灵通，造反积极性特高，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就出自哈军工。潘复生与哈军工红色造反

团联系密切，这也可能是潘复生抛开省委，单独率先造反的原因之一。

1月28日下午，红色造反团等31个总部的联席会议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召开。师院学生范正美在会上提议开始夺权。范正美说：“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³

他的这个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会议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并准备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会前，造反派代表与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23军军长游好阳进行了沟通，得到完全同意的结果。

1月31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及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之后，潘复生担任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和顾问。如果不了解酝酿过程的话，从表面上看，这一切似乎都是潘复生一人导演的闹剧。

从一月革命的情况看，三个主要干部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都是被打成了“右”的典型，长期不太得志，在文革夺权时积极起事，多少有“泄愤”因素。

在一月革命中，群众干部走上历史舞台，最著名的有王洪文、陈永贵、徐景贤、王秀珍、李顺达等。

四、军干统天下

面对一月革命风暴，所有干部都面临着赞成或反对的抉择。这是路线和利益的抉择，其实路线也是一种利益，不过是某个集团、阶层、阶级的利益罢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大多数干部的抵抗和群众组织的分裂，各省革委会的组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致使不得不用军队

稳定局面，这就造成了文革中期的“军干统天下”的形势。

（一）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历史证明：越大的革命反对的力量越大。这是因为革命的变动越大，造成的动乱越大，触动的利益阶层越大，对原社会结构的破坏越大，因此，反对的力量自然越强。其实，在一月革命的同时，高层就对一月革命进行了强烈抵制，这就是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11日、16日）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对文革和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做法不满，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与中央文革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过程中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等都在会上做了激烈的发言。⁴

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随后，中央文革开始了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

与此同时，在全国的许多省市，出现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件，为此，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八项命令》。《命令》中有对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予以严惩的语句，据说叶剑英在传达《八项命令》时“故意”进行了“歪曲”。在这种条件下，依各地军队对《八项命令》的理解，出现了大量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当时被称为“二月镇反”。“二月镇反”实际上是下层的“二月逆流”，可以看作是维护“走资派”利益的军队干部对一月革命风暴思潮的“逆反”。其中，青海省发生的军队开枪镇压夺权的造反派的事件震惊了全国。成为“二月镇反”典型。

1967年初，青海省的分成了两派，“八·一八”派支持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捍卫”派支持省长王昭。当时的一般看法认为反王昭的“八·一八”是造反派。但王昭得到省委大部分领导和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的大部分驻青部队领导的支持。

1月29日，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杨植霖向“八·一八”派

“和平交权”，

这一夺权并没有得到军区及驻青 205 部队的支持，造成了“八·一八”派强烈炮轰赵永夫和省军区的局面。2 月中旬，“八·一八”派率先抢占《青海日报》社，并派两千多人坚守。2 月 21 日，赵永夫与后字 205 部队张晓川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23 日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开枪用武力攻占《青海日报》社。按后来中央处理事件的会议上，赵永夫回答周总理问话说，该事件共伤亡 260 人。实际数字是：“八·一八”派死 169 人，伤 178 人，共 347 人；军队死 4 人，伤 46 人，共 50 人。据说，当天晚上赵永夫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后该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赵永夫被逮捕，张晓川、王昭（1970 年病逝于南滩监狱）隔离审查，刘贤权全面负责青海事务。

按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的“二月镇反”》⁵一文的统计，除北京、上海、山西、山东、贵州等省份外，其他省份或多或少都有“二月镇反”现象，四川、福建、内蒙古、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河南、吉林、河北、辽宁、天津、云南、西藏等省市区都有典型事件发生。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是军队军干向文革路线的宣战，“大闹怀仁堂”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就是宣战书。

（二）军干与造反派对抗焦点：武汉“七·二〇”

从 1967 年 3 月到 11 月，全国只有三个革委会产生。

在这八个月里，革委会产生之少的原因有二，一是说明斗争之激烈，军队“二月镇反”现象有力地阻止了造反派擅自夺权，二是说明没有中央支持，革命干部的产生之艰难。

由于军队的支持，一般各地的保守派在逐渐激烈的武斗中占了上风。武汉“七·二〇”事件就集中表现了这种矛盾。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说明了湖北人的厉害。1967 年 7 月的武汉，文革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似乎比其他省份折腾得更激烈。武汉的两大派组织为“保”或“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发生了激烈的武斗。

反王任重的一派是“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

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保王任重的一派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

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采取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在两派的武斗中，当时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干部和战士及公安人员（当时公安系统已军管）都穿便装参加了武斗，百万雄师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造反派“三钢三新”在武斗中遭到重创，死伤了不少人。据1967年8月1日出版的《新华工》报报道：5、6两个月间，“三钢三新”方面，“已知死亡的一百五十八人”，“受伤人员住院治疗，已查出姓名的就有一千零六十二人。如果加上散失在各单位和街道居民中的伤员，估计在三千人以上。”另外，“三钢三新”方面的有40万成员的工人总部早已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其主要领导人朱红霞、胡厚民被抓。

当时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及空军政委余立金，到武汉解决湖北问题。谢富治、王力到达武汉后，按中央指示公开表态支持反王任重的“三钢三新”，并要求陈再道释放被抓人员，一下子惹怒了湖北省军区的部队和百万雄师。7月20日，军区警卫部队、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数千人，冲击谢富治、王力住所武汉东湖宾馆，围攻谢、王二人，中间推打了王力，撕破了王力的衬衣，并把王力劫持到军区，企图逼迫谢、王改变态度。

后“七·二〇”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被全国声讨。当时是周恩来、杨成武处理的武汉事件，陈再道最终也没有敢举旗造反，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一公开，百万雄师立即土崩瓦解，全国军干陷入极大被动。

（三）《八一社论》帮倒忙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时间不长，由于一个事件的发生，使得军队干部的处境有了转机。

1967年7月31日，主管《红旗》杂志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主持起草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于8月1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这篇社论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军地矛盾更加尖锐。全国的武斗已经不是大刀长矛的阶段了，主要武器开始升级为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及六〇炮等。对于执政者来说，这种纷乱局面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社论的精神和纷乱的局面，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也引起了多数军队干部的不满。这篇火上加油的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康生否认自己说过“揪军内一小撮”这句话，陈伯达也赶紧把责任往下推。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难逃其责。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八一社论》发表不到一个月的9月30日，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12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被隔离审查。把中央文革小组最骨干最得力的工作人员抛弃，说明这是毛对军队干部的妥协，而军队干部对“揪军内一小撮”有强烈的反抗。

既然已经不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干部“支左”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各省两派的斗争越演越烈，已经形成了“局部国内战争”（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语），尤其以西南、广西、陕西、安徽、湖南为最，中央不得不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问题。

从1968年7月份开始，领袖和中央决心要收摊了，而收摊的办法只有依靠军队。过程中，中央发布了三个布告“七·三”（1968年针对广西）、“七·二四”（1968年针对陕西）、“七·二三”（1969年针对山西）布告，并派工（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继而进入全国各大专院校。

（四）“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安天下

1968年5、6月份，广西两派四二二（造反派）与联指（保守派）对峙已经到了中央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桂林、南宁等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破坏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军队武器，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杀伤解放

军指战员的恶性事件。

7月3日中共中央针对广西乱状发布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布告》要求：

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军区、联指联合行动用武力针对四二二执行布告，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镇压、屠杀造反派事件。之后，军区和联指又以清查“反共救国团”为借口，枪杀、刑杀、毒打、关押几十万四二二人员，广西全面军管，8月27日革委会成立，韦国清在广西的地位得到巩固，从此广西再无造反派，造反派拥护的干部谢王岗被打倒。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特别针对陕西省发生的武斗不断升级，一些地方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动车船，中断交通、邮电，私设电台，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解放军战士等一系列严重事件，颁布了《七·二四布告》，布告重申：

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抢去的现金、物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迅速交回，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信，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

陕西省收缴武器的过程比广西顺利得多，截至9月中旬，陕西省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收缴各种子弹近400万发和一大批手榴弹、炮弹、炸药和雷管。至9月底，陕西省各地的武斗陆续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被拆除，绝大多数地区的大宗武器基本收缴完毕，武斗带来的动乱局面得到控制。

（五）工宣队进清华

1967年4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分裂为两派，即团派和“四一四”派。公认为团派是激进派，“四一四”派是温和派。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清华大学开始了清华史上著名的“百日大武斗”。据后来统计，“百日大武斗”导致18人阵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的策划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从60多个工厂抽调了3万多人（包含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组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清华井冈山（团派）进行了抵抗，最后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731人受伤。这就是闻名全国的“七二七”事件。7月28日，毛召见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谭（厚兰），毛怒斥武斗不得人心，警告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此后，各地各校相继进入工（军）宣队，清华四一四的胡鹏池认为：“清华七二七事件”动因与后果的持续发酵，直接导致了毛泽东整个文革方针及主导思想的“变法”，从而导致了毛泽东最终抛弃造反派，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导致了以“红卫兵造反派”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结束。

（六）“七·二三”布告收尾

“天下未乱晋先乱，天下已治晋未治。”夺权最早的山西，终于乱到了最后。在“七·三”布告发布一年后，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整顿山西乱局。

山西夺权后一个月，“三结合”分裂，革命干部刘格平就与负责支左的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产生了分歧。山西的两大派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武斗，中央在“七·三”布告发布一年后，针对山西发布“七·二三布告”，其主要内容是：

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

法办；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予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七·二三布告》发布后，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包括69军）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的一个师，共二十多个团的部队，全省各单位由军队干部开始主政。

到1970、1971年间，全国大多数省进入军干主政状态，一月革命中最著名的三个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潘复生均已下台，分别被谢振华、杨得志、汪家道所替代。而文革结束了群众运动阶段。

五、典型群众干部剖析

每一次革命或动乱，都会涌现出许多“英雄”，这是因为革命或动乱解除了对人的旧法律和旧习惯的束缚，从而解放了人的“自然力”，文革也不例外。从文革的群众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干部，都是“人尖子”，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把群众干部妖魔化当然是错误的，他们的造反既有“听党的话”的历史原因，也有自身处境的原因。

（一）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

全国第一个造反派非聂元梓莫属。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16岁参加革命，行政12级，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宋一秀、夏剑多、杨克明、高云鹏、赵正义、李醒尘（均为北大哲学系教师）等六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

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珏云而声名大噪，被毛泽东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

按身份，聂元梓应该是“革命干部”。成为红卫兵的领袖应当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估计聂元梓自己也没有想到她的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并引出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的开端。使她成为红卫兵的领袖，这就是“时势造英雄”，一个不具备左右政治风云能力的人物，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人，却作了左右政治风云的事，也决定了她的悲剧下场。

全国第一造反派非蒯大富所属。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

“造反派红卫兵”的群众干部大部分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产生的，蒯大富是一个典型。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后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领袖，首都三司副司令，成为造反派的领头人。

像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给工作组提意见，本不是什么大事，却被工作组隔离审查，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救，能不感激毛主席？能不为毛主席冲锋陷阵？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后来的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

注意全国“第一个”和“第一”有不同的含义，“第一个”是首个，“第一”有最大的意思，能与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对抗，岂非最大的“造反派”？！

（二）王洪文

全国职位第一的造反派非王洪文莫属。王洪文，男，1935年12月生，吉林长春人。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

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

王洪文是一个“理想”的接班人，工、农、兵、干都做过，像这样的人能不听党的话？！能不痛恨“资本主义复辟”？！

王洪文的造反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作的。其实王洪文是造反派中的温和派，这从他们不敢贸然夺权，一直等待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并且在1967年1月份两次《通告》允许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签字引起张春桥不满等几件事可以看出。

王洪文有组织能力强的一面，上海是全国唯一没有军管单位的城市，当然与强大的工总司的工人队伍有关。

时任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造反派的“死敌”，被总后造反派批斗时几乎被打死）对王洪文的评价很高：我曾认为王洪文是上海滩上的“瘪三”，是摆不上台面的人。1970年7月，毛主席知道我厌恶造反派，要我到上海学习一下。“那一次，王洪文当我在上海‘学习’的向导，热情接待，陪同参观。我看上海社会稳定、供应充足、群众对生活满意，比同期最好的北京还要强。我就想了，共产党安排一个省长、市长，要在经历多年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中选优秀的，才能胜任。王洪文两三年就把上海搞成那个样子，难怪毛主席那么喜欢他、器重他。”⁶

王洪文之所以能成为全国职位最高的造反派，是因为他的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身份。王洪文之所以成为“四人帮”之一而下台，是因为他是文革的“象征”，他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是文革被否定，他就被否定，没有人会记得他在稳定上海时的功绩。

（三）徐景贤

全国理论水平最高的造反派非徐景贤莫属。徐景贤，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革结束）。

徐景贤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此后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

夺权时，在各省热衷于成立什么“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之时，上海的造反派正构思“公社”形式。像上海的造反派能演出“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剧，也绝

不是偶然的。这至少反映了他们的理论素养、理想和思想。

徐景贤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过程。他在《十年一梦》中说：“时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选举’，‘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徐景贤自己则认为“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夺权宣言的题目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宏雄伟的气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印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造反派的理论性特点，这种特点正是有了像徐景贤这样的年青理论工作者所造成的。

（四）陈永贵

全国思想最左的造反派非陈永贵所属。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中国山西昔阳大寨人，为农民及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是经历最复杂阅历最多的造反派。抗战时期陈永贵曾任伪村长和日本间谍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1964年毛泽东乘火车南下视察了解到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相对而言，与上海几乎同时夺权的山西就要“土”得多。山西是一个不大的省，当时的人口约一千七百万人，省会太原市的人口也就是一百二十万人。山西省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省，造反派无法离开他们的土地纲领。陈永贵在文革中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的升级版，即：变“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为“公社为基础（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农民自留地，取消农村“自由市场”。也许是这种紧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做法，是陈永贵跃升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因素之一。陈永贵的“公社”思想与上海的“公社”思想，有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公社机构的民主性，即公社委员是否由选举产生。陈永贵的“公社”有很强的封建性，最终只能沦为封建“领地”和“庄园”。

事实上，陈永贵在文革中以“反大寨”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批斗和残害了反对他的许多干部和群众。这和上海的稳定不可同日而语。

（五）李顺达

全国思想最右的造反派非李顺达莫属。李顺达（1915年-1983年），全国劳动模范，历任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山西省革委常委，并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第九、十届党中央委员等。

李顺达是一个一直跟党走“乖宝宝”，与陈永贵的“灰色”历史相比，李顺达的历史是鲜红的。1948年，平顺县人民政府在他家的门楣上，为他悬挂了“劳动英雄”的牌匾。1952年李顺达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成了全国著名的劳动英雄。

在文革中，李顺达成为群众和干部对抗大寨的旗帜。如山西省群众干部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曾在《山西日报》发文，建议坚持“队为基础”、保留“自留地”，襄汾县委书记李辅则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坚持活跃自由市场等，都是汇集在李顺达的旗帜下。在文革的思想动乱中，在群众中产生各种左和右的思想是必然的，不过表面上都必须打上“毛泽东思想”的印记。

六、各类干部的命运

革命或者动乱的结果往往与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文革也是如此。当文革的“大乱”得到“大治”之时，原来的人物、原来的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眼前，不知命运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命运。

（一）军干

全国军管后，尤其是1971年林彪事件后，大批地方干部得到“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军队干部逐渐退出地方政权，回归军队职位。值得一提的是林彪事件前当红的四野干部或多或少的受到林彪牵连，失去当权地位。

黑龙江汪家道，原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1971年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1977年卸任两职，1978年黑龙江省委召开大会对潘复生、汪家道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进行批判。汪家道闲出政坛。

山东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1969年后省革委主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74年卸任地方职务（白如冰接任），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之后担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委副秘书长职务。

山西谢振华，69军副军长（因军长董其武未到职，由谢振华主持工作），1970年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1974年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谢振华。后离职学习由王谦接任，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等职。北京谢富治，国务院原副总理、公安部部长。1967年任北京市革委主任，1971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72年去世，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谢富治党籍并撤销谢富治《悼词》。

青海刘贤权，1977年卸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主任。期间担任过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1969—1975）。后任济南军区顾问，1981年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因为刘贤权在文革的表现，1988年只获得二级红星勋章，按刘贤权的资历，应该获一级红星勋章。青海赵永夫，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入狱，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内蒙古腾海清，在内蒙古期间腾海清的最大“功绩”是挖肃“内蒙古人民党”。1969年底腾海清被另一股革命造反派批斗，中央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由，调回北京。令人不解的是，腾海清在文革结束后未收到处分或刑事指控，1975—1980年任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江西程世清，原26军政委，文革到江西后因“与林副主席关系不错”，1971年，被撤职隔离审查，1978年10月被逮捕。

1982年1月获释。回福州市作离休处理。

甘肃冼恒汉，1977年6月被免除在兰州军区和甘肃省的职务，1982年12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政治、医疗待遇，1985年6月改按正军职待遇。湖北曾思玉，武汉事件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1973年与杨得志对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1980年任原南京军区顾问。

湖北陈再道，武汉事件后被批判。1972年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广东黄永胜，1968年调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刘兴元（原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曾任四野42军政委）接任。1971年9月，在“九·一三事件”被撤职。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

吉林王淮湘，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淮湘极力阻碍揭批“四人帮”运动，并于1976年12月1日下令枪杀了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青年工人史云峰。1977年2月，中共中央免除了王淮湘在吉林的一切职务，5月王淮湘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12月王淮湘被隔离审查。1980年王淮湘被开除党籍。

江苏许世友，1973年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卸去地方职务，彭冲接任。指挥过中越边境反击战。后任中顾委常委，副主任。

浙江南萍，在浙江任职期间，一直协调不好两派矛盾，林彪事件以后，1972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周恩来指出，南萍、熊应堂不向下传达“9.13”事件的通知，同陈励耘（空五军政委，在林彪事件后被捕）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有联系，会议认为南萍上了贼船，犯了严重错误，被免去职务，6月送北京审查交代问题。南萍是9届中央委员，从此未再露面。

湖南黎原，1970年，军长黎原率军调防他地，地方职务由华国锋接任。安徽李德生，1969年，李德生被调到北京，参与政治局、国务院、军委的工作，1970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副主席。1973年底，李德生被调到东北任沈阳

军区司令员。

辽宁陈锡联，1973年12月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脱离地方工作。1975年1月—1980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顾委常委。

四川张国华，1972年去世，刘兴元接任。

云南谭辅仁，1970年被军队人员刺杀，周兴接任。

福建韩先楚，1973年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广西韦国清，1973年脱离广西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197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脱离地方，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委员长；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西藏曾雍雅，1970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脱离地方职务，任荣接任。后任沈阳军区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新疆龙书金，在批林整风中接受组织审查，调离新疆，之后未安排工作。1983年按大军区副职待遇离休。

（二）革干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崭露头角的五名革命干部，除张春桥外，其余已提早完成其历史使命在1970年代下台。

刘格平，1970年被解除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职务，分配到唐山陶瓷厂劳动。1983年党组织给出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去世。

王效禹，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3日，在山东青州因病去世。

潘复生，1971年6月中共中央免除了潘复生职务，决定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进行审查。1980年潘复生因病去世。1982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潘复生问题结论的请示回电答复中说，潘复生在文革时间，确实迫害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一些冤假错案，错误是严重的。但鉴于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同时考虑到潘复生参加革命较早，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对所犯错误曾做过检查，现已病故，

因此，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同志的审查和不做组织处理的意见。

李再含，1971年5月被撤销职务。1975年8月14日在大连逝世。

张春桥、姚文元是一月革命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革命干部，后来进入中央工作，成为“四人帮”之二。

还有一些在一月革命中没有表现机会的革命干部，如刘建勋、李雪峰，解学恭、李瑞山、马天水等。

刘建勋，太行区干部。1961年为纠正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刘建勋从广西调至河南，为解决河南百姓的生活问题想了不少办法。文革中刘建勋虽然支持了造反派，文革后虽然没有被重用，1977年至1979年任河南省政协主席。下场还是不错的。

李雪峰，北方局、太行区干部。他在文革中充当了“救火队”的角色。

1966年6月，先是替代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到天津任职。1968年到1970年任河北省委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华北组出了问题，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隔离审查达八年之久。1985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解学恭，晋绥干部。文革前任华北局书记。1967年1月，不知为何受重用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2月任革委会主任。1978年6月被免除党内外职务。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1987年3月被开除党籍。解学恭是文革时期任职最长的省级一把手。

李瑞山，实际上算不上如刘格平、王效禹那样的革命干部。原在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调任陕西省第二书记。1968年平稳坐上陕西省第一把交椅，至1979年调至北京，任农委副主任、经委副主任、经委顾问等职。

马天水，1967年2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6年10月至1981年12月接受审查。因文革中犯有罪行，1981年12月被判刑，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2年4月至1988年12月因病取保候审。1985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8年12月在上海去世。

另外，革命干部四川的刘结挺（原宜宾地委第一书记，造反后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张西挺（原宜宾市委第一书记，造反后任四川革委会副主任）夫妇也很出名，因为不是第一把手本文开始没把他们上榜。刘、张 1970 年 7 月停职接受审查，1971 年 8 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 年 6 月 20 日，刘结挺、张西挺被依法逮捕，1982 年 3 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刘、张均在 1993 年去世。

这些革命干部在文革中特别张扬，整了不少老干部，也得罪了不少老干部，所以没干几年早早被免职。比较起来刘格平下场最好，也许是他资格很老，整人相对较少，但后来“六十一个叛徒”重新上台，他的重新就职也很不容易。

（三）群干

相对于革命干部，群众干部的命运显然要糟得多。如果把群干分成造反派红卫兵（学生）、工农干、劳模三类的话，造反派红卫兵（学生）出局是最早的。

1. 学生出局

1967 年到 1969 年间，由于工（军）宣队的进校，学生干部大多被发配，有许多人又回原校被清查“五一六”，多人文革后又被判刑，最典型的是北京学生的“五大领袖”。“五大领袖”有一位北京市革委副主任、四位常委，都属于副省级，但没有把他们当领导干部来看，市革委派出的工（军）宣队进校，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

聂元梓（北大新北大），1969 年 11 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83 年 3 月，57 岁的聂元梓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 17 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蒯大富（清华井冈山），1968 年 12 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 年 11 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过审查。1983 年 3 月 10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法塘格木监狱。

韩爱晶（北航红旗），1968年底被羁押，交代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来在法唐格木农场被监管劳动。

谭厚兰（北师大井冈山），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6月，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王大宾（北地东方红），1968年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获释出狱。

2. 工农干出局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批被认为“四人帮”体系群众干部下台甚至被捕。

主要人物有上海的王秀珍、体委主任庄则栋、文化部长于会泳、副部长钱浩梁、刘庆棠等。这都是省部级干部。当然基层也有许多反“四人帮”的群众干部被“两个凡是派”一锅烩搞下了台。

王洪文，1976年粉碎“四人帮”被捕，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死于狱中。

王秀珍，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1月离职审查，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庄则栋，1961、63、65三届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乒乓外交”的发起者，四届人大后任国家体委主任。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了4年。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论。

于会泳，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曾参加“样板戏”的音乐

创作，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钱浩梁，著名老生演员。文革中钱浩梁扮演李玉和后受到重用，曾任中国京剧院革委会领导成员，又任院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出席了党的“九大”。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还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被粉碎，钱浩梁被认作“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1982年初才恢复自由。

刘庆棠，中国著名芭蕾舞演员。文革期间，刘庆棠任中央芭蕾舞剧团革委会中共核心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1976年10月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刘庆棠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3. 劳模淡出

最典型的是陈永贵。他没有成为四人帮体系的人，纯粹是沾了劳模的光。但极左的毛病一直未改，1977年，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1982年未获选党的十一大代表。

李顺达，1977年受到“倒清查”，使其受到一连串不公正待遇，淡出人们的视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李顺达的所谓问题终于水落石出。1978年，他担任了山西省农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79年，他担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1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正式作出了为李顺达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983年4月，他当选为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吴桂贤，曾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4. “三种人”出局

最后一轮出局的群干是“三种人”。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党。而清理“三种人”是此次整党的主要任务。所谓“三种人”是陈云提出的，即指：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三种人”中有许多是反“四人帮”分子，但因“出身”不好，终被出局。

“三种人”在各省的省级干部大多是挂名省革委“副主任”“常委”之职，实际职务实为“县级”“副县级”，稍高一点的是“副厅级”。如四川省革委副主任蔡文彬，1963年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为电子科技大学）通讯专业学习，任校学生会主席，校“东方红”及“红成”负责人。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成都邛崃县委书记。诸如此类的群干，都在“清理三种人”的攻势中败下阵来，使得许多人才毁于一旦，既不利于国家，也不利于个人，成为“双败”局面。应该说，文革后对“三种人”的批判是对一代人批判。这代人参与并推动了文化大革命，最后把文革推到了“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语）的地步。

（四）“走资派”

林彪事件后，尤其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许多当年的走资派也逐渐复出。文革后，邓小平二次复出，胡耀邦主持平反工作，“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也得到平反，更多的走资派得到平反，走上工作岗位。走资派后来的命运也在“复辟”。当年各省一把手的命运如下。

欧阳钦，1965年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后任东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遭残酷批斗和迫害，平反后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范五，原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文革中长期被关押。1983年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至1970年文革中受迫害，被隔离审查，下放劳动。1970年开始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政协主席，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等职。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陈丕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7年恢复工作后，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1983年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贾启允，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一月革命风暴”中受到迫害，被停止工作。1972年恢复工作。1975年后，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976年，在云南省内造反派的压力下，选择了向造反派妥协，并在1976年2月份把邓小平与他的一些谈话暴露出来，客观上为批邓供了炮弹，“四人帮”一下台贾启允于1977年2月也受牵连下台，其在文革尾声的表现好比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一样。贾启允在1979年3月任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行署副专员，1983年4月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贾启允在文革前后的表现，在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很具有代表性，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

卫恒，山西省原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下旬在关押中去世。

王谦，山西省原委第二书记、省长。一月革命后王谦被关押，1970年解放，任阳曲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1975年在追随江青“批谢（振华）”立功，晋升省委第一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利用揭批清“四人帮”机会，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迫害反“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1980年停职一段时间后，调任重庆市委书记。

彭真，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最早被打倒的“走资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布：文革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委员长。

王昭，青海省原省长。1967年“二月镇反”后被关押，

1970年2月12日，饱受摧残的王昭被迫害致死在狱中，年仅53岁。1978年党中央为王昭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杨植霖，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2月杨植霖自觉革命，将红卫兵引入省委、省人委夺权，引起“二月镇反”的发生。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救自己，文革前杨植霖写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在文革中被批判为美化叛徒，受到牵连，被残酷迫害。平反后，1978年1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12月当选甘肃省政协主席。又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乌兰夫，原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1966年华北局会议被批判下台。1972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召开十大做准备。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1973年，中共十大上，乌兰夫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75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委员长。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万晓塘，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1966年6月的华北局会议上被批判，9月病逝。

方志纯，原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后任东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遭受迫害。1975年后，他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80年任江西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汪锋，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1966年底至1977年受迫害，被关押。1977年7月开始，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书记兼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届政协主席，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4月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文敏生，原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1966年9月任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期间，受残酷打击迫害。后任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79年1月平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任邮电部党组书记、部长。

后离休任中顾委委员。

林铁，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三书记，行政五级。1966年6月华北局会议被批判，文革中受迫害。后任中央组织部顾问。第一、二届中顾委委员。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王任重被打倒，身系冤狱近8年。1975年王任重释放被放，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主管农业。1980年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3年王任重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委员长。198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赵紫阳，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被打倒，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改革开放的发起和积极推动者，1989年“六四”后被免职。

赵林，原代理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1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书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第四届政协主席，山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离休任中顾委委员。

江渭清，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4年底，江渭清重新被启用，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直至1982年。晚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1987年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江华，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江华受到关押、批斗。1973年8月24-28日，党的“十大”召开，江华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1月，江华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为中顾委委员、常委。王延春，原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关押数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南省委为他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第一副主席。1984年3月19日在长沙病逝。

杨静仁，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文革中，杨静仁同志受到严重迫害。1978年3月，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以后又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8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民委主任。后为政协副主席。

李葆华，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至1973年文革受迫害。1973年9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党校省干班党支部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1978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霍士廉，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他受到诬陷，惨遭迫害，在周恩来总理关照下才幸免于难。1977年1月，霍士廉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区第一政委。1979年2月，霍士廉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0年10月，霍士廉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离休后任中顾委委员。

黄火青，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受迫害。1975年9月至1977年12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1980年1月起）。后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

廖志高，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廖志高于1967年初被“打倒”。1974年11月，中央任命廖志高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1980年8月，廖志高突发脑血栓塞导致半身瘫痪，难以再负担繁重的工作。1982年2月，中央调他到京任中组部顾问，后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叶飞，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周仁山，原西藏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文革，在一夜之间被戴上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西藏的代理人”的帽子，被关进监狱达8年之久。1978年周仁山恢复工作，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区党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竭尽全力为保证新疆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不懈努力。然终因身体不支，两年后调回北京，1981年以后，周仁山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顾问。

王恩茂，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66年文革

开始后，王恩茂受到迫害。1975年，经毛泽东亲自过问，他被调到原南京军区任副政委。1977年，王恩茂担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1981年，党中央决定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和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4年，王恩茂又兼任兵团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85年10月，王恩茂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1986年3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王恩茂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走资派回归官位复辟，群干回归群众工作，军干回归军队备战，革干、林彪“山头”军干归于湮灭的时候，文革的目标一项也没有达到，历史好像回到原先的地方。革命的原意是要社会结构和制度大跃进，但革命的动乱和暴力往往造成社会极大的分裂和破坏，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就像跳跃之前要倒退助跑一样。正因为如此，再前进还是要回到原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就是前进。

人还是那些人，但事情不同了，复辟不是真正的复辟。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代人，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干部、军队干部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危害性，所以启动、推动了改革开放，把原来不自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回归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注释：

-
- 1 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页2。
 - 2 转引自《贵州风云》，页115。
 - 3 引自网文，范正美长篇文革回忆录《秋梦追思》（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a5f29450102wk0b.html。最近
登录时间：2017-10-9
 - 4 见百度百科词条“二月逆流”。
 - 5 《领导者》总68期，财经文摘，2016年2月25出版，页127—136。
 - 6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页76。

各地文革特点简述

卜伟华

在中国文革历史的研究中，各省、市、自治区的文革历史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搞清楚各地文革的历史脉络及其特点，必然会对整个中国的文革历史产生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刻的认识。本文根据过去积累的一些资料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史研究室所编大事记等资料，试图对各地的文革特点作一简述。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只望能起一点儿抛砖引玉的作用。

北 京

北京是文革的策源地。毛泽东搞文革，首先选择了北京作为突破口。他要搞掉刘少奇，首先搞掉北京的彭真。北京的运动对全国各地有极大的示范作用。文革之初，北京红卫兵常得风气之先，并把中央的精神传向全国各地。北京红卫兵到各地串联，煽风点火，对各地的造反派起来炮轰各级党政领导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文革中首先喊出“造反有理”口号的是北京的中学生，最先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也是中学生，而大学生们的造反行动则相对滞后一些。具有这一特点的还有天津市。

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写出《向旧世界宣战》的传单，最早提出破除“四旧”的号召，直接引发了急风暴雨式的破“四旧”浪潮。经中央肯定和媒体的高度赞扬，破“四旧”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打死人的事件。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这是后来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此类

惨案中最早的典型事件。

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地派”两大派。北京红卫兵组织的派性与全国各地有所不同，各地大多数对立的组织会在对待某些领导干部、某些权力机构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而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们都力图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行动，他们的区别只是在紧跟的程度有所不同。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的不很紧密的联合体。中央文革小组把北京高校的两大派当作推进文革进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因而对两大派的几个主要组织都爱护备至，并树为造反派的“红旗”。但中央文革小组对待北京两大派的态度也是有区别的，它对“天派”相对严厉一些，批判、训斥的时候多一些；对“地派”较为宠爱一些，保护、表扬的时候多一些。其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小组非常看重造反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他们认为“地派”中的师大“井冈山”等是反击“二月逆流”最有力的组织。

北京市一级的夺权与各地不同，它是在文革发动之初即由中央直接夺了一次权，到“一月风暴”时又夺了一次权。北京的大联合和夺权是中央直接指导的。毛泽东亲自操控了北京的夺权进程。北京原拟3月初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份中央电报通报了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夺权问题的指示：“主席最近对北京市指示，夺权不要匆忙，先做好充分准备，开好工、农、学的代表大会。”北京市革委会在4月20日成立。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采用了北京市的夺权模式：先召开工人、贫下中农、大学生、中学生的代表大会（即工代会、农代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然后成立革委会。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在北京树立了“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为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整党建党、干部下放、“上山下乡”“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等运动提供指导性的经验。总的来说，“六厂二校”经验都是很“左”的，它的核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经验在总体上推动了“斗、批、改”的进程，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指导方针贯彻到全国各级、各系统的领导部门和基层单位，进一步加深了“左”

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及各领域的影响。

1973年10月，江青等人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展了一场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把1972年至1973年期间贯彻周恩来指示所采取的措施，统统说成是“右倾回潮”的表现。北京市委肯定了这种做法，并在全市各个系统开展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北京市出现了两个典型，即“一个小学生日记事件”和“考教授事件”，都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

1976年3月底到4月5日，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是当时全国性的抗议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它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上 海

1966年8月底，上海市委遭到北京南下红卫兵的猛烈冲击，上海市委让下面组织大批工人、市民、干部去保卫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辩论，试图改变被动局面。但事与愿违。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最大作用，就是催生了上海的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榜样激励下，更在北京红卫兵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迅速崛起。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接管，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两张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毛泽东高度评价《文汇报》刊登的《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少有的好文章”。《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加了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写成的编者按说：“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28日，上海的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第一次炮打张春桥，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镇压。这次炮打的结果显示出张春桥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上海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因炮打重新整合。由于参加炮打者多为造反派的中坚，这些骨干因炮打遭到批判而被边缘化，上海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而工人

造反派被认为立场坚定，地位更加上升。从此，上海局势基本上由忠于张春桥的机关联络站和工总司控制。

上海的工人造反运动在全国独领风骚，工人造反组织最为强大，而且实际存在的时间最长。各地造反派进入夺权后的革命委员会大多只是摆设，并无实权，而上海则是例外。上海工总司的许多头头在革委会以及后来的上海市委中担任要职，王洪文更是几乎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上海的动乱严重，但相对来说武斗并不严重。最厉害的一次武斗是1967年8月4日砸联司，当天参与砸联司的超过10万人，但没有动用枪支弹药。武斗中被打受伤者1000多人，其中许多人是武斗结束后，被作为联司或支联站各级头头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的，不少人从此落下残疾，但当天没有死一个人。

上海民兵是一大特点。上海的民兵指挥部是从1967年8月成立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演变而来的。1967年11月17日，上海市革委会决定以文攻武卫“改造基层民兵组织”，“凡已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单位，文攻武卫组织就代替原民兵的一切活动和工作。”1970年5月31日，在上海民兵工人基干队伍成立大会上，王洪文宣布：“为了适应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名称的统一，市革命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文攻武卫’改称为‘上海民兵’”。全国各省市的民兵都归军队管，落实到地方，就是军队的派出机构区县武装部管。唯独上海，区县武装部管不了民兵。文革中上海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设立，使得全市各工厂的民兵，有了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中的上海民兵被认为是一支“第二武装”。

上海的市委写作组也很有特点。文革前的写作班子只是秘书班子，只提供政策参考，并不具有话语权。而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却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九大后，各省市都恢复了省市宣传部，唯独上海始终没有恢复市委宣传部，舆论被写作组管理和引导。写作组代行着市委宣传部门对政策解释的话语权，为张春桥、姚文元管理左右着上海的思想界，甚至对全国的思想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关于上海民兵和市委写作组的这两个特点，在李逊女士的新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中都有比较详尽的阐述。

天 津

天津市的文革，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省委管大学的运动，市委管中学的运动。1967年1月，天津划为直辖市，河北省委就不管了。

天津市的造反运动是从中学开始的。1966年6月21日，十六中的学生发表给全市青年的公开信，批评天津市委。天津市委和全国许多地方的党委一样，采取了压制的办法。他们组织全市群众及各学校师生对十六中这封信进行辩论，将十六中揭发批判市委一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后，天津市委不得不检查在“十六中事件”上所犯的“方向路线性错误”。

9月19日，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因心脏病突发逝世。21日，新华社播发了他的死亡公报。有50万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半年后的1967年4月10日，中央即明确提出天津存在一个“万张反党集团”。

1967年1月2日，中央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辖市改为中央直辖市，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上海造反派的《紧急通告》发表后，天津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纷纷开始夺权。从1月7日到月底，天津日报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市电信局、市公安局、市计委、新华书店等单位，相继被造反派夺权。但全市性的夺权并未发生。2月25日，天津市“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群众组织、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方组成的领导班子，也称“夺权领导小组”成立，解学恭任组长，肖思明任副组长。

2月，天津延安中学经过军训，实现大联合，为全国提供了“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的大联合”的经验。

3月15日至22日，天津市先后召开市贫下中农、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和职工等5个系统的代表会议（即“五代会”）。但因为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加剧，革委会迟迟未能成立。7月，与“五代会”相对立的“大联筹”成立。此后，“五代会”与“大联筹”两大派之间长期派争不断。

天津文革中也发生过一些武斗事件，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规模都不大，武斗造成的死亡人数极少，据说天津中级人民法院

院认定在文革初期武斗死亡共 11 人，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天津文革武斗中死亡人数在全国很可能是最低的。

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此后，“揪叛徒”活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当年在“抓叛徒”活动中最有影响的是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据南开大学两派组织自己宣称，他们在“揪叛徒”活动中揪出的十二级以上领导干部即达 1200 余人。

1968 年 2 月 21 日，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攻击天津党政领导干部、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和文艺工作者。提出要批判一个“黑会”、一个“黑戏”，要彻底揭开公检法的盖子。此后，天津开始了揭文化界和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砸烂文艺“黑会”“黑戏”、砸烂公检法运动。

1974 年至 1976 年，江青三次到天津宝坻县小靳庄，大讲“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小靳庄被树为全国的典型，各地争相学习小靳庄的经验。

黑龙江

1966 年 8 月 16 日，哈尔滨工程学院（即原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6 年 1 月交地方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但此后人们多沿用旧名。）“红色造反团”中的一些人，到黑龙江省委院内贴出了《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从而掀起了黑龙江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浪潮。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不仅是全省影响最大的造反组织，而且足迹遍布全国，参与了许多省市的文革运动，在全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8 月 26 日，省委机关的干部职工在八区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会上点名批判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等领导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会上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此后，省委书记处的 12 名书记中，除潘复生外全部被批斗。潘复生因到黑龙江时间较短，造反派批判省委的许多问题都与他无关，而且他在运动中支持造反的态度比较坚决，所以毛泽东决定依靠潘复生来领导黑龙江省的夺权运动。

1967 年 1 月 16 日，“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

并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宣布“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3月23日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宣布夺取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文、财等一切大权。

黑龙江省革委会“勤务组”召开会议，决定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为省革委会班长，游兴懋（哈尔滨工程学院学生）、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教员）为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为顾问。3月17日，经中央建议，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潘复生任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十六条》中规定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人员，必须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而在文革的实践中，实际上又返回到上级任命的老路上去了。十六条中提出的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制”，在全国各省、地、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并没有一家真正实行过。

4月初，黑龙江省造反派分裂成为“炮轰派”和“捍联总”两大派，派性斗争激烈，并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曾动用了坦克、装甲车、机关枪、冲锋枪和炸药，后果十分严重。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省委机关柳河农场开办“柳河五七干校”，把大批干部下放进行劳动改造。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在这以后，全国都办起了各种“五七干校”，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

1968年6月，沈阳军区党委根据中央批示成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成立时，共接收国营农、牧、渔场93个，合编为5个师（辖58个团）、3个独立团。至1972年2月，黑龙江省共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本省知识青年77.4万人，其中77%分配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事件”。6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决定成立省反侵略斗争指挥部，潘复生任主任。统一领导全省反侵略斗争、军工生产、三线建设和支前工作。

1970年7月8日，周恩来指出：“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23日，周恩来等当面批评潘复生，指出：“黑龙

江的问题主要是一派掌权，一派压另一派”。1971年3月至6月，黑龙江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潘复生在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8月，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的职务。另外如山西、贵州和山东，也有和黑龙江相似的特点，即在最早夺权的这四个省，出现了由中央肯定的四个著名左派：刘格平、潘复生、李再含和王效禹。这四个人夺权后成为省革委会主任，大权在握，对反对派进行压制，造成全省范围内的长期动乱，都在“九大”后受到处理，成为动荡政坛上的过客。

吉 林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吉林省委书记处及其办事机构常委办公室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已不能坚持工作，被迫东躲西藏，多次搬家，先从省委机关大楼转移到省人委办公楼档案室，后又转移到团省委、省宾馆、康平街2号、省委党校幼儿园，直到1967年1月底，被造反派发现，才完全停止工作。

1月18日，长春市“二总部”与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对省委实行了联合夺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吉林省夺权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等于2月初宣布退出“二总部”，另行组织了“长春公社”。吉林省驻军支持“二总部”的夺权，认为“长春公社”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大方向错了”，不予承认。到2月下旬，长春市形成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与“二总部”为一派，也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称为“公社派”），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形成长期武斗的局面。

1967年9月，中央将吉林省驻军、群众组织代表和阮泊生、兰干亭等领导干部一起召到北京，协商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1968年1月，吉林两大派达成大联合的协议。3月，吉林省革委会成立。没有经过筹备小组的阶段，直接成立革委会，是吉林省的一个特点。

1974年5月，吉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揭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会议”揭批王淮相等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会议认为，王淮湘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对林彪及其死党

是跟的很紧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文革结束后，王淮湘因林彪事件和与“四人帮”关系密切被免除职务，开除党籍。

辽 宁

1966年10月21日，新华社报道，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步行串联，历时一个月，行程2千里，从大连到北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开步行串联之先河，带动全国千百万红卫兵走上长征路。

1967年1月31日，“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辽宁省的夺权并不成功，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让。

至6月，辽宁省形成了“八三一”“辽联”“辽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

7月下旬以来，沈阳武斗成风，许多工厂停工，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很快又刮起了抢枪风，据后来从辽宁9个个市、地和2个铁路局收缴上来的武器统计，有各种枪支20余万支，子弹300多万发，手榴弹48990枚。

8月22日，“辽革站”与“辽联”在东塔机场发生枪战，沈阳空军派出制止武斗的战士被打死、打伤多人。这次武斗使飞机和机场遭到破坏，被迫停运3天。

1968年5月8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

1968年7月4日，辽宁省革委会将鞍山市公安局军管会总结出的“群众专政”经验（即所谓群专、群侦、群审、群判、群管的“五群经验”）转发全省。这一经验推广后，群众专政队私立公堂、私设监房，刑讯逼供，任意践踏人权，打人致死致残，任意定性判刑，更有甚者任意将人处死。

1973年7月，辽宁省兴城县知识青年张铁生在本年大学招生考卷背面写的一封信，经毛远新修改并加编者按发表在《辽宁日报》上。张铁生成了“反潮流”英雄，上了大学、入了党，并担任了铁岭农学院的党委书记，还当上了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4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编者按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教育战线出现的又一

个社会主义制度新生事物。所谓“朝农经验”是指办“政治”大学，培养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同资本主义斗、敢于造走资派的反”，说这是“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

1975年1月，辽宁省委在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召开现场会，推广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哈尔套经验”，以公社为单位，赶“社会主义大集”，这种“社会主义大集”，是强迫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必须卖给供销社，不准到集市出售，然后再从供销社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取消了政策允许的农村集市贸易，挫伤了农民发展正当家庭副业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75年4月，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因批评毛泽东，揭露林彪，为刘少奇喊冤等罪名惨遭杀害。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其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河 北

河北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了邢台和唐山的两次强烈地震，共有25万多人丧生。

1966年4月河北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机关由天津市迁往保定市办公。

7月，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即被批判、撤职。11月后，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地的红卫兵猛烈冲击省委机关，批判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1月23日，在保定的各派红卫兵同各造反派组织发起夺权运动，一天之内，省委、省人委、保定地委、保定专署、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委等在省会的三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被夺权。

夺权后的各造反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冲突，频频发生武斗。

河北省军区支持较为稳健的“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而三十八军支持比较激进的“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保定两派各恃有军队的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7年6月22日至23日，发生在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然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都赶到现场，试图制止武斗，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陈伯达先

后在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工筹派”而批评“工总派”，更激化了两派的对立情绪，致使武斗升级。

虽然河北省于1968年1月成立了革委会，但并没有扭转河北省的动乱局面。

1970年12月的华北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检查“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地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会后，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被调离。

保定帮派林立，武斗成风，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的“老大难”。粉碎“四人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保定局势仍然十分严峻。1976年11月9日，中央发出布告，提出解决保定问题的四项措施。部队出动20个团的兵力，封锁了保定的所有交通要道，包围了192个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抓捕坏人。到12月初，保定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河 南

1966年8月18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紧跟毛泽东，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刘建勋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站出来，坚决支持造反派。从炮轰省市委到夺权，这批老干部都坚定不移地支持造反派，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河南省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河南文革的这一特点是由原河南造反派武彩霞女士在《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发出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河南省军区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军队的态度与刘建勋等老干部不同，他们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

中央在河南问题上态度鲜明，指责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明确指出应由军区政委何运洪负主要责任。不久，中央决定调王新接替何运洪，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团时，对“二七公社”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表示支持。次日，上海《文

汇报》发表文章称赞这一口号，导致全国各地武斗升级，形成“全面内战”的形势。

8月12日，省革筹小组、省军区召开各军分区及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刘建勋、纪登奎在讲话中要求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把枪发给造反派，不允许保守派有枪，并提出“枪换肩”（即由保守派换给造反派）的口号。同时还明确提出，当前军分区、人武部由支持保守派转向支持造反派的标志就是：枪发给了造反派。此后，全省各地抢夺军队、人武部、公安局枪支弹药的事件接连发生，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批判了省委原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新，当时的中央文件把王新定为林彪“死党”。河南批林整风中搞的是“批林批王新”。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为那些受到组织处理的“九次冲杀，十次受压”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平反补台”，认为他们遭受了“王新路线”的迫害。11月，省委召开批林整风会议，揭发批判王新，提出要彻底肃清林彪及其死党王新在河南的流毒。此后，全省大搞“平反补台”“突击纳新”和“突击提干”。仅半年时间，全省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干6.6万人，全省的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1974年1月，江青派谢静宜、迟群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调查一学生非正常死亡问题。谢、迟回应向江青汇报后，中央下发5号文件，要求各地深入批判和反击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

1975年8月上旬，驻马店、许昌等地区普降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使洪、汝、沙、颍、唐、白河漫溢决口，板桥、石漫滩、田岗、竹沟4个大型水库及大批中小水库垮坝决堤，30个县约1050万人受灾，数万人死亡。此事当时未在媒体上披露。

内蒙古

启之先生认为：“与其他省、市、自治区相较，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挖肃’为主的‘革命’所要解决的民族问题，亦即乌兰夫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推行‘民族分裂主义’的问题。”笔者认为此说确实击中了要害。

内蒙古在“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活动，是围绕着《内蒙古日报》展开的。当时，内蒙古存在以“工农兵”“无产者”为代表的

保守派和以“呼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内蒙古军区在报社两派争相夺权中派了一个连去制止武斗，去制止武斗的部队支持了报社的保守派，引起了“呼三司”的愤怒。“呼三司”数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并在那里静坐示威。当“呼三司”围困军区第7天时，发生了军区干部柳青开枪打死学生韩桐的事件。

从1967年2月至4月，为解决内蒙古问题，中央六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和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4月13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决定中说内蒙古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呼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支持了保守组织。

一般来说，中央正式对某地文革表态后，都会在对当地文革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引来反对派的反弹。但在反弹的力度上很少有像内蒙古的反对派那样强烈。

中央决定发布后，被宣布为保守组织的“工农兵”“无产者”的大批群众表示坚决不服，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中央重新调查内蒙古的情况。内蒙古军区的大批干部、战士也表示不理解，许多人参加了支持“工农兵”“无产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内蒙古军区一大批干部战士前往北京告状。

到北京告状的内蒙古军区的军人们受到中央多次接见。每次接见都出现“顶牛”的现象。周恩来等人三番五次地宣传中央的政策，军人们则顽强地要求中央收回“八条”。会场上每每出现哄闹、混乱的场面。甚至出现冲上台“将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同志毒打致伤”的事件。

内蒙古的抵抗着实让中央恼火，中央的处理也是极其严厉的。中央6月15日的通报中把内蒙古军区军人们在北京的行为定为“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违反党纪军纪和国法的犯罪行为。”中央军委决定严肃处理支持保守派的军区领导人，调兵移驻呼市，将不听中央号令的部队调离呼市，并宣布将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

随后，北京军区部队开进呼市，一些保守派组织被强行解散。

1967年10月，乌兰巴干向滕海清递送了《乌兰夫黑帮包庇大叛徒集团罪行的简要报告》，《报告》中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蒙修设在内蒙古的大特务组织”。1968年2月以后，滕海清以乌兰巴干编造的材料为依据，领导开展了挖肃“内人党”运动。

各单位、各地区闻风而动，很快就挖出了大批的“新内人党”。与之相伴的，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人数越来越多。内蒙古革委会内关于“新内人党”问题也有了意见分歧，革委会副主任高锦明认为“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塌了！”11月，高锦明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并被停止了工作。

高锦明遭到批判后，内蒙古地区的挖“内人党”运动开始进入高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里的蒙古族干部纷纷被抓，几乎无一幸免。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指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扩大化，而且使大批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但当时中央的结论只是认为在挖“内人党”工作中犯了扩大化错误，“反乌兰夫、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方向还是对的。”因而，内蒙古的广大干部、群众赴京上访，强烈要求彻底批判滕海清的错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呈瘫痪状态。当年12月，中央作出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统一全面领导内蒙古的工作。1970年2、3月间，郑维山宣布内蒙古在平反工作上犯了“一风吹”的扩大化错误，宣布内蒙古革委会为落实政策制发的一系列文件停止执行，使内蒙古局势又发生逆转，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工作陷入停顿。

“新内人党”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之一，它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因此案而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有34600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6222人。这起冤案殃及面极大，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政第一把手乌兰夫到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直到普通农牧民，甚至殃及内蒙古周边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蒙古族的聚居区。

1969年7月，中央“为了便于领导和战备的需要”，决定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将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除外）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的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巴彦诺尔、乌力吉、塔木素、阿拉腾敖包、笋布尔等公社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巴彦淖尔盟阿拉善右旗其余部分和额济纳旗划归甘肃省。如此大范围的行政区划变动，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山西

1966年11月，山西省委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三干会”一再受到造反派冲击，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此后，造反派纷纷进入省委和太原市委机关，连续批斗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党的各级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山西是全国最早夺权的省份。山西省的夺权，是在中央支持下，由山西省原副省长刘格平带头进行的。

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在其住处召开由23个造反组织头头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议进行期间，造反组织调集人马，抄了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家。会议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刘格平宣布山西的文革由“核心小组”领导，“核心小组”是夺权总指挥部的顾问机构。在刘格平、张日清等人的支持下，造反派查封了省市委所有的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抢收公章，抢占各部委的办公室，夺了省委和太原市委的权。

山西夺权的一个特点是造反派内部的派性斗争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1月下旬，张日清派出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当时山西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支持该厂的另一造反组织“红卫队”重新进行了夺权。“红联站”在省广播电台的夺权也被宣布为非法，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重新夺权。此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组成“造反夺权工作队”，分赴全省各地（市）、县进行夺权或对已由“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夺权的单位进行重新夺权。

山西夺权的另一个特点是劳模参与。1967年1月底，由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等著名劳模发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这个组织宣布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3月12日至19日，“山西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召开，产生了山西省革委会。

山西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刘格平和第二把手张日清各支持一派，刘格平支持“红总站”，张日清支持“红联站”，两大派群众组织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频频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

于4月、7月两次在北京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未能解决问题。在解决山西问题的12月会议上，确定由六十九军党委统一领导山西“支左”工作。1968年5月，中央第四次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毛泽东接见了会议代表。此后，省城的武斗之风开始有所减缓，但其他一些地区的武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

从1967年4月到1969年4月，山西省革委会和省核心小组曾陆续作出过一系列关于制止武斗的“通告”“通令”“通知”“规定”等，但由于省革委会和省核心小组中许多负责人本身都是帮派头头，他们发出的“通告”等，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因而派仗越打越大，武斗不断升级。

1969年7月23日，中央发出专门针对山西的布告（即《七·二三布告》）。《七·二三布告》对制止山西的武斗、稳定山西的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七·二三布告》的贯彻实施，被派仗、武斗所笼罩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变，谢振华接替刘格平主持山西党政军全面工作，山西局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1974年，山西的“批林批孔”运动演变为对省委主要领导人谢振华的批判斗争，这就是围绕晋剧《三上桃峰》开展的批判斗争。山西省委从3月下旬开始，举行了长达3个月的三届七次会议，会议由陈永贵主持，对省委主要领导人谢振华、曹中南进行批判。会议指责谢、曹二人“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的错误。山西原来较为稳定的局面又被打乱了。

山 东

1966年8月25日，山东青岛一些高校造反学生与拥护市委的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发生冲突，史称“八·二五”事件。中央委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负责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但收效甚微。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市委副书记王效禹反映自己对青岛事件态度的电报作出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应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967年1月22日，王效禹等人率领23个群众造反组织，

夺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28日王效禹率青岛市赴省夺权代表团22人到达济南，呼吁山东省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2月3日，由25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的“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4月中下旬，山东省和济南市的两大派组织严重对立，一派是拥护王效禹的“山工总”“山红指”等组织，另一派是对王效禹不满的号称“四·二二”派的组织。5月7日，在济南省委大院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四·二二”派被打垮，济南市以“四·二二”派为主建立的革委会几乎全部被摧毁。

1968年11月，王效禹等人在山东全省全面发动了“反复旧”运动，集中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全省约39%的县市革委会和47%公社革委会被摧垮、改组，搞变相夺权。

1969年1月，王效禹等人派“工宣队”进驻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山东全省社会和经济再度陷入严重混乱和瘫痪、半瘫痪状态。

九大闭幕后，中央将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在京的27人留下来集中学习，解决山东问题。5月29日至6月2日，山东省委常委会和济南军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负责人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王效禹发动“反复旧”的错误。6月5日，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召开地方、军队干部联席会议解决王效禹问题。此后，王效禹虽然名义上还担任着山东省的一把手，但实际上已经处于被批判的地位，靠边站了。

1972年11月18日至1973年1月8日，中央召集山东省及青岛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进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解决青岛市和山东省批林整风中出现的问题。汇报会期间，对杨得志、袁升平、张铨秀进行了批判。中央批转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的领导也是错误的”。2月11日至3月29日，省委、济南军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传达中央精神，对杨得志、袁升平进一步揭发批判。

1973年8月，袁升平被撤销职务。9月28日，省委印发《彻底揭发批判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材料》，要求迅速掀起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袁升平的严重错误的高潮。此后，山

东全面开展了批林揭袁运动，株连了一大批军队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74年初，在批林批孔和“批林揭袁”运动中，山东的造反派重新拉帮结派，搞“进驻”“踢开党委闹革命”，各大企业的造反派也纷纷起来要求重新夺权。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整风汇报会议。4月，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接见山东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时指出：山东的批林批孔要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对袁升平和杨得志要严格加以区别，把矛头指向杨得志、白如冰同志是错误的；山东清查“五一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决不允许为王效禹翻案；干部群众不要重拉山头，不要成立战斗队，不要搞进驻，不准非法抓人；对于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打击。

湖 北

文革初期，湖北省委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运动。7月3日，王任重在给省委常委的信中提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运动初期，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400余人，其中中学生159人。

1967年1月26日，湖北省各造反组织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夺权大会，把湖北省党、政领导人张体学等押到会场，宣布夺取湖北省领导权。但造反组织之间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意见分歧，1月27日，“工总”等5个组织，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

2月8日，“工总”“九·一三”等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这份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于是围绕着拥护还是反对《二八声明》，造反派组织展开大辩论，后来演变为大规模的武斗。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是为了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军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

专政措施。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军委十条命令后释放了绝大多数的“工总”被捕人员，“工总”组织得以恢复。

5月16日，号称百万，且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成立。武汉的保守势力强大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6月，武汉两大派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斗死亡人数达到108人，伤2774人。

毛泽东原想到武汉亲自解决湖北省的问题，树立一个就地解决问题的样板，却遭到当地驻军和“百万雄师”的激烈的反抗，最后竟不得不匆忙飞往上海。

“七·二〇”事件的爆发，是文革以来武汉地区各种矛盾交织、冲突的结果，是文革中出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公开的抗议活动。如徐海亮先生所言，“七·二〇”成为文革进程的一个拐点。

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后，混乱局势并未结束，原来的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1968年5月后，湖北造反派组织大肆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据统计，被抢的枪支达10万支，子弹约1000万发。

1969年4月开始，湖北造反派掀起“反复旧”运动，提出“还我造反派的天下”“要重新把权夺回来”等口号。5月27日，中央批复湖北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之后，局势趋于稳定。11月5日，中央举办湖北问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解决“反复旧”和“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问题。湖北省和武汉市造反组织头头等1300多人参加，历时半年多。

湖 南

1966年9月下旬，湖南省委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

进行反击”，正式在全省部署抓“黑鬼”。此后，全省各地在学生和一般职工中抓出大批“右派分子”“三反分子”。省委发动抓“黑鬼”，完全违背中央意图，一部分带头造反的学生、教师、机关干部和工人纷纷奔赴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省委迅速陷入被动境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省委不断检讨，各造反组织竞相批斗领导干部，至12月下旬，省委在群众组织的冲击下，工作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长沙群众组织分裂为“湘江风雷”和“高司”两大派，并影响到全省。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遭到严厉镇压，全省共抓捕“湘江风雷”“红旗军”人员一万多人。1967年6月，“湘江风雷”恢复组织，重整旗鼓。中央于1967年8月10日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支持“高司”的湖南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决定改组省军区，由四十七军为首解决湖南问题。中央决定出台后不久，保守组织迅速土崩瓦解，两大造反组织间开始大打出手。

1967年夏，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杀人事件是群众专政的一个典型案例。共死亡4000多人。受道县杀人事件的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00多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道县和零陵地区其他各县的杀人事件中，当时掌握实际权力的各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干部，对杀人事件大多采取了纵容态度。

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在湖南有充分的表现，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林彪。1967年10月24日，林彪在接见黎原时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湖南“省无联”的《我们的纲领》《“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几篇文章相继问世。《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这种极左思潮的纲领性表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如陈益南先生指出的，“极左派”红卫兵们所写的文章，当时并不为“省无联”的大多数人所知，更不是“省无联”所组织的行动，而基本上是杨曦光等少数人的个人行为。中央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从1968年1月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长达几个月的对“省无联”的批判斗争。省革筹领导的这场全省范围的斗争，夹杂着极大的派性因素，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1968年4月省革委会成立后，一些对革委会权力分配不满的造反派头头又在“反复旧、反右倾”的口号下拉山头，搞武斗。9月，革委会三次全会，采取措施，对几个带头闹事的人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批判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叶卫东等的“多中心论”。以后，章伯森、胡勇、叶卫东的副主任也被免去。

湖南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大张旗鼓地批判了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将其定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南的代理人”。卜占亚后被调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同时中央调张平化回湘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政委，实际主持省委工作。

江 西

1967年1月26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夺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

造反派夺权后的一大举动就是否定八一南昌起义。2月4日，造反派在人民广场举行大会，“造八一建军节的反”，宣布彻底砸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2月5日，《江西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的社论。

江西的武斗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厉害的。它的特点是在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方面。据周恩来说，大规模抢枪“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江西省军区和大多数的军分区、人武部是支持保守派“联络总站”的，他们向保守派提供枪支来与造反派武斗，但他们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向保守派发枪，大多数情况下都采取了“明抢暗送”的办法。据统计，

文革中江西全省各地共有 8.5 万支枪、子弹 1524 万发被抢。

8 月 10 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首的江西省革委会筹备小组。

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够马上平息江西的动乱。8 月 24 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 65 人。

1968 年 8 月，江西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 90 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 4102 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 171000 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 2 万多人。

瑞金县实行“民办枪毙”，即将杀人的权力下放，公社、大队即可随便杀人，不需立案、不需审批。瑞金县从 9 月 23 日起至 10 月 7 日上，共杀了 300 多人。受瑞金“民办枪毙”风潮的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两县，也各杀了 270 余人和 500 余人。

1969 年 11 月，江西大搞工业“两个突破”（机械工业无切削加工工艺和开发新产品不经过设计阶段），开展所谓汽车、拖拉机大会战。由于决策失误、工作瞎指挥，给江西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

“九·一三事件”后，程世清被撤职隔离审查。

1974 年 2 月 13 日，中央转发造反派头头涂烈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的信，中央批示认为涂烈“提出的在江西存在的 9 个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问题”。批示点名批判了省委书记白栋材。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印发并讨论涂烈的信。

2 月 21 日至 6 月 4 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由陈昌奉主持，揭发批判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

6 月，江西成立南昌民兵指挥部，潘世告、涂烈任总指挥

和政委。6月30日，南昌民兵指挥部召开成立大会。在大会期间和会后，万里浪、涂烈两派组织发生严重武斗，致死2人，伤100多人。

7月7日至12月30日，中央召集江西省委部分常委和两派造反组织代表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江西问题。年底，中央决定调陈昌奉到武汉军区，江渭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1月，省委决定解散南昌民兵指挥部。

江 苏

1966年6月中旬，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称其为“反革命黑帮”。

8月3日，南京发生了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在批斗中遭受武斗被折磨致死的事件。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并建议要对学生群众讲清楚党的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毛泽东说，十六条里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江渭清同志提出来的。

1967年1月3日晚，在南京江苏饭店发生了造反派“红总”与保守派“赤卫队”之间的大规模武斗，人数占绝对优势的“红总”经过一夜激战占领了江苏饭店。近2000名被俘的赤卫队员在短暂关押后获得释放。其中不少人遭到造反派殴打与羞辱。

南京“一三”事件后，江苏省最大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被压垮，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红总”等造反组织，指责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策划“赤卫队”挑起武斗，并借此揪斗省市党政领导人，冲击党政机关。

1月24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300余人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馆开会，“省红总”为首的一派与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夺权方案达成共识。1月26日，“省红总”派组织成立的“夺权指挥部”调动一万多人，冲入江苏省、南京市机关，宣布夺取了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大权。“一·二六”夺权得到了江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支持。

参加夺权，并掌握大权的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的“南

大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等组织认为“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好个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为“好派”和“屁派”。

在两大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下，3月5日，中央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事管制。

8月1日起，“红总”派在江苏掀起“倒许风潮”。他们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告全省人民书》，指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8月3日，许多造反组织冲击南京军区，占领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8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两派组织在南京砖瓦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在“红总”的进攻威胁下，南京城内的“八二七”撤退至下关地区和大桥工地，南京城成为“红总”的天下。中央于8月15日派出了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赶赴南京等地制止武斗。但是中央的干预并没有遏制事态的发展。8月下旬，中央明确宣布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红总”原定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9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达成制止武斗协议。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告一段落。

文革中的清查“五一六”运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诬陷迫害，江苏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自1970年4月起，江苏省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有13万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万多。在清查“五一六”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

1976年3、4月间，南京出现了一系列以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为内容的事件，南京大学生在通往上海、成都等地的列车上，刷上了大标语，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的先声。南京事件后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和拘留，还有一些干部和群众被停职检查或隔离审查。

浙 江

1966年8月下旬，在“破四旧”风暴中，浙江省委和浙江大学师生及许多干部、职工、农民一起，成功劝阻了红卫兵对

灵隐寺的破坏，使千年古刹终于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到1967年1月底，省级机关和全省各级党政大权已被造反派所夺取。在夺权运动中，浙江形成了“省联总”和“红暴派”两大派群众组织，两派互相夺权，武斗频繁。3月，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内部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两大造反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要无条件支持“省联总”，另一种观点认为“省联总”“红暴派”都是造反派，都应支持。认识上的不同导致军管会内部矛盾日益激化。8月，中央决定以二十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南萍、陈励耘为正副主任。南萍公开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

8月下旬“省联总”为了控制全省，以“文攻武卫”开路，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武力镇压“红暴派”。在攻打萧山武斗中，打死90多人，在富阳县的武斗中打死100多人。

1968年夏季，省革委会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在全省推广所谓“三献一并一升”（捐献自留地、宅边地、零星果木；合并生产队；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升为生产大队）的典型经验。全省2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大队核算制；约30%的县不同程度地没收了自留地，更多的在并队时，强令社员敲锣打鼓“献”出自留地等。

1969年1月，针对浙江省成立革委会后两派斗争尖锐的问题，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批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人，并在军区系统层层揪斗所谓“阮、李、罗”的代理人。

1969年底，省革委会决定在浙江省开展“夺煤大会战”，历时3年，虽然全省煤产量暂时上升到169万吨，但付出巨大代价，且严重破坏生态平衡。1970年又提出开展钢铁大会战，到1971年，全省建起高炉51座，电炉58座，这些突击建成的高炉、电炉，或因质量问题无法使用，矿石、焦炭、电力缺乏和技术不行等原因停产，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先逮捕了陈励耘，后又撤销了南萍的职务，调谭启龙、铁瑛到浙江主持工作。

1973年9月，张永生、翁森鹤等造反派在王洪文的支持下，在浙江煽动“反潮流”，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人。1974年1月，

江青写信给驻浙某部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专程到浙江送信、送材料。从年初开始，杭州、温州、金华等地连续爆发多起武斗事件。

3月，浙江省委决定成立批林批孔小组，谭启龙任组长。但实际上这个小组一成立，谭启龙就被架空了，浙江“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权被张永生、翁森鹤等人篡夺。此后，各市、地、县，各部门纷纷建立了以造反派为主体，凌驾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

在江青、王洪文的支持下，浙江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1万余人，在此期间，全省发展党员40,590名，其中“双突”人数达38,005人。上至省委常委，下至厂矿、街道，都有为数不少的“双突”人员执掌大权。他们还在王洪文授意下，搜罗一大批“反潮流战士”，列席各级党委常委会议，使各级党委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1975年7月，中央16号文件转发《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后，浙江全省逐步形成批判派性、纠正“双突”，整顿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批判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的错误，并决定分别予以处理，对翁森鹤实行隔离审查，将张永生、贺贤春等人分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张永生等人又活跃起来，企图推翻中央16号文件，为“双突”和一些造反派翻案，但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制止。

安 徽

1966年8月27日，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学生贴出《炮轰安徽省委司令部——造李葆华的反》的大字报，由此发生了造反学生与拥护省委的群众冲突的“八·二七”事件。随后成立的合肥工业大学“八·二七”革命造反派等造反组织与拥护省委的“红总”等组织相互对立，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

1967年1月，安徽“八·二七”等造反派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军区的支持下准备夺省委的权，要求军队支持。21日，安徽省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呈报《关于可否派出部队警卫群众组织召开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大会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当日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26日，

“八·二七”、工联会等宣布夺权。

“一·二六”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意见分歧，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好个屁，后来人们将两大派分别称为“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武斗。3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对“一·二六”夺权不予承认和肯定，决定立即对安徽省实行军事管制。《决定》中的第6条说：“‘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1967年夏天，安徽武斗严重，混乱局势难以控制。毛泽东亲自决定调原驻江苏北部的12军去安徽。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由12军统管，省军区独立1师、2师划归12军指挥。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中央任命12军军长李德生为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2军政委张文碧任安徽省军区政委。

8月8日晚，安徽两派在合肥市爆发武斗，12军派出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插到两派武装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终于将一场大武斗平息。

这场武斗制止后，12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无效之后，军领导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将其制止。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部队战士又以“卧路”的办法将这些汽车挡回。

经过采取果断措施，安徽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此后，部队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

毛泽东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的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后，亲自将这一经验批转全国。

安徽武斗问题得以暂时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在安徽两派问题上采取了“一碗水端平”的政策，没有将两派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是称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1968年6月，发生了大规模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的“芜湖事件”。李德生和十二军党委依靠宣传“七三布告”，大造舆论，成功平息了事件。

福 建

1966年8月29日，发生了数千名学生冲击省委的事件，从此揭开了福建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序幕。由于工人赤卫队的一部分学生不同意揭发批判省委，提出要“保卫省委”，因此发生了工人赤卫队和东海前线红卫兵强行架走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进行保护的事件。

1967年1月8日，十个造反派组织联名发出《告全省人民书》，号召群众起来造省委的反。1月16日，叶飞被造反派拉上卡车，在福州市区游街示众。1月19日，省委及福州市委领导又被造反派挟持到福州市郊进行揪斗。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叫福州军区送叶飞到北京予以保护。

福州军区在夺权运动中没有积极支持造反派，因此遭到造反派的嫉恨，1月26日、29日，连续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事件。此后，福州军区借军委“八条命令”之威，在福建造反派中抓了一批“反革命”。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8人，拘留65人，解散了几个组织。”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于2月18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称福州军区此举为“又一次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胜利”。2月1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1月31日，福州军区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警告造反派说：“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2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1月26日冲击军区事件发生后，福州地区的造反派以反对或支持冲击军区的态度逐步分化为“八二九”和“革造会”两

大派，全省各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也都分裂为两大派。

为解决福州军区和造反派的矛盾，中央召集造反派代表进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3月31日，周恩来接见福建赴京全体代表，指出1月26日冲击军区是错误的，但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揪住不放，凡与1月26日冲击福州军区和2月7日冲击《福建日报》社有牵连被打成“右派”而被捕的，一律平反、释放。

福州军区原拟于3月中旬成立革命委员会，但因其对“革造会”派造反组织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被中央否定。4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提出“鉴于当前福建成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宣布，在那里先实行军管。”

1967年12月5日至1968年8月15日，中央在京举办有13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最后各派群众组织达成了收缴武器、停止武斗和大联合的协议，成立了省革委会。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回乡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很大的改变。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福建省军区有人公布了省军区政委倪南山和副司令员周子韬1971年写过揭发张春桥煽动造反派夺解放军枪的材料，省军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会上当场逮捕倪、周二。接替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知道后，极力为倪、周二人辩护，为他们开脱责任。3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即中央9号文件），对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彻底揭开福州地区“批林批孔”斗争的盖子，并要求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共同召开联席会议（简称“四联会”），对前段“批林批孔”中的错误作出检查。“四联会”开始不久，王洪文代表中央给皮定均打电话，提出要集中揭发批判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此后，福建开始“万炮齐轰韩先楚”，省委决定在《福建日报》上对韩先楚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广 东

文革初期，广东文革是在陶铸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67年1月22日，广东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广东省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向赵紫阳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向造反派交印。造反派向赵紫阳等省委领导人交代：夺权后书记处仍要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工作。当晚，省委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承认犯了方向路线上错误，要求各级党委在群众夺权时只能接受不能抗拒、抵触。

2月27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广东省的夺权是仓促进行的，造反派的联合极不充分，夺权后不久即产生了对夺权两种不同的态度：“省革联”的人说夺权好得很；而反对派则把这次夺权说成是假夺权，是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2月19日，广州5万多反对“省革联”的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强烈声讨“省革联”的“假夺权”，扬言要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夺回来。2月21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2月22日，广东40多个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筹备会”）。至此，广东出现互相对立的、跨行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2月28日，广州军区对《广州日报》实行军事管制，“省革联”的主要舆论阵地丧失，夺权与反夺权之争，最终以“省革联”的垮台而告终。

从1967年4月至1968年2月，全省各地的武斗冲突接连不断。

4月22日，中山医学院“东风派”与“红旗派”发生冲突，消息传开，校外两派组织都派出队伍前往增援，冲突双方人数最多时达万余人。进入7月后，武斗形势更加恶化，先后在广州糖厂、中山纪念堂、华南工学院、中南林学院、市总工会、钢铁厂、第22中学等地发生了有数千至万人卷入的大规模武

斗流血事件。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以后，广东省各地的两派组织都以自卫的名义，频频冲击军事机关，砸抢战备仓库，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以及车辆、通信器材等。

广东的两大派组织中，“东风派”人数占优势，但一直被认为是“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红旗派”中的一些认为大联合不是“大凑合”，不愿意与之联合。当周恩来要求他们尽快联合后，又坚持双方不能平起平坐，必须“与我为核心”。后经过不断地说服教育，终于使两大派组织达成了联合。1967年11月，广东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1968年2月，广东革委会成立。

在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期间，全省发生一些严重的乱打乱杀事件。仅阳春一县，从8月18日起，不到半个月，就杀了1700多人。其中全水公社竟是“成批杀人”，“从8月15日至25日杀人高峰期”，共打死663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广东的归侨、侨属和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害面最大。广东省革委会为了处理有海外关系的人，专门制订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绝大部分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或迫害，许多干部被迫表态“斩断海外关系”。

广 西

广西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出现在桂林。1966年8月7日，广西师范学院反对工作组的十几个学生在与对立面群众的冲突中受伤，成为轰动一时的桂林“八七”事件。与全国许多地区不同的是，师院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和教师一开始就是多数，他们的行动得到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很快形成桂林的多数派，后来称为桂林“老多”。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桂林“老多”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韦国清。1967年1月，桂林“老多”的学生们奔赴南宁，与南宁的造反派一道共同揪斗韦国清；给韦国清戴高帽游街，事后并把韦国清等自治区领导人押送到桂林，连续三天召开几万人的批斗韦国清大会，会后并把韦国清等人戴上高帽在市区游街。

1月23日，广西“工总”“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一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造反组织进驻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权。

3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援朝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查后再定，而有些群众组织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4月1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发表声明，支持前者，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搞“三结合”。于是，围绕着“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形成了两派，即“联指”派和“四二二”派。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自治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中央对广西两大派的态度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从1967年6月1日开始，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此前，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支持广西“四二二”的，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多次对广西“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进行批评。8月24日，周恩来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态度明显偏向“四二二”一边。11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这时候，中央的态度有所改变，不再明显偏向于“四二二”一边。《决定》将两派都同样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派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1968年以后，广西“四二二”与自治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央也逐渐改变了对广西两派的看法。1月下旬，原广西驻军同情“四二二”的支左部队被下令调出广西。广西军区对“四二二”的态度也更加强硬。2月29日，广西军区命令部队派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墟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60多人。此后，广西军区频频动用部队武装来解决广西派性斗争的问题，而且往往是在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这样做的。

5月，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在广西破获了所谓“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此后，在全自治区掀起了声讨“反共救国团”的高潮。在追查“反团”的旗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

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7月31日至8月5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广西“联指”武装人员开始围歼“四二二”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据点。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7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的2324人被打死。

8月10日，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调附近各县“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县人武部中队共4000多人，对逃散的“七二九”人员进行包围，抓捕了10000多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打死1000多人。

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7月下旬，广西各地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的高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据《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中披露的数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武斗中被打死的达3000多人，另外在此前后被迫害和滥杀的达8万多人。”

在广西文革中发生了数百起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人吃人的惨剧。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涉及十几个县。仅在武宣县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1983年在广西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简称“处遗”）和1984年整党工作中，对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各种严重罪行和错误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处理，对在文革中参与吃人肉的人也进行了处理。

云 南

1966年8月23日，昆明工学院的少数学生串联昆明冶金技校、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的学生约一千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分九批先后进入省委机关大院。

9月14日，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成立。当天下午，“炮兵团”冲击《云南日报》社，要求批判已发表的三篇社论。12月23日，更为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成立，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阎红彦，建设新云南”。

12月，昆明地区100多个组织联合组成“大联委”，但其内部矛盾冲突不断，1967年1月22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62个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新云南”）。此后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省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当夺权风暴刮到云南时，两大派便各自为政，争相夺权。

1月26日，昆明“新云南”所属造反派组织兵分两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8时，昆明“大联委”又召开10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活动中，双方发生对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联委”派抢走。夺权之后，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大辩论。夺权之风很快遍及全省各地。3月，中央决定对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

军管会在对待云南两大派问题上未能“一碗水端平”，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明显倾向“八派”，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八派”采取攻势，而“炮派”采取守势。但军管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也有倾向“炮派”的人，所以两大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持续，且日益激烈。

1968年1月，康生将赵健民打成“叛徒”，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4000余人被迫害致死。因赵健民被说成是“炮派”的“黑后台”，所以“炮派”也长期遭到打压。

1月14日，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在下关卷入两派武斗，当地驻军党委从派性出发，给工八团扣上“滇西挺进纵队”的帽子，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上报昆明军区党委。1月27日，工八团途经一平浪矿区时，被部队围歼于干海资煤矿，打死工八团成员184人及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59人。酿成一大惨案。

2月，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在北京举办了近两千人参加为期半年的学习班。8月13日，云南省革委会正式成立，谭甫仁任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成立后，云南开展了“划线站队”（实际上是依靠“八派”，压制“炮派”，所谓“划线”，就是以其是“八派”还是“炮派”划线，这是最典型的支一派打一派）、“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全省上下大查大揪“滇挺”分子和“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使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

1969年12月，云南省革委会召开10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号召“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历时8个月，造田7500亩，使滇池水面缩减3.5万亩。

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等县发生7.8级强烈地震，死亡15000余人。此重大灾害当时国内媒体均未报道。

12月17日，谭甫仁在其住处被枪杀。后由周兴接任省委书记。

1975年7月，发生了武装镇压回族群众的沙甸事件，造成总共1600余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1975年整顿时，中央批准云南省委的报告（即省委26号文件），开始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因受文革“左”的理论政策的影响及派性的干扰，无论是对错误的纠正和政策的落实都很不彻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以后，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反复。一些被批判和下放的帮派骨干疯狂反扑，大肆活动，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接替病逝的周兴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贾启允，屈服于帮派的压力，在《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中，把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所作的谈话，进行歪曲篡改，承认自己到云南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造成极恶劣的后果，在全省刮起大反复的邪风，使贯彻省委26号文件初步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贵 州

贵州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被认为是“烂掉了”的省份，而它的省会贵阳市则被认为是“反革命两面政权”，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省委原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降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职也被免去。省委原书记处书记一人，候补书

记一人，及四个省委常委被停职反省。省、地、州、市、县层层都搞了“夺权斗争”。

1966年6月6日，贵阳一些学生到《贵州日报》社贴大字报，要求“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贵州省委将其定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处理和反击。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贵州省委陷入被动，不断检查所犯“方向路线”错误。11月2日，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被迫在大会上承认“六六”事件是“革命事件”。

贵州的夺权，是通过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进行的。李再含原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很早就开始批判贵州省委。从1966年9月至1967年1月，李再含背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直接向中央发出18份电报，向中央报告贵州的情况。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批示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召至北京，面授机宜。李再含如约到京，在中央文革小组处得到了关于夺权的具体指示。1月25日，“省造反总指挥部”夺了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权。2月13日，以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会成立。

4月11日，部分反对派学生冲击“省红代会”，被称为“四一一”派。之后，“四一一”派由学校逐步发展到社会，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与当地革委会相对立的群众组织。6月8日，贵阳地区“四一一”战斗兵团成立。此后全省各地两派对立，武斗不断。

李再含对“四一一”派采取分化、瓦解、镇压、踏平的办法，但一直未能使“四一一”派屈服。1969年7月29日，发生了动用部队和专业武斗队开枪镇压“四一一”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8月23日至9月下旬，中央将贵州省党、政、军负责人及部分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开会，解决贵州问题。周恩来等在《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1969）71号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

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调蓝亦农主持贵州工作。11月，省革委会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揭发批判李再含等人的严重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蓝亦农受到牵连，中央调鲁瑞林到贵州主持工作。

四 川

1966年8月15日，重庆部分造反派在重庆师专集会，要求市委回答他们的问题，次日他们又到市委请愿，并贴出批判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

8月26日，省委在锦江礼堂召开驻川大工作组检讨大会，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冲击大会造反，随后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他们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等口号。

10月1日，成都地区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10月16日，由“红成”发起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植岩被迫承认“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革命口号”。此后，四川各地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

11月13日，“红成”等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做检查。大会进行中，“红成川大支队”冲击大会，致使会议中断。此后不久，“红成川大支队”从“红成”中分裂出来成立“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开始分裂成“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全国各地造反派的分裂大多发生在夺权前后，四川造反派的分裂是较早的。

1967年1月19日，成都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夺权。

1月24日，由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40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2月8日，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公告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

润泉任“革联会”主任。由于造反派在权力分配中意见分歧，后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

在“二月镇反”中，四川是全国抓人最多的。

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以查抄黑材料为名，冲击成都市公安局，并扣押公安局负责人，抢走档案和枪支。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等13人，将其游街示众后关进监狱。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开始围困成都军区。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17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肯定了军区派出部队捕捉抢劫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首犯，对严重违反中央军委命令的少数军内人员采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2月19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3月5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近10万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

在全国来说，四川武斗开始得早，规模也大。

1967年5月6日，成都一三二厂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该厂“产业军”动用民兵武装的枪支，向围攻的造反派开枪射击，打死48人，打伤127人。事发第二天，中央即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撤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宣布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为左派组织，而“产业军”等组织为保守组织。调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并以他为首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四川省的事宜。

“五六”事件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北京和各地造反派纷

纷表态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有的还派人前往成都进行增援。在“二月镇反”中被压抑的造反派这时候普遍翻了身或正在争取翻身，成都一二三厂的枪声成为全国造反派重新崛起的信号。

7月下旬以后从成都、重庆、宜宾、泸州、涪陵等地开始，全川武斗不断升级。造成此严重局面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造反派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大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二是成都军区按毛泽东“武装左派”指示并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向泸州、永川、涪陵、万县等地造反派正式发了枪。

四川武斗又属重庆最为厉害。解放后，八家大型军工厂建在重庆，分别承担从枪支弹药到水陆两用坦克、四联高射机枪等的生产任务。在武斗最惨烈的杨家坪地区，就有国营建设机床厂、国营空气压缩机厂等数家兵工厂。武斗开始后，大量武器散失民间。

据史料记载，曾任四川省革筹组办事组组长的郭一民在一次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的发言中说：“8月份重庆武斗升级，达到最高峰，一个月内打了1万多发炮弹。”据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抢夺的各种炮弹总计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也就是说文革中全国共消耗了96383发炮弹。而重庆一地即占全国总数的10分之一以上。

刘结挺、张西挺是四川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在文革前因违法乱纪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1967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平反，并双双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刘、张利用派性挑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在他们工作过的宜宾地区，1967年7月、9月和1968年3月，王茂聚等三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宜宾各县“八二六”派武装人员到泸州市镇压属于四川“红成”派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三次“武装支泸”，致使1500多人被打死。

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4日，中央在京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向中央提出的报告说：四川革命和生产落后的原因在省革委领导。省革委成立后没有正确对待群众，长期陷入派性，个别领导人错误地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分“革”与“保”，划分“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致使武斗不息，错误地发动了全省性的“反复旧运动”，省革委个别领导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大搞“以我为核心”，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中央领导人指出：刘、

张是个人野心家，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此后，刘、张实际上已被撤销职务，四川形势逐步好转。

从1971年开始，全省集中开展了“一批双清”运动，即批极左分子，清理“五一六”和“三老会”骨干。经过清查，省第二次党代会宣布，刘结挺、张西挺是“五一六”在四川的头子，是“三老会”的后台。实际上，在“批清”运动中被整的人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在“批清”中，曾把纠正刘、张主导的“打谢（家祥）反梁（兴初）”运动作为“批清”的一项内容。批林整风开始后，由于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被错误地认定为“上了林彪的贼船”，于是各地又纷纷扭转“批清”方向。在纠正“批清”中，为大约10万人进行了平反。

1975年10月5日，中央决定调赵紫阳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1976年2月，重庆、成都的造反派头头黄廉、邓兴国、杨志成、周家喻等趁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再度活跃，在成都大街上贴出大字报，指责赵紫阳、赵苍璧“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新 疆

1966年9月3日，陆续串联到新疆的部分首都红卫兵，组织上千名学生冲击自治区党委机关，并宣布绝食静坐。同时发通电、散传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起来造自治区党委的反，这就是震惊全疆的“九三事件”。此后，一批又一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拉出来批斗、游街。

1967年1月19日，新疆“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1月25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1月26日，在新疆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1月

19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26日凌晨3点到下午3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6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27人，打伤78人。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

“一、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在1月31日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46人。

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联”；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

1968年9月新疆革委会成立。11月开始对王恩茂的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的大批判运动，给王恩茂扣上“新疆独立王国的总头目”“刘少奇黑司令部在新疆的头号代理人”等帽子。随后，又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揪王恩茂“独立王国的第二套班子”，挖贺龙的社会基础，使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诬陷和打击。

1972年1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着重解决自治区党政主要负责人龙书金所犯的严重错误。3月25日至5月14日，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两个党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了龙书金的严重错误。7月，中央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报告的批示中指出：龙书金上了林彪的

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调整新疆的领导班子，由赛福鼎代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委。按照中央的部署，新的自治区领导班子结合新疆实际，初步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农村政策，制止派性回潮，使长期混乱的局面渐趋稳定，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

宁 夏

1966年9月20日至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部署“迁赶”工作。被“迁赶”的对象主要是“五类分子”，一大批因历史问题和错误处理过的人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被“迁赶”的人员，除少数回原籍外，绝大多数被安置在固原、海原、隆德、泾源、盐池、同心、陶乐等县。文革之初，将“五类分子”等驱逐出城市是许多地区都曾实行过的政策，但将此事正式写入省一级的党史大事记的只有宁夏、天津（天津使用的词汇是“疏散”）等少数几家。

1967年1月27日，由宁夏地区22个造反组织组成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在宁夏军区的支持下，夺了自治区的党政财文大权。2月11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认为“联委会”是“假左派”，宣布“1.27”夺权为非法，并对公、检、法机关、宁夏日报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实行军管。此后，宁夏地区相继出现了“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联委会”改名，简称“总指挥部”）、“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宁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宁三司”）。四派群众组织的成立，使宁夏地区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各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日趋激烈。

8月12日，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支左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决定派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率二十一军的六十二师进驻宁夏，接替宁夏军区，负责“三支两军”工作。

当时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总指挥部”，将“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8月16日，在宁夏军区给一些“筹备处”组织发放了部分枪支的情况下，康生指示进驻宁夏的六十二师要坚决

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8月20日，青铜峡的“筹备处”数千人员包围并猛烈进攻“总指挥部”的据点青山机械厂，并包围了途经该地的野战部队。部队向兰州军区汇报，说驻青铜峡部队已被围困，青铜峡水库大坝可能被炸。8月26日，在中央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会上，康生称“筹备处”“性质变了，武装镇压”。27日，兰州军区电告中央，要“发枪武装左派”，“发现进攻，即组织左派坚决还击”。28日凌晨，康生代表中央同意了兰州军区的意见。青铜峡地区的部队就开枪镇压了“筹备处”，当场打死101人，伤残133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青铜峡事件，当时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也就是说，开枪打死大批群众是镇压反革命叛乱。事后，康生在接见宁夏军区和群众组织代表时说：“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12月9日，在支左部队的领导下，“宁三司”“宁总司”“总指挥部”“筹备处”（造反派）四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12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康健民为首的宁夏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4月10日，宁夏革委会成立。

青 海

青海省文革初期两大派群众组织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简称“八一八”）与“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他们围绕着《青海日报》1966年6月3日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街头大辩论。“八一八”派认为号召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好得很，“捍卫队”派认为社论鼓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是大毒草。与此相关联的是对省委领导的看法。省委书记杨植霖了解当时的中央精神，较早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表示支持“八一八”；而省长王昭则坚持运动初期的认识，对“六三社论”持不同看法。所以，“八一八”保杨揪王，“捍卫队”保王揪杨。

1967年1月12日，青海“八一八”等组织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月29日，“八一八”派的40个组织宣布夺了青海省委、省人委的党政大权。1月30日，《青海日报》对此做了报道，

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但从2月3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

青海省军区內，支持“八一八”的军区司令员刘贤权被支持“捍卫队”的副司令员赵永夫夺了权，失去自由，处于被批斗的地位。

2月23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装镇压，死伤惨重（169人死亡，178人受伤），酿成重大流血事件。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13000多人。

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暴发；另一方面，它也是1967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甘 肃

文革之初，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李贵子成为省委支持的著名“左派”，他对反对工作组和自己的学生教师进行残酷地打击和迫害。后来，李贵子又将打击对象扩展到社会上，多次冲击铁路中学，引起铁路职工的不满和反抗。他们又煽动一些群众围攻铁路职工，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群众对立局面，引起公愤。甘肃省委无法应付混乱的局面，于是将责任推给裴孟飞、马继孔，经中央批准将他们撤职。李贵子也很快垮台。

11月10日，中央批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停职反省。省内很快开展对“甘肃省委以汪锋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声讨和批判。

1967年2月5日，甘肃省造反派联合组成的“甘肃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省

人委的权。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都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激化。5月初，“红联”产生了分裂，原“红联”内的一些组织退出“红联”，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在对待甘肃各群众组织和准备结合的干部问题上，甘肃省军区与兰州军区发生了分歧。甘肃省军区支持原“红联”，反对“红三司”；支持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世泰，反对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而兰州军区支持“红三司”，支持胡继宗，反对王世泰。

5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当实行军事管制”。5月14日，毛泽东提出可不实行军管。7月29日，中央批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其中提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1968年1月，甘肃省革委会成立。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转载《甘肃日报》的报道，介绍了甘肃会宁县以王秀兰为代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语中引述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随后，下乡运动迅速在全省兴起，并很快影响全国。

1969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甘肃省和兰州市革委会联合调查组的长篇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介绍了兰州第五中学自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该校师生每周学习两天，另外4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并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此后，全省城镇中小学普遍照此“经验”，实行“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校”。

1975年5月，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观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被当作主要经验在甘肃省农村普

遍推广。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统统被当作“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加以批判，并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在作物种植上采取强制手段，大搞瞎指挥、一刀切，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

陕 西

1966年6月6日，西安交大学生写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和省委，被省委定为“反革命事件”。学生李世英被戴高帽子游街后自杀，经抢救脱险，后来毛泽东称其为“学生领袖”。

12月，西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开始分为东西两大派：东派以西安交大的造反组织为首，包括以后成立的“工总司”“文总司”“财总司”“机关总司”“农总司”“中革会”等。西派以西工大、西军电的造反组织为首，包括以后成立的“工联”“农总会”“机关总指”“红卫兵司令部”“农民造反总部”“文总指”“财总指”等。

1967年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中专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此后，西北局、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各区县、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相继被夺权。全省所有党政工群组织全部瘫痪，被迫停止工作。

2月23日，西安军分区党委暂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职能。3月3日，经兰州军区批准，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21军、总后西安办事处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简称支左指挥部，后改称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支左委员会），对西安铁路局、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广播电台、西安广播电台、《陕西日报》社、《西安晚报》社、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4月12日，西安驻军支左指挥部决定，由21军派出57名干部和一个连队，分别进驻省、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业局等21个部门“抓革命，促生产”。并决定分别建立陕西省、西安市工业领导小组。不久又成立了“陕西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这些组织措施在维持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方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1968年5月1日刚刚成立了革委会的陕西省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严重的事件。陕西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现象极其严重，被抢各类枪支万件以上，子弹数百万发。

中央“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很猖獗。7月19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21人。7月31日，汉中两派武斗，打死21人。此外，在全省一些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

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把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8月6日，西安警备区发布限期收缴武器的通令，严令各造反派组织要迅速主动上缴武器，违期不交者，将以对抗“七·三”“七·二四”布告、私藏武器论处，这一通令发出后，各造反派组织纷纷上缴武器、解散武斗组织。8月8日至8月12日，西安地区“工联”“工总司”“工交捍卫军”“工总革联”“陕红联”等工人造反组织分别撤销。截至9月中旬，陕西省共收缴武器7万余件、收缴各种子弹近400万发和一大批手榴弹、炮弹、炸药和雷管。至9月底，陕西省各地的武斗陆续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被拆除，绝大多数地区的大宗武器基本收缴完毕，动乱局面得到控制。

西 藏

由于西藏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高寒缺氧的气象条件，以及民族和宗教工作的特殊性，西藏地区的文革有边疆地方的特点。与内地相比，西藏动荡的时间较短。从时间上来说，西藏文革比内地滞后很多。

文革初期，自治区党委根据西藏特点提出和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客观上对减小文革对西藏的破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8月，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就提出，“要保护有价值的文物，保护‘四寺一宫’（即拉萨的三大寺、扎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前的甥舅会盟碑，保护反帝爱国的上层人士，不准提反对宗教的口号等意见”。9月17日，《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通知》明确规定：“不办社的地方，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

集中力量抓好农牧业生产。”“内地来西藏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串联活动的革命师生，他们如果要回家，应适当安排，并向他们讲清楚，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10月12日，区党委发出的《关于农村“文革”中一些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农奴主、代理人不要动，要尊重宗教信仰等。”11月19日，区党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文革”的规定的补充通知》，确定：“西藏县以下农村、牧区一律不搞‘文革’运动，也不号召破四旧、立四新。”10月26日，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边境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提出在边境地区一般不进行文革运动。

文革初期，拉萨的部分藏汉群众和红卫兵在首都进藏红卫兵组织等的支持下，成立了“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简称“造总”），夺权开始以后，与“造总”观点对立的群众和红卫兵，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文革中，西藏的派性斗争，主要是在这两大派之间进行的。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由于部队也有两种观点，在支左工作中反映出来，于是在造反派与部队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纠纷和冲突。

1967年2月5日，拉萨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同时宣布夺权，并发生冲突。区党委内乱成一团，工作陷入瘫痪。2月9日，北京红卫兵和“造总”成员冲进西藏军区，要揪斗张国华，并要求军区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下来，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

中央出面保张国华。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此后，军区把揭发批判张国华的“专打土皇帝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宣布军事接管“造总”夺权的西藏日报社、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和拉萨有线广播站。

4月，军委十条命令出来以后，西藏重新陷入动乱的局面，派性斗争恶性发展。后来，围绕着是否应该给“造总”平反，如何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等问题，两派之间争斗不断。

5月11日，中央决定：组成以张国华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宣布对西藏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9月，周恩来等人在北京召见西藏军区及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确定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求两大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交通运输，搞好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

1969年3月以后，陆续发生多起恶性事件。

3月9日，丁青县一些人成立所谓“怒澜两江卫教神军总指挥部”，武装袭击当地机关和驻军，抢劫各种枪支300余支，国营牧场牛羊900余头（只），国库粮食50余万斤，毒打残害干部、群众20余人。

以后，5月在昌都边坝县，6月在尼木县，7月在日喀则地区南木林、谢通门等县、比如县陆续发生类似的事件。

9月25日，中央对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据此，西藏军区下达了平息暴乱的命令。

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1964年经中央批准，西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试点工作，1965年8月，开始在全区试办人民公社初级社。文革期间，初级社陆续推向全区并开始试办人民公社。1970年，西藏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到1975年，基本完成了人民公社化。1975年开始对全区城镇私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内容是，在拉萨、日喀则等几个城镇补划成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至1976年，这项任务基本完成。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¹

——26个省区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吴 迪

地方文革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党研系统、方志部门²以及国家机关单位推出的出版物（中共地方史、地方志书、组织史、大事记、校史、馆史、院史等，以及党史党建和社会历史人文刊物），二是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的师生的学术著述（包括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三是民间人士（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或离退休人员）撰写的，以自印、海外出版及互联网为载体的相关文字。

新时期以降，官方搜集、编撰、出版了成千上万册关涉文革的书籍，研究成果蔚为大观，³涉及地方文革的出版物，主要有三，一是省地市县区各级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地方历史；二是省市地县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各地的志书；如当代地方简史丛书系列。三是上述两个部门编写的大事记、历史纪事等。⁴这三类史志著作都有参考价值，一般来说，中共地方史（第二卷）较当代地方简史详细。省志中的分志，如政党治、政权志、军事志、文化志等，会有关于文革的内容。而县志、区志、乡志、镇志中的原始资料可能会更多。

这些著作在谈到文革时，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一、在思想上，按照官方观点来解释历史；二、在事实上，笼统概括，宜粗不宜细；三、在写作上，叙述同质化、分析公式化、人物脸谱化、语言文件化。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出版物提供了大量的文革史料。尤其是地县一级出版的当地史志和大事记，价值更高。事实也证明，这些文献资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的信息源。

高校和研究院所是文革研究的重镇，地方文革自在其中。

但是，研究者——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从选题到搜集资料，从立意到成果的发表和出版，都会受到官方的干扰、限制和审查。因此，其学术性会受到一定的损害。尽管如此，其相关著述仍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文革的研究，其成果理应受到高度的重视。

民间地方文革的研究和写作，情况复杂。身份上，这些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在体制外的移民国外的人，一类是在体制内的退休人士。思想上，这些人又可分三种：非主流的独立学者，主流的写作者，以及游移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人们。年龄上，这些人的主体是中学老三届，大学老五届和当年的干部。他们是文革的亲历者，对回首往事，还原真相，评说历史、褒贬人物有着较高的热情。而当年参加过造反，又被官方以“三种人”的罪名加以整肃的人们则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这种身份的、思想的上差异和年龄上特点，使他们笔下的文革呈现出各种色彩。但总的来说，不受当下意识形态的束缚，独立性强；记叙翔实，有别于官方出版物。但是，个体的、自由的写作状态，“三无一压”⁵的政治环境，查阅资料的阻禁，搜集资料的艰难等实际问题，使民间难以出现严谨的、完整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文革史著作，散漫的、零碎的、回忆性、纪实性的文字占了多数。

在民间方面，地方文革的文献资料之保存、编辑、整理、研究与著述，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文革文献资料的收藏家，如湖北的李晓航，山东的齐晋华，北京的王红进、广东的叶曙明，四川的王锐等人。他们以个人财力，数十年间披沙拣金，收藏了大量的文革史料，为社会所用。其中对地方文革研究贡献最大的是李晓航，他将各省区市的文革史料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公布于网上，无偿地供人们使用，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

二是海外的专业团队或个人，作为团队，宋永毅等人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民间历史”网站，华新民团队主办的《华夏文摘》是地方文革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作为个人，加拿大华裔学者吴一庆主编的《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以个体之力，积数十年之功，不惮烦琐，分门别类，保存、整理了大量的文革史料，尽管其搜集的文献资料有重复和泛化的现象，但是这一交流网站以其及时更新和无偿服务为学者保存了大量文章资料，在国内互联网大量屏蔽、

封锁网上的文革资料的情况下，显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国内的网刊，如《往事》《昨天》《记忆》《往事微痕》《黑五类》《巴山夜雨》等。这些网刊出于民间，扎根底层，刊发了大量的地方文革史的文章，为独立学人和民间作者，提供了言说和交流的平台。

四是音像资料。李宇锋创办的文衡文化有限公司拍摄的文革文献片，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的文革记录片，（如《我虽死去》《寻找林昭的灵魂》《为革命画画：户县农民画》《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吴文光及其团队拍摄的文革口述系列记录片，以及法国华裔学者迟淼拍摄的关于重庆武斗的记录片《尸长的故事》等，也都是地方文革史中重要的文献。

五是出自网络的，关涉到各地文革的全景性或专题性著作。重要的如：水陆洲的《文革简论》⁶，刘朝驹的《文革史话》⁷和余习广的《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等。⁸前两书对各省区市文革情况都做了专门的叙述。刘著资料宏富，虽未注明出处，但可作为大事记使用。⁹水著“把所有的有关材料全部罗列在一起，然后加上少许自己的话。”¹⁰余著对各地的暴力事件有详细的描述，与前两书一样，也是既无资料出处，又无参考文献。但对于有心的研究者来说，亦足资借鉴。

关于地方文革的文献资料，数量众多，良莠不齐，中英兼有。本文只取中文，不取英文。另外，历史研究包括对背景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从时间上讲是十七年，从空间上讲是北京和相邻省区。因篇幅和才力所限，有关各省区文革背景的文献，本文不予收录。具体的选取标准是：

1. 学术性的文字，本文将尽可能收入。凡成果卓著，贡献突出的独立学者，本文将重点介绍其人其书。但是，凡讲到了各省区市文革情况的通史或专史，如上述刘朝驹、水陆洲和余习广等人的著作，本文不予收录，以节省篇幅。

2. 回忆性的文字，无论是官方出版还是民间自印，抑或网文，凡有参考价值者，本文尽量收录。考虑到海外出版或民间自印的著作，一般人士难以获得，本文会做略做介绍。

3. 资料性的文字，凡是文革时期产生的文献资料，除了个别例外（如汝其的支左）外，本文概不收录。李晓航编撰的各地文革史料编目，因已是“地方文革交流网”上各省区市必有常设项目，成为不说自明的文献资料，所以，本文亦不收录。

4. 文艺方面的文字，以史料为主，评论酌收。如贵州诗人哑默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地下诗文。文革后多有评论。本文仅取其自编的“地下写作”的第一手材料《真与美》。

5. 各省省志、通志下面的某些分志分册中，会或多或少地含有与文革有关的内容，如前述政权志、政党志、军事志等。因其卷帙浩繁，无法一一寻检。故本文不收。

6. 各省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献资料，因已另有专题综述，本文不收。

7. 回忆录、纪实、口述、访谈等文字甚多，本文择要收录，以十篇为限。

有几点需要说明：

1. 由于地方文革史的文献资料来源庞杂，为了眉目清楚，本文大体上以（1）史志 / 大事记，（2）学术研究¹¹，（3）回忆 / 述往这三部分，作为叙述诸省文革史文献资料的基本结构。个别的省，会出现第四部分，如资料，或纪实。

2. 为节省篇幅，在本文中频繁出现的某些固定词组，如“XX出版社”“中国共产党X地历史”“中国共产党X地历史大事记”等，笔者将使用它们的缩略语。如省掉XX出版社中的“出版社”，省掉“年”。

3. 由于本文要提到大量的著作，多出自互联网，为节省篇幅，本文均不注出处。在纸媒上发表过而又有上了网的文字，出处亦免。

4. 因时间和篇幅限制，本文所论范围仅及文革时期的26个省区，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本文的叙述顺序是东北三省（辽吉黑）—华北两省一区（冀晋内蒙古）—华东六省（鲁苏浙闽赣皖）—中南四省一区（豫湘鄂粤桂）—西南三省一区（蜀滇黔藏）—西北三省两区（陕甘青宁新）。

在本文的修改中，笔者曾向周孜仁、张业赏、崔金珂、齐晋华、何蜀、董国强、陈益南、谭迦洛、孙言诚等多位研究地方文革的专家征求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反馈和指正，谨此致谢。

黑龙江

一、史志、大事记

与某些省比起来，黑龙江党研室的成果相当可观，他们不

但出了省级的中共历史和大事记,如《中共黑龙江简史》(1923—2003)(中央文献,2003)、《中共黑龙江历史青少年读本》(中共党史,2003)、《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989)(黑龙江人民,1991);还出了不少地市级的党史和大事记。¹²

但就与文革有关的成果而言,黑龙江的党史远不如方志,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深广上,黑龙江的方志,不仅出到了地市这一级,如大庆、佳木斯等,而且深入到了地市下面的区县。以哈尔滨为例,哈市下面有七个区,其中有五个区的方志中有大事记。在记载文革方面,这些大事记有的相当详细。如下两例:

1.《太平区志》大事记,1968年10月25日:“潘复生女儿闲游乘坐的红旗轿车因没有合格证,被太平交警中队干警郭东山及执勤民兵截住。事后,市军管会根据韩潮指示,将郭打成现行反革命,非法拘留审查31天。”

2.《道外区》大事记,1971年11月18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4410件,已查证核实1488件,占33.6%,破获政治、刑事案件473起,其中大案、要案、集团案78起。”6月30日:“全区揭批查运动结束,共发现冤假错案1237人,其中致死62人,致残38人,错押74人,遣送64人,抄家39人,揪斗和隔离933人,其他27人。”

哈市下面有12个县,这个县都有自己县志。而绝大多数县志中,都有大事记。其中对文革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再举三例:

1.《双城县志》1966年6月:“县委将全县3000余名中、小学教师集中到城内第二中学、第三中学进行集训。在40天的集训中,中小学校领导干部和一般教师有2459名被点名批判。”9月,“县政府办公室干部张凤山等5人,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影响秋收生产的情况,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向全国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暂停两个月的规定。”

2.《巴彦县志》1966年12月:“在全县各地墙上和房山头用红、黄、白诸色油漆涂写毛主席语录,名曰‘红海洋’,仅县城各单位用于购买油漆款达30余万元。”1968年3月:“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三起较大的冤假错案,一为‘清真寺反革命集团’,一为兴旺大队‘拉马分队事件’,一为丰乐公社志达一队‘扶蒋反共暴动委员会’事件。”

3.《依兰县志》1972年5月8日:“依兰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依兰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错

把一批干部认定为‘依兰县潜伏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成员，以代号‘113’立专案清查。”

除了大事记，这些方志中还藏着很有价值的内容。如《方正县志》第八编政权／政事，第四章公安司法，第三节审判：“1968年11月公、检、法被砸烂，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原法院干部集中办学习班。法院工作由军管组代替，由于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受‘左’的错误干扰，审判工作混乱，刑事、民事案件得不到及时处理，并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五常县志》第十五编政法，第二章检察，第二节审判：“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和‘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的原则，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审理的1159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复查后，共平反纠正了170起，182人，赔偿经济损失10万余元。”

此外，一些涉及文革的单位史也值得关注，如：《齐齐哈尔轻工院校史》（1952—1985）（中国轻工业，1992），《齐齐哈尔市第二中学校史》（1951—1991）（内部资料，1991）

二、学术研究

关于黑龙江文革的学术文章，就笔者视力所及，只有谷丽娟《文革中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龙江党史》1990/2），王永魁《文化大革命初期夺权的动态变化》，徐金洲《1969年开始的全军临战状态何时结束——兼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临战状态的关系》，以及王锐《毛远新文革早期的三张大字报解读》等寥寥几篇。

三、回忆、述往

在回忆录、传记方面，当年黑龙江的领导留下来的，有《李范五回忆录》

（中央文献，2012）、《欧阳钦传略》《王一伦传》（黑龙江人民，2009）、《李剑白回忆录》（黑龙江人民，2008）和《心系财贸，解惑求真——关舟回忆录》（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主政黑龙江多年的潘复生，既无回忆录，也没传记。只有《文革狂人潘复生》《潘复生晚年一席谈》以及《父亲潘复生在文革中的几件大事》等文章。

民间的回忆、纪实等著述，比较重要的有——

1. 范正美《秋梦追思》（北京高等教育，2007）。作者原为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教系的学生，文革中为该校红色造反团总部的负责人，黑龙江造反组织“捍联总”负责人。省革委会常委，1984年定为“三种人”，撤职并开除党籍。全书共十章，二章至七章讲了文革。书后附有文革大事年表和作者年表。

2. 滕叙究《哈军工传》（湖南科技，2006）此书分上中下三卷，中卷第七十章至第八十章写的是黑龙江文革的哈军工，其中哈军工的造反多有着墨。作者另有《哈军工红卫兵历史典故》1—2和《欧阳湘之死》（欧阳湘是黑龙江省委原书记欧阳钦的儿子）等文。

3. 《哈军工文革回忆》作者文革时是哈尔滨育红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其父是哈军工的教师。此文讲述了他家在文革中的被抄家，父母、姥姥被批斗的往事。其中提到了林彪的女儿林晓霖。

4. 晋至冀《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求学的岁月（1964—1970）》，作者是该校的学生，从齐齐哈尔市发改委退休。全书20章，第14章至22章是文革部分。

5. 冷建华《我的大学：哈军工》，作者是1962年从江苏农村考入哈军工，此文共13章，7—13章记述了哈工军的文革。

6. 康有山《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是黑龙江大学63级学生，文章记述了哈尔滨市的两派斗争。

7. 梦明《那一年我十八岁——我的文革回忆》此文作者当时是高一学生。

8. 张鸣《五七中学纪事》，作者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五七中学的学生。

吉 林

一、史志、大事记

在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研究成果中，有两本与文革有关的内部资料，值得一提。其一是1990年问世的《中共吉林省委活动大事记》（1966—1987），此书的版权页上有四个黑体字“内部使用”，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XXXX号”。此书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从1966年5月开始，以月为单位，逐日记录，直至1976年12月。

其二是《中共吉林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

书封左上角印着：内部资料，征求意见稿，编号 XX，但无出版时间）。此书分为四编，下册第三编以“文化革命的内乱和吉林人民的抗争”为题，用了五章（16—20 章）140 余页讲述吉林的文革。书后附有“大事年表”。

能够看出文革的地方特色的，是某些市县级党史。如松原党史的编写者在叙述“斗批改”时，就谈到了当地特有的“三挂”问题：“在‘清队’、整党建党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一大批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除了个别的结案外，还有一些人的问题没有及时进行处理、结案，被挂起来了。至 1971 年 2 月初，仅扶余县挂起来的就有 2173 人……被挂起来的大多数是好人。”（第二卷，吉林文史，2012，页 329）

在吉林省的方志中，89 卷的《吉林省志》（吉林文史，1996）中的第二卷是“大事记”，其中记载了文革。吉林省下辖一个副省级市（长春），七个地级市（吉林、四平、通化、白山、辽源、白城、松原）和一个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它们都出了本地区的方志。¹³

对于文革研究来说，这些方志颇似“鸡肋”。以《长春市志》为例。加上“总志”，这部副省级城市的志书共有 77 卷，它没有为“大事记”单设一卷。长春市下辖的六个区，只有南关区有包括文革在内的区志。余下的五个区（朝阳、二道、宽城、绿园、双阳）的区志，都是从八十年代写起。在长春市下辖的四个市县中，只有榆树县志包括了文革时期。在这个庞大的方志群中，唯一可宝贵的是《榆树县委大事记》（1949—1985）。这是 1986 年内部印刷的资料，当时政治宽松，距离文革结束只有八年，故其所记翔实可观。

二、回忆、述往

吉林省委的领导人，从省委书记赵林，到省革委会主任王维湘，都没有个人的回忆录和传记问世。领导层中的两个文人，省委书记处书记郑季翘和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留下的文字不少。郑有两种传记——锦松、冯宝兴合写的《郑季翘传》（吉林人民，1992）和华迦写的《郑季翘传》（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出版，2012）。宋没有回忆录和传记，但很有一些纪念他的文章，如《宋振庭与吉林省文教事业》《无悔的人生——宋振庭同志二三事》《一代士人宋振庭》《“七尺从天大唱归”——

回忆宋振庭同志》等。关于王维湘少将的文字，多是评论性的，如《王淮湘双手沾满鲜血》《王淮湘主政时期的丑事》，等等。被人们纪念的军队干部，大概只有洪学智、王永君、张士文合写的《蒙冤受屈十八年红梅傲雪志愈坚——洪学智在吉林省工作生活追记》记述了洪贬黜吉林 18 年的经历。

民间关于文革的回忆，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文革初期的造反，二是文革两派的武斗。作者多为中学老三届和大学老五届。较重要的有：

1. 《逝水年华——长春文革记事》，作者时为长春市 43 中的初一学生，此文是他的在博客上连载的回忆录，全书共 65 节，从第 17 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至第 65 节“一帮一，一对红”写的是文革时期的故事。

2. 胡显中《劫后余生惊回首》（自印，2010）¹⁴ 作者原为吉林大学的学生，因同情胡风被打成右派而被捕入狱。文革爆发时，作者正在长春服刑。全书 29 章，第 13 章至 23 章讲述了文革期间长春监狱的情况。

3. 姜东平《文革武斗时期的真实长春》（1—5）作者时为长春市的中学生，文章记述了 1967 年至 1968 年发生在长春的几次武斗。作者还有《回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兄弟反党小集团”案件始末原载》等文。

4. 清秋子《“牛魔王”忏悔录——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作者时为长春市实验中学初一学生。此文共 35 节，讲述了 1966 年 5 月至 1967 年 7 月长春的文革。

5. 徐飙《梦旅》，作者时为汽车厂青工，文革造反，官至省革委会常委。此书是他写的长篇纪实小说，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有详细的描写。

6. 李卓英、刘志远《1967 吉林长春基础楼武斗事件》此文讲述了 1967 年 10 月 16 日—19 日，吉林长春市“八一八野战军”及同派的“长春公社”与“红色造反军”，为争夺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楼，以建立本派据点进行的武斗事件。

辽 宁

一、史志、大事记

辽宁省的中共党史只出了一卷，与文革有关的二卷至今

仍付阙如。如果用《中共辽宁历史简明读本》（辽宁教育，2011）来弥补这一遗憾的话，那么，遗憾会更大——简明读本只用了一章三节万把字就把十年文革打发了。令人欣慰的是，它有一本巨细不捐的大事记，¹⁵几乎是逐日记载了包括沈阳军区的辽宁省各地的文革情况。如1967年9月7日：“由于不断发生武斗，造成沈阳市内断粮。沈阳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和车辆，日夜从郊外粮库向市内运输，保证了居民口粮的正常供应。”（页253）。1968年4月13日：“鞍山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共打死了23人，称之为‘四一三事件’。”（页256）。1969年1月21日：“沈阳军区专案组根据某群众组织专案组提供的所谓‘线索’，罗织了一个90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分子名单’。因涉及的人原籍都是东北的，故名为‘东北帮’。其中，有副省级以上干部12人，市、部、厅、局级的36人；全国政协委员7人，省政协委员17人；省参事室参事、文史馆馆员22人。不久，在这90人中，即有55人被‘专政’。有的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和‘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反革命分子’‘叛特嫌疑分子’等。”（页267）

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大事记还记录了粮食供应、污辱教授、文艺批判，禁止农村的自由集市等内容。1970年12月31日：“城市面粉供应，除外宾和伤病员外，一律改为全麦粉；高粱要加工一部分高粱面，米类均改为三等。”（页280）。1973年8月2日：“毛远新等人在沈阳医学院对56名教授、讲师搞突然袭击，用本年高考的数学试题‘考’他们，企图搞臭知识分子，吹捧交白卷的张铁生。”（页323）。

辽宁省地市级党史的出版情况，参差不齐。辽宁省下辖14个地市，其中沈阳、本溪、营口、阜新、朝阳都有党史二卷，而大连、鞍山、抚顺、丹东、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虽无党史二卷，尚有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党史大事记。

近三十年来，辽宁省的方志部门出了很多成果，与文革关系密切的，是这些志书中的大事记。《辽宁省志》中有大事记，辽宁下属的14个地市中，《沈阳市志》《抚顺市志》《大连市志》《营口市志》和《辽阳市志》等在第一卷或总述的后面，也都有本市的大事记，它们或详或略，都包括了文革时期。

另外，史志部门还编写过一些专题性的书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

1. 《中共朝阳地方党史专题汇编》。此书在“党史征研”的标题下，将文革十年按时间顺序分成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由五个专题构成。每个专题由一篇文章组成，文章引用资料均未注明出处。

2. 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辑、整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连》（内部出版，2001）这是一本综述性的图书，收录文革专题资料《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文革时期的整建党工作》《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迫害情况》《文革时期的工业》《文革时期的农业》等44篇，全书共32万字。

3. 铁岭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铁岭》（内部出版，2010）共32万字，由综述、专题、回忆录和大事记组成。综述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铁岭、昌图、开原、西丰、铁岭5部分；专题分“红卫兵运动”、武斗、整党建党、农业学大寨、知青上山下乡、“金家中学经验”、西丰县十名“革命小将”反潮流、“顶风记”出笼前后等8个专题；回忆录部分收录了孙奇等8人的回忆文章。

4. 昌图县史志办公室编：《中共昌图地方党史》第4辑文革时期1966.5—1978.12（内部出版，2011年）

二、回忆、述往

关于辽宁文革的研究，就笔者目力所及，有三篇文章应该提及：周治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朝阳农学院》、刘玲灵《文革后期辽宁省全面整顿情况始末》和张淑燕《文革时期的特殊高考：炮制“白卷英雄”始末》。亲历者的回忆作品，省级领导有《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2007）第15章至16章，讲述了他主政辽宁的经历。《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1996）宋是东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受到冲击。此书的下卷第十八章讲述了他文革中挨批写检查，农场劳动，以及1974年调回北京的经历。《永远的怀念——郭峰工作文集》（上下，辽宁人民，2007），郭峰时为辽宁省财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审查”，下放到省“五七”干校劳动。此书提到了文革时郭的经历，收入了纪念他的文章。在当年的省级干部中，毛远新是个重要人物，关于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多有文章论及，毛远新也有回忆性文章，但鲜与文革有关。

民间的回忆文字，主要有：

1. 铁背山《辽宁文革二三事》此文题为辽宁，实际上写的是抚顺在文革后期（70年代）发生的五大政治事件：王曼恬制造的《艺浪》黑画事件、“红工联”造反派领袖武振良和郭大可被镇压、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抚顺、庆“九大”天桥踩踏导致几十名女中学生伤亡以及市百货大楼被炸事件。

2. 高振河《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此文讲述了1967年6月和8月沈阳发生的两次武斗事件，第一次是辽革站与辽联之间的武斗，史称“六一事件”。第二次是“辽革站”在机场袭击赴北京开会的代表，打坏飞机两架，打死打伤解放战士多名。作者揭示了沈阳军区在两派争斗中扮演的角色。

3. 李德起《忆沈阳军区机关文革运动》，作者时为沈阳军区司令部军务部的干部，此文记述了文革之初军区的造反。

4. 《我所经历的文革往事》（1—14）作者时为锦州某地农村的小学生，此文记述了1966年至1980年间的农村政治。文革中暴力、学校的混乱、黑五类受歧视，等等。

5. 王紫辰《阜新的文革之灾》作者时为阜新市的小学生，此文出自作者的博客，是一篇阜新文革的简述。

6. 文青：《走过硝烟的红卫兵——锦州文革回忆录》作者时为锦州市第十二中学的红卫兵，曾多次参加过武斗并负伤流血。此文从1966年6月写起，一直写到1968年6月，对这三年的锦州文革做了较详细的描述。

7. 《J城的往事》，这是一篇锦州文革的回忆录，作者时为锦州海军学校的子弟，初中生。文章从1962年写起，重点是1966年至1968年。

8. 安海岐《回忆“五·一六”绝食》作者时为锦州某校67届高中生。文章叙述了1967年5月16日锦州部分学生和外地串联的学生一起，以要求取消《三六通令》为由，在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迫使市公安局军管会十天后撤销《三六通令》的事情。

9. 齐占文《沧桑回眸》（自印，2007）作者时为中共锦州市铁合金厂党委书记。此书讲述了他所在单位的文革，以及他本人受到的迫害。

河 北

一、史志、大事记

官方史书在叙述文革时，通用的策略是谨小慎微和粗简含混。《当代河北简史》（当代中国，1997）《中共河北简史》的表现尤为突出。前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五章）的篇幅，与“抗洪斗争与根治海河”（第四章）“唐山大地震：抗灾与重建”（第六章）相差无几。后者只用了8500字就打发了文革。1966年底石家庄国棉一厂发生的“12·5”事件，1968年波及河北十个县、株连全国十几个省市的邱县抓“国民党”的假案，《简史》只字不提。这两本官史的粗简含混，在市一级的官史中得到了挽救。比如《中共石家庄历史》（中共党史，2016）的第二卷就详细地介绍了“12·5”事件。《中共保定地方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09）亦有可读之处。

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对河北文革史的研究者最有帮助的文献资料，应该是各级党研室和方志办出的大事记。河北11个地级市的史志和档案部门，有7个出了本地区的大事记。在这些大事记中，有5个出自当地的档案馆，其中有四个的出版时间在九十年代以前，这意味着，这些大事记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有价值。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事记值得参考，如《刘子厚在河北大事记》（1958—1980）、《石家庄铁道大学六十年大事记》（1950—1979）、《河北农业大学文革大事记》（1966年6月—1987年3月）、《河北衡水中学大事记》（1958—1970），以及《阜城中学文革记事》（原文出自阜城中学网页，作者时为阜城中学的学生）等。

二、学术研究

在民间，研究河北文革的独立学者，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研究文革中的军队著名的余汝信。他有《河北的“三支两军”》《文革漩涡中的38军》等学术文章。另一个是要宝钟。他在保定造反组织中，曾担任多种要职。他写的《洪流三部曲》¹⁶的第二部《龙争虎斗——河北保定文革史略》一书，对保定地区的文革有详细的描述，填补了官史的空白。

三、回忆、述往

与文革有关的传记、回忆一类的书文出了不少，河北领导层的如《刘子厚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2005），《林铁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2005），当过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与河北文革关系密切，但迄今为止，只出版了《李雪峰回忆录》（上），与河北有关的（下）一直不能问世。在河北文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38军领导王猛的传记有两种，《猛将王猛》第15—21章，记述了38军在保定支左的情况。《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2008年在香港出版。

民间的回忆、纪实作品主要有：

1.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作者是河北鸡泽县赵庄村人。时为县四年级小学生。此文记述了当地的文革：斗老师、破四旧、全县大抓“迎蒋团”、社员们干活磨洋工等。有些细节很有价值。

2. 毛巾工程师《长篇纪实——我的文革》作者时年15岁，在河北某县中学读书。此文讲述，他文革初为什么被打成小反革命，想跳井自杀，被救。十六条公布后，他在学校成立造反组织等情事。

3. 王笑笑《我所亲历的河北省政府被夺权的经过》作者时为河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此文讲的是1967年1月23日夜里，河北省地市三级造反联合总部的造反派夺省委党政财文大权的经过。作者还有《我所亲历的两次“土地革命”以及现在的反思》等文。

4. 董保存《河北磁县二九事件始末》作者是军旅作家。此文写的是1968年早春，河北省邯郸地区磁县县城内发生的“二九事件”——解放军向正在武斗的造反派开枪，造成51人死亡，伤数百人。作者在《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2010）一书中，有的文章也写到了河北文革。

5. 刘光生《翻开我的老相册》系列。作者时为唐山四中高二的学生，有多篇博文谈到了唐山和丰润农村的文革。

6. 田奇庄、赵军民、王卫星《文革中的中国邱县》（1—4），作者是邯郸的媒体工作者，此文是他们对邱县文革中抓国民党大案的调查采访。《1966——我经历的文革回忆片段》《人妖颠倒的1966——我经历的文革回忆片段》《人兽嬗变——我的

一段文革经历》等博文。

7. 刘普伟《文革往事琐忆》（1—6），作者时为石家庄二中的学生，此文从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写起，至家里被抄，家长被打成黑帮，自己卧轨自杀未遂结束。作者的博客中，还有《石家庄武斗》等谈河北文革的博文。

8. 《风云突变——保定市文革期间武斗情况全记录》（1—3）作者以“直隶保定府”为名，“全记录”者实际上是保定文革大事记，时间从1966年5月1日到1977年5月2日。

山 西

一、史志、大事记

在官方出版物中，两本省级的史书——《中共山西历史》（1949—1978）（中央文献，2001）和《当代山西简史》（当代中国，1999）都以三章一百页左右的篇幅讲述了山西的文革。资料性的图书《中共山西历史纪事（1949—1976）》（中央文献，1999）为11个地级市树立了样板，于是，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历史纪事”——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榆次、长治、晋城、运城。以“大事记”作为书名的只有临汾和太原。展阅这些“纪事”，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就是按中共的规定把历史分成若干时期的大事记，在各个时期下面编年纪事。

山西的方志部门，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承接了从省级通志到市县分志的系统工程，三十多年来，成果累累。地市县方志的开篇，常见这样的说明“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境域为主，重点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也就是说，这些方志包含了文革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地区如《太原市志》不但有本市的河西区、北城区、南城区的区志，而且也将集义乡、上兰村、武家庄等乡镇村庄纳入修志的范围。

二、学术研究

在地方文革史的研究中，山西民间的独立学者贡献最大。至少有两部书，在文革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部是由集体写作，石名岗执笔的《文革在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上下卷，十三章57万字，书后附有参考文

献和四个附录，2014，自印，2015 在香港天马图书出版），这本书彰显了民间反思文革的深广，展示了学术独立的力量，丈量出官方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巨大差距。此书不但有着澄清山西文革历史史实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国内外的地方文革史的编写提供了思路、框架和方法。

当然，此书也非尽善尽美，其主要问题是，第一，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极左、四人帮等缺乏明确的定义。第二，结构上较松散，一些章节应该压缩删汰，使上层政治背景、山西官场斗争及群众运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妥帖的处理。第三，在叙事上，吝于剪裁而拙于概括。前者主要表现在书中有大量议论。后者主要表现在书中的大量的几百上千字的引文。第四，对官史中的错误没有针对性的指正。

第二部是《虔诚的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十一章，40 余万字，自印，2009）。作者孙涛是山西大学中文系 70 届毕业生。

此书以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为划分标准，将山西文革分为五个阶段，书中的主角——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在五个阶段的活动，构成了此书的基本线索。与一般的写人物的纪实作品不同，作者既有宏观视野，又注重史料，以反思历史为出发点，求真求实。“力求以真实作为基础，展示山西十年文革的全景。不因尊者讳，不为贱者隐，尽力还原历史的原生态。”（作者题记）

此外，孙涛还著有一些关于山西文革的文章，如《分解一下山西文革的五个阶段》《太原文革运动的兴起》《太原五中成立的七一战斗小组》《真实的印痕：读〈文革记忆——太工红旗李青山回忆录〉》《就〈虔诚的疯狂〉书稿再说点题外话》《我的大学生活》等。

关于山西文革的学术性文章，还有：

1. 钱理群《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载《记忆》181 期，又见《燭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2017）。此文是一篇研究性书评，所评之书是前面提到的《文革中的山西》。

2. 张东明《文革时期的山西夺权研究》（2005）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

3. 牛崇辉《文革时期山西经济建设述评》（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4. 黑老赵《山西省文化大革命概述》（郜银林收集整理，收入郜的博客，资料16《忻州有关参考资料》中）。全文六万余字，分为六部分，从文革前的山西省情讲起，分别叙述了山西文革的三个时期（卫恒、刘格平和谢振华），对1966年至1969年三年间山西的文革有较详细的记述。文中有几个附录：山西领导班子名单、“炮轰省委派”五大组织的介绍，参加夺权的24个组织名录，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此文经过郜银林的收集整理，收入郜的博客，资料16《忻州有关参考资料》之中。

5. 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文革在山西》一书对此文多有征引。

三、回忆、述往

在关于山西文革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评传一类的书，除了《卫恒之死——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长书远寄——王大任回忆》《百战将星——谢振华》《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历程》《赵树理传》、陈徒手《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等出版物之外，民间自印，或互联网上的某些故隐其名的网文也有很多，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推李辅的《所思所忆七十年》（美国，溪流，2012）。还有一些回忆性文字，也值得一提，如：

1. 高兆忠《狰狞岁月愁：1957—1979》（自印，1999）作者原任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此书记述了作者在文革中的遭遇，揭露了省委党校校长李慰等人对他的迫害，以及省党校校史如何歪曲历史等情事。

佚名《文革亲历记》作者当时在省革委办公厅常委秘书组工作，此文讲述了中央给山西办学习班的情况。

3. 《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1—8），此书讲述其父（1966届毕业生）1968年分到太原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到太钢与奥地利和西德专家搞顶吹转炉的事。

4. 《我的一生——文化大革命（1966.6—1968.4大学）》作者时为太原机械学院的学生，书中记述了太原的文革情况。

5. 愚人《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记忆》第40期）作者是山西歌舞剧院的小提琴手兼乐队副队长，文革中因站错

了队被打成另类。此文记叙了太原文革中的两派，和到歌舞剧团支左的三批军宣队，将军人们政治上的极左……尽收笔端。

陈永贵是山西的名人，关于他的书，最早的是资深报人冯东书写的《文盲宰相陈永贵》，此后有中央调查组成员陈英茨写的《陈永贵本事》，吴思《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以及段存章的《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个党报记者眼中的大寨人》等。

四、纪实、纪事

1. 赵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2013，自印），此书写的是1966夏到1969夏三年间晋东南的文革。作者关注的是群众运动和两派斗争，笔墨主要集中在“联字号”和“红字号”两派上面，武斗是全书的重点。对了解山西晋东南的文革有帮助。

2. 谷峰《新太原50年纪事》（上中下）（香港，国际文化，2010），作者程太生，笔名谷峰，武警部队作家。此书的中集《十年风雨》写的是一个民间史志学者眼中的太原市的文化史。作者另有《父亲1967“支左”轶事》《省城太原文革十件大事》等文。

3. 郅银林《忻中文革略记》《五台县文化大革命简述》《代县文革点滴》《忻县中学文革小报》《忻县的“教育革命”和“小反革命”》《忻师文革略记》（与阎琦圣合写）

4. 余习广、杨昕《山西平遥武斗及“八七”事件、“八九”事件》。

内蒙古自治区

一、史志、大事记

在官方出版物中，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1991）、《当代内蒙古简史》（当代中国，1998），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大事记：1947—1987》（内蒙古人民，1988）、《中共内蒙古地区史大事记》第二卷（内蒙古人民，2004）都谈到了内蒙古文革。而图门、祝东力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中央党校，1995）一书则是内蒙古文革的专题性研究。

在上述著作中，有两本书有价值。一是《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作者图门是蒙古族，参与了“四人帮”的审讯，书中披露了一些有用的资料，但作者把这一冤案的责任都推给康生，

失去了对历史的基本判断，殊不足取。另一本是《内蒙古自治区史》，主编者是内蒙古著名的历史学家，此书对文革的叙述虽然也相当粗简，但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二、独立研究

在独立研究中，启之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2010年）值得重视。此书围绕着内蒙古文革的核心事件“挖肃运动”展开，但没有局限于于此，而是努力寻找这场运动的历史根源，并且试图揭示出这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钱理群对此书的评价是，此书“材料尤其详尽、全面，并且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与深度，已经很难超越。”（《记忆》219期）。此书的缺点，如李逊所说，有深度而无宽度——作者的视野不够广阔，对造反派、保守派的情况有所忽略。此书中的“清队”一章曾在1993年由瑞典中国学学者、文革史学家沈迈克教授译成英文，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

三、回忆、述往

内蒙古党政军领导的传记、文集、回忆录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文革。如《乌兰夫传》《乌兰夫文集》《踏在土默川上的足迹——云瑞忆往》等。

在民间的回忆、纪实、访谈、口述等类著作中，较重要的有：

1. 杨海英（日）的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刘英伯、刘燕子，台北，远足文化，2014）。作者试图通过亲历文革的蒙古人的口述，来揭示蒙古人受到的巨大迫害，以重建蒙古族的历史。与一般的口述不同，此书用了相当篇幅阐述了作者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集中在“种族大屠杀的文化大革命”、作者后记及作者访谈这三节之中。

2. 高树华、程铁军合写的《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明镜，2007）高树华时为内蒙古师院的教师，文革初成为内蒙古四大造反派的领袖之一。此书是高晚年对文革的口述，记载了文革中内蒙古主要的事件和人物。程铁军是高树华的学生，是此书的整理者。

3. 阿拉腾德力海编撰的《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此书是“挖内人党”的资料汇编，作者是内蒙古党委机关的退休干部白音

太。此书第三稿，作者署名巴彦泰，书名改为《内蒙古挖肃劫难》。

4. 邢野等人编的《内蒙古文化大革命通志》（中国科学教育文化国际交流促进会出版社，2005）此书分三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1957至1981的内蒙古的重大史实。书后有四个附录，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文革专用词语简释”和“文化大革命中滥用刑罚、刑具名称”。内蒙古九三学社网站载文，对此书有过这样的评论：“以往此类政治性很强的书往往宜粗不宜细，邢野老师则做到在不发议论的前提下，真实还原历史，让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自己去评说。”（见王英：《邢野——串缀历史珠链的人》，互联网：九三学社内蒙古自治区）

5. 马文蔚写的《难忘的“现反”经历：1966—1979》（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2）此书是个人回忆录，作者是内蒙古广播电台的编辑。该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她本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事的记述，最后两章记述了呼市的群众专政，挖“内人党”，军管以及唐山学习班和五原干校的情况。

还有一些重要的纪事性的文章也值得一提，如：白音太《“内人党”冤案前后》（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巴赫《文革“内人党”事件窥探》，高原《内蒙全面军管与余洪信事件》（《记忆》56期），汪钦《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哈斯格尔勒《“内人党”冤案亲历记》，以及澳门大学社会人文学院副教授程惕洁写的《四十余年回首看内蒙古文革》等。

四、资料文献

杨海英（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编撰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基础资料》（日本，风响社，2009—2017）迄今出了九本，每本都是大16开，少则600页，多则1200页，是笔者见到的最详尽最完整的地方文革史料的汇编。

这九本的体例大体相同，即分资料解说、资料和参考文献三部分。第一部分资料解说是日文，是对该书所涉及的历史的说明和研究。第二部分资料是主体部分，由若干专辑组成，其中的资料由扫描、影印、录入等方式构成，全部是中文。第三部分的参考文献分三种：汉语（中国语）文献、日语文献、欧文（英语）文献。这套资料能为中文研究者使用的，只是第二部分。

山 东

一、史志、大事记

山东省下辖 17 个地级市，这些市都出了本市方志，各志中都有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大事记”。《山东通史·当代卷》的《通纪》上册第三章专讲文革。在史书方面，《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中共党史，2001）、《中共山东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11）。《山东四十年纪事》（山东人民，1989），《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1989）以及吕景琳、申春生主编的《山东五十年发展史 1949—1999》等是研究山东文革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山东下辖的地市县也出版了当地的党史，但其对史事的叙述粗细不一。比如，王效禹在山东搞的“三反”（“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博山、栖霞、肥城等县党史就一带而过，而诸城、郯城和临沂等地区的党史则有较详细的叙述。这一差异，在山东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揭袁”（袁，指的是山东省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运动上也显得很突出，有的县党史，对揭袁批袁只字不提，有的则记述详瞻。泰安、天桥、槐荫、峰城、沂水、城里二村等地的文革十年的地方大事记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二、学术研究

关于山东文革的学术研究，张业赏是第一人。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始搜集散藏在民间的大量文革文献，在撰写《中共山东历史》第二卷的时候，又有机会翻阅了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文革档案。在撰写博士论文《山东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论文，2010）的过程中，他还采访许多当事人。这使他对山东省的文革历史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的博论是第一次对山东文革史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另外，张业赏还有《1966 年山东大学的文革》《文革初期山东高校的“大辩论”及其影响》《1967 年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等文章，亦为研究山东文革的必读之作。

另外，还有几个人值得一提：

1. 文革资料收藏家刘建华（笔名：齐晋华），在收集史料

的同时，对山东文革，尤其是青岛文革有较深的研究，发表过多篇文章，如《青岛八·二五事件》《“九大”前山东的“反复旧”》《乱中夺权的青岛1967年1月》《青岛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5～1969.12）、《一九六七年青岛文革日志》（1967年1至4月）、《山东临沂文革概述》《山东潍坊文革概述》《青岛文革期刊〈主沉浮〉》等。

2. 山东党研单位的研究人员丁龙嘉，有多篇论文问世：《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山东夺权的“三结合”经验》和《山东文革中的“反复旧”》。

3. 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崔金珂。作为科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文浩研究团队的成员，与文浩一起，从搜集山东史料入手，对山东文革史做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他的博士论文，是对山东文革史的专题性研究。

关于山东的文章主要有：

1. 首都师范大学黄延敏教授。其博士论文《“破四旧”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7）运用了济南市档案馆中“破四旧”的资料，是研究文革初期山东省的红卫兵运动及其“破四旧”规模、范围的重要学术著作。

2. 冯娜《文革时期曲阜“破四旧”运动述略》（硕士论文，2010）作者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

3. 李先明《文化大革命初期曲阜的“破四旧”运动及其影响——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心态》（《中共党史研究》，2012/8）

4. 张宁《文革初期山东“二·三”夺权评析》（硕士论文，2009）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

5. 林林《文革时期滕县粮食生产研究》（硕士论文，2006）作者是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研究生。

6. 左进峰《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的教育革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第4期）

7. 刘伟燕《文化大革命后期山东的“批林批孔”运动》（硕士论文，2013）作者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生。

三、回忆、述往

关于山东文革的回忆录、传记、纪实、口述等，官方出版物不少，如《谭启龙回忆录》《袁升平文革回忆录》《袁升平口述》

《杨得志回忆录》。将军们似乎更热心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文革时负责山东“支左”工作的济南军区副司令员，67军军长李水清，写了《李水清将军回忆录——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67军政委，也参加了山东支左的王金泉，也写了回忆录《经历与见闻》。

之外，还有——

1. 穆林（时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年革命工作纪实》（山东人民，1998）

2. 秦和珍（时为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秦和珍回忆录》（山东人民，1998）

3. 张敬焘（时为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敬焘回忆录和纪念文集》（中共党史，2012）

4. 冯乐进（文革后任山东省司法厅长）的《百年纪事》（内部印刷）

5. 冯毅之（时任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的《阳春勿忘三九天》（内部印刷）和《风雨沧桑一百年》（香港，天马出版社，2002）。

6. 刘建军《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此书的第23—27章写到了山东文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遭遇。

7. 韩金海（当时山工总头头，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韩金海回忆录》（未刊稿）。

民间的回忆书文主要有：

1. 知侠、真骅《黄昏雨》（青岛出版社，1994）知侠即刘知侠，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时为山东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东分会主席。文革初即被打成“黑线人物”。真骅是其妻。此书是两人的通信集，其中记述了当地的文革。

2. 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1999）作者时为临沂的中学校长。此书是他的文革回忆录，记述了临沂市文革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感。

3. 张宗鲁《从我文革期间被判刑十年说文革》作者滕县龙阳公社冯营大队人，时为山东大学电子系二年级学生，因参加造反。1968年被王效禹打成“现反”，罪证是撰写五篇反动文章（《“极左派”万岁》《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与解体》等五篇文章），1969年被开除学籍，1970年被捕，1976年滕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其徒刑十年。文革

后未得平反。此文讲述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和撰写文章的主要观点。

4. 雷运河《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1—3）作者不详，此文国内网上只有第一部分“初战告捷的欢歌”，分两节：一革命干部的思考，二革命风暴前的沉默。

5. 《山大文革琐记》作者时为山东大学的学生，全文共十六节，从1966年“吴富恒副校长被抛出”开篇，到1969年“翻案兵”结束。

6. 朱瑞福《从农民到高级编辑》（三联，2013）作者是山东寿光人，时任寿光县委秘书。此书是他的回忆录和日记选集，其中第五章是文革纪事，包括文革日记四篇，回忆文革六篇。第六章中的“1970年青岛济南淄博德州外调”和“省委党校进修日记选”等节。

江 苏

一、史志、大事记

《当代江苏简史》和《中共江苏地方史》都写到了江苏文革，前者略而后者详。后者用了五章（15章—19章）叙述了江苏的文革，第17章（开展“斗批改”运动），18章（从抵制极左思潮到“批林批孔”运动），19章（1975年的整顿与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对江苏革委会成立以后开展的“对敌斗争”（“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挖“五·一六”）以及在“批林批孔”和“全面整顿”中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1974年“下放工人回宁事件”和1976年的“南京事件”有较详细的记载。书后附有“大事索引”和“历届省委领导人名单”。

在江苏的地方党史著作中，最能见其地方特色的，是对当地红卫兵/造反派活动，及其与军队关系的记载，盐城的“杀派”和“巩派”的分歧（《中共盐城县历史》《中共盐城历史大事记》）、徐州地区“踢派”和“支派”的武斗（《中共东海县地方史》《中共徐州地方史》第二卷）“四清”引发的跨行业群众组织的兴衰（《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地方史》）军队取缔造反组织，旋即又为其平反的尴尬处境（《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等章节，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比较详细记述了当地清查“五·一六”的史志有《徐

州市志》上下（中华书局、1994），《滨海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以及由中共溧水县委组织部、中共溧水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溧水县档案局、溧水县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编纂的内部刊物《三十年回眸》（1949—1978）（2008）等。

二、学术研究

长期致力于江苏地区文革史的独立性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是原南京大学教授董国强（现为复旦大学教授）。董曾承担《江苏通史》共和国卷文革部分的撰写工作，其《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又载《记忆》第16—19、21—28、31、32、35等期）一书奠定了他的研究基础。他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 Andrew G. Walder 合作，在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The China Journal* 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有关江苏文革史的论文。这些论文不但深入探讨了江苏文革运动的过程，而且对群众运动的起源和群众派性冲突长期延续的结构性因素作出了全新解释。此外，董国强还有：《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从南京大学的“清队”运动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转化》《从南京大学“倒匡”事件看文革的复杂属性与多重面相》《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浅析》（《记忆》67期）、《南京文革群众运动的起源和派性认同》（《记忆》73期）《“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等文章。

在独立研究者中，有两个人成绩突出。其一是著有《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台，博客思出版社，2015）的乔晞华博士，他原来是南外附中的学生，文革后赴美深造，1996年获社会学博士。此书是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南外附中红卫兵暴力行为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书后附有英中文参考文献。其二是王虹，他著有多篇关于江苏（主要是南京）的文章：《从王金事件看真实的文革》《雨花台事件：造反军的一张大字报》《“南京事件”中的新街口广场集会》《南师附中文革备忘录》（上下）、《文革记事——红联，工宣队和胡百良》《南师附中的文革派别》《南师附中文革大事记》（1966—68）等。

另外，丁群的《江苏省清查“五·一六”运动》（文史精华，2009年第一期）也值得一提，此文详细讲述了江苏省清查

“五·一六”的全过程：如何夸大敌情，如何刑讯逼供，如何利用这种清查排除异己。文章引用了史志资料和中共南京市委、无锡市清查定案小组、江苏落实政策办公室等党政机关当时发的文件和统计数字，很有说服力。

三、回忆、述往

在回忆录、传记、纪念文集的出版方面，江苏当年的领导人的多有问世。如，关于许世友的至少出了两本：《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1986）和《一代名将许世友》（黄河，2004）。前者谈到了江苏文革，后者讲的是战争中的许世友。关于许家屯也出了两本：《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香港联合报有限公司，1994）和《许家屯回忆与随想录》（明镜，1998），前者讲的是他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在香港七年的经历；后者讲到了江苏的文革。关于刘顺元，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刘顺元传》（1999），其中写了文革前刘在江苏代江渭清主政，文革中先被批斗，后被关押的经历。彭冲没有回忆录，只是在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出过一本《彭冲纪念文集》（中共党史，2015），其中《彭冲同志在江苏》《彭冲同志与南京的不解之缘》等文讲到江苏的文革。关于江渭清，出了《江渭清画传》和《江渭清回忆录》。后者讲到了江苏的文革。高华认为，这部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¹⁷

与其他省区一样，关于江苏文革的回忆文字，更多的来自官场之外，如：

1. 陈白尘著《对人世的告别》（三联，1997）作者是著名的剧作家，书中的《听梯楼笔记》记录了作者文革后期在南京盼望“落实政策”期间的一些社会现状和见闻。

2. 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案始末》（中国社会科学，

1998）。作者时为南京五中的高中学生，因写了《南京知青之歌》而受到长期迫害。

3. 丁群编注《陆兰秀狱中遗文》（美国，成家，2000）。陆兰秀时为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因上书毛泽东，要求为刘少

奇平反，呼吁结束文革，于1970年7月4日被以“反革命”罪处死。1982年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4. 《常州文革之回忆——纪念文革运动四十周年》作者时为常州解放西路小学四年级学生，经历了常州市的文革。此文共分五章。作者对红卫兵砸毁清凉寺、天宁寺和当地的两派武斗有详细的描述。

5. 纪大中《绞刑架下的革命——文革纪实》作者是姜堰镇人氏，本文写的是江苏省泰县的文革（泰县文革后改为姜堰市）。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让没有赶上文革的年轻网友们了解一个“真正的文革”。

6. 王春南《江苏文革中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作者时为南京大学教师，此文叙述了以南京大学为突破口的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

7. 朱子南《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作者时为江苏师范学院的教师，此文记述了该院在清查“五·一六”中造成的种种冤假错案。

8. 方子奋《南京慧园里六号》作者原为杭州船舶专科学校的教师，因“右派言论”校方欲送其劳动教养，遂辞职成为南京东流农场的农业工人。文革中被构陷于“反革命集团案”。同案者被枪毙，他被判刑十年。1979年平反。此文记述了南京的文革，对1970年底南京“一打三反”运动有翔实记载。作者还有《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等文。

9. 解顺庆《我亲历的苏州武斗》作者时为江苏吴县中学1968届高中学生。此文记述了当地的“支派”和“踢派”1967年8月在苏州发生的几次武斗。

10. 王庆顺《文革期间的南京“一三”事件》作者是南京轧钢总厂的工程师，此文是他的同事——南京造反组织“八二七”负责人，江苏省革委会常委薛德元的访谈记录。文中记述的是1967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三”事件和“一·二六”夺权。

浙 江

一、史志、大事记

专门谈浙江省文革的出版物，只有《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程超，魏皓奔编，《浙江方志》编辑部内部印刷，1989）此书是内部资料，看不到。能够看到的是《中共浙江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2011）和《当代浙江省简史》（1949—1998）（当代中国，2000）。比较而言，在记叙文革上，前者更为可取。首先，在叙述历史事件及其来龙去脉上，党史之详细深入远在简史以上。党史的文革部分用了五章十七节，简史只用了一章三节。章节篇幅的差异，使简史对好多重大事件，如灵隐寺事件、军管会内部的分歧、斗批改中的学毛著、大批判、砸烂公检法、清队、干部下放、知青下乡和整党建党等，只能一笔带过，而党史则辟有专节，从容叙述。其次，党史有较高的学术性，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重视基层的研究成果，杭州、宁波、台州等十多个地县的党史、大事记都在其视野之内；二是它注意资料的出处，所引用的资料都以脚注的方式注明；三是书后附有五个附录，不但有浙江省的组织史的资料，还有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此书目和资料较《当代浙江简史》附录中的书目和资料要丰富得多。

同其他省一样，浙江省地县区的党史更值得重视，如嘉兴、绍兴、舟山、富阳、萧山、金华、丽水等地的大事记、纪事、专题集等。其中《温州龙湾区志》（政治运动卷 1949—1979）第十四章以五节的篇幅简述了当地的十年文革史，在一打三反一节中记述的“红色风”“十八党”事件，具有当地特色。

二、学术研究

关于浙江文革的独立研究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是肖雪慧针对《南方周末》2013年2月28日发表的《审判文革遗案》一文，发表的《瑞安个案使文革的平民受害者进入视野》；一是傅怀锋《鄞县地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4年11月）。

慈溪党研室陈小恒、陈雁撰写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在慈溪的贯彻执行》《慈溪县红卫兵运动》《慈溪县批林

整风运动》《慈溪县“批林批孔”运动》《慈溪县机关斗批改干校片段》《慈溪县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岑仲敏等人撰写的《慈溪县“一打三反”运动》等系列文章，对慈溪的文革有较全面的介绍。

三、回忆、述往

与浙江文革有关的人物的回忆录、纪实、访谈、日记，除了《江华传》（中共党史，2007），《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2003），《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2006）外，较重要的还有：

1. 旬令香《我的“文革记忆”》（1—11）。作者时为永嘉县（浙江东南）培红小学一年级学生，因母亲被通缉而被学校开除。书中记述了她们全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

2. 江帆《我的被“清查”往事》。作者时为浙江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文后附有两个附件：清查“学习班”期间夫妻互通的信札和清查后期作者的日记片段。

3. 徐水良《文革初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儿子打死人及冲军区事件》《浙江文革中的一桩公案——保江华》。作者是浙江大学“红暴会”前身“暴动总部”的负责人。

4. 朱雷《文革历险记》（1—5）。作者是舟嵎要塞的营职参谋，因批评许世友被扣上“倒许乱军”“反革命”帽子受到舟嵎要塞区普陀守备区领导的长期迫害。此文详叙事件经过，但人称混乱，不便阅读。

5. 《佛堂文革惨案纪实》（1—18）作者不详。佛堂是义乌县的一个区，此案又叫“尚阳同盟党”案。发生在1968年8至11月间，被审查的所谓“同盟党”分子264名，迫害致死的9名，打成重伤的44名。涉及义乌县内13个公社，44个大队以及学校、工厂、电影院等单位。波及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四省和义乌周边的金华、兰溪、永康、浦江、诸暨等五县，涉案人达数千。

江 西

一、史志、大事记

在江西地方史的研究中，江西党史办和方志办推出《当代江西简史》和《中共江西历史大事记》（1919.5—1998.12）两书，

对程世清主政期间（1967—1972）狂杀滥捕的“三查运动”（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和“民办枪毙”，以及经济领域的大跃进——造车（汽车、拖拉机）大会战，备战迁厂、“一化带七化”、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策给江西带来的巨大危害，在这两本书有较多的描述。而《中共江西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简编》和《当代中国江西省》对这些江西文革的地方特色则语焉不详，一带而过。

官方出版物中，值得重视的是，江西各县市区内部出版的大事记，如：《抚州历史回眸：1951—1979》，《南昌市郊区党史大事记：1949～2000》（1998），《赣州地区大事记：1949—1999》，《九江党史大事记：1949—1978》（1998），《西湖区建国五十年来大事记》（2000），《东湖区建国以来50年大事记》（2003），《中共进贤县党史大事记：1926～1985年》（1990）等。这些大事记或详或略记载了当地文革的情况，对地方文革史的研究，有参考价值。另外，江西党史资料第40辑《江西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7）一书。记载了文革制造的各类冤假错案。

二、回忆、述往

在回忆、传记、纪实、日记、访谈的文字中，关于江西省级领导的，有《杨尚奎传》（1952—1967任江西第一把手），刘勉钰、胡少春著《方志纯传》（江西人民，2005），《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2014），李意根《程世清沉浮录》，芦笛《程世清将军：江西人民心中的另类丰碑》《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等著述。民间的同类文字，主要有：

1. 黄爱国、黄洋《潘世告沉浮录》（党史文苑2007年第15期），潘世告原是萍乡安源煤矿的采煤工，九大、十大中央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此文叙述了潘如何通过造反，爬上了政治巅峰，又如何成为“三种人”，成为阶下囚的过程。

2. 张小金《文革前夕回忆》作者文革时是吉安一中的学生，后分到江西吉安汽车运输局大修厂工人。1981年考入厦门大学研究生。此文原名《山雨欲来——四清运动中的一场校园整风》（1—8）

3. 杨明远《回顾文革经历引发的思考——纪念毛主席诞生120周年》作者时为萍乡煤矿学校任体育教师，此文记述了萍

乡的文革。

4. 汝其《支左日记》（1967—1968）作者是到江西支左的军校干部，这本日记中记载的“民办枪毙”被很多文章引用。

在这些述往的著作中，武斗和冤案是民间叙述的重点，关于江西的武斗，主要有如下著作：

1. 郑玄华《萍矿文革武斗重大事件》（1—10）作者是萍乡的造反派，此书以中央文件、首长讲话和对当事人的访谈和回忆做基础，较完整地记述了萍乡地区的武斗。此文的附录中，有“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阶段”“萍乡文化大革命脉络”“干部普遍受冲击受‘迫害’的原因”和“萍矿造反派队伍分析”等章节，对了解此地区的文革历史有帮助。

2. 黄秋生博客。作者是赣州的老三届，他的博客里的“赣州往事”系列中有多篇关于当地文革的文章。较重要的有《赣州往事：碧血横飞赣州城》（此文从1967年2月4日赣一中批斗教师讲起，讲到同年6月的武斗。文后有江西冶金学院红卫兵组织编写的《碧血横飞赣州城》的目录和图片），《6810部队，看见你们格外亲》（此文讲述了1967年7月12日解放军6810部队进驻赣州支左，造反派为牺牲的战友报仇，枪杀赣州运输局武装部长赵远庄等情事。）《赣州文革6.29大规模武斗之后的“303”》（此文讲述了当年支左部队在当地的商业学校开办“赣州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在文革后期共关押了走资派和黑干将303人，故名。）以及《碧海青天夜夜心》（此文讲述了两派恩怨与1974年李九莲问题的历史关联。）

3. 抚州移动文明博客。转载者是70后，临川文化协会副主席、抚州文史馆馆员。他在博客中转载了《文革中的抚州武斗被定军事叛乱》《临川故事之文革抚州武斗》及《文革中抚州著名的武斗》三文。

在江西文革史上，最大的集体性冤案是“李调会”，最著名的冤死者是李九莲、钟海源等人。这方面有两本书最重要，一本是新华社名记者戴煌写的《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载《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工人出版社，2004），另一本是南昌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平写的《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2005）。

安 徽

一、史志、大事记

安徽史志部门这些年出了不少与文革有关的研究成果，除了那些常规项目（地方史、大事记、组织史）之外，党研室推出的《卢荣景访谈录选编：文革遭遇》（1—3）令人耳目一新。卢在文革时是一个县处级干部，最高的职务是铜陵市委副书记，1980年代才当上省长。卢的访谈以“选编”形式刊载在安徽党史网站上，表明它的内容符合时下的要求。尽管如此，他讲的铜陵地区和铜官山矿区的文革，资料罕见。

进入新世纪以后，安徽先后推出了三本与文革有关的省史：《当代安徽简史》（当代中国，2001），《中共安徽八十年简史》（安徽人民，2003）和《中国共产党安徽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14）。后一本有大事索引、安徽省级领导机构及领导成员概览等附录，但是三本书都没有参考文献，书中偶尔有个注释，表现出写作者在学术上努力。

尽管省级史志办不断地敦促市县区编写本地包括文革十年的史书，但是迄今出版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合肥简史》（中共党史 2006）。《中共泾县地方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池州地方史概述》，文革部分仅 760 余字。

令人欣慰的是，在大事记的编写上，安徽并不落后。除了《中共安徽省历史大事记》（1949—1999）（安徽人民，2002）之外，十五个市县党史办多包括文革十年在内的大事记问世，较有参考价值的如下：合肥（内部出版）、马鞍山（中共党史，2011）、池州（池州党史地方志网）、巢县（无为网）、泾县（内部出版）、舒城（人人网）、巢湖行署（百度贴吧）、淮北（淮北官网）、淮南（王忠萍新浪博客）。

二、学术研究

安徽文革的独立研究很少，董国强写的《从“夺权”到“军管”：安徽文革运动初探》是其一。学术性研究也只有田红梅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濉溪（淮北）市的教育事业》一篇。令人欣慰的是，安徽大学青年教师李嘉树博士正在研究安徽当代史，尤倾心于安徽文革史。他已收集到《安徽八二七》《红旗报》，还访问了梁守福、凌恩荣等群众组织负责人。2015年7月他还

在《记忆》上发表了征集安徽文革史料的求助信。¹⁸

三、回忆、述往

关于安徽文革的传记、回忆、纪实，公开出版物有《李德生回忆录》《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安徽人民，2010），《光辉战斗的一生——姚克传》（安徽人民，2000）以及相关的回忆文章，如姜毅然《李德生在安徽》（《党史纵览》2007第7期）。但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张恺帆回忆录》（张恺帆口述、宋霖记录整理，安徽人民，2004）张恺帆在文革前任淮南矿区警备区政治委员，安徽合肥市委书记，副省长。因反映了无为县大饥荒的情况，1959年被省委书记曾希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书讲述了大跃进与大饥荒，对安徽的文革过程亦有翔实讲述。

回忆述往类的书籍在民间出了很多，较重要的有：

1. 梁守福《乱流浮沉半生缘》（网书，2008）作者是安徽蒙城人，时为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造反后任为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负责人。此书共十二章，从第二章至十二章写的是文革。书后附有八个附件，梁还有理论性的文章《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与文革实践》《文化大革命是完善人性的革命运动》等，对文革予以充分的肯定。

2. 朱来常《我的人生档案》（海天，2006）作者时为安徽大学中文系学生，文革初任本校的红卫兵司令。此书对安徽大学造反派的情况有详细描写，作者对文革持否定的态度，称“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红卫兵是历史的怪胎”。

3. 王伟平的博客。作者1963年生于合肥。其博文中有多篇关于合肥文革的文字。如《60年代中后期的安徽政治与相关事件》《合肥造反派报纸》《长丰杜集“五七干校”》，尤其可贵的是1965年到1980年代的合肥大事记。

4. 红雨斋博文。在75则文革史笔记的博文中，有九则谈到了安徽的文革：《文革中原安徽省级干部的沉浮》《安徽红卫兵领袖梁守福和朱来常》《安徽省1974年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入学前家庭出身情况》《安徽的生产建设兵团》等。这些博文都是资料性的，鲜见作者的评论和分析。

5. 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作者是老公安，掌握大量内部资料。此文记述了安徽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

中制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以及当权者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其中军代表刘万泉害死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后，剖尸开膛寻找敌人电台的恶行，尤其令人发指。

6. 蒋梅芬《文革经历二三事》作者原为宣城师范学校1965届速成班的毕业生，此文记述了1966年8月至1970年间五星公社及湾沚镇的两派斗争：红杨中心小学师生成立的保守的“学红军”和造反的“千钧棒”，引发的五星公社内部和社会及各单位的两派斗争。讲述了公社一级领导受到的迫害。

7. 刘乐顺《一个农村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作者安徽巢湖人。时年28岁1967—1969年间任安徽巢县一乡镇文革核心小组组长、红卫兵大队队长。作者在口述中谈到当地农村的文革情况。

8. 庞振月《文革中的宿县“小反复事件”始末》作者时为宿县地委的文秘，文章记述了文革中宿县支左打压了造反派，而后又为其平反一事。作者还有《忆孟老》等文。文中的孟老，指的是宿县地委书记孟亦奇，文中讲述了当时的宿县文革。

福 建

一、史志、大事记

与《当代福建简史》（当代中国，2001）和《中共福建地方史》（社会主义时期1949—2007）（中央文献，2008），《中共福建地方简史》（1926—2006）（中央文献，2006），《中共厦门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2013）等官方史志中相比，史志部门编写的大事记的学术价值更高。如《中共福建省委大事记》（1949—1990）（福建省委办公厅文印中心，1999年承印，内部使用）将41年的历史，分成四册，将文革单立一册（第三册1967—1978）其详可知。福州的大事记有两种，一种是《福州历史大事记》（从唐至2000年），另一种是《建国后福州历史大事记》（1949—2000），后者比前者详细，如1966年，前者12条，后者有19条。其余还有《中共厦门地方史大事记》（1949—2001）（中共党史2002），《中共南安地方史大事记》（1949—2000）（编委会自印，2000）等。

福建省的9个地级市，都有自己的大事记，除了三明市有《社会主义时期三明市史大事记》（中共党史，2010）之外，其他地区，如南平、龙岩、漳州、宁德、泉州、莆田等地的大事记，

都是从遥远的古代记起，尽管如此，在远略近详的原则指导下，文革十年的部分，亦有参考价值。

二、学术研究

在诸省区市中，福建文革史的研究一枝独秀。这要归功于福建师范大学的两位教授——汪征鲁和叶青，多年来，他们以福建文革为学科重点，悉心指导和身体力行，培养了多位专业研究人才。下面这些论文的作者，多数出自这两位教授的门下：

1. 郑小娟《福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二六事件”》（2002）
2. 陈矩弘《文化革命时期福建的教育革命研究》（2002）
3. 陈秋兰《文革时期福建赤脚医生研究》（2006）
4. 尚长风《文革时期福建的经济研究》（2008）
5. 赵嘉琛《文革时期福建批林批孔运动研究》（2010）
6. 赖正维《文革时期的农民“造反”组织及其活动管窥——以福建为个案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作者还有《文革时期福建老区问题的历史反思》等文。

在这个研究队伍中，历史学院副院长叶青的贡献最大，由她的博士论文整理而成的《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当代中国，2004）是第一部对福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十章，书中有大量图表，书后有福建群众组织资料。

除了此书之外，叶青还有《非常十年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此书是作者研究福建文革的文集，包括群众组织研究、重大事件研究、政经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上山下乡研究等专题性文章31篇。可以说，这是一部专题性的福建文革史。

三、回忆、述往

关于福建文革的回忆、传记、纪实、口述等著述众多，主要有：

1. 《叶飞传》《开国将军叶飞》《叶飞纪念文集》等。叶飞自五十年代初即担任福建党政军第一把手，文革初受冲击，靠边站。这些书籍中或多或少都提到了福建文革。

2. 《韩先楚传》《战将韩先楚》（张正隆，解放军文艺，2000）传主文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福建渡过。张正隆书的第

10、11 章写到韩在福建文革中的经历。对韩应对革命造反，保护老干部老战友，抵制极左政策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事，有详细的描写。

3. 《梁灵光回忆录》梁灵光在文革初任福建省副省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75 年任革委会副主任。其回忆录中，有很多篇幅写到了福建文革。

4. 黄炳辉《浮生剪影：一位耄耋老人的自白》（上海人民，2014）。作者 1955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史、哲、兵法战例等的教研。此书的第 11 至 14 章记述了厦门的文革。

5. 岩野闲人《血泪龙津河》，作者傅平，1950 年生，福建闽西龙岩人。此书讲述了龙岩党政领导在文革初期的活动，群众组织的兴起，支左军队对反对派的镇压，以及镇压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相当一部闽西地区文革简史。

6. 郭义山《龙岩文革：动荡的岁月》（1966—1976）作者是龙岩一中的学生，文章记述了龙岩地区的文革。所述时间虽截止于 1976，但 1968 年之后极为简略。

这一类的还有陈金城《亲历文化大革命》，郑梦彪《艰难纪事——浩劫中的母校和老三届》和佚名《1967——我记忆中的文革片段》等。

河 南

一、史志、大事记

河南省的党研和方志系统，出了不少包括当地文革的史书。省级的史书，如《中共河南历史》（第二卷）（中央党校，2014）和《当代河南简史》（当代中国，1999），地县一级的党史二卷，如《中共新乡市历史》（河南人民，2012）、《中共登封历史》（河南人民，2012）、《中共信阳县历史》（河南人民，2016）和《中共新野县历史》（河南人民，2013）等。就学术价值而言，由史志办编写的，九十年代出版的大事记的参考价值要比上述史书高一些。

二、学术研究

在民间的河南文革研究中，最著名且贡献最大的是武彩霞。

武是原河南农学院大三学生，“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成员，文革中曾任广武公社副书记。其主要著述有：《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郑州大学文革概述》《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四十周年话文革》《文革事件钩沉》等文章。这些文章编入《不再沉默——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文化传播，2010）一书之中，网书《霜叶集》（署名一丁）摘选了部分文章的内容。

在上述文章中，《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一文学术价值较高。作者认为，河南文革有五个特点，第一，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十年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二，河南省的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之中，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做了很大的贡献。第三，以党言川为首的河南的造反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第四，清算文革的“揭批查”是极左的、派性的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五、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

在其他的研究者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曾宪坤。其研究的集中于南阳地区，有《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南阳县文革“斗批改”时期的“大批判开路”》《南阳县文革初期的内乱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文章问世。

三、回忆、述往

关于河南文革的回忆录，纪实等著作，较重要的有：

1. 关于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汝水清凉《刘建勋其人其事》，讲述了刘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文革后的不幸遭遇。可以与刘墨的《刘建勋：“信阳事件”后的“救灾书记”》并读。

2. 关于纪登奎。主要是纪登奎的妻子王纯《忆中南海内旧事》和儿子纪坡民回忆纪登奎的系列文章，如《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纪登奎是怎样成为“造反派”的？》（又名《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3. 《文敏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7）。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曾任代理省委第一书记，1968年被中央定性为河南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

4. 方复山《风雨十年路——我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时任“郑大联委”服务组第一任一号服务员，此文是他写的回忆录，其中有《河南省文化大革命实录》一文。

5. 周光敏《往事回首——许昌文革纪实》（1—15）（作者是“豫南建筑公司第七工程处”的职工，其母因地主成分被赶回农村。）

6. 刘光耀《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1—9）

四、口述、访谈

1. 李素立采写、整理的袁庚华口述的《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袁庚华是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此口述分载《记忆》118—119，122三期。

2. 马秀珍口述、阿陀记录《我曾是郑州铁路局“二七公社”第二把手》。

3. 老田主持整理的关于河南文革的系列访谈，包括郑州文革亲历者谢保安、葛丽英等人的访谈；河南兰考的杨捍东访谈。

湖 南

一、史志、大事记

与1997年出的《当代湖南简史》（当代中国）相比，2009年出的《中共湖南历史》（二卷）（中央党校）在叙述湖南文革的时候，要详细一些，其中有一些民间作者不曾写到的内容。如该书第十五章记述了湖南民间的异端思潮：1968年新化县回乡知青肖瑞怡三次给毛的上书，建议中共中央适应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制度；指出人为的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对社会的破坏。江华县的农民赵文祥1967年两次给毛写信，揭露林彪的十大罪状。醴陵县的工厂会计汤玲英写大字报批评文革打倒一切，为老革命家评功摆好。桃江县的农民熊克立批评个人崇拜和愚民政策。以及民间学者注意到的，大庸县的回乡知青

丁祖晓、丁祖霞姐妹散发传单，反对个人崇拜，批评时政；李启顺、李启才等六名同学自印传单，公开声援，被当地公安列为“特一号”“特二号”反革命案件遭到镇压的冤案。

市县出的当地党史，也颇有可观者。如《中共岳阳市地方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2009）、《中共浏阳地方史》1949—2002（中共党史，2004）。

在史志方面，大事记仍旧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如《湖南省志·大事记》（湖南人民，1999），《长沙市志》二卷（湖南出版社，1995），以及地县出版的建国后的大事记，如《长沙县志》《湘潭市志》《株洲市志》《道县志》等。以及《湖南大学校史》等。

二、学术研究

在湖南文革研究的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向前的博士论文《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此文近18万字，分三部分，是一部湖南文革群众运动史。

此外，还有四个人值得重视——

1.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2010中文版；香港，牛津大学，2016年英文版）一书的作者谭合成。此书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详细记载了1967年湖南道县在官方组织下，由基层干部指挥的对“黑五类”的灭门式屠杀。2016年，谭合成又在《记忆》173期上发表了她的《采访手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零陵（永州）地区十一县市关于文革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2. 曾经当过造反派的陈益南。他是民间研究者中的杰出之士，他不但著有长篇回忆录，还深入历史深处，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

3. 原湖南省委纪检委书记杨敏之，文革时，他是衡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对省府和当地的文革都有深入的了解。著有：《我的思想回顾》《解读权力》《一瞬长思——回首文革》和《苦涩的反刍——文革回眸》（未定稿）（湖南人民，2000）。这四本书前两本是作者总结文革教训，反思权力和体制；后两本是关于湖南文革的回忆。

4. 功会，文革时是中学生，1974年进入工作做工，是湖

南文革的亲历者和参加者。他在《记忆》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如《从“007密令”闹剧到湖南的反周风潮——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一》《“省无联”是怎样出台的——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二》，《“省无联”众生相——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三》，其《文革中的红中会》一文，详细展示了长沙市文革的中学生红卫兵的情况。

三、回忆、述往

关于湖南文革的回忆、纪实、访谈、口述一类的著作，除《张平化回忆录》《卜占亚上下“贼船”记》《黎原回忆》（第9部分：在湖南近三年的“三支两军”）、《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李海文）等著作外，较重要的民间著作有：

1. 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1988年初版，2016年再版，1997年英文版）此书记录了他在湖南多个看守所、监狱和劳改农场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个人的思想历程。

2.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2006）作者是长沙市照相馆的工人，文革中参加造反，成为“湘江风雷”的一员。此书是他在文革经历的回忆录。

3. 应山红主编《雁阵惊寒：湖南衡阳文化大革命史事》，编者在前言中谈到，《衡阳市志》总序中只有465字写到当地的文革。他编写此书，就是要为后代留下真实的史料。书中汇集了多人撰写的关于衡阳文革的文章。其中《荣辱浮沉南柯梦》一文详尽介绍了文革时期衡阳群众组织的名称、派别和演变发展情况。《十年天地干戈满，四海苍生痛哭深》一文历数了发生在衡阳的11次大小武斗。《火烧后院，祸起萧墙》一文记载了衡阳地、市党政机关在文革中的情况，尤其难得的是，书中还忠实记录了中下层机关干部的造反活动。

4. 林启山编著《老虎坪纪事》作者本名陆芒，退休前是邵阳县修志办主任。书名中的“老虎坪”是中共邵阳县委所在地。作者经历了该县文革的全过程，了解邵阳地区抓“黑杀队”“刮红色台风”等情况，并且参与了事后的调查摸底。还曾冒着危险保留下一批资料，又得到了一些当事人提供的真实记录。

此外，任冬林整理的，关于岳阳燎原（吕仙亭）居委会、方元大队的文革资料（《记忆》“拾荒者”专辑，第69期）

湖 北

一、史志、大事记

在省级史籍方面，湖北出版了《湖北省志》（湖北人民，2002）、《湖北简史》（湖北教育，1994）和《中共湖北历史》（1949—1978）（湖北人民，2015）等多部史书和两部大事记——《中共湖北历史大事记》（第二卷，1949年5月—1978年12月。湖北人民，2007）和《湖北省志大事记（1840—1985）》（湖北人民，1990）。后者虽然是从晚清记起，但文革中的大事尚历历可查。如1966年冬至1967年春造成两万五千余人丧生的“脑脊髓膜炎大流行”，1968年武汉的“反复旧”等。

湖北省的12个地级市都有自己的市志，但其中鲜有关于文革的记述。这12个地级市推出的大事记，有5个与文革无关。余下的大事记可分三类，长时段的如襄樊、荆州，起止之间相隔七八十年。中时段的从1949年开始，至新世纪前后结束，跨度四五十年，如宜昌、咸宁。短时段的是武汉、黄冈、黄石，这三个地方将1966年—1977年单列一册，殊为难得。

二、学术研究

“七二〇”事件是湖北文革中的大事，也是文革的转折点。独立学者多有论述。湖北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的《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2005），《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0）。是目前所见关于“七二〇”事件最完整最齐全的资料汇集。

关于这一事件的著述还有：王绍光的《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2009），吕德义《武汉军民抵制文革错误的一次英勇抗争：试论“七二〇事件”的原因》，余汝信：《“七二〇事件”中的8201与8199》，丁凯文《关于文革“七二〇事件”——读〈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李千里《回忆录与文革历史编造——以武汉“七二〇”事件为例》等文。另外，学术性的文章还有中央党校于南的研究生苗立锋的硕士论文《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研究》（1990）。

三、回忆、述往

关于湖北文革的回忆、传记、口述、访谈等，湖北领导方面有《张体学传》（湖北教育，1989）、《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回忆赵辛初》（中共党史，1995）、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大连，2013）、湘人《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炎黄春秋》2006年2期）等。武汉是文革重镇，七二〇事件影响巨大，近年来出了二三十本造反派头头的回忆录。主要有——

1. 李承弘《百年寻梦》（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0）作者时为武汉钢厂的青工，文革初造反，为武汉职工联合会（简称“工总”）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此书是他的回忆录。

2.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09）吴焱金是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造反后，担任武汉“工造总司”的勤务员。此书从一个青年工人、造反派负责人的角度对武汉文革作了详细回忆。

3.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自印）作者是“毛泽东思想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勤务组成员，文革中曾被武汉军区抓捕入狱。文革后又被隔离审查，关押了18个月。书前有何蜀作序《失败者书写历史——王光照回忆录序》序中说：“王光照这部历时八年写成的六十万字回忆录，和武汉其他原工人造反派代表人物的回忆录一样，为研究工矿企业造反派提供了生动具体的‘文史资料’，从亲历者回忆的角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4.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2）作者时为武汉的青工，文革造反成为一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文革后因命案判处死缓，系狱21年。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他参加文革的过程，写到了他的反思与忏悔。

5.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印，时间不详）作者时为武汉学生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一号勤务员，担任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和文革后被多次关押，总计27年。此书是他的回忆录。

6.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作者时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干部，曾任“长

办联司”主要负责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

7. 章迪杰《峥嵘岁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作者时为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之一。

8.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大，2005）作者时为华中工学院65级学生，是“新思潮”中“北决扬”的代表人之一。此书对武汉地区文革和“北决扬”有详细记叙。

9.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电学院文革亲历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作者时为该院团委副书记，当过院革委会副主任，学院党委副书记。此书是他的回忆录。同类的书还有岑颖义写的《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公司，时间不详）

10.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1）作者时为武汉市农委干部。文革中担任武汉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勤务组组长。此书记述了武汉地区的文革。

除了这些造反者的回忆录外，还有一些普遍人的回忆，但国内正式出版物罕有，多为自印或在海外出版。重要者如李乾《迷失与困惑——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自印，2007），杨闯《文革亲历记——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4）等。

广 东

一、史志、大事记

与本省的民间著述和独立研究相比，广东官方史志的两大系统，就显得逊色多了。中共广东地方史只出到一卷，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第二卷，至今未见出版。《当代广东简史》在近五百页的篇幅中，只用了五十页写文革。地县市三级有廉江、新丰、禅城、中山等地的史志问世，这些著作对广东文革史或多或少做了丰富和补充，如“三忠于”和全民备战（见《中共新丰县历史》第二卷第三章第三节），干部的“两退一插”（《中共廉江县历史》第二卷第十八章第二节等。

值得重视的是，广东史志部门出版的大事记，如《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1958—1989.9）、《惠城区历史大事

记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8）、《惠城区文化大革命资料选编》（1966—1976）、罗定县大事记（1949—1979）、《阳春永宁历史大事记》等。越是基层的大事记，对文革的记载越详。如阳春永宁的大事记，就有这样的记载，“1967年1月，各单位成立群众组织，夺公社党委和管理委员会大权，形成‘旗派’和‘司派’，双方针锋相对，进行大辩论。7月，出现无政府主义乱打乱杀现象，被杀害的：那漓大队5人，铁垌大队3人，沙坪大队2人，湖垌大队5人，新江大队1人，信蓬大队1人，新沙大队1人，庙龙大队1人，棠梨大队1人，沙田大队3人，造和大队2人，林湾大队1人，坡楼大队1人，那陈大队2人，红光大队6人，硃石大队6人，全公社共41人。”

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有如下著述值得关注：

1. 孙沛东《时尚与政治：广东民众日常着装时尚》1966—1976（人民出版社，2013）此书是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广东人在文革中的穿着打扮，为文革研究开创了新的维度。

2. 海南岛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崔开勇熟悉当地的文化史，是《定安县志》（海南，2007）、《定安红魂》（南方，2015）等书的作者。他写的《定安县文革始末》可以看作是定安县的文革简史。

3. 王珉《从广东澄海文革看文革的运动形态》，作者是辽宁行政学院的教师，此文发表在该校学报，2008年第10期。

4. 欧阳湘《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广交会的干扰与破坏——兼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问题》。作者是广州市委党史室的研究人员，此文发表在《红广角》2013年第4期。

二、学术研究

在各省区市中，广东文革的研究名列前茅。其中成就突出的研究者首推叶曙明。其代表作《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自印，2011）围绕着广东省委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详细地描述了1966—1968年广东的文革。此外，叶曙明还编著有《广州文革三年史》（1966.5—1969.4）、《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广州文革研究文章汇编》等书。

另一位独立学者是谭迦洛（笔名：阿陀），十几年来，他一直致力广东文革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考证、访谈、评论文章，如：《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文革为什么分两大派？》《关

于广州第一场大型武斗起因》《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与薛声钦合作，《记忆》148期）等。

关于广东文革的独立研究也出了不少，主要有：刘国凯的《广州红旗派的兴亡》（香港，博大，2006），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海枫，1971），王超《广州电影界的造反者：珠影东方红》（香港，中报周刊，1969）等。

三、回忆、述往

关于广东文革的回忆、传记等，广东领导中写赵紫阳的最多。赵蔚写的《赵紫阳传》（中国新闻，1989）第4章至第10章是赵紫阳在广东。武传斌《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及余汝信《赵紫阳与广东文革》（《记忆》136期）。

回忆、纪念陶铸的文字也很多，如曾志的《陶铸落难》，陶思亮回忆父亲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及赵庚《陶铸在一九六六》以及郑笑枫、舒玲写的《陶铸传》（中共党史，2008）。除了陶、赵之外，广东省委的其他领导人的相关著述，有《刘兴元传》《回忆陈郁同志》《王首道回忆录》《曾志回忆录》《杨康华回忆录》（广东人民，2001）以及广东前省委书记林若的《忆文革岁月》。

受林彪外逃的影响，有关黄永胜、丁盛等人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如黄永胜的二儿子黄正写的《军人永胜——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前传》（香港，新世纪，2011）的第九章中，写到了广东的文革。《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2009）的第11—13章，写到了广东文革。还有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的文集《非常真相》上下（香港，知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此书选录了作者生前撰写的有关文革中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回忆、评论等文章，其中有多篇与广东文革有关的文字。还有作者撰写的《黄永胜传》。此文的文化大革命前部分原载于《开国上将》下（中国社会科学，1999）文革中的部分被删掉。此书将被删掉的部分补齐发表。该传的后九节叙述了黄永胜在文革中的活动。

出自民间的回忆、传记主要有：王希哲《希哲自传：走向黑暗》，叶曙明《迟泽厚谈广州文革》，刘铁扣《文革回忆》（1—10），蓝天沛《文革开始时惠州情况》，陈宝德、李学超《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范最之《我的经历：疯狂的岁月》，

以及黄东汉关于广东知青逃港的系列文章(《记忆》93期、107期)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史志、大事记

在广西的官方出版物中,有几本书值得一提:《当代中国的广西》上下

(当代中国,1992),《当代广西简史》(当代中国,2003),以及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读本》(1921—2013)。这三本书都写到了文革,虽深浅详略有异,但在回避掩盖杀人吃人这一点是却是一致的。

省级之下的党史著作,如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玉林市(县级)历史》(1919—1997),《中国共产党百色历史(1921.7—2007.9)》,《中共广西地方史大事记》(2001),《中国共产党南宁地区大事记》(2012),《中共合山市党史大事记》(1995),《中共武宣县党史大事记》(1990),《中共融安县党史大事记》(1990),《中共忻城县党史大事记》(1990),《中共融水县大事记》(1993),《中共鹿寨县党史大事记》(1997)等。这些著作中的文革历史虽粗简笼统,但也多少揭示了当地的一些真实情况。

二、独立研究

在广西文革的独立性研究中,秦晖是一重镇,其长文《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记忆》162期),《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等流传甚广。此外,萧宏(笔名“小平头”)也是一位活跃的作者,其主要文章有:《解码“七二五讲话”幕后的惨烈真相》《广西融安大屠杀》《韦国清南宁屠城“四二二”全军覆没》《广西“上石农总”冤案始末》《“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始末》。

另外,余习广也有多篇文章问世,如《广西南宁武力攻打“四二二”据点事件》《广西桂林“六八夏季大战”与“红色武装割据”》《柳州武斗与“红色武装割据”》《广西梧州市据点大攻击武斗和火烧山城事件》(此文讲的是1968年4月中至5月初,广西梧州市三个群众组织进行的大型武斗,和武

斗中“造反军”派火烧山城梧州的事件。)

三、回忆、述往

广西文革的主要事件是“联指”派和“四二二”派的武斗、在军队支持下的大屠杀以及吃人。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围绕着这些专题。主要有：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1994），申晓云《文革中枪杆子里面出革委会——广西“武斗”真相》（《当代中国研究》2013年第1期），钱文军《广西武斗纪事》（1—3），文聿《广西武斗日志片段》，吴若愚《文革广西大屠杀》（此文又名《广西文革武斗》，署名“扁舟子”），晓明《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晏乐斌《广西文革纪略》（《炎黄春秋》2012年11期）。郑义《广西宾阳大屠杀》《广西吃人狂潮真相》《钦州大屠杀——广西文革抽样调查》，宋永毅《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真相》《广西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性暴力》等。

关于广西文革的主要负责人韦国清的文章也很多，如：张雄飞《韦国清广西罪行录》（1—10）、《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别有用心的〈桂林市志〉》；徐勇《“广西王”韦国清炮火夷平文革反对派》《艰难岁月里的韦国清》等。

此外，还有一些个人回忆录，如程郁《我眼中的广西文革》，章彰《回想五七中学》（1—6）（作者还有《县志应把真实留给历史——以1996年版平果县志为例》等文），秦晖《广西文革回忆系列之二：沉重的浪漫——我的红卫兵时代》等。

四、资料

与其他地区不同，中共中央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从1985年至1988年，对广西文革资料做了有组织的搜集和整理，要求三级政府机构（区、地、市县）和自治区的厅局，包括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编写文革大事记。汇集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18册。自治区还编有《广西文革大事记》（1—4）。其中《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图片档案资料》于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2014年前，这套资料被宋永毅等人编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并刻成光碟出售。2016年，美国明镜出版公司将这些资料冠以《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之名在海外出版了电子版，为研究广西文革提供了最完整最权威的文献资料。关于“处遗”

的情况可参见如下文献：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会议纪要》（1983年3月21日）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对照检查》（节录，1984。检查承认，区党委思想路线不端正，既有派性作怪，又受“左”的束缚。延误了妨碍了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和许多政策的落实。）

3. 晏乐斌《广西文化大革命运动》（作者是公安部退休干部，此书是2015年的自印）。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广西文革情况，共七章。前四章以《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为题，发表在2012年第11期的《炎黄春秋》上，发表时有删节。后三章发表在《记忆》第209期上。第二部分是广西文革大事记。这个大事记摘自于广西文革大事记年表编写小组编的《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1990年7月，广西人民）。

4. 岑国荣等《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此文认为《广西文革大事记》《文革档案资料》《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等资料，是站在派性立场上的胡编乱造的，这些材料是“处遗”负责人韦纯束控制了广西大权期间的产物。此文由广西423名干部签名，第一名作者岑国荣是中共中央原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组书记，广西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文章写于2014年11月8日）

四 川

一、史志、大事记

与其他省一样，四川的党研室和方志办也推出了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本省的地方史、大事记和组织史。如《中共四川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10）、《当代四川简史》（当代中国，1997）等出版物。地县市也有这类成果问世。但是，在“宜粗不宜细”的编写思想的指导下，这类出版物对文革时期的记载、叙述都极其粗简。

以《成都市志》为例，此志时限从1840年至1989年，设1部总志和80部专志。无论总志还是专志，对文革都尽量一笔带过。如《政党志》“民盟一章”的“组织建设”一节，在谈到文革时期时只有一句话：“民盟成都市委员会被迫停止活动，

组织工作完全陷于瘫痪。”（页 347）《宗教志》佛教章“寺院兴废”一节，则有这样的文字：“1966 年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市佛教寺庙除文殊院、宝光寺外，其余不是被强占便是被毁坏。”（页 83）。《文学志》当代篇“诗歌”一章的开头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诗歌创作出现空白。”在这类志书中，对研究四川文革有重大价值的，是地方志中的“大事记”。

如《成都市志·大事记》（方志，2010）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采用编年体呈现的“大事记”；文革部分在第 324 页—406 页。每年下面先设“概述”，将成都当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事做一介绍；后面以月为单位，对当月发生的大事做较详的记述。第二部分是用纪事本末体编写的“大事专题”。文革部分的专题主要有：红卫兵“破四旧”，大、中学生大串联，“826 事件”，1113 大会的召开，“三支两军”，“二月镇反”，“打李总站”的成立与解散，杜灵事件，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成都市革委会成立，成都市级机关“五七干校”始末等。

二、学术研究

在粗简、平面、同质的官史面前，四川民间在文革的研究和写作上，表现出的活力、多元和精深，成为各省民间写作的翘楚，而这一成就的取得，与《昨天》的主编何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何蜀退休前是重庆党史刊物《红岩春秋》的副主编，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其代表作《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香港三联，2010 年）详细地记述和剖析了重庆武斗的原因、过程和结局，揭示了毛泽东、武斗和造反派三者间的关系。此书既是第一部研究文革武斗的专著，也是第一部重庆文革群众运动简史。

另外，何蜀还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简述中共在文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重庆市为例》《文化大革命中首次大规模武斗“一二·四”事件》《红卫兵绑架李井泉事件始末》《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等。同时，何蜀还是重庆文革口述的组织者和整理者、录制者和编撰者。从 2011 年至 2013 年，他主持的《重庆文革亲历者口述历史》项目，采访了 147 人。近

年来，经他手整理出版，或作序的文革回忆录已达五部之多。而他主编的网刊《昨天》也推出了4期“四川文革专辑”（16、30、38和92期）。

在独立研究者中，还有两人值得一提，一是自贡市的退休干部、作家王锐。作为文革小报的收藏家，他熟悉四川文革史料，他撰写的四十多万字的

《文革小报研究》虽然无法问世，但他写的四川文革的文章，如《自贡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始末》《自贡文革大事记》《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等。时见《昨天》《记忆》等网刊。

三、回忆、述往

文革结束后，关于四川文革的回忆、传记等公开出版物很有一些。除了《李井泉传》《张国华传》《远去的背影——李大章纪念文集》《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等关于四川领导的书籍之外，还有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镞——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2011）中刊载的三篇关于四川文革的文章：《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成都二月风云》和《重庆一月采访简记》。

当初被迫害的干部、作家也多有回忆之作。重要的如：

1. 邓自力《坎坷人生》（四川文艺，2000）作者是邓小平的弟弟，文革前任泸州地委书记时，因提出解散食堂，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他要求平反。此书是他的回忆录。

2.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四川人民，2005），作者是文革前李井泉制造的“反党集团”案中的成员。此书记叙了这一冤案的前因后果，讲到了造反派帮助他们上访翻案的经过。

3. 张黎群《一本未写完的书——张黎群回忆录》（上海人民，1994）作者是三八式干部，文革时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被李井泉打成“三反分子”，入狱七年。此书是他去世前二十年写的回忆，其中有相当的篇幅谈到了四川的文革。

4. 诗人、作家，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三联，1988）、雁翼的《囚徒手记》（陕西人民，1993）、沙汀的《时代冲击圈——沙汀回忆录》（北岳，1998），马识途的《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1999）等书，对四川文艺界文革有详细的记载。

民间独立写作者，推出的个人回忆性著作远超过官方，主要有：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1999）、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美国溪流，2006）、《岁月回望录红卫兵小报主编的家族追忆》（台湾，秀威资讯，2013）、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何蜀整理、注释，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1）、黄荣华《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何蜀整理，中国文化传播，2013）、李正权《青春从战火中走过》（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4）、阳增泰《写给历史的交代——原重庆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自述》（何蜀整理、注释，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4）、黄肇炎《嘉陵旧梦——一个大学生造反派的成长记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4）、罗成胜《我的造反生涯——重庆涪陵忠实兵总负责人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2015）、谢声显《所谓草民》（广西师大，2005）、《黑与白的记忆》（香港，三联，2012）、《吴宓日记（续编）》（第八、九、十册）（吴学昭整理、注释，三联，2006）、王成林《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自印，2003）、徐勃著《口舌人生》（重庆出版社，1998）等。另外，杰出的独立学者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中，对西昌地区的文革史也多有记述。

云 南

一、史志、大事记

在高度同质化的官史中，《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2004）显露出一一点个性——将云南文革的两大特色：“划线站队”和“政治边防”及其恶果（如“沙甸事件”）做了较比详细的描述。在资料性的书籍中有两本书价值较高，其一是云南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2005年5月内部出版）此书“是官方出版的最权威、同时也最为民间最关注、引用最多、争议亦最大的一本官方著作。”其二是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的《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2007年编印），“此书的特点是原始资料较多，而无评论。”¹⁹

另外，值得参考的还有《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1950—1999）》（云南人民，1999）、《中

共昆明历史大事记述》（1949.12—1978.12）（云南人民，2000）等官方出版物，这些书中对谭甫仁的极左政策及后果有较多记载。

在云南省下辖的曲靖、玉溪、昭通等8个地级市中，都有包括文革时期在内的大事记。不过，曲靖、保山的大事记是“内部资料”，而普洱和临沧虽然有多种大事记，但都不包括文革时期。

在云南省下辖的8个自治州中，西双版纳州只有文革后的大事记，德宏、大理、怒江、迪庆四个州的大事记的跨度都是五十年左右。红河、文山的大事记都是从公元前记起，跨度二千多年；只有《中共楚雄州大事记》（1966年—1976年）把文革时期单列出来。作为官方出版的另外一本比较有价值的是：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2007年编印的《历史的见证（云南大革命史料选编）》，此书的特点是原始资料较多，而无评论。

二、学术研究

在民间的独立学者中，研究云南文革最有成绩的是周孜仁。他撰写的《云南文革史稿》（上下册），以阎红彦、谭甫仁、周兴、贾启允等云南主政者为经，以政治运动为纬，从1959年写到文革结束。全书六十万字。2019年在美国华忆出版社问世。这是文革发生五十周年后，由民间历史学家撰写的第一部地方文革史。

此前，作者已有《云南文革笔记》（台湾，秀威资讯，2015）一书。此书从1969年2月分配到云南调到省委担任秘书写起，一直写到文革结束。与一般的文革史著作不同的是，此书不仅描述了昆明上层的政治，而且关注下层民众的疾苦。与一般的作者不同的是，周孜仁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与文学家的神思文采无缝对接，在写史的同时，精心营造气氛，刻画人物。故其文摇曳生姿，生动可诵。此书分四卷45节，约40万字，《记忆》主编启之以《思痛之华》一文为序，专事推荐。

“赵健民特务案”是云南文革史重要的组成部分。丁龙嘉、听雨撰写的《康生与赵健民案》（人民，1999）以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为主线，叙述了云南的两派之间从思想分歧到武斗，以及“滇西挺进纵队”等大量冤假错案的形成、发展和平反的过程。另外，丁龙嘉还有《赵健民

在20世纪50年代反“左”一文(2012年第10期《炎黄春秋》)。

三、回忆、述往

与文革有关的传记、回忆等作品,除了省一级的领导人物,如《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1987),孙雨亭《历史的选择:我的回忆》(云南人民,1996)的出版物外,还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物,主要有:

1. 刘殷农《一个幸存者的自白》(自印,2013)。刘是云南造反组织823派的二号领袖,是云南文革造反派领袖中唯一写了回忆录的人。²⁰

2. 万国祥《风雨人生》(自印,2005)作者时为昆明市委党校副校长,书中记述了昆明市文革情况。

3. 熊景明《家在云之南——忆双亲,记往事》(人民文学,2010)作者时为云南大学外语系的学生,此书的第五、六两章讲到了昆明和澄江的文革。

4. 肖健卿《难忘春城六日——阎红彦上将陨落之谜》(见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2011)作者时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1967年初派往云南,此文是他在昆明的所见所闻。另,这本书中,还收入了崔俊峰《昆明两大派的争斗与初步联合》一文。

5. 王铮《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1—21)此文发表在“王铮科学网博客”。作者时年12岁,为云南陆良县盘江小学的学生。此文是他的长篇回忆文字,记叙了1966至1971年当地的文革。

6. 马荣升《我所亲历的云大文革运动》,作者时为云南大学理科二年级学生,退休前任云南省腾冲县教育局局长。此文讲述了云南大学等院校的文革,至1970年学生毕业分配,离开云大校为止。

7. 杜占池《文革亲历记》(1—12)作者是中科院综考会农林牧研究室的科研人员,1972—1976年,作者在中科院植物所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室工作期间,曾到云南调查紫胶的生长和生产情况,文中讲到了玉溪、红河、文山等地的文革(见第四、六两节)。

8. 杨献才《麻栗坡文革点滴回忆》麻栗坡是个县的名字,此县在云南省文山州东南。作者时在县里的教师,参加了造反派,文中记述了军管前县里发生的多起乱杀人的事件。

9. 王希圣《我所经历的云南思茅文革过程》作者时为“四清”工作团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正在思茅“四清”。全文16节，从北京来的两个红卫兵讲起，一直讲到1969年思茅地区的五七干校。可以看作思茅地区的文革简史。

10. 尹家民《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作者是军旅作家。此文简述了文革中的昆明军区发生的种种恶性事件：阎红彦上将自杀，谭甫仁中将被刺，朱家璧少将跳楼，以及秦基伟中将、李成芳中将在文革中经历。

贵 州

一、史志、大事记

贵州的党研室，出了中共贵州历史一卷，中共建政后的部分（一般都放在第二卷中）至今阙如。相比之下，方志办的勇气和效率要在党研室之上，他们出了《当代贵州简史》，在《贵州通史》第五卷中，也讲到了当地的文革。还出了一本《当代贵州大事记》。不过，这些书都令人不满意，如果说，它们还有些正能量的话，那就是唤起了当地文革的亲历者，激发他们自撰当地的文革史。

在官方的出版物中，有两类书值得重视。一是《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12辑）。这套书是2003年至2008年间，贵阳市档案馆与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内部参考资料，约600万字（见贵阳档案信息网《汇编出版档案资料综述》一文），其中第10—12辑是文革十年的历史文献。二是在贵州市地县等史志部门编写的当地党史和大事记。如《中共贵阳市南明区历史大事记》（1949—1992）（内部印刷，1995）、《中共贵州省毕节地区历史》（内部印刷，2006），以及六盘水、安顺、遵义、铜仁、黔东南、黔南等地区出的历史大事记，等。这类书对当地文革有较详细的记载。如毕节一书中提到，1966年9月至1967年初，除个别单位外，毕节地委曾叫停了当地的文革。

二、学术研究

在贵州文革的独立研究者中，邓振新是第一人。他编著的《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2014）是迄今为止唯

——一本关于贵州文革的通史性著作。邓振新 1962 年作为调干生入贵州大学物理系，1967 年加入贵州的造反组织“四一一”，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市委，曾任市委批林批孔办公室调查组组长。文革后担任《贵州科技报》总编。这些经历为他编写这本书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书前的“若干要点解读”，表明了作者的基本倾向和此书的重点。书后附有简明贵州大事记（1949—1976）和贵州省历任主要领导名录（1949 至今）此书的缺点是，结构比较松散，叙述缺乏条理。

有一篇学术性文章值得一提——《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作者高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此文是作者读了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回忆“四清”的文章之后的读后感。文章考察了周林治黔的功过，刘少奇的“四清”模式（桃园经验），毛对贵州“四清”的干预，后十条的制订，刘少奇的受挫，以及在回忆文本后的“权势关系”和“人情”，文章分析了李井泉、李大章、周林、贾启允等西南高层领导人与毛、刘的关系。作者的结论之一是：“四清连文革”是贵州文革的一个特色。

三、回忆、述往

贵州当年的领导很少话说当年，贾启允、李再含、蓝亦农都没有回忆录留下来。笔者看到的只是 1973 年 9 月—1977 年 2 月接替蓝亦农，出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鲁瑞林写的自传体的回忆录《西南三十年》（人民日报，1998）。与贵州文革有关的回忆、传记、访谈，民间很多，主要有——

1. 邓振新主编《折腾岁月》（自印，2017）。此书是为纪念贵州“四一一”运动五十周年而编，作者将 65 篇回忆贵州文革的文章，按时间顺序，分别编入文革前、文革全景、文革初期、四一一运动、文革中后期、文革文艺等诸编之中。

2. 杨文化编《不灭的火炬——贵州“四一一”运动纪念文选》（中国文史，2013）。此书“除了对‘四一一’运动做了追忆式的描写外，也有历史叙述中的价值判断。”此外，杨还有《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一书，该书 1—5 是 1966 年 6 月至 1969 年 7 月的日记摘抄。第六部分是当时留下的文件和信件。

3. 《高致贤回忆录》全书共 22 节，第九节讲的是毕节县的文革。作者还有《一个文革办公室秘书的心路历程——高致

贤文革日记选辑》一书，是1966年5月16日到1976年10月6日的日记选辑。另外，作者还有《我所亲历的文革札记》《文革“烙饼政策”在大方》《我知道的郭桂发》（郭在大方县广播站工作，文革中成了铁杆保皇派）等文章。

4. 钱理群《一个中国边远地区的底层知识分子的文革记忆》（载《漂泊的家园》，贵州教育，2008）

5. 《冷卫口述》（戴为伟采写，《记忆》124、125、127期）口述者时为贵阳中学的高中学生，此文讲述了文革中的贵阳中学的造反、布依族山寨插队，以及知青组织的读书会等。

6. 山妹《苦涩的回忆》，书中的主要记述了文革十年间，作者全家从贵州万山汞矿被赶回湖南老家，全家因为漏划地主受到的种种磨难。全书十七章，第三章到第十六章是文革部分。

7. 孙陇《贵阳“红卫军”头头李铁乃，草根造反有罪》（网文“文革杂碎事”）文中附有贵州省高级法院对李铁乃等人的刑事判决书。

8. 晏乐斌《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作者时为贵州公安厅工作人员。此文讲述了“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将公安厅领导悉数打倒，长期迫害对立面“红旗兵”。追随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成为支撑李再含政权的三根支柱之一，即对贵州人民行使镇压之权的“刀把子”。

西藏自治区

一、史志、大事记

西藏的党研部门，对文革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三本大事记。一本是《西藏大事辑录：1949—1985》（内部资料，1986），另一本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问世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年至1994）（西藏人民，1995），第三本是21世纪编印的《中共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共党史，2005）。

党史系统出的书中，唯一可见文革内容的，是《中共西藏历史图志》（中央文献，2011）此书包括：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协议的八年岁月、平息叛乱与民主改革、西藏社会的伟大跨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西藏等，但以图为主，文字不多。

丹增、张向明主编《当代中国的西藏》（上下）（当代中

国，1991）写到了文革，但此书的主要内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成果以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方面。真正对西藏的文革有较系统的叙述的，是丹增主编，张向明为顾问的《当代西藏简史》（当代中国，1996）。此书的第七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西藏”简略地勾勒出了西藏文革的特色：利用派性做掩护，打着造反的旗号，以护教为目的的“尼木事件”——1969年5、6月间，拉萨市尼木县、昌都区边坝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组织“卫教军”“敢死队”，冲击县机关，杀伤数百人。（279—280页）

另外，此书还告诉我们，“五七干校”在这里变成了“惩罚干部、迫害干部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在学习班清队运动中，被推上第一线按敌我矛盾批斗的有一百多人，大量的冤假错案，给受害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81—282页）

在全区的斗批改中，西藏的教育改革和合作医疗最见异彩——本来就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区革委会却提出“县县有中学，区区有完小，队队有民小，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结果各地争相办学，盲目发展，最后落了个劳民伤财。藏区本来就是免费医疗，却一定要照搬内地的“合作医疗”。结果根本行不通，不了了之。（283—284页）

在自治区志的编写方面，西藏陆续推出了，《卫生志》《城乡建设志》《财政志》《人大志》《文物志》等。文革时期，西藏自治区下辖7个地区71个县，中共中央规定，其中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现已出版的地方方志有《日喀则地区志》《那曲地区志》《林周县志》《普兰县志》《达孜县志》《仁布县志》《申扎县志》《曲水县志》等。

二、学术研究

当代藏史研究属于“高敏”领域。就笔者所知，以中文写作的独立学者，目前只有两个人：李江琳和唯色，而专门从事西藏文革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只有藏族女作家唯色一人。

唯色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系，毕业后任拉萨《西藏文学》编辑。2003年出版散文集《西藏笔记》被查禁，因拒绝检讨，西藏自治区文联将其作离职处理，遂为自由撰稿人和独立学者。唯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

1. 《杀劫》（台北，大块文化，2006）此书是一本文革时

期拉萨地区的居委会、红卫兵批斗贵族、僧侣，打砸寺庙文物的照片集，摄影师是作者的父亲。作者对重要的照片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解说。

2.《西藏记忆》（台北，大块文化，2006）此书是《杀劫》的伴生物，作者根据文革时期的照片，访谈了七十余位生活在西藏的文革亲历者，受访者多数是藏族，也有汉、回等族。文革中，他们有的是红卫兵、造反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有的是运动的积极分子。作者从这些访谈中选出了有代表性的23篇口述，编成这部被称为迄今最完整的西藏文革口述历史的书。书后附有作者依据中国官方发行出版的书籍、报刊及相关资料整理而成《西藏文革大事记》。这些官方书刊包括：（1）《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2）《西藏大事辑录（1949—1985）》（西藏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西藏自治区党校理论研究室合编，1986）；（3）《西藏日报》（1965—1970年）。

3.《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这是一篇带有考据性的文章，发表在日本《思想》（岩波书店）“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2016年元月号。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中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此文讲述了发生在距离拉萨百多公里、的尼木县及东部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这两个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作者以这两个事件为例，试图解答的事件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或由武斗转化为“叛乱”等长期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两个疑案。

三、回忆、述往

为了纪念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任荣、张经武等前西藏自治区的领导人，官方出版了一些传记性的书文，如赵慎应写的《张国华将军在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2001），降边嘉措写的《雪山名将谭冠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热地写的《任政委与西藏各族人民心连心——深切怀念任荣同志》，以及《功在西藏风范长存——纪念王其梅同志100周年诞辰》《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等。研究西藏文革，

这些都是必要的参考文献。

此外，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七任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江村罗布、列确和向巴平措以第一人称自述的角度，留下的《见证西藏》（中国藏学，2009）一书，其中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的文章中提到了文革。

书写西藏的作者不少，林照真的《喇嘛杀人》，茨仁夏加的《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等书籍都很著名。但涉及文革的不多。马丽华是著名的专写西藏的女作家，出书多种，但是文革在她的书里极为罕见。笔者所见，真正涉及文革的，有这样几部——

1.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香港，明镜，1998）作者是著名的自由派作家和政治学、藏学研究者。他曾在十几年中，十次进藏，足迹遍及藏区，在西藏的时间累计两年。此书的第六章第四节，第八章第三四节用较多的篇幅谈到了西藏的文革：人民公社运动，藏族上层的厄运，进藏的红卫兵、寺庙的破坏者，等等。表现了作者对西藏问题的深刻的观察和独到的理解。

2. 降边嘉措《毛泽东与达赖班禅》（出版情况不详）作者是研究《格萨尔王》的专家。曾是达赖班禅的翻译。书中提到文革时，工作组发动群众批斗青海前副省长，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喜饶嘉措。群众不肯去批斗，工作组就强迫僧人去斗他。结果两三天里，先后有六名僧人自杀。

3. 王小彬《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60年》（人民，2009），此书的第4章写的是西藏的文革。包括“文革在西藏的发动过程”“文革前期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文革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三节。

4. 李爱华《西藏日记》，作者1966年11月进藏，1981年调回郑州，在西藏工作十五年。历任西藏军区生产部山南农场支边青年连班长，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事，书中写到了西藏的文革。

5.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北京，中国藏学，1990）作者是西方人，观点与中共官方接近。书中提到了红卫兵造反，砸寺庙等情事。

陕 西

一、史志、大事记

陕西省志编有 1949 到 2009 的大事记。但极其粗疏简陋，如对斗批改中的三个全国性的清洗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都一笔带过。只有在《中共西安历史》第二卷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运动的具体“成果”——抓了多少“现反”，关押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自杀了多少，打死了多少，等等。

《中共陕西历史》只出到限于 1949 年以前的第一卷，建政后的第二卷未见问世。在陕西下辖的十个市里面，咸阳、宝鸡、铜川、延安、渭南、榆林、商洛都没有当地的党史二卷。只有安康、汉中的党史第二卷“取得了阶段成果”，令人安慰的，是出了上下两本《中共西安历史》其中的文革内容还算比较丰实。还有一本《中共渭南历史日志》（1919—2012）（中共党史，2013）也有一些文革的东西。

在官方史志之中，与文革的关系最直接的，是方志之中的纪略或大事记一类的书——

1. 《安康地区文化大革命纪略》（《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2004，第 1643—1659 页）

2. 《宝鸡地区文革纪略》（《宝鸡市志》附录，三秦，1998，第 2405—2413 页）

3. 《黄龙县文化大革命纪略》（《黄龙县志》陕西人民，1995，页 674—683）

4. 《华县文化大革命志》（内部版 1985）

5. 《太白县文化大革命叙略》这是《太白县志》中的一章。

6. 《丹凤县文化大革命及拨乱反正》这是《丹凤县志》的一部分。

7. 《中共留坝县委文革时期大事记》（1966.5—1976.10）内部资料。

8. 《陕西省军区 1966 年至 1979 年大事记》，此大事记是《陕西省军区大事记（1949—1990）》中的一部分，来自军区档案馆。

9. 《陕西省公安大事记（1949 年 2 月—2000 年 12 月）》。

10. 《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65—1977）此大事记是

西安交大的校史(1896—2000)》中的一部分,出自该校档案馆。标题写的截止期是1977年,实际上止于1974年。网上另有《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966—1968),也是取自上述校史,与这个大事记是同一版本。另外,还有霍有光编著《交通大学(西安)年谱(1950~1978)》(中国青年,2014)作者是该校档案馆馆长。以及李大河《西安交通大学无线53班在校大事记》等。

二、学术研究

研究陕西文革的学者,似乎只有白磊一人。白磊的外公白瑞生文革前是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被打成胡耀邦的黑线人物,在西安七十三号关押多年。为了弄清这段历史,白磊搜集史料,采访当事人,撰写各类史学文章,虽困难重重,无名无利,仍矢志不移。

多年来,尽管发表空间狭小逼仄,其研究成果,渐为学界所知。其主要著述有:《从夺权到军管——1967—1968年陕西省武斗述略》(21世纪网络版52期)、《白瑞生与“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炎黄春秋》2014年10期)、《西安“七十三号”纪事》(《炎黄春秋》2015年第7期)、《文革时期陕西各地区造反组织派别》以及董胜利口述,白磊记录整理的《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白磊记录整理的《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等。

三、回忆、述往

在陕西的省级领导中,在任时间短,而纪念文字多的是胡耀邦。虽然胡在陕西省任职是在文革前一年(1964.11~1965.10),但也足以使他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制造者。因此,有不少陕西省的厅局级干部成为这条黑线的“黑干将”而遭到关押和批斗。由唐非等五人写的《胡耀邦传》的第一卷写到了胡在陕西的经历。胡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2005)重点在胡的晚年。写胡耀邦又与陕西文革有关的,是林牧写的《胡耀邦的超前改革》一书(网书)。全书共十章,第九章“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写的是陕西省把胡耀邦等三位领导打成“三家村”的往事。

西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林写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

（当代中国，2001）谈到了他在西安七十三号被关押时的情况。

1973年5月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霍士廉没有回忆录，也没人给他写传。但有一篇来自民间的回忆性文字《霍士廉进京》

（1—12），此文记述了1967年7月下旬，几位西北的大学生，冒险历难，将霍士廉保护到了北京，交给周恩来派来的人的经过。李瑞山1970—1978年间担任陕西省委第一把手。在任期间，推行极左政策，而《李瑞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1999）却是一片颂赞之声。1969年因支左而兼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的胡炜少将写了回忆录，下册《征程纪事续集——胡炜将军回忆录》（大众，2005）讲到了陕西省的文革。文革中任延安地区财办主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许飞青有《风雨人生路》（敦煌文艺，2000年）一书，书中讲述了他在文革中的际遇。

民间的回忆录，主要有——

1.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香港，明报，2004），作者因思想反动被陕西师大中文系被开除学籍，又因企图翻译《日瓦戈医生》被劳教三年，释放后在农村劳动。1979年平反后再入陕西师大读书，1994年移居美国，书中写到了陕西城乡的文革。

2. 白羚《小城文革乱象录》（银河，2011），作者是陕西户县的知识分子。此书是他写的《溺水湾湾》三部曲的第二部。小城指的是户县。全书23万字，可以看作《户县文革史》。

3. 沙苑子《陕西省林业学校文化大革命》（1—7）作者是陕西省林业学校的学生，因“恶攻”罪，被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劳改。此文是作者在文革期间耳闻目睹的事实逐段记录下来，以供当今和后来人研究文革之用。文中全用了真名实姓。另外，他还写有《“刘总师”暴乱集团冤案纪实》等文。

4. 李百灵《文革旧事录》（网书），作者是户县工商局干部，著有《农情忠言录》等著作。此书中包括《户县“‘卫国防义军’反革命集团”假案》《乡村哲人杨伟名夫妻自杀始末》《文革初期户县“捍卫军”始末》等文章。

5. 容琳《我所亲历的“三支两军”》作者是21军61师183团三营九连的一名新入伍的战士，参加了西北国棉四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6. 《总字212的文革大事简略回顾与反思反省——我所了解的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作者署名“四队学员”，总字212，指的就是西安装甲

兵工程学院。此文是这个学院的文革史。

7. 王友琴《王冷之死》（王冷是西安市八中的语文教师，文革初，被她原来所在的西安市 37 中的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此文后面附有白磊给王友琴的信，及《关于西安“王冷事件”的部分原始资料》）。王友琴还有《陕西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党晴梵被打死事件》《文革中被枪决的农民诗人》（陕西西户县，青年农民诗人韩佑民被冤杀）等文。

此外还有，付 denghua《西安交大文革往事》，石江《高墙外的“渣滓洞”——安康文革派性集中营纪实》，杜钧福《文革初期的中小学教师集训——以陕西省为例》等。

甘 肃

一、史志、大事记

甘肃没有《当代甘肃简史》，或许《甘肃通史》的第 8 卷（当代卷）

（1949 年—1980）可以取而代之。此卷用了一章三小节的篇幅，讲述了甘肃的文革。《甘肃省志》的第一卷《概述》（甘肃人民，1989）的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时期”也讲到了文革。

甘肃有 12 个地级市，两个州，86 个县。这些市县都有本地的志书。但这些志书的，有的不提文革，比如《永昌县志》，而《乌江镇志》仅在“政事纪略”中提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2 卷的《甘肃省志》第一卷《概述》的第六章第三节是“十年内乱中的甘肃”，只用了五页就交代了文革十年。第二卷《大事记》内容相对多一些。文革的内容散落在《共产党志》《政权志》《公安志》《民政志》等分册中。

与概述卷比起来，《中共甘肃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17）的文革部分要细得多。尤其是 1966 至 1969 年这一阶段。其细表现在对运动的发展过程有较具体的叙述，对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讲得比较清楚完整。比如为迎合北京，省委如何从文艺界入手，批电影《红河激浪》，批的过程中发表了哪些文章，迫害了哪些人，等等，书中都有相当具体的描写。²¹

在一些县区的党史中，或可看到文革的内容，如《中共合水历史》第二卷（1949—1978）（甘肃人民，2015）、《中共

兰州市七里河区历史》（甘肃人民，2012）、《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历史》（甘肃人民，2013）、《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党史大事记》等。

要了解甘肃的文革情况，最直接的是党史系统出的大事记。如《中共甘肃大事记》（1919.5—1999.12）（中央文献，2002）、《中共兰州历史大事记要》（1925—2000）（甘肃人民，2001）、《中共榆中历史大事记》（甘肃文化，

2011）、《中共白银市白银区历史大事记》（1921—2014）（中共党史，2015）。

二、回忆、传记、述往

文革中，在甘肃任职的省级领导，有两个人写有回忆录：《宋平回忆录》（江苏人民，2001）和洗恒汉的回忆录《风雨八十载》。洗是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时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的回忆录比宋平的细节多，套话少。此书的第二部“十年文革”用了六章记叙了甘肃的文革，讲了作者亲历或参与处理的一些重大事件。其他的省领导也出了两种传记，其一是关于原国民党起义将军，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的，共两种：《邓宝珊与陕甘宁》《邓宝珊将军传奇》（甘肃人民，2011），其二是关于省委原第一书记汪锋的，也是两种：《秦岭之子——汪锋革命传记》，以及《汪锋传》（中共党史，2011）此书第20至22章，讲到了文革。

民间的回忆之作，主要有——

1. 萧默《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2010）。作者1963年到1978年间在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书中记述了文革中发生在敦煌研究所内外的大事小情，包括，敦煌佛教石窟如何逃脱红卫兵的“破四旧”，敦煌所的两派斗争，以及所长常书鸿和时为右派的高尔泰等人的故事。

2. 高尔泰《寻找家园》（十月文艺，2011）。作者是著名作家和画家，文革时以右派身份寄身敦煌研究所。书分三卷，后两卷写到了文革时的兰州和敦煌。

3. 杜钧福《文革初期的李贵子事件》，此文讲述了甘肃初期，省委与造反学生李贵子在兰州的活动，李贵子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兰州大学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文革初，在甘肃省委的支持下，在兰州大学制造了70天的红色恐怖，

迫害了数百名师生。另见，吕言夫《文革初期兰州大学的五十多天白色恐怖》

4.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我的回忆录》（上海古籍，1999）。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摘帽右派”。

5. 赵旭《文革中被枪毙的甘肃县委副书记杜映华》，此文叙述了原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因同情兰州大学下放的右派师生，帮助他们创办《星火》刊物，而卷入“右派反革命案”中，先被判刑，后被枪杀的事。作者还有《血写的历史——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等文。

青 海

一、史志、大事记

在中共地方史书中，青海有1949年以后的组织史，没有党史。值得庆幸的是，有两部不同下限的《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一个是从1932至1990年，是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1990年的内部出版物。另一个是从1932到2010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在青海的一市（西宁）六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玉树藏族自治州）之中，中共党史系统出了三种四本大事记，一是《中共西宁历史大事记》（1929—2007）、《中共西宁历史百件大事》《中共海北州藏族自治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0）（中共海北州委党史研究室，1999）、《中国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历史大事记》（1949.08~1999.12）（中共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2001年）。此外，还有化隆回族自治县党史办出的《化隆党史大事记》（1949—2009）。

青海方志方面的成果比省党史办多得多。81卷本的《青海省志》包括综合志、特色志、专业志。其中直接关系到文革的，是《青海省志·大事记》（青海人民，2001）。此外，《西宁市志》（陕西人民，1998）、《玉树藏族自治州志》（三秦出版社，2005）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志》（民族出版社，2001）之中，也都有《大事记》。此外，还有《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事记》（1954~2014）（青海人民，2015）、《海南藏族自治州大事记》（从史前至2013）（青海人民，2015）。

如果想知道官方对青海文革的看法，陈云峰主编的《当代青海简史》（当代中国，1996）应该是最简易方便的选择。研究青海文革的民间学者，对这本官史的观点不是会认同的。尤其是它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叙述和对刘贤权的评价。2014年，民族出版社出过一本张生寅，杜常顺写的《青海历史》，此书的最后一章提到了中共的建政。全书以五十年代平叛结尾。

二、学术研究

全面研究青海文革历史的民间学者，唯孙言诚一人而已。孙先生是复旦大学六十年代初的史学研究生，九十年代从齐鲁书社社长任上退休之后，即投入文革，二十多年来，积累了大量资料，著有多篇专业文章。2016年4月出席德国科隆大学“文革地方史国际研讨会”。他对青海文革有独到的研究，2009年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青海二·二三事件》一文（第10期）。

青海“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的大事件。对青海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重大影响。研究这一事件的文章很多，如：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赵淮青《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洗恒汉回忆录补正》（《华夏文摘增刊》649期，2008），以及卜伟华《也谈青海“二·二三”事件》等。

对惨死于文革中的原青海省省长王昭的评价，是学界关心的话题。尹曙生的《青海省省长王昭：从纠“左”、偏“左”到被“左”扼杀》一文对王昭及时代政治有深刻的分析。青海党史办出的上下两卷的《王昭在青海史料集》（内部出版，2008）、是研究青海文革史的重要书目。

民间文革研究刊物《昨天》出过两期“青海文革专辑”（第55期、第70期），刊出青海文革的文章15篇。

三、回忆、述往

1. 王仲方《炼狱》（群众，2004）作者1961年5月起，先后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省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中受迫害。此书是他的回忆录。

2. 史洛明《震撼灵魂的岁月：文革日记（1966—1972）》（自印，2010）。作者1966年5月随丈夫王仲方调到青海，

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编辑。文革中，因曾在罗瑞卿领导下工作而受到株连。此书是她的当年写的日记。

3. 尹曙生《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作者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他还有《金银滩之痛》（《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等文。

4. 《雷一宁专集》（《往事微痕》第23期，自印，网络发表，2009）。作者时为青海某中学的教师，“摘帽右派”。书中写到了青海文革。

5. 孟犁野《士之殇》（香港，时代文化，2012）作者时为青海省话剧团编剧，“摘帽右派”。书中写到了青海文革，包括赵永夫及“二·二三”事件。

6. 聂树人《青海地质五队的“一打三反运动”》作者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地质《东方红》的第二把手。此文写的是他在青海的经历。

7. 王菁珩《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炎黄春秋2013年7期）作者时为221厂厂长。

宁 夏

一、史志、大事记

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当代宁夏简史》（当代中国，2002）、《中共宁夏1949.9—1978.12》（宁夏人民，2008）和《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1925.8—1988.6）》（宁夏人民，1991）在记述宁夏文革史方面各有短长。《当代宁夏简史》的可取之处，在“点”，如1970年宁夏地区“一打三反”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此书有较详细的记载。《中共宁夏史》的可取之处在“面”，如《当代宁夏简史》一笔带过的“干部下放和五七干校”“批林整风”、落实干部政策等专题，《党史》记述较详。《当代宁夏简史》忽略的“革命大批判”“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备战”“整党”等内容，《中共宁夏史》都辟有专节。《中共宁夏党史大事记》的文革部分，按照官方的“三阶段”说，对宁夏文革史上的大事做了记录，但其惜墨如金，在重大事件上常常语焉不详。

宁夏下面有五个市，其中银川、石嘴山、固原三个市有包

括文革时期的大事记。五个市下面的14个县多数没有这种大事记，即使有，也极粗。相对而言，《中共彭阳县历史大事记》（1932—1997）（宁夏人民，2000）和《中共青铜峡历史大事记》（1925—2001）（宁夏人民，2002）略好一些。

有一些党研室或方志办的专业人员写的文章可视为对上述史书之粗简的丰富补充。如：芦学舜《银川红卫兵运动述略》《银川市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简述》，陆维成《文化大革命中银川市的“斗、批、改”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曲折发展的银川经济》（作者不详）等。

二、独立研究

关于宁夏文革的独立研究者很少，就笔者所见，只有武丽丽、赵鼎新撰写的《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二十一世纪》2007年6月，总第101期）一文。作者考察了1966—1968年宁夏的文革，“从毛泽东的克里斯玛权威、地方官僚和群众组织这三者的关系入手来解答”为什么毛“只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文革？文革发展形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文革必然会把中国迅速地引向灾难？”等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宁夏文革的兴衰，说明毛用群众运动来打压科层的意图败北，毛可以发动文革，运动群众，但是，他无法阻止新生的革委会和两次军管的科层化，更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例行化。洞察了克里斯玛与科层组织关系的韦伯战胜了毛。

三、回忆、述往

1967年7至8月间，宁夏三派四大群众组织之间，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武斗：石嘴山市武斗（6月19日），银川市西塔武斗（8月1日），永宁县大观桥武斗（8月8日），吴忠县城武斗（8月13日），也发生过军队开枪镇压对立派别，造成104人当场死亡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成为回忆录和纪实文学的重点，如：《冼恒汉回忆录》中谈到的“青铜峡事件”，余汝信《“青铜峡事件”述略——冼恒汉回忆录补正》，郭振伦《宁夏银川市“八一”攻打西塔事件》《宁夏平罗“八二九”武斗》，郭振伦、余习广的《宁夏吴忠“八一三”大武斗》，余习广《1967：宁夏银川八三〇“掌政桥之战”》，以及笔名摩天岭之鹰的《宁夏永宁伏击战》等。

宁夏从1968年的“反四右”，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到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制造了多起重大的冤假错案，如“赵延年反革命集团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这些冤案成为独立学者和民间撰述的重要内容，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的“一打三反”和平反冤假错案等章节中，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有专门的叙述。另外，还有《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与吴述章》等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史志、大事记

关于新疆的史志，出了不少。但是，《中共治理新疆史》（当代中国，2015）《20世纪新疆史研究》（新疆人民，2000）一类的似乎应该涉及文革时期的著作，其实并无文革的内容。中共党史系统出了《中共新疆地方史》，但是到了1966年就打住了。值得庆幸的是，由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共新疆地方史丛书”中，有很多市县的简史谈到了文革时期。如伊犁、哈密、新和、且末、托克逊县、和静、青河、墨玉、温宿、奇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等。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市县的简史，没有注明迄止时间，所以，从书封上无从判断它是否包括文革时期。如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莎车县、福海县等。

此外，在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中，还有不少大事记，对研究文革有帮助。如《中共新疆历史大事记》（新疆人民，上册1993，下册2001），《中共水磨沟区历史大事记》（1956.5—1999.12）（新疆人民，2001），《中共库车县历史大事记》（1949—1996）（新疆人民，1999）等。

方志系统，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80余卷的《新疆通志》中，有不少分志都有包括文革时期的“大事记”。比如《共产党志》记载：1969年9月2日“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整了一大批人，一些人被迫含冤而死。”1970年2月23日“自治区革委会……在‘一打三反’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株连了大批家属、子女”。1971年10月1日“由于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封锁消息，又不采取措施，致使《新疆日报》各种文字版和地、州报纸发生刊登林彪大幅照片一连数十日引用林彪语录几百处的严重政治事件。”《文化事业志》1968年9月5日“革委会成立以后，

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仍然极其严重，并未联合起来，正常工作还是无法开展，除少数艺术表演团体在军宣队主持下排练样板戏外，多数处于闲散状态。”1970年4月“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建立‘文艺大批判小组’，继续全面批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作品”。9月22日“自治区革委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样板戏学习班，推广样板戏。”

在官方的史志著作中，有几本书对了解当地的文革史有帮助：

1. 《当代新疆简史》（当代中国，2003）此书所述文革，虽然粗简，也总还能提供一个大致轮廓。

2. 陈超编著《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民族出版社，2009）此书的第二章谈到文革时期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3. 《新疆冤狱始末》（中国青年，1990），此书是针对文革中的“新疆叛徒集团案”所写。虽然主体是讲述四十年代盛世才迫害左翼人士和中共党员，但是也用了一定的篇幅讲述了由此引发的这一重大的文革冤案。同类的文字，还有《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所谓“新疆叛徒集团”的历史真相》（《中共党史资料》第25辑），张建功的《康生与“新疆叛徒集团案”》（《文史精华》（2012年第11期）等。

另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革也是新疆地区的一部分，因此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1968）、《农八师石河子十年文革大事记》（1966—1976），都是研究新疆文革所必需的参考书。同时，也有不少人写过兵团文革的往事，如劳人的《走进文革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5月—1975年），黄河清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造反派、保皇派的部分史实》等。

二、回忆、述往

新疆区一级的领导人中，赛福鼎·艾则孜是重要人物，整个文革期间，除了文革初的两年，他一直在领导岗位上。他的《赛福鼎回忆录》出过两次，这两版回忆录都仅写到中共建政，没有涉及文革的内容。中国穆斯林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沙希迪写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也至少出过两次，两个版本的回忆录中，都没有对文革的记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参谋长格尔夏回忆录《历史的回声》（兵团，

2008)的第六章分了七节专讲文革。《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2008)一书由丁盛口述,余汝信整理。此书的第十章写的是文革岁月。

文革中,长期主政新疆的龙书金(1968年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没有回忆录,也没有人给他写传记。在文革中一直作为“走资派”挨整的原新疆第一把手王恩茂留下了一本《画传》(中央文献,2013)。不过,评论他的文章很有一些。如,陈伍国《文革中的王恩茂》(《时代潮》2001年第7期),《霜重色愈浓——王恩茂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此文是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牛其益的口述。陈伍国2004年两次采写。祁若雄《批判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始末》(《百年潮》2007年第6期)等。

来自民间的回忆性的文字很多,主要有——

1. 陈平《大漠足音》(新疆大学,2005),作者又名陈新元,16岁时成为兵团农三师的一名战士。评论者说此书是新疆兵团的一本“活字典”。其中有些篇章谈到新疆的文革。如《我的记忆·1969那一年》《红海洋·青春记忆》《1970:图木舒克工宣队》等。

2. 李洪涛风雨人生话文革(新疆哈密,1—18)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二十五至三十五周岁这个人生最富理想

3. 《回疆随记》1—6,作者不详,《随记的》之五《新疆奇人——吴巨轮》,吴巨轮是新疆大学数学系学生,红二司的负责人,曾任新疆革委会委员。

4. 朱峰《天山深处》(1—12),此书原名《在阳谋的祭坛上——“天山深处一个小右派的苦难生涯”》。这是一本右派的回忆录,讲述了作者从1957年到1979年在新疆的经历。其中谈到了文革。

5. 方广钊《往事杂忆》,作者时为新疆沙湾县第一中学的高中学生,此书是作者对当年往事的回忆。包括《亲历石河子“126”事件》,《也谈文革中学生打老师》《恶攻》等篇。

6. 关于新疆的武斗,有不少文章谈到,如武光《1966年乌鲁木齐“九三”事件》、孟晋中《文革风云:见证文革第一枪》、朱培民余习广《文革第一枪: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于国红《新疆医学院“七二六”武斗》、周涛《在乌鲁木齐被

枪击记》（1968年文革中的事）高栋《文革中发生的新疆霍城“11·27”惨案》（《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以及新疆大学的学生王力德写的《武斗进化简史》等。

注释：

1 本文所说的文献，指的是文革之后产生的，与文革有关的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不包括文革时期的手稿、传单、笔记、检讨等原始记录的零次文献，也不包括文革时期的文件、报刊、讲话汇编、书刊等出版物构成的一次文献或曰原始文献。

2 1981年8月1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成立。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小组“从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各地修志工作，定期向中央和国务院反映情况，对修志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并负责拟订编修新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的规划，制定并颁布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组织交流修志工作经验。”在小组的领导下，自80年代初至1994年，“除台湾地区另计，西藏未建立修志机构外，其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先后建立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委会（或编委会办公室、总编室）具体组织实施的格局。”

3 1993年3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会，共展出已出版的各类志书、年鉴和其他地情类著作5000余种。

4 党研部门出版式的中共地方历史，通常分两卷，第一卷的下限是1949年；第二卷才包括文革。大事记也有这种情况——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部分。地方志系统出的大事记通常在通志或分志的前两卷中。网上流传的某某地区1966年至1976年的大事记，通常是摘自党研或方志的相关书籍。

5 “三无”指的是无资金（没有研究经费，没有出书补贴）、无平台（没有平面刊物发表，没有专业的会议讨论，没有地方展示成果），无出口（作品在国内无出版渠道）。“一压”指的是政府对民间文革研究的打压。

6 水陆洲是网名，其原名是王忠林，2016年3月逝世。其所著《文革简论》是一电子书。2012年修订。在网上可以找到电子文本和录音。共六编，第二编分上中下三册，上册第二章2—7节分别介绍了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六省市革委会成立前的情况。中编第四章分节介绍了新疆“石河子”事件，内蒙古“二月黑风”，湖南取缔“湘江风雷”，青海大屠杀，四川成都“二月镇反”，武汉解散“工总”，南京镇压“倒许乱军”分子，广州解散“省革联”，长春瓦解三大造反派组织，福州打击“一·二六”事件的参与者，武汉“七二〇”事件等。中册第五章3—14节，分别介绍了青海、内蒙古、天津、江西、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

吉林、江苏、浙江、革委会成立前的情况。下册第六章1—8节，第七章1—6节，分别介绍了湖南、宁夏、安徽、陕西、辽宁、四川、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革委会成立前的情况。该书诸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本节概述，将文革发动至革委会成立这一时间段上述六省市的大事记和史料（电报、信函、大报的社论、小报的消息，中央的文件，毛的批示、紧急通告等）汇集一处；第二部分是本节简论。

7 刘朝驹的《文革史话》是一章回体的通俗历史读物。总字数约700万字，7部，27卷，1390回。网上发表了1000回以上，并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山雨欲来》（上下）。

8 余习广是湖南常德澧县人，1973年的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文革后入北京大学读研，获法学硕士学位，先在中央党校任教，旋下海经商，业余以研究当代史为职志。自称“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是他主持的当代国史系列之一。此书400万字，在其博客中名为《文革真迹：“红色武装割据”录》（1—115）。

9 杜钧福的《读刘朝驹〈文革史话〉》一文，对此书有较高的评价：“和一般所见文革通俗读物不同，该书取材相当严格，一般都言之有据，所以，又可以认作是非常丰富的文革材料汇编。其所搜罗的材料空前丰富，是我所见关于文革的书籍、大事记远远不能比拟的。作者严格按时间顺序叙事，尊重了历史事实，但舍弃了可读性。作者没标明引文，当然也没给出出处，作为学术研究工具有缺陷。但作为大事记绰绰有余。”（网文）

10 卜伟华《值得注意的水陆洲现象——水陆洲〈文化大革命简论〉》网文。

11 笔者认为，如果以独立性和自由度为标准，大陆的文革研究由高而低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民间人士（体制外的，包括离退休者）的自主性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高校和社科部门的专业性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党研和史志部门的职务性研究。本文中的学术研究指的是前两个层次。本文将学术研究单列一项，是为了与第三个层次——党研和方志部门的出的史志有所区别。众所周知，大陆出版的中共地方史和地方志是要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编写的，是要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才能出版的，因此，这类著述的学术性必然要受到损害，而低于前两个层次。

12 如：《中共齐齐哈尔地方党史大事记》（上册1919年5月—1949年9月，中册1949年10月—1966年4月），内部印刷，1987；《中共大庆历史》，中共党史，2008；《中共大庆历史大事记述》，黑龙江人民，2003；《中共牡丹江市党的历史活动大事记》（1920—1986），内部印刷，1988；《中共佳木斯市党的活动大事记》（1928—1987），内部印刷，1988。

13 《四平市志》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通化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白山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辽源市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白城地区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松原市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上下卷，中华书局，1996。

14 2008年，此书曾以《阳谋下的人生》的书名，在美国劳改基金会出版。

15 即由高峰主编的《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16 此书的第一部是《崩大富》，第三部是《东皋春雨——宋祖陵发现记》。这两本书在要宝钟的博客中都可以看到，唯第二部被屏蔽。

17 高华：《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18 此信刊载于《记忆》136期（2015年7月31日），这一期还发表了李嘉树写的《安徽首座毛泽东巨型塑像建成记》。

19 这里提到的价值较高的两本书，都是周孜仁在审阅云南部分之后补充的，文中引号的部分来自2017年7月21日他给笔者的电子信件。特此说明，以示谢意。

20 周孜仁曾建议作者刘殷农修改此书，并提出具体的删增意见。刘殷农同意，但其未及着手即于2014年秋病逝。周孜仁认为，此书“虽有殊多不足，亦留下许多可贵史料”。引自2017年7月21日周孜仁给笔者的电子信。

21 此书的个别章节的编排有纰漏：第二节“全面内乱在甘肃的蔓延”共六小节，第二小节“兰州红色长征团的组建和串联”应该与第四小节“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对调。因为，前者提到的“九三革命总部”在第四小节中才成立。

文革集体屠杀述要

周孜仁

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巅峰之作，那么，集体屠杀则是文革中最野蛮、最残忍的黑暗之章。这些史料之所以得以保存，原因有三：一是1978年，中共要求各地平反“冤、假、错案”，处理“遗留问题”，官方据此开展了对文革时期各地暴力事件的调查处理，从而得以留下可信度较高的数据和个案信息。其次，不少独立学者对各地的血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最后，许多亲历者回忆，给研究者提供了现场实证。

文革期间发生的杀戮仅有统计学数据是不够的，仅凭死亡人数来定义屠杀亦极不科学和准确。文革受害者死因各种各样：不堪忍受而自杀者，批斗过程中受虐待打致死者，战场上彼此攻击而殒命者，等等，如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前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廷懋提供的数据是“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民间上访的受害人寡妇们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¹又如云南“划线站队”和“清理阶级队伍”，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省冤假错案达1.51万件，被打成‘九种人’的共有25.78万人，受批斗审查的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打死逼死1.72万人，打伤致残6.17万人。”²如此众多死者，显然不可简单归类于屠杀。

为准确选取研究样板，首先需要对“集体屠杀”的概念作出准确的界定。笔者认为“集体屠杀”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施害者目的的主观“故意”；二，受害者或根本无自卫能力、或已失去自卫能力；三，受害者数量具有“成批”性质。

所谓“故意”，是施害者行为目的指向明确而且公开³：

首先，杀人指令非秘密、或心照不宣地发出；其次，施暴目的不是简单的虐待和羞辱（因虐待羞辱过度而致人死亡的例子很多），而是直接褫夺受害者生命。所谓“根本无自卫能力或已经失去自卫能力者”，包含如下两类人员：一是政治贱民“黑五类”及其亲属，⁴二是已完全丧失了自卫和抵抗能力者，如武斗中的俘虏。所谓“成批”，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苏阳先生以人数10加以界定。这种“批次”含义模糊。10人为“批”，那么9人、8人如何归类？本文将统计数字表述改为性质表述，即：以相同政治诱因触发、政治时段相对集中的杀戮行为，且非个别原因的、分散的个案杀戮——后一种杀人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据此，本文按文革的时序，选取最有政治表征、规模最大亦最血腥的七次大屠杀为样板，从惨案发生的背景和导因、屠杀的简要情况和杀戮研究成果三个方面予以述要。这些样板分别是：

1. 1966年8、9月之交以“破四旧”为名的京畿大屠杀；
2. 1967年3月青海军队对造反群众的大屠杀；
3. 1967年夏秋川东的杀俘狂潮；
4. 1967年夏秋以道县为代表的湘南大屠杀；
5. 1968年秋江西瑞金等地的“民办枪毙”；
6. 1968年广西的南宁屠城及乡村的杀人、吃人潮；
7. 1975年秋正规军对云南沙甸回民村落的军事剿灭。

必须说明，长期以来，宋永毅、郑义、何清涟、苏阳等一大批文革学者，对文革集体杀戮的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果，宋永毅的《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苏阳的《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等著作，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本文的目的，仅仅在于通过上述案例，从文革暴力这一视角，观察并梳理阶级斗争理论对生命的戕害。

京畿大屠杀

1. 背景及导因

毛泽东发动文革，制造“天下大乱”，首先需在打破官僚体系，营造恐怖戾氛。以干部子女为主的“老红卫兵”在京城大搞“红色恐怖”。北京当局非但不制止老兵的暴行，反而为

其加油鼓劲。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8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称：“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⁵昌平、大兴两县不幸成了屠场。

2. 杀戮现场回放

8月26日，昌平、大兴两县公安部门召集公社、武装部负责人和红卫兵负责人紧急传达市局会议精神，宣读并印发“西纠”“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警察向红卫兵介绍了打击目标及当地“黑五类”情况，然后统一行动。大兴公安局还作组织计划，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络施害者。张某继而开会布置，成立指挥部，划分战斗组，分片包干。27日晚，大辛庄成立以高福兴（公社主任）和胡德福（公社团委书记）为首、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九人小组”负责指挥杀人。⁶高、胡二人召开秘密会议，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制定屠杀计划。胡德福宣布31日夜10点半统一行动。对“四类”分子“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行决定。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8月27日，大兴县黄村派出所和公社武装部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派出所指导员宣布：“‘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下午，黄村以“破四旧”之名，当即打死2人。是日晚，昌平县中越友好公社（现北京北郊农场）借口燕丹砖厂有人搞“反革命暴动”，以防暴为名打死“黑五类”分子4人，派出所前往现场支持。

28日和30日，中越友好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逐村公布杀人数字，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该社回龙观大队“行动不力”，会上挨克，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为加快速度，昌平最初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接着残杀一般“黑五类”分子。短短数日，昌平全县24个公社有14个公社开戒，共杀人327。

从8月27日至9月6日，中越公社屠杀144人。黑山寨公社位于十三陵北麓，唯恐落后，跟进行动更为疯狂，8月

29日晚在大队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同日，辛庄大队杀9人。打杀风蔓延至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至9月4日止，全公社共杀人67，其中未成年孩子18人。大兴和昌平竞相比赛杀人。8月30日，大兴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负责提审，随提随审，随审随杀，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北臧公社杀人行动始于27日，新立村杀53，马村杀34，六合庄杀11，杀人总数计98。

罪恶行动组织最好、杀人最多者，是为设有“九人小组”的大辛庄。全公社39大队起杀戒，黎明、中心、新生、宏升4大队同时行动。九人小组组长高福兴亲临屠场督杀，批评宏升大队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大队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110人。

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⁷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才38天。杀“四类”分子175，子女137，其他12。涉及171户，22户杀绝。

北京市委秘书长马力于9月1日发布广播讲话，市、县派出工作组制止杀人。翌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集体屠杀之风渐得遏制。

3. 研究与文献

官方档案馆对京畿屠杀资料一直对外封锁，甚至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等，亦无任何资料存留，首善之区观瞻所系，即使“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显然均不能公开。⁸京畿大屠杀的发现和研究，一直只在民间进行。

20年后，高皋、严家其合著的第一本文革通史《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在“抄家的狂风”一节，作者对大兴屠杀做了首次披露。2001年美国《民主中国》3—4期发表遇罗克的胞弟遇罗文撰写的《大兴屠杀调查》。此前，由者永平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远方出版社，1998）一书，收入张连和的文章《五进马村劝停杀》，记录亲眼所见现场惨景。宋永

毅2002年发表于《当代中国》第三期的《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以大兴、道县的大屠杀为例，从社会学角度解析这些罪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加以引领。

青海“二·二三”大屠杀

1. 背景及导因

1966年10月，毛泽东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摧毁了各地官僚及保守势力。翌年1月毛号召“全国全面夺权”，各级行政职能瘫痪。毛泽东派出军队“支左”，建立预想的“文革新秩序”。

事实与毛的预设相反，作为秩序的代表，军人难以分清左右。对“社会成分复杂”，不安于现状的造反派，特别是夺权后分裂出来的激进造反派往往心存反感，一旦“支左”，他们大多向尚未垮台（或垮后东山再起）的保皇派、向因夺权权力分配不均而业已分裂的“稳健”造反派选边站。⁹如是，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被迅速推向巅峰；第二，军队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他们对“左派”的认定充满了情绪性和不确定性¹⁰；第三，文革前“全国学习解放军”，将军队誉之为“钢铁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政治地位被抬至空前高度，宠坏了的军人一旦介入乱局，无异驱虎入城郭，群众稍有不逊甚至冒犯，军人必会施以铁腕，坚决镇压。¹¹

1967年1月13日，以“8·18红卫兵”为代表的青海造反派响应毛泽东夺权号召，接管《青海日报》，两派纷争被推向高潮。10天后，军队奉命“支左”，省军区内部矛盾亦随之引爆。司令员刘贤权召开党委会决定支持“8·18”，副司令赵永夫等坚决反对，军区机关干部组织“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推赵永夫为“顾问”并软禁刘贤权，继之批斗、毒打、抄家。¹²刘贤权起草给中央的电报遭拒发，不得不让夫人安绍杰将电报稿用纱布缠腿上赶赴兰州军区拍发（未遂）。赵永夫控制了青海军政大权，站台保守派，对手无寸铁的“8·18”学生枪弹相向，痛下杀手。

2. 杀戮现场回放

2月3日，赵永夫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的名义，调动青藏公路250多台战备军车，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武装游行；同月14日，赵又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遭报社职工坚决抵制，2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涌来报社声援，人数逾2000，西宁各“8·18”组织亦划分地段守卫报社。包围报社的军人封锁通向报社各主要道路，群众仍蹚过刺骨河水，给被围的报社保卫者送去寒衣热食。

双方在报社对峙九天九夜，赵永夫把控的省军区向中央军委发电，谎称“8·18”在报社“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又称“8·18”“拥有枪支、弹药”“呼反革命口号”。电报凡十余封。据说林彪接电后“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¹³21日，赵永夫再也等不得，决定武装占领《青海日报》。

23日，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反革命组织8·18，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省军区调动独立师及独立团计13个连包围报社，截断通讯联络及所有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报社地势低，机枪居高临下，架满周围楼房、高地。

11时10分，军队枪击8·18的广播站，打哑所有喇叭；14时，设于宾馆的赵永夫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发出信号弹，顷刻间枪声大作，仅十几分钟，人群便纷纷倒于血泊中。事后统计，死伤群众347人，其中死169，伤178。

当天北京即闻异讯，总参作战部致电兰州军区急询西宁发生了何事？为何军队、地方电话均打不进？副政委王文英称不知情，经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报：“西宁市‘8·18’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叶剑英元帅晚8时接到赵永夫加急电报，回电赵称“你们打得好”，“对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查清，坚决打掉。”¹⁴赵永夫加

码转告众人称：“特大喜讯，不是叶帅电话，是林副主席打来的电话……”“联合指挥部”立即通电基层传达。翌日晨，“捍卫队”群众组织纷纷上街张贴“特大喜讯”，军队同时进行大搜查、大逮捕。10157人遭监禁，其中被捕4131人，遭受捆绑、吊打、灌凉水等多种残酷刑法折磨。¹⁵

赵永夫又在屠杀现场搞了“尸体展览”¹⁶并组织参观，揭露“走资派刘贤权支持‘8·18’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刘贤权、张江霖¹⁷及其家属到现场认罪。继“二·二三”事件后，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学生，打死打伤12人。¹⁸

三月初，总政通知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被武装押解赴京。赵永夫则以“平暴英雄”身份赴会介绍“平暴”经验。

血案终未被锁住。真相通过群众来信、来访、控诉信和血书纷纷涌至北京。3月11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¹⁹

3月29日，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²⁰决定称：“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8·18’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8·18’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8·18’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最后，周恩来大声道：“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解放军上去拔掉赵永夫、张晓川、王昭²¹领章、帽徽，押出厅门，王昭在门口哀呼：“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因“二·二三事件”被捕的群众、干部立即释放，一律平反。这回轮到支持赵永夫和他支持的“捍卫派”倒霉了。赵永夫的妻子凌勤元不堪批斗，扑轨自杀。

3. 研究与文献

赵永夫对上忤逆乱纲，对下滥施屠杀，很快受到从高层到百姓的一致讨伐，其罪行以中央文件形式加以认定。因此，有关“二·二三事件”的回忆文字相对较多。如果仅仅将其视作孤立偶然事件，所得结论，充其量就是“赵屠夫”一类武装狂人何以心理变态而已。因此，最初的文革史研究，如高皋、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甚至未予提及。但将事件和整个文革相联系，“二·二三事件”的意义则重要得多。

毛泽东预想推出军队“支左”来建立文革“新秩序”，不意军队偏偏成了毛文革“基本盘”的对立面。面对老师“大闹怀仁堂”和各地对应的“二月镇反”，毛必须寻找“石头”予以反击。“二·二三事件”正好为毛提供了这块“石头”。青海屠杀成了“二月镇反”招致否定的转折点。被毛“第二次解放”的造反派以加倍的疯狂和仇恨，在全国各地掀起“揪赵”浪潮，继而揭开了1967年夏反“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²²

“二·二三事件”的后续效应，是军地矛盾、两派矛盾和军内矛盾迅速激化。7月20日“武汉事件”爆发，军人公然带群众揪斗钦差大臣王力，几乎危及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武装乱象让毛不得不重新考虑策略的进退、张弛与转圜。从这个角度讲，“二·二三事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标志性课题。文革后，军委文件虽未公开否定当年的结论，却暗中释放赵永夫，贬斥8·18造反派甚至颂扬军队镇压。某些纪实文学作品，更编造离奇情节将“赵永夫将军”（实为大校）描写成平暴英雄，刘贤权则被降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二·二三事件”和某些人心中的文革一样，重新变得迷离无解：仅此一端，就说明该课题研究的重要性。

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的回忆录《冼恒汉回忆录——风雨八十载》虽未能获国内出版，但自印本和电子版广为披露，书中第四章“需要说清的一些问题”将“赵永夫事件”作为专节记述，是为可信史料；刘贤权夫人安绍杰作为事件的重要见证人，2012年完成的两万字回忆文稿《亲历青海“二·二三”事件》，亦为研究“二·二三事件”的重要资料，按她的说法，为了“写好这份回忆，全面真实地再现当时的历史”，她从

2005年起曾先后5次到兰州军区、青海省军区查阅资料、寻找证人。文革研究史家孙言诚所撰《“二月镇反”与青海“二·二三”事件》，²³从史实重现和理论解析两个方面，进行了精到的文字表述。网刊《昨天》“青海二·二三专辑”，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时任青海日报社编辑编辑孙正荃撰写的《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青海省话剧团编剧孟犁野撰写的回忆录《士之殇》二书。²⁴此外，陈平的《三十天的恐惧》记录“两个孩子经历的青海‘二·二三’”事件等文字，亦悉数编入该专辑，为研究青海事件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还需一提的是，该专辑还编入了“二·二三事件”施害者赵永夫女儿赵斌对乃父的回忆，以及赵永夫同时被捕的，关于王昭狱中生活的文字，从另一角度为研究提供了参考。

川东杀俘狂潮

1. 背景及导因

1967年初的“二月镇反”，将大批造反派投入监狱。等到三、四月之交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身陷囹圄的造反派顿然解放，“第二次解救”使其思想更激进，情绪更反叛，对毛更死忠。这些造反派与对立派（造反派中未受镇反牢灾的温和派，或镇反中东山再起的保守派）之间的仇恨迅速升级，武斗迅速进至热兵器时代。四川造反最早的重庆，武斗最先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内战。虐待杀俘风随之而起，继而触发了1967年7、8月川东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杀戮。

四川是西南最重要的省份。1967年5月中央先后召开会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分别于7日和16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俗称“红五条”）。俩“红条”非但未化解矛盾，反而让派斗陡然升级。重庆造反资格最老，影响力和实力都十分强大的815派，对势单力薄的“反到底”本不看在眼里，如今北京偏让双方平起平坐，815派大为不满；“反到底”则认为自己在二月镇反中深受狱灾，理为“坚定左派”，抗争之力度和拼命之勇武愈高一筹。重庆兵工厂云集，除了飞机，从半自动步枪到高射炮、坦克到军舰，各色武器悉数登场。

专区县的普遍情况则是，“红十条”让两派力量发生了逆

转和重组。涪陵的造反派“忠实兵”（全称：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和万县造反派“主力军”，都在“二月镇反”中被抓捕取缔。“红十条”下达，当地军分区奉命转向，曾被取缔的“忠实兵”“主力军”劫后重生，急剧膨胀。尤其特别的是，成都军区6月17日正式发文《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俗称“涪陵五条”）》将“红卫派”正式判定为“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接着，成都军区还根据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²⁵对万县、涪陵、泸州等“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过了考验的（革命派）加以武装”，²⁶武斗之火如暴添烈油。在权力当局和军队名正言顺的支持下，造反派反败为胜，围追驱杀。保守派（或准保守派）一直发誓以生命和鲜血捍卫毛泽东，没承想一朝被弃，政治上的绝望将对造反派之敌意推向极致。大规模的杀俘狂潮就这样发生了。报复性屠杀同时殃及“四类分子”和无辜平民。

2. 杀戮现场回放

1967年夏，万州“红色派”被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宣布为“保守组织”；“支左”军队奉命向造反派“赤旗”和“主力军”发枪，1967年8月14日赤旗派、主力军向万州城区的红色派发起总攻，红色派腹背受敌，从钟鼓楼渡口溃逃长江南岸。撤退前，红色派武装人员还冲进看守所，将枪口伸进牢门6寸见方的风门逐间扫射。²⁷击毙在押人员33名。主力军入城后先在钟鼓楼前的垃圾堆找到5具尸体，后又在罐头厂外河滩发现23具尸体。

红色派退守江南，很快落入赤旗派包围之中，突围无望，遂对南岸各乡镇农村“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大开杀戒。许多“五类分子”被全家杀光。万县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当时整理的资料记载，至9月下旬，万县的新田、白羊、白土、走马、跃进、上游、五桥等7区23个公社的红色派，对“地富反坏右”和“翻天派”（指“造反派”），先后杀害301人，关押600多人。

涪陵杀人时间和诱因和万州一致，只因距重庆更近而规模更大。1967年6月17日，成都军区发布《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俗称“涪陵五条”），涪陵两大派：“忠实派”（“二月镇反”受镇压后得平反）和“贸派”（“二月

镇反”受益)矛盾陡趋白热,武斗逐日升级。忠实派得军队支持,实力大增,再得重庆“反到底舰队”望江101炮舰支持,遂于1967年8月14日实施大反攻,一举将“贸派”逐出城区。政治和军事同时失利使“贸派”变得格外疯狂,杀俘、杀政治贱民成为发泄仇恨、表达自己政治正确的最佳方式。

资料记载:从1967年8月19日到9月24日止,贸派先后在涪陵共组织了七次集体屠杀:第一次杀10人,第二次杀12人,第三次杀2人,第四次杀13人,第五次杀了33人,第六次杀10人,第七次杀9人。8月27日贸派攻占丰都后枪毙3人,退守栗子山后杀9人,再加上败军在清溪区杀的281人,一个月内杀人总计382。

“三镇压”指示传达至贸派控制的农村基层,杀人则由基层报清单至“红贸”保卫科,清单报由头头批准后立即执行,一次杀掉33人。

3. 研究与文献

由于川东屠杀多为政治、军事失利一方所为,掌权一方都以国家机器的名义(如支左办公室、革委会等)对凶手进行了清查,官方审理资料相对完备。民间文革研究对史事披露则是三十多年后的事。墨蛾在2007年发表于“子归原创文学网”的长篇纪实作品《艰难的历程》第124至126章对涪陵血案进行了最早披露。当年涪陵红卫兵“忠实派”总负责人、并在“新生红色政权”担任地革委常委的罗成胜,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官方档案于2015年完成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我的造反生涯》,其中对涪陵大屠杀做了详尽揭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万州学者谢声显著《黑与白的记忆》于2012年由香港出版,对万县屠杀有真实的描述。唐龙潜写下《长埋心中的块垒——沉重岁月的剪影》一文,成为解文革暴行最直接的见证。

湘南大屠杀

1. 背景及导因

湖南以道县肇端,祸延邵阳、常宁、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地的集体屠杀,于1967年夏秋与川东杀俘同时发生。屠杀政治背景及诱因亦与川东相若。

差异仅在于川东屠杀的受害者主要为政治失败者抓获的俘虏，湘南的受害者，几乎全为农村的政治“贱民”。仅道县一地，8月13日到10月17日，66天共杀4519人，117户绝户。

道县屠杀亦肇因于“二月镇反”。1967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就湖南“湘江风雷”下属组织“红旗军”冲击军区一事批示：“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2月4日，全军文革办再次传达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军队遂将“湘江风雷”的近万名头目抓捕入狱。

接着中央又号召反击“二月逆流”。5月12日，湖南省军区据广州军区指示，宣布“认真做好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对于在押人犯……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湘派”东山再起，很快控制了省城长沙。相反，湖南造反最早、和“湘派”原属“同一条战壕”的学生组织“高司”，²⁸因得省军区支持，未被“镇反”，由此分道扬镳，继而武力相向。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刊载江青“文攻武卫”口号，湖南内战爆发。

8月10日，由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发（67）244号）》称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关于“湘江风雷”问题所发“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新决定宣判了“高司”的政治死刑。“8·10决定”迅速传遍三湘四水。湘派弹冠相庆，高司则如鸟禽散，被逐出长沙。眼见得被保守势力视为“牛鬼蛇神”的造反派在长沙大获全胜，专（区）县建制派力量唯恐当地造反势力坐大，担心“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于是将屠刀挥向政治贱民。

掌控印把子和枪杆子的区、公社及武装部等建制力量是共产党在农村的基本盘，他们对造反派充满鄙视；农村的“黑五类”自共产党接管大陆政权，他们及亲属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待遇等一切方面都饱受欺凌，从心理上渴望改变现状，对于造反派多暗表赞同（虽然不敢有任何行动）。建制派从政治上将他们和造反派硬扭在一起，从而确认对其残杀的合

法性便顺理成章。

道县有两个对立派性组织，一为“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俗称“红老保”）成员多为既得利益者和“组织”依靠对象；另一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俗称“革匪”），主要成员为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知识层次较高，成分较复杂，有的还遭遇过政治迫害，在县城势力较大。“8·10决定”下达，该派高音喇叭日夜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文革周年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拥有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支持的红联派哪肯认输？屠刀在握，要表现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英雄感，最简单的手段就是血腥地褫夺乡村弱者的生命。

2. 杀戮现场回放

道县红联派大开杀戒的理由是：地富反坏右以及21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他们认为杀人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在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道县四马桥区杨家公社开干部会，前进大队支书感叹：“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主持会议的公社秘书、区“红联”副司令蒋文明立即要大家翻开“红宝书”学习“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蒋道：“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有了毛泽东发话，杀人有依据了。还有一“次高”理由：“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²⁹他宣布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公开煽动暴民仇恨替代本够脆弱的法律。

还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壮杀人胆气。8月11日，全县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县武装部长刘世斌专门煽动，说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

道县杀人由现成体制有组织进行，通过传达、总结、以点

带面推广，大大提高了杀戮效率。事情一开始，熊炳恩就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布置：“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寿雁公社随即召开大队干部会，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朱勉，当晚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将朱拖上山乱棒打死。朱成为道县屠杀祭旗者——两天后的15日，即发生钟佩英母子三人被杀案；再次日，公社秘书蒋文明赞赏说“行动快，有魄力！”8月17日举行各大队负责人会议，蒋再次赞扬郑家大队贫下中农革命行动，各大队于是你追我赶，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共杀31人。

表彰与总结是煽动集体罪恶的成功经验。从13日杀朱勉始，杀人狂潮很快全县蔓延，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7人，接着成立100人的杀人团，分赴各公社大队，组织更大规模扑杀。从8月13日到8月底，据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1000多人。屠杀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轮奸后杀害。上面提到的区武装部长关有志杀红了眼，亲派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数十人乱棒打死“四类分子”唐玉，以此为号，久佳、新塘2公社5个大队同时行动，4天内杀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40多人。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对杀人进度大极为不满，斥责“你们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基层干部为求自保，只好回去补杀。蚣坝区成为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杀人1054人，由是，屠杀如浊流下滩，无法遏止。

8月22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封锁道路渡口，严查行人。是夜召开宣判大会，由民兵杨飞吉手执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王盛光又致电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指示小甲公社和蚣坝公社，每大队选一、两个“四类分子”宰杀。杀人指令下达二公社，所有大队雷厉风行，至月底，小甲公社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人，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依旧认为行动不力，对该大队负责人进行指责。公社召开总结表彰会，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成一团，中间塞上开山炸药，将12人全体炸死。

道县杀人事件共杀4519人。³⁰因道县杀人恶流蔓延，零陵

全区共有 7696 人被杀，其中“四类分子”3576 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 人；未成年人 826 人，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 10 天。与杀人事件直接牵连者 14000 多。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和 47 军派副参谋长刘兆丰率部队于 8 月 29 日赶回道县，经一个月余工作，杀人方才得停歇。

3. 研究与文献

道县大屠杀尚未结束，便有阎维胜 8 人冒生命危险寻访道县乡村 100 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特别是劫后余生的孤儿寡母叙述亲人遭杀经过，写出 300 多页的道县屠杀大事记，记录 6 千多真名实姓死难者的全部材料，用多种方式向上级汇报，控诉杀人魔头熊丙恩等人罪行。长宁县亦有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为首，组成 13 人反屠杀代表团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引得中南海震动。这些人虽然后来都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迫害。

文革结束后，道县屠杀被揭露，湖南作家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 1967 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贡献至伟。1986 年，《芙蓉》杂志编辑部将道县屠杀作为“拨乱反正”典型列为报告文学选题，编辑谭合成得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采访，其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甚至在押行凶者。其后二十余年不弃不舍，几赴道县，补充调查，2007 年终得 50 万字大书出版。该书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有各方面数据的翔实统计和分析，案例近 400 个，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这些都让该书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价值。

披露于互联网的文稿：湘子的《道县大屠杀》，何莲清《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 1968 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邵阳大屠杀》，萧一湘《常宁大屠杀》，白水的博客《两个老“湘江风雷”队员难忘的回忆》³¹ 从不同方面，对湘南血腥史给予了补充和丰富。2005 年，张介山编著、伪托“湖南出版社”之名自印的《非常岁月——邵阳县文化革命回忆录》，成为专题记录邵阳县杀人惨祸的第一本书。

瑞金大屠杀

1. 背景及导因

江西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1月5日，在全国算较早也较顺利者。1967年江西大乱，8月的抚州发生武斗，被北京定性为“武装叛乱”。福州军区副政委程世清临危受命，率26军76师和坦克团入赣止乱，程广发《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以政宣攻心，未动武力遂得以和平收缴枪支，使赣省政局恢复正常——此举大得毛泽东赏识，翌年江西成立革委会，程当了革委会主任。

程从此头脑发热，不管“抓革命”还是“促生产”，均凭邀功之愿和感情冲动行事，奇招迭出，胡作非为，一时竟有“程胆大”之称。瑞金大屠杀，正是其天性变态所为。

程世清赣省主政半年后，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省革委召开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运动（查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会议结束，各地迅速行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滥捕滥杀。运动才开展了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人。在如此恐怖气氛和政治高压之下，江西一些地方就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称为“民办枪毙”。公社、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必立案，不要证据，不必审批，滥杀无辜血流汹涌。其中最为残忍的，是著名红色故都：瑞金县（杀300多），兴国县（杀270多）和于都县（杀500多）。

2. 杀戮现场回放

瑞金杀人潮自1968年9月22日肇端。是日，军代表赵树林主持召开全县“三查”动员大会。赵乃广东潮汕人，前一年回家探亲看到家乡大杀反革命，深感瑞金差距太大，乃对公社干部煽情：“我是一个外地人，随时可以离开瑞金，但你们都是本地人，倘若我们不把潜伏的阶级敌人给揪出来，到时猖狂的敌人跳出来夺取我们的政权，你们会有什么下场？毛主席告诉我们，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就坚决消灭掉。同志们，你们应该怎么办！”与会的律阳公社革委会主任王立荣听得热血沸腾，响亮应声道：“杀！”

次日上午，律阳公社旋即举行公开宣判并执行死刑大会，

从社办综合厂、各大队中挑出一批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开斩，以对各大队作现场动员。当天各大队便开始了大捕杀。三天之内，全县共杀人222人，其中律阳公社几乎占了一半（107人）。

受害者数量最多为“五类分子”及其亲属，约占9成；其次是农村传统手艺人，剃头匠³²、风水先生一类所谓“四旧”边缘人；还有的成分虽好，但偶发牢骚者，亦遭杀戮。

受瑞金“民办枪毙”凶潮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两县，也各杀了以“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270余人和500余人。

杀人至24晚县革委会召开公社干部会宣布制止。只是一旦杀红了眼，屠杀战车很难停下，不少大队得到通知，依旧谎报人已杀掉，继而又杀三天，至28日方才消停。

3. 研究与文献

瑞金大屠杀最为可信的研究资料，当数军代表汝其发表在《天涯》杂志1999年第1期的《支左日记》，日记里最重要的1968年9月25日、9月26日和10月22日等几则，因作者的军代表身份和日记实时性，使之具有了极大的可信度。

旅美学者姚蜀平对文革屠杀研究赋予了极大关注。所著《文革中的“民办枪毙”》³³一经在网上披露，即受到广泛关注。发布在华夏知青网（www.hxzq.net）的“老例博客”作者称，受姚蜀平文章的启发，利用2013年清明和2014年11月中旬旬休假回乡期间，走村串巷，采访了40余位健在的亲历者，写出了20000字的《1968年瑞金“民办枪毙”大屠杀调查》，从“受害者名单”“杀人风暴的起因”“对大屠杀的思考”等八个方面记录了这场屠杀。特别对其中搜集到的84名冤死者姓名、受害时的年龄、以何名义处死等基本情况，逐一记录。

关于瑞金屠杀，也散见于公开刊物和网上的文章，如《随笔》2009年第2期作者胡平的《程世清在江西》，悲悯情怀的博客《“民办枪毙”》³⁴等。

广西屠杀与吃人

1. 背景及导因

为了尽快结束自己一手制造的内乱，1968年4月，毛发话，说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

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事情由此变得简单：只需将其中一派宣布为“国民党”，灭掉就算了结。1968年5月17日，韦国清炮制“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上报中共，坐实了“422派”的反革命性质。造反派由此成了正规军队的一碟“下饭菜”。

广西革委会成立前1个月，7月27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正式宣布造反运动的终结。此前7月17日，造反派的一次全国串联会被斥之为“北航黑会”，再以前，以援越物质被抢而引出的“七·三布告”。广西造反派“422”终于势成孤军，7月25日周恩来等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称“422”为“国民党”“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等等。“422”死期将至。

韦国清本系广西区委书记，文革又当上区革委会主任。以韦为首的广西各级官僚集团及政权机器，包括军队和武装民兵完好如初。所谓群众组织“联指”，不过政权正统维护者招牌换记而已。如今有北京表态支持，又有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要对不听话的造反派、对“五类分子”和无辜群众大开杀戒。

2. 杀戮现场回放

广西大屠杀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波高潮。上半年各专（区）县成立革委会，“刮12级台风”是为第一波；下半年以“七·三”布告的颁发为由是为第二波。

前一年11月中央批准成立自治区革筹组，韦国清任组长，正式确立了其广西“正确路线”代表地位，拥韦派“联指”开始在军队支持下对“422”大开杀戒，以杀人推动基层“新生红色政权”建立。

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集中优势武力攻打“422”州佩据点，抓获13人全部枪杀；25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抓促”领导、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主持人、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提出为迎接县革委成立，要实行“群众专政”，对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要心慈手软，17天全县杀239人；3月16日，天等县成立革委会，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保卫新生红色政权，至27日全县杀人630人（仅18日一天杀人31起，遇害102人）；祥元乡两起事件共杀46人，9家绝户、16户男丁杀尽，死者之妻女被轮奸后强嫁凶手。3月19日，崇左县筹备县革委会共杀94人；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高度赞赏，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

钦州地区杀人自灵山县始。2月11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以灵城镇杀3人暴尸以鼓动杀人，新圩公社代表连夜赶回杀5人再重返会议；16日，“联指”攻打融安县铜鼓桥，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杀15人；至3月18日，全地区共杀2000左右，其中灵山占1000多；上思县人武部长段振邦以民兵“枪换肩”为由收缴“422”派民兵枪支装备“联指”，然后宣布“422”为反动组织，谎报枯那大队有土匪3、40人“伏击我民兵”，从而实行武装进剿，杀群众、干部973人，革委会成立后，段振邦又以县革委会名义张贴布告称：“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在全县“清匪”，抓1671人，杀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无辜平民61人，是为“枯那事件”。

3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围剿“422”，杀110人，支持“422”观点的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8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3月26日至5月22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领导覃锡明等，用枪、棍、锄头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人12。双目失明的老妇，未满10月的婴儿均未能幸免，13户男性全杀光。行凶后洗劫受害人财物。

4月上旬，著名长寿之乡巴马，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组织民兵及“联指”围剿“422”，在羌圩公社下乙屯杀害30户56人。

4月13日，贵县庆祝革委会成立，“联指”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对“422”派实施武力镇压，10天捕人数百，一个月内全部枪杀；各公社亦成立“‘保红’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杀人38，斗死90余人；14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听取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精神后即杀24人；16日再杀52人；至5月6日，共杀56户92人（15户绝户），大队治保主任黄芝珍等杀人主谋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设卡哨搜身4151元，收生产队上缴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旱田大队革委主任制定奖励政策：3民兵负责杀1人，奖励3元，自15日起三晚共杀人22，其中五户杀绝；4月21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在县革委主任常玉善主持下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90余人，杀

12。其后屠杀不辍，至六月共杀人 177。

4 月 23 日，玉林地革委召开会议布置反右倾、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 10156 人，其中大部分死于“杀人台风”中。陆川县再掀杀人新高潮，全县 11 公社 155 大队，有 154 个大队布置杀人，4 月 26 日至 29 日，共杀 1229 人。其余各县“联指”乱杀“422”群众及“五类分子”惨祸深重，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不得不于 5 月 3 日发电做“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

6 月 19 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在“积代会”³⁵上做总结报告，煽动积极分子们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继续回乡杀人，决不能心慈手软。会后屠杀全面展开。王德堂利用军队支左，强奸被杀者遗孀及受批斗的女学生 6 人，被封为“支左”好干部。

第二波杀人潮以南宁屠城为嗜血表征。

造反派势力在南宁及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明显占优，成为韦国清必须拔掉的“钉子”。5 月底至 6 月上旬，柳州“造反大军”对抗“联指”配合“军队”的进攻吃亏，遂抢劫军列的“援越物资”，犯了“国际主义”大忌，引来“七·三”布告和中央 7·25 讲话，事情逆转，韦国清先是大造舆论，从 7 月 11 日至 8 月 3 日，《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鼓动镇压“阶级敌人”，实为煽动屠杀“422”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司令员宋治平等制定作战计划及配置兵力配合“联指”近万武装人员，再调武鸣、横县、邕宁、马山等九县及南宁市郊区“联指”合力进剿。

进攻于 7 月 21 日开始，由广西革委会负责人、职业军官亲临指挥，首先对“422”据点实施炮击，“422”所控制的居民街区顿时一片火海。“422”头目熊一军带领失去战斗能力者由据点废墟撤出，与居民一起举手请降。熊一军跪倒 6972 部队赵营长面前，说“422”已死伤无数，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苦求停止炮击。

5 日下午广西“联指”和南宁“联指”开会祝捷，晚宴吃喝，宴后即开始虐待杀俘。参与中央工作组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如此记载：7 月 31 日猛攻开始，当天攻下展览馆，8 月 8 日全部攻下，围剿、屠杀群众造成万

余人死亡的严重事件。许多人虽未参加武斗，亦遭非法审讯、殴打、关押，有的被枪杀、毒打致残致死。侥幸逃脱的“422”成员及家属共 3000 多人（一说 7000），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联指一时无法攻入。正是南方暴雨季，进攻方趁机开闸西津水电站，一夜间南宁城全部淹没，数日后大水退却，防空洞冲出腐臭尸体无数。

1968 年 8 月 26 日，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会盛况空前。韦国清讲话中再称：要肃清“反共救国团”及“国民党残渣余孽”。会后，全广西再掀乱斗乱杀新高潮。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数字是，全区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 89700 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 3700 人，逼死 7000 人，其余 79000 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

南宁地区 14 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 8 个，宾阳县就死了 3777 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也就是说，89700 人当中，有 79000 多人是有组织的集体屠杀的，占死亡人数的 88%。这还没有考虑失踪和无名无姓的死者 5 万人。自治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杨志庆向中央调查组反映，商业部门发布票，1969 年比 1967 年少了 13 万人，区直属机关一些比较负责同志说死亡 20 万人。也有人说全区死亡四五十万人。中央调查组认为死人最少在十万以上。³⁶ 就按十万人计算，就有 8 万人是被集体屠杀的。

必须专列一段介绍：广西屠杀最为骇人听闻的是相当规模的人吃人兽行。广西文革“处遗”问题的内部报告³⁷披露，吃人风潮所及，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受害者牵涉 24 个县市，吃人最多的是武宣县。据 1981 年广西区党委办公厅向中央调查组汇报，武宣县被分尸吃肉、吃心肝的有 38 人。《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 年记载：从 6 月 15 日至 8 月底，武宣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 75 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女民兵班长黄文留，不仅吃过人肝，还亲自割下五个男性生殖器泡酒喝。武宣县国家干部、职工有 113 人吃过人肉、人心和人肝。

更为狂野的是，这些吃人恶魔，在韦国清治下还大受提携。黄文留当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柳州钢铁厂和柳州第二化工厂将“422”成员身上绑上炸药，按接电钮将人炸得血肉横飞，此毒刑发明者之一、柳州钢铁厂的岑国荣被提为广西总工会主

席、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委、十届中委、十一届候补中委。几年后“处遗”，数万名和杀人有关的罪犯只枪决了10人。仅有的10名死刑犯，有3名是因强奸杀人罪被起诉。

3. 研究与文献

由于韦国清一直主政广西，死捂盖子，以致“四人帮”粉碎后相当长时段，广西都宣称该省在文革中自始至终执行“以韦国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未涉林彪、“四人帮”路线。中央意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运动在广西一直无法开展。直到韦国清被调离，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共开明派于1981和1983年两次派出中央调查组，由李锐、周一锋等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领导挂帅，在广西本地组织了十万干部参与调处广西文革的“遗留问题”（简称“处遗”）。自1983到1988年间从基层公社到省市级开展调查、核实，发现广西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位列全国之首，有大约8.6万至15万之多；³⁸广西全区还发生过吃人风潮。调查五年，关于广西文革“处遗”问题的内部报告系列《广西“文革”档案数据》共十八册、七百万字；此外，广西整党办公室的档案1987年编印了《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年》、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所著《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亦于1989年5月成书，³⁹这些，不仅为研究广西大屠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说明1980年代，官方和民间对文革灾难进行反思的共识。1980年代末那场“风波”让中国政治走向一夜左转，《广西文革大事年表》于1990年7月出版不久，便因存在“重大政治问题”被下令收回销毁。

但民间研究并未因权力封杀而步伐停歇。郑义于1986、1988年先后两次到广西调查吃人事件，于在1993年出版了《红色纪念碑》一书。宋永毅2016年5月由国史出版社（美国）出版了36卷本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央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的《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供许多大屠杀的准确资料。

1962年生于柳州并见证了1968年的柳州武斗的萧宏先生，所撰《广西文革解码——“七·二五”讲话幕后真相》，以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对广西大屠杀做了精到和深入的分析研究。随着网络普及，广西大屠杀已经成了一个热门内容，如吴

若愚《机密文件记录的广西文革大屠杀》，张雄飞《酷吏韦国清文革二三事》等，都是宝贵的信史。

云南沙甸屠杀

1. 背景及导因

按照本文开头认定的第二要素：集体杀戮中“受害者为根本无自卫能力或已经失去自卫能力者”，将正规军对沙甸村民的武力屠杀列入探讨样板似不太准确，因为：沙甸受害村民遭遇屠杀时尚具有一定自卫能力。但是，作者以为，对于文革研究，“沙甸事件”具有三个极具表征意义的价值：首先，沙甸农民虽然确实有一些抢来的步枪和自制土武器，而对方是配置了榴弹炮、火焰喷射器等现代化武器的正规部队。两相对比，沙甸村民的自卫能力实可忽略不计。其次，这次杀戮是文革（含文革前）造成的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导致的武装冲突的典型。最后，“沙甸事件”是所谓“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后长期动荡最后的脓血破顶之点，它用两千多条性命的代价击碎了文革“新秩序”的脆弱和虚假。沙甸是云南红河州蒙自县鸡街公社下属的一生产大队，回族聚居，有1500余户，7000余人，素以文化教育发达著称。1930年代，9名中国穆斯林青年赴埃及留学，沙甸便占5席，留学生之一的马坚，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东方语系教授，马先生翻译的汉语版《古兰经》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

如此伊斯兰文化渊源之地，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自然成了当局重点打击的“顽固堡垒”。1965年农村“四清”，沙甸被红河州委圈定为“运动试点单位”，三所清真寺被全部关闭，礼拜活动全部停止。文革接踵而至，全国造反，政治高压陡然缓释，沙甸回民亦成立组织造反，名曰：“捍卫民族政策造反兵团”，主旨为批判走资派“破坏共产党民族政策”，重开清真寺进行礼拜，并正式加入云南两大派之一的“炮派”。

不幸的是，1968年成立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炮派”被指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而惨遭整肃。沙甸村成了红河州“炮派”聚集的“蚂蜂窝”。当局派出一个加强营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军人进村便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

是反对共产党领导”⁴⁰ 凡企图继续礼拜、把斋者，一经发现，立即被批斗，游街，捆绑吊打、酷刑折磨。小小沙甸村，揪出了“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赵氏小爬虫”⁴¹ 200多人，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⁴² 罪名，侮辱折磨的办法包括在受辱者脖子上挂猪头，强迫舌舔……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型批斗会，60位回民被挂黑牌游斗，后集体押至厕所旁，迫其学猪叫用嘴拱厕墙，戏之为“猪拱长城”；还有强迫50多位回民作猪滚状，从10多米高坡上横身下滚，致使一位已怀身孕的妇女滚后即流产。沙甸140多户地富及其子女家庭则派其他民族民兵进行查抄，其中40多户强迫迁至苗、彝村寨“包夹改造”。“解放军宣传队”直接驻扎清真寺，在寺里吃猪肉，把猪骨头丢清真寺水井……

穆斯林是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体，民族感情遭遇如此巨大伤害必生巨大反弹。从1968年8月省革委会成立到1975年，反抗始终未曾停歇。全国政局本不平静。林彪事件后，边疆开始“落实民族政策”，再次给回民抗争提供了借口，接着“批林批孔”，饱受压抑的云南“炮派”卷入抗争，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复调共振，对云南政局冲击幅度更大。滇省本多民族聚居之地，滇南及滇西几乎所有回族聚居区起而相应，武斗先后发生且愈演愈烈。

1975年初，中央不得不直接插手——沙甸村10名代表和云南省委所有大员一起被召集京城。事经半年的撮捏依旧无法摆平，6月20日，云南省委正式报告中央，说沙甸问题“政治解决已无可能”，提出军事解决请示。中央批准：由军委直接下令“打土围子”。

2. 杀戮现场回放

7月29日凌晨开始调动部队，对沙甸实施军事包围，以后对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附近回族群众聚居村亦实行军事包围，整个军事行动历时21天，至8月18日结束。其中以沙甸战事最为惨烈，历时7天8夜，于8月4日结束。现将沙甸回民“三巨头”之一马绍美的回忆直接摘要于后：

1975年7月29日凌晨3点：“四人帮”开始对沙甸回民武装镇庄。村边站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脚捆起来，丢到粪池中溺死。大清真寺的守卫者殉难。

大清真寺被占领。

凌晨4点多，沙甸回民凭据地形熟，进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价，……没抵抗的回回们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枪杀于床上……有的指望逃生，愿当俘虏，押送途中被枪击于光天化日之下。

30日，武装人员缩小包围圈，在无线电报话员指挥下，对老沙甸村子进行更猛烈轰击。……31日，2000余老弱妇幼、伤、残、病的回民群众在笔者带领下集队出村求存，马上被分往几个小集中营，笔者等头头银铛入狱。

8月3日，……开始残酷“清剿”，伤残的“回匪俘虏”被提着脚手，像丢死羊一样丢上汽车；运去“医治”，有的干脆现场补枪。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民举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走到大田埂上，几挺机枪一齐开火……现有五名幸存者，其中三名是补枪未死的。……入夜进行最后“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根据准确统计，死人约886，伤、残600余，进剿者的死伤人数不详，被毁民房4400多间，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

3. 研究与文献

文革结束后，云南政局大翻盘，掌权的“八派”被整肃，轮到“炮派”坐庄。沙甸杀戮本身是在“炮派”反抗压迫背景下发生，平反事很快被提上日程。1979年2月15日，经过中央批准省委和昆明军区联合发文，对“沙甸事件”平反。官方撰史，理所当然对此事作为“冤案”加以记载，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5年编写的《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中共个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个旧市党史大事记》（2009年8月版）都按“宜粗不宜细”原则作明晰有限的表述。

必须一提的，1989年官方审定版《沙甸回族资料》，其中关于沙甸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数据（包括当事人马绍美等对于沙甸杀戮的回忆文字）较为丰富，颇具史料价值。

民间的记录文本，则从1990年代开始，陆续通过书面和网络形式推出，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更多细节。马萍撰《沙甸村屠杀纪实》发表于1990年1期《探索》（美）杂志，算是

最早的民间资料。其后先后推出的有事件亲历者、云南省委“沙甸工作组”成员周康的《骇人听闻的“沙甸事件”》⁴³、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省委沙甸工作组副组长李长猛之子马黑的《父亲往事》、事件策划者之一、云南“炮派”领袖方向东的书面回忆，⁴⁴其他如署名“126团的现场参战者”“朱长超”等人的回忆文稿则散见于不同网站的个人博客。应当说，对于此事，各方认识无大分歧。

注释：

1 引自晓妍凤平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guopingfengyi>，最近登录时间：2018年6月10日。

2 云南省委党史办编：《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188页。

3 笔者当时所在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派因战场失利，于8月22日夜间为报复而秘密杀俘。策划者事后订立了保密的攻守同盟。

4 “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有的农村没有“右派分子”，故又提“黑四类”；后也有加上资本家和反动学术权威，扩大为“黑七类”，还有加上民国时期的军官（连以上）、警察、宪兵、特务、土匪等，扩充为“黑21类”者。

5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页110，香港，潮流出版社，1989。

6 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出身地富，不但未纳入“九人小组”，反被关押，险遭杀害。

7 一说325人，见百度百科和京皖《大兴大屠杀》。此处从《天地翻覆》第七章的数据。

8 遇罗文《北京大兴文革屠杀调查》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47.html>，最近登录时间：2018年6月19日。

9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曾拿出来传阅。《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第256页。

10 这种联系包括：军队（尤其地方军区）在某地驻扎时间一久，多与当地人结婚生子，建立了亲属网络；战友退伍或转业当地，都将其与地方社会构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

11 如四川的“二月镇反”，湖南对“湘江风雷”的全面镇压等。

12 安绍杰主编：《刘贤权将军》，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第 331 页。

13 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青海省军区共发电报十余份。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第 91 页。

14 《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967 年 2 月 23 日条目下，记载了叶剑英称赞赵永夫之事。

15 安绍杰：《亲历青海“二·二三”事件》，载《昨天》第 70 期。

16 “尸体展览”一类做法为文革时期施害者欺骗群众、证明自己暴行合法性最通用的贼喊捉贼之障眼法。1968 年广西军队南宁屠城后，组织群众前往参观被军队大炮夷为废墟的百货大楼，称是被攻击者 422 派自己放火烧的，同属一类。文革中此类案例还有很多。

17 张江霖时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18 引自 1967 年 4 月 10 日下午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 年第二版，首长讲话。

19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第 584-585 页。

20 中发 [67] 110 号文。

21 王昭曾在罗瑞卿主管的公安部任副部长，1961 年调青海任第二书记兼省长。为解决大饥荒问题做了很多好事，后在四清运动中因过“左”而伤害了许多上层人物。文革伊始，王昭成为造反派打倒的对象。

22 文革结束后，在叶剑英的关照下，赵永夫获释。先是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离休，1987 年 10 月 18 日病死于北京。

23 见网刊《昨天》69 期（二月镇反专辑）

24 孟犁野的书在 2012 年由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孙著为未刊稿。

25 1967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第 256 页。

26 见 1967 年 8 月 28 日《张国华同志在四川省农业生产计划、财贸、金属材料生产供应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东方红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造反总部主办的《蓉城快报》第 1 期。转引自《昨天》2012 年 3 期。张国华时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

27 见万县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共万县市委政策研究室和万县市农村经济委员会 1996 年联合编写的《万县市历代战争和灾害》。

28 全称：湖南高等院校造反司令部。

29 引自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在清塘公社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上的讲话。见湘子《道县大屠杀》

http://www.l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485928，最近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30 还有一说：由 47 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检察院原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

31 网址：<http://blog.sina.com.cn/cbssp>，最近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32 走街串巷者接触人多，信息较广，故被认为思想危险者。

33 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57142.html>，最近登录时间：2018 年 6 月 14 日。

34 见：<http://blog.sina.com.cn/beststyle68>，最近登录时间，同上。

35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此类活动在全国风行多年，直到“九·一三”后乃止。

36 《广西落实政策调查报告附件之一：广西在文革期间大批死人问题的情况报告》1981 年 7 月 15 日。

37 即《广西文革机密档案数据》系列，电子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 2016 年 6 月出版。

38 有关广西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官方有多种说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二册，内部出版，1986，第 273 页）称 8.6 万多人。又据当年参加“处遗”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工作笔记：死者 8.97 万是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 3 万多，失踪的 2 万，共 14 万。韦国清在一次谈话中则承认有 15 万人之多。参见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页 14。

39 该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7 月出版，发行不久便因“重大政治问题”下令收回销毁。但民间已有流传。封面题图就是南宁屠城的著名地标：新华路水塔。

40 参看马绍美《“沙甸事件”概述》。沙甸回民领袖分别为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前二人死于战火。马绍美被捕，判死刑未及执行，即被落实政策释放，后任沙甸党委书记。

41 指赵键民，文革前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时被污指为“刘少奇在云南的代理人”而关押 8 年。

42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页 319。

43 《炎黄春秋》2007 年第 7 期。

44 王福生：《方向东传奇纪事》自印，2013，页 59。

中央文革要员境外出版物简述与辨析

余汝信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总参谋部。它的全盛期成员人数为十八人，其中文革结束后被官方指为负面人物的，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八人。

负面人物在大陆境内不享有政治上的言论、出版自由，因此，他们中如有人认为对文革这一段甚具争议性的历史有什么话需要公开说，有什么冤屈要公开申诉，唯有千方百计地拿到境外去说。自 1993 年至 2016 年这二十三年间，上述八人中的陈伯达（包括其子陈晓农）、王力、戚本禹三人，在境外出版有回忆录类出版物共五本。这部分出版物，披露了被官方扭曲或屏蔽的若干重要史实，对人们了解文革的内情有莫大帮助，但多少也有着一般回忆录通常存在的弊病。本文为对以上出版物的简述及对其中一些问题的辨析（另非负面人物穆欣境外出书一本，本文只作简介未做辨析）。

一、有关出版物简述

1.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大陆境外的第一部回忆录类纸本出版物。

王力文革前夕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 1960 年代中共国际“反修”斗争中，参与起草了包括“九评”在内的论战文章，为中共对外关系的主要笔杆子和实际参与者。文革序幕阶段，为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主要

成员，与陈伯达一道起草了“五一六通知”初稿。1966年5月被中共中央决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文革期间，为中共意识形态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最初整理者和阐述人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的主要提出者。1967年8月底被隔离审查。1968年1月至1982年1月被囚禁于秦城监狱，长达十四年之久。1983年8月“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并于翌年2月将其开除出党，其后虽一再向邓小平等中央高层输诚，唯始终未能正式安排工作。1996年10月21日病逝。

本书共191页，其中有涉文革部分89页，占全书47%。该部分包括《打倒王力之谜》《驳“王力是康生的人”》《“二月逆流”》《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八·七讲话》《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和我的看法》《关于陈伯达》等数篇文章，澄清了“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八七讲话”等事件实情和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责任。总的来说，王力的辩解比起他批评的聂荣臻、陈再道等人的说法，更为接近事实真相。

2. 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

穆欣文革前夕为《光明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1966年6月任总编辑）。1966年5月被中共中央决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1960年代的《光明日报》归中宣部领导，该报毛泽东爱看，尤其爱看该报定期编辑的几种学术性专刊。爱屋及乌，穆欣也因此被视为新闻界炙手可热的左派代表人物。

穆欣在中央文革小组曾负责办公室工作。1967年9月被指为“黑手”受“监护”审查，翌年1月转囚于秦城监狱，系狱长达八年，1975年5月方获释。1979年12月彻底平反，调任外文出版事业局副局长，翌年兼任人民画报社长，总编辑。2010年病逝。穆欣的回忆录契合官方口径，在大陆有出版机会。生前中共党史出版社于1994年在北京出版了其《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东方出版社2006年在北京出版了前书的扩充版《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

本书共565页，其中叙述1967年9月被“监护”后自身情形部分100页，约占全书20%弱。在本书“跋”中作者引用

了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也就表明，虽经文革十年的磨难，唯作者的思维体系仍然脱离不开官方文革史观的窠臼，书中的有关叙述，也就难以达致起码的客观性的要求。如作者曾于1966年3月12日发表过《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以批判夏衍，同年7月1日发表过《“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以批判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书中就故意回避不予提及。故此，本文不准备对本书详加讨论。

3.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陈伯达文革前夕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主要职务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并兼任多个职务：中共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66年5月，被中共中央决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中共建国后，陈伯达在党内地位不低，以1956年八大中央委员得票数计，排第11位。文革前夕在党内排名列第19位。陈为毛泽东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进者。唯文革开展后，他的毛泽东思想主要诠释者地位，已先后被王力、张春桥所取代。

陈伯达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内第五号人物，陶铸被打倒后，更上升为第四号人物。1969年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陈提出应以发展生产为要务，被否决，唯九届一中全会表面上仍继续维持其第四号人物的地位未变。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因对张春桥不满而被毛以“赞成‘天才论’”罪名停止一切职务并被关押。1973年中共十大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罪名“永远开除出党”。1980年底“两案”审理期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81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刑满正式被释放，被安排于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工作。1989年9月去世。

本书共494页，汇集了陈伯达在生命最后十年中所写的文

稿共五十七篇，其中自述部分涉及文革时期的十九篇 80 页，全为被囚期间的交代、回答审问的草稿及对“两案”起诉书有关指控的说明等。文革部分文稿占全书篇幅仅 16% 左右，唯因其为文革结束多年后首见陈的亲笔手稿，意义不同凡响，而其中《从九大到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记忆》两篇，对事情经过所述最详，尤显珍贵。

陈伯达为一典型文人而参与政治者，一旦从高位坠落而被囚禁经年，其本来气质则明白显露。有涉文革的文稿，多自责自贬之词，如 1981 年 3 月 29 日致胡耀邦等人的信称，“历史的教训是深重的。坐狱，判决，这些教育对我很好，是需要的。”“发疯时刻过了，人平静下来，归于正常，就会有忏悔，认过，认罪。……或许我的罪恶深重，不严重处分，不能平民愤，这也是可能的。”而这样的自责自贬心态是否多少会影响到所述事情经过的真确性，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4. 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王力反思录》是王力生前拟定的书名。书中全部文稿，都是王力生前亲笔写成，或是其夫人王平权根据王力口述录音，整理打印成文，再由王力校对后成稿。

本书上下两册共 1293 页。上册第一部的内容是“诗词及其背景”“要留清白在人间”；第二部的内容是“上书文选”；下册第三部内容是“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第四部分内容是“王力谈毛泽东”。涉及文革内容的“要留清白在人间”88 页，“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464 页，两者相加共 552 页，占全书篇幅 43%。

本书在中央文革小组诸成员境外出版物中最具史料价值，而书中最具史料价值者又是第三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该回忆录自 1965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发动”写起，结束于 1967 年二三月间。为弥补自 1967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王力尚在位而回忆录未能写及的缺陷，本书编者、王力的儿子王鲁军，将王力应访问者的提问所讲述的文革初期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之“文革第一年”（已于 1995 年在大陆境内《传记文学》公开发表过），作为该回忆录的第三部分。

王鲁军在本书出版后记中称，“父亲生前多次嘱咐，第三部要等他死后才能公布：因为第三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

是父亲以忠于历史原貌为原则，客观如实地记录了文革初期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对一些重要事件决策的内幕及过程；包括伟人们在气头上说过的过头话，‘做出过的错误判断和决策的最原始的资料’。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把原稿第二部的第二部分‘文革第一年’放到第三部‘未完成的文革回忆录’之后，为的是形成一部按时间顺序写下来的‘完整的文革回忆录’。另要说明的是，‘要留清白在人间’和‘上书文选’中的小部分内容曾由牛津大学出版过。书名是《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实》；‘文革第一年’曾在《传记文学》杂志上发表过。”

5.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本书共 445 页，其中文革部分 167 页，占全书篇幅 38%。

本书作者没有署陈伯达的名字，而仅署为“陈晓农编纂”，出版人看来是经过考虑的。

陈伯达自 1981 年 8 月获准保外就医至 1989 年 9 月去世整整八年间，写有文艺评论类、哲学类、经济类学术文章二十多篇，却从未就中共历史问题尤其是文革时期问题写过只言片语。陈晓农承认，“有许多重要的历史情况，父亲只在口头谈话——主要在私人谈话中涉及过，而并未写出过书面材料。”

对于本书“编纂”经过，陈晓农称，“从 1981 年 11 月至 1989 年 9 月，父亲与我朝夕相伴，彼此几乎无话不谈，我也有意识地对父亲的谈话做了简要的笔记。在父亲遗稿的出版事务结束以后，我即参照过去的笔记，对父亲的谈话情况重新进行了仔细的回忆，着手将谈话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依时间顺序，逐事记录下来，并尽可能搜集了一些相关的历史作为佐证。因是抱病写作，工作时断时续，前后历时四载，方才编缀成书。”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本书有关父子对话的陈伯达口述部分，当日并没有交予陈伯达本人过目认可。如按照口述史的规范要求，口述者的签名认可是一个必需的步骤。

如非有此步骤，读者很有可能怀疑：有关谈话的真实程度如何？有关谈话的场景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编纂者有无可能根据陈伯达在囚期间文稿再自行创制了一个对话场景？编纂者有无可能对谈话内容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加工？

如非有此步骤，我们认为本书虽未署陈伯达著但所有内容

被冠以“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之名，却也并非合适的。

6.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

戚本禹 1950 年代即为毛泽东秘书班子成员。1963 年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在史学界引起震动及争论，毛泽东褒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1964 年夏在陈伯达力邀下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得毛同意但令其今后随传随到，仍可随时出入中南海。毛自 1965 年底多次点名表扬戚：“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

戚本禹文革序幕阶段为文革文件起草小组成员。1966 年 5 月被中共中央决定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同月调回中办，同年夏天挂名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1968 年 1 月被宣布“请假检讨”后长期囚禁于秦城监狱，1980 年“两案”审理期间被捕。1983 年 11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1986 年出狱后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从事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1991 年退休长居上海。2016 年 4 月 20 日病逝。

本书上下两册共 778 页，分为五个部分。其中上册为第一部分“我的青少年时代”，第二部分“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共 340 页，占全书篇幅 44%；下册为第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第四部分“我的秦城岁月”及第五部分“继续革命”，共 434 页，占全书篇幅 56%。

戚本禹在本书“献词”中称，“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0 周年。”“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在 10 月 6 日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阴谋发动的‘苦迭打’（意为‘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由法文的‘*coup d’Etat*’音译而来——本书编者）中，遭到非法拘捕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志，以及数以千万的因此而遭受株连的所谓‘三种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属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的牺牲者。”从中应可得知戚写作本书的旨趣所在。

二、对有关出版物的辨析

1. 王力：政治失败者的自我辩护词

与正统的官方流行说法相比较，作为政治失败者自我辩护词出现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说法大多（并非全部）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本书一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二月逆流”的诱因。王力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重要的话有“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接着批评江青说：“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¹

毛泽东2月10日对陈伯达、江青的严厉批评，是几位副总理和老师们的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诱因。毛的批评给他们壮了胆，以为有机可乘。如果没有毛以上的批评，副总理和老师们何敢碰江青的一根毫毛？

（2）引发“七二〇事件”的“四点指示”。王力称：

第一，陈文说：“王力的‘四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其实，这四点根本不是王力的指示，而是中央在北京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又未传达，而是总理代表中央讲的。（我当时的记录稿及在秦城时要我作的誊清稿都交给了中纪委）²

“七二〇事件”的起爆点，是保守派散布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其实，这四点根本不是王力的指示，而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这是弄清“七二〇事件”起因的关键之处。

（3）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导火线。王力称：

我认为，外交战线上不对的做法，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就相当的严重了。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国际上全面紧张，首先同苏联发生了直接冲突，我们使馆到人家大街上去贴大字报，然后东欧、蒙古、东南亚，全面紧张。非洲从加纳开始，人家驱逐我们使馆。港澳也是，首先是澳门，红卫兵的一套在港澳搞起来，也许是自发的，但我们报上支持。老早就对英国提出抗议，一九六七年六月提出严重抗议。不断抗议后，到八月二十日采取了严重的外交行动，即向英国、香港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定四十八小时内一定要撤消对三个报刊的停刊令，要宣布无罪释放十九名新闻工作者，如果不这样做，要承担一切后果。这是直接原因。后来发生了包围英代办处、放火、抢东西，这并不都是红卫兵干的，是有坏人。也不是中央文革组织的。那时我不在现场，陈伯达、康生都到现场，用大喇叭叫他们撤退。北京有组织的红卫兵还能听，外地流窜来的人他不听。所以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事件。

后来斗争我时，吴法宪提出火烧英代办处要王力负责。周总理说：“火烧英代办处的事王力不知道，他没有责任。直接的导火线是最后通牒，这个通牒是外交部搞的，送给我看过的，我没有来得及请示主席。没想到发生严重后果。”事实上也就是这么个过程。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搞的。群众一乱，控制不住局面。陈伯达、康生的确是去了，还有别人。我被打伤了腿，没有去。高音喇叭到处喊，都不听。后来有人归罪于我，是毫无根据的。³

王力讲出了实情：火烧英国代办处直接的导火线，是外交部的限时照会（“最后通牒”）而非王力“八七讲话”。这个照会是外交部拟稿的，得到周恩来的批准。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周聪明地将责任推到王力头上。唯王力说“陈伯达、康生的确是去了”，不确。陈、康没有到过现场。

“揪军内一小撮”提法早已有之。王力称：

人们又说：一九六七年一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

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何况王力根本不知道。这问题不能叫罪状。⁴

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关锋的罪名之一。王力辩称，类似提法在毛泽东修改过的“五一六通知”中就有，而且是毛泽东本人加的，“这问题不能叫罪状。”

2. 王力某些说法也大有存疑之处

王力的东西也并非全对。如在《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一书的〈毛泽东谈邓小平兼及我对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看法和建议〉一文中，王力称：

十年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转折中，作出了伟大贡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使我想起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武汉同我单独谈话时对邓小平同志作的极高的评价。他说，他不

同意并列地提打倒刘邓的口号，接着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这一段话，我过去没有完整地引用过。现在事实又一次证实了毛主席的评价。所以我在第二代领导核心向我三代领导核心交接的时候，特别整理出来报告中央。⁵

王力上述说法存疑处有二：一为所谓与毛谈话时间，二为谈话语境。

（1）谈话时间

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毛泽东 1967 年 7 月 14 日凌晨三时乘专列离京，晚九时抵武昌，住东湖客舍。⁶毛一整天舟车劳顿，断不可能这么晚到住处后还找王力一个人单独谈话。且王力当晚正与谢富治和北航红卫兵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⁷从旁证实王力当晚也无与毛谈话的时间。7 月 15 日、16 日，毛没有召见任何人。7 月 17 日上午，毛在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7 月 18 日晚七时半，毛在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谈武汉问题。换言之，王力这两天是与众人一起到毛处开会，毛并无单独接见过王，更无与王谈什么邓小平问题。

（2）谈话语境

1967 年，刘少奇、彭德怀都是正在受到全国性批判的人物，毛绝不可能将刘与周恩来、彭与林彪相提并论。以刘少奇为例，当年 3 月 23 日，戚本禹将不点名批判刘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送毛审阅，毛批示称“看过，写得很好。”此文 3 月 30 日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报即作转载，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首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点名批判刘少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此背景之下,毛怎么还可能说什么“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还说什么“不管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掌舵”?

王力的建议写于1989年。其时,他向邓小平输诚、表忠的心情迫切,不惜为输诚而将二十三年前的基本史实抛诸脑后,可悲可叹!

3. 陈伯达:“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陈伯达在谈到1970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情形时称: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在另一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原定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林彪抢先说话,据所记忆,是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里面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及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后,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散以后,我觉得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⁸

陈伯达在这里首次披露了:(一)在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会之前,林彪曾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泽东谈话;(二)林彪对他说,他在会议上的讲话,是毛“知道”的。

(1)有关这天的会议,官方《毛泽东年谱》称,“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小会议室集合,毛泽东问周恩来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林彪说:我要讲点意见。毛泽东说:你们三人讲吧!”“周恩来介绍完后,毛泽东问请哪一位讲。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⁹

林彪系将领邱会作在回忆录里则称,“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四十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

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¹⁰

将陈伯达的说法与官方说法、邱会作说法相比较，官方和邱会作都没有说在开会前林彪曾单独与毛谈话。

（2）陈伯达为什么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的同意？陈在文中并没有交代清楚。事实上，是因为林彪在讲话中提及：“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阅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¹¹

以上讲话，被认为是针对张春桥的。林彪讲话后，在与会者中间瞬间掀起轩然大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陈伯达称，他问林彪，林的讲话是否得到毛的同意，换言之，不点名批张是否得到毛的同意？林彪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只是说，他的讲话是毛“知道”的。这里的所谓“知道”，其实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毛知道林要讲话；二是毛知道林在讲话中要不点名批张。到底林说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光凭陈伯达这段话，人们难以得到准确答案。更重要的是，陈伯达以上全部说法，都仅是一家之言，仅是孤证。俗语说，孤证不立。

要相信陈伯达所言，人们恐怕还须寻找更多的证据。

4. 陈伯达、王力、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产生经过的不同说法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产生的经过，陈伯达称：

“文革”前，周恩来（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文革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名单。”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在顾问，江青列在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总理。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¹²

实际上，是先有一个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后者，其成员之一的王力，则有这样的回忆：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写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¹³

以上是王力在1990年代初的回忆。另王力在1980年代初

还有以下回忆：“文件初稿送主席后，主席要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名单，并准备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席提陈伯达为组长，成员名单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吴冷西、王力、陈亚丁。”¹⁴

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后来大多保留在中央文革小组。有变化的是：陈亚丁换成谢镗忠，吴冷西被剔除了，又增加了各地的几个人。

至于戚本禹，则另有说法：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¹⁵

综上所述，在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前身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名单产生经过的问题上，陈伯达、王力、戚本禹三人各有说法：一、陈伯达称周恩来提出由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要陈开个小组名单，陈提了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二、王力先称毛提陈伯达为组长，名单是毛定的，后称名

单是江青定的。三、戚本禹称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提了张春桥、关锋、戚本禹、陈亚丁，陈提了尹达。提名之后名单送毛，毛提出意见后又有第二次提名补充。三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外人实难以判定真假对错。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没有说清楚文件起草小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传承关系。其实，先定下来的是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名单，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只不过是前者基础上有所调整、补充而已。

官方关于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最权威的说法，出自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大事记称，“（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抛开陈、王、戚三人说法对错不论，参考官方当时的说法，保险一点的结论应该是：文件起草小组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由多部门、多人提名，最后由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定夺批准。

5. 王力：对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经过的错误记忆

2001年《王力反思录》出版后，外界对其评价颇高。该书的信息量的确很大，比1993年出版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大得多。但信息量越大，可能的错误就免不了更多。只要细心阅读，可以发现，该书错误的信息的确还是不少。

以王力对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经过的回忆为例，王力在“文革第一年”中称：

会后中央下发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文件，当时我不知道。我是到六月二十日才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时，他们才告我其中内幕。因为江青动员我和王任重在会上批评邓小平。主席原来的意图是批评刘。林彪和江青却要批邓。江青要张春桥告诉我说：主席不同意你为文革小组成员，说你是彭真的人。陈伯达、康生请江青讲了话，说不留一个王力，

就清一色了，才留了你。我知道这个底，自己是一个“留用人员”。可是我并未接受任务，批邓时我一言未发。中央文革成立，是在上海开的会，没有通知我参加。时间大约是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陈伯达、康生、关锋、戚本禹、尹达、谢镗忠、刘志坚等都去了。尹达的名字本来排在组员的最前面，很快就被打倒了。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张春桥是江青提议当副组长的。名单是常委决定由陈伯达提名，经过批准后由常委报主席的。在五月下旬，拟定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中，原来没有姚文元。张春桥提议加一个姚文元。陈伯达问了江青。江青说，要查一查姚文元同姚蓬子的关系。张春桥当天就回答，上海查过了，姚文元同姚蓬子没有政治上关系，界限划得很清楚。报告了江青，江青问了主席，同意加姚文元。常委决定的这个名单，我原来以为主席没有批，后来知道起初只是不同意我一个人。为什么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实还是江青捣的鬼。¹⁶

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又称：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是刘、邓为首的常委、书记处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发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因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为组员，所以没正式定下来，到六月份才定下来的。原起草小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陈亚丁换成谢镗忠（总政文化部正部长），加了姚文元。这还有个过程，张春桥极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审查一下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定了姚文元为中央文革成员。名单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说王力是彭真的人。

.....

毛主席不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是当时康生，陈伯达觉得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都

不熟悉，所以要留一个王力。他们请江青向毛主席谈，说“要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张、姚、关、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周折，而且各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人也还没定，所以文革小组成立会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几天才在上海开的，当时没有通知王力出席。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才告诉我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¹⁷

王力的回忆，其实很缺乏逻辑性。如他说中央文革小组名单5月28日发出，既然已发出，为何又“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又说“到六月才定下来的”，这样名单岂不要再发一次？

王力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回忆”，竟然有人深信不疑。如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利用王力的说法再自我发挥称：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是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名单。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

1966年8月2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共14人：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¹⁸

王力、叶永烈都是错的。其实，以“中央”名义于1966年5月28日制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通知，在5月29日已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出。中央文革小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王力、姚文元）的名单，在该通知中已明确列出。该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该通知注明地方发到县级以上，军队发至团级以上。以王力是直接当事人的身份又是中央副部长的级别，按常理根本不可能到6月20日以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

6.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对陈伯达文稿的“改造”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注明是“陈晓农编纂”。经笔者比较分析，该书有部分所谓陈伯达“口述”，其实是对《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所收集的陈在狱中所写文稿的改写。这些改写，编纂者已承认是在《陈伯达遗稿》一书1998年出版之后才完成的，换言之，改写并没有得到陈伯达本人生前同意。有关改写情况，试举两例说明如下。

（1）文革小组成立的经过《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陈伯达称：

中央的《通知》确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

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当时，周总理找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总理说康生不合适，说在中央里面我的文化高，要我当。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我考虑文革小组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可先列上毛主席在起草文件时用过的人，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总理。¹⁹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中陈伯达的原文是：

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文革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在顾问，江青列在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总理。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²⁰

两相比较，陈晓农在改写时，去掉了陈伯达原文中“（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及“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重要的两段话。又加上原文中没有的“康生原来是文革五人小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总理说康生不

合适，说在中央里面我的文化高”等语句。

（2）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陈伯达称：

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

林彪讲完后，康生便要我先讲。我没有讲。康生就夹七夹八地讲了，还引用了林彪当时的一些话。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主动求见毛主席了。²¹

以上所谓陈伯达的回忆，除了“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是陈晓农所撰之外，其实是由《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中的三段文稿组合剪辑而成。第一段原文是：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在另一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原定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可是林彪抢先说话，据所记忆，是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里面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以及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后，康生便向我挑战，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会散以后，我觉得要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²²

第二段原文是：

我散会后应该直接到毛主席处，请问对林彪讲话

所疑之处，但却匆匆赶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因为在开会前，他们曾经在一起），林彪诓骗我，我愚蠢至极，竟信不疑，犯了大罪。²³

第三段原文是：

毛主席这句话，对我来说，含有一段很难过的历史。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自此以后，要见毛主席，总要先打电话向秘书（主要是徐业夫）打听，主席起床没有，有没客人……有几次打听得很不愉快，有时秘书就干脆说，“我要回家了”。于是，我感觉要见毛主席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渐渐地不单求见毛主席了。这样的事首先涉及江青，我是很不便向毛主席说清楚的。²⁴

可以看出，合成后所得的文字效果，与原文相差甚远。

陈晓农对陈伯达原文不同程度的加工、扩展或简缩（以及干脆是陈晓农自行撰写）而成的“陈伯达口述回忆”，因篇幅太大，我们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再一一查证，到底哪些是陈伯达的原稿，那些是陈晓农的“改造”。通过以上所举两例，我们已经知道，所谓“陈伯达口述回忆”，很大程度上是编纂者改写过的，只能算是陈晓农个人的作品。所谓父子对话，其实只是一个虚拟的、并非真实的场景。

7. 戚本禹：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

戚本禹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杨尚昆可谓是他的间接上级。文革前夕打倒“彭陆罗杨”，戚甚觉杨罪有应得。有关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戚本禹称：

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

……

主席在 1966 年 7 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

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

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查。²⁵

所谓杨尚昆“秘密录音”（又谓“窃听器事件”），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作出如下注释，简要地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为了准确、完整地保存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曾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了录音。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他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和同一些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195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杭州会议上，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并批评了搞录音的做法。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汪东兴所传达的毛泽东关于不准搞录音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

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利用“录音问题”，罗织罪名，对杨尚昆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株连了大批干部。198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提出：一、“杨尚昆同志在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建议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借录音问题强加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三、“1961年1至4月的录音，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因而1961年给他们的处分是不适当的，建议中央予以撤销。”四、“鉴于所谓秘密录音一案株连人员很多，影响很大，建议中央将这个复查报告批转有关单位，以消除影响。”同日，中央办公厅把这个复查报告作为《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一起报中央书记处，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于1980年10月23日印发至县、团级党委。²⁶

《戚本禹回忆录》称，“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罪证是“里面除了小录音机，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戚对杨的指控可谓耸人听闻！这是除戚之外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说法。据中办老人们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煞有介事地派人在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和中南海内各办公室、会议室普遍搜查所谓窃听设备，当然一无所获”，²⁷故此，当时中共官方、中办群众组织和其他造反派在批判杨尚昆时，亦从来没有过类似戚本禹所称在毛的“卧室和洗手间安放窃听器”的指控，文革结束后官方对杨的审查结论中更无类似说法。更不要说当时

的技术条件是否可能有“米粒状”大小的窃听器材？其无线传输的范围有多远？在那儿接收信号又不会被人发现？负责毛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知道并允许这样做吗？

杨尚昆历史上曾经布置过的对毛的会议、办公场所进行过的录音，无论对错，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工作上的需要。但如果对毛的卧室、洗手间安放窃听器，却是中共党内纪律绝不允许的刺探领袖个人私生活的敌对性阴谋活动，一旦被发现，就是弥天大罪，戚难道不明白这两者性质上的天渊之别？退一万步说，如果杨尚昆真的指使人这么做，他的目的何在？他的行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戚本禹在文中没有解释，说实话也根本解释不了。因为这是戚自己想象、捏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如何能够解释清楚？

有关杨尚昆“秘密录音”一事，王力的看法倒是比戚本禹客观得多。王力称：

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机。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²⁸

8. 戚本禹：关于严慰冰匿名信案

也许是为吸引读者眼球，《戚本禹回忆录》里有不少真假莫辨的中共高层内幕故事。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案，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此一中共当代历史上著名奇案的侦破过程，《戚本禹回忆录》称：

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

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

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

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²⁹

戚称“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唯笔者认为，此经过与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中黄峥的说法极度相似。黄峥如是说：

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

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³⁰

以上所谓破案过程，黄峥含糊其词地用了“据说”的说法，并没有透露其信息来源。戚本禹则不同，他大言不惭地声称破案过程是叶群亲口告诉他的。事情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叶群早已不在人世，戚以为死无对证，他说什么，别人也奈何不了他。

对于黄峥上述“巧合”的破案过程的说法，笔者早在十年前《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一文中已做过批评。现不厌其烦将其重录一遍如下。因为对黄峥的批评，原则上同样适用于对戚的所谓“回忆”：

1. 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绝非是黄峥所言的“巧合”。

2. 依据目前的公开资料，林彪至少自1965年下半年即在苏州休息养病。偶尔外出活动的范围，从未超出华东地区（1965年12月初到上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及1966年2月20日视察济南军区），此期间，叶群除自1965年9月部分时间到江苏太仓参加四清及11月底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一两天时间外，从未离开过林彪身边。直到1966年5月10日林彪在杭州陪同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之后，叶方随林回京（林参加刘少奇在京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个1966年春天，叶群都在华东，如何又能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现身？

3. 所谓“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即百货大楼的四楼七号房。对外用“出国人员服务部”名义，实际接待的除当时极为稀罕的个别公派出国人员外，平时主要服务对象为国家级领导人及其家属，

即所谓“四副（党、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副委员长）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假设（仅仅是假设而已！）叶群那年春天果真在此间出现过，又岂能不知进来这里的是些什么人物？何以能为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就喋喋不休失了身份？再说，七号房内免不了遍布警卫及工作人员，岂会任由两位贵客吵骂而袖手旁观不加劝止？

4.（略）

5.再退一万步说，假设两人果真吵了一架。这么一件芝麻绿豆小事，叶群也没有“仗势欺人”去中宣部告严，严怎么就非得要到总政去告叶？叶群不仅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夫人，且更是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的夫人，本人1965年已是军委办公厅党常委，相当于军一级干部，且组织关系不归总政而属总参党委管理。谅你总政“负责同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接纳严的投诉。

6.又假设总政“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接纳了严的投诉。1966年春天，林彪远在离北京两千里之外的苏州，这位“负责同志”无论怎么认真负责，唯其是否“真的”可能因为这么一件屁大的事，专程从北京跑到苏州，“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叶群当时是“林彪同志办公室主任”，见林的一切事宜都得通过她（据知情者透露，即使在四清现场，叶群也要人架设了直线电话，可随时与苏州及北京联系），这位“负责同志”要代人告叶的状去见林彪，又如何通得过事无巨细都要管的“林办主任”本人这一关？

7.据林办工作人员公开的说法，至少是自1960年代初以后，林彪自己从来不看文件，每天只是“听”不超过半小时的要事与文件摘要汇报。严慰冰的匿名信，家人及工作人员从未向林本人透露过半点风声，既然连文件都不看且又不知情，林怎么可能亲自看过匿名信，且“觉得这字面熟”？

如此说来，一言以蔽之，黄峥的“巧合”说引出的一番“破案”经过，纯属向壁虚构而已。³¹

根据文革中流传的群众组织的材料，严慰冰匿名信一案早已在1962年已经侦破，只不过对于严的处理一直拖延下来，直到1966年春中央才有所行动。1967年5月，首都红代会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等编印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案件——关于彭真、陆定一、钱信忠、黄树则策划反革命假会诊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的调查报告》称：“一九六二年，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罪行，已为公安部门掌握。公安部派人找旧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赵俊和党组成员刘敏，对严慰冰的笔迹。”³²该《调查报告》又称，“1963年12月，陆定一带严慰冰到上海，再次找薛邦祺、粟宗华会诊，并用胰岛素休克办法，做了五十次治疗。陆这次见到薛后，‘向薛很机密地透露了严慰冰攻击叶群同志的事’。随同陆定一夫妇到上海的，是陆的保健大夫耿德章，由他负责，把严治疗的情况向保健局汇报。”群众组织的材料还称，“（1966年）3月11日晚，彭真打电话给张子意，叫他和许立群到钓鱼台去。彭真拿出了严慰冰匿名信的照片给他们看，并指示安排严离开中南海。其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指名叫黄树则等到他那里，安对黄说，严慰冰是反革命，精神病是假的，并要黄给中央写一个关于为严会诊经过的报告。”“（1966年）4月28日，公安部会同中宣部将严慰冰隔离。具体经办人，是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两天后，4月30日，杨、张奉命从北京到陆定一正在逗留的安徽合肥，向其告之严案一事。

5月8日，陆定一回京，随即被软禁。”

以上材料说明，严慰冰案的真实破案过程，与戚本禹的说法大相径庭。

9. 戚本禹：毛泽东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吗？

文革中诬陷、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致死，是1980年代初“两案”审理时戚本禹被指控的三项罪名之一。为此，《戚本禹回忆录》特地有一节“关于张霖之等人被斗致死的事件”颇长的文字，罗列了张的诸多“问题”，一来以证明文革的必要性，二来以图多多少少撇清自己的责任。戚其中提及：

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³³

“张霖之就是”，并非戚本禹的发明。这句话源自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该报记者高晓岩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原文称，“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何家栋说，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毛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文接下来称：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编辑注）

刘少奇不敢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

笔者认为，“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这句话，是1998年的这篇文章才编造出来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材料证实毛泽东说过张霖之是走资派。文革期间，无论是中央、中央文革的什么人（包括戚本禹本人），有谁引用过毛泽东这句话吗？没有！群众组织编印的所有毛的讲话集中有这句话吗？没有！查遍所有中央文件，有这句话吗？更没有！

事实上，毛泽东在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确是点了国务院一位部长的名，但那不是煤炭部的张霖之，而是冶

金部的王鹤寿。高文中出现这样的错误，或许是来源于被采访对象何家栋的误记——将张霖之与王鹤寿混为一谈了。依照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公布的当日的会议记录，毛泽东如是说：

主席：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
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主席：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³⁴

高晓岩文章称，“毛点谁的名，谁就倒了”，这句话相对来说还有点靠谱。王鹤寿是被毛点名的，他早在1964年4月已被免去冶金部部长一职，下放到辽宁鞍山任中共鞍山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张霖之其实没有被毛点名，所以，1965年1月三届全国人大他仍被再次任命为煤炭工业部部长，同年7月，再任新成立的煤炭工业部党委书记。文革初期1966年8月间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三次参加毛接见红卫兵的活动。戚称，“尽管毛主席那里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不对，正是因为毛从未点过张霖之的名，他才能稳稳地继续坐在煤炭部部长的位子上，直到文革的狂潮1966年12月后才将他打翻。

“张霖之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不是文革前也不是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而是文革结束以后某些人强加予毛的编造。如果屡屡把后起的、别人的编造当成自己的“回忆”，《戚本禹回忆录》全书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简短的结语

1. 人到晚年，陈伯达对文革持自责的态度。其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胆大妄为，使党的政策遭到了破坏，写了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没想到使许多知识分子蒙受了灾难，我这个罪恶，应该遭到惩罚，而且还在继续受惩罚。这个惩罚是合理的，应该的。我愿意让为我所伤害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我有这点反省。”³⁵

王力晚年对文革持否定的态度。其称，“我直到被关到秦城，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的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³⁶

戚本禹则直到去世前一刻对文革一直持肯定态度。其称，“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有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仍被中国乃至世界的反对势力，加诸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成千成万奋不顾身为这次大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同志，则被反对势力妖魔化为红毛绿眼、为非作歹的野心家和流氓匪徒。”³⁷

2. 陈、王、戚三人晚年对文革的态度、立场有异，但不排除他们对文革年代的回忆都有可令人关注之处。他们的回忆，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不同于官方渠道的、可供读者参考、研判的有用信息。唯读者在撷取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应须注意比照其他来源渠道信息，如相关的其他人的回忆录、文献资料等，逐一进行鉴别。同时应须注意的是，作者愈是对自身在文革中的行为具备自省的态度，其回忆的真实性、客观性就愈大，反之亦然。

3. 除了自身的选择性记忆——如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只谈“好”事不涉“坏”事，对自身言行的撇清等这一口述回忆类史料常见的缺陷之外，陈、王、戚三人撰写回忆录的条件均甚差——没有条件查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文件、工作记录、会议记录及日记等原始材料，以帮助恢复记忆，而单凭记忆是远不够且极不可靠的。此外，戚本禹的回忆录相当部分并非自撰而是他人帮助整理代笔的，其中增加了一些并非本人亲历而是坊间流传的不实材料。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均不可避免地影

响了其作品的质量。

4.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此一父子对话谈史类型的作品甫一面世，即引起读者的关注，笔者在2005年写有《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文，对其进行过推介。拙文对此书肯定的多，只指出有“小疵”而未能认识到更大的如陈伯达原文进行不当改写这样的存在问题。其实，这一类作品如程光的《心灵的对话》，亦存在与《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的、甚至严重得多的不当改写，以作者自己的思维重塑父辈言行形象等问题。此类型作品，实难以作为严肃史料使用，这是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注释：

- 1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29。
- 2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39。
- 3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52-53。
- 4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74-75。
- 5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9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98-99。以下毛泽东行止亦见此书。
- 7 《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主编，1967年8月。
- 8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118。
- 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页321-322。
- 10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页691-692。
- 11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1970年8月2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1月15日发出。
- 12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81。
- 13 《王力反思录》，页585。
- 14 《王力反思录》，页932。
- 15 《戚本禹回忆录》页378-379。
- 16 《王力反思录》，页935-936。
- 17 《王力反思录》，页598-599。
- 18 叶永烈：《陈伯达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页340-341。
- 19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268。
- 20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81。

- 21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374。
- 22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 118。
- 23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 135。
- 24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 121-122。
- 25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页 387-388。
- 26 《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 716。
- 27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页 102。
- 28 《王力反思录》，页 597-598。
- 29 《戚本禹回忆录》，页 385-386。
- 30 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 394。
- 31 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增刊》第 500 期，2006 年 5 月 15 日。
- 32 该调查报告由首都红代会中国医科大学红旗公社、健康报延安公社、卫生部机关红色造反团、卫生部机关红旗战斗团编印。文革中同类出版物还有《反革命“会诊”案件内幕——阴谋包庇攻击林彪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始末》（卫生部井冈山联合战斗兵团等编印）等。
- 33 《戚本禹回忆录》，页 521。
- 34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和讲话·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在小型座谈会上的讲话》，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 121。
- 35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页 162-163。
- 36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页 105。
- 37 《戚本禹回忆录》，页 115。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林彪事件文献著作述评

蒋 健

46年前发生的“林彪事件”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之一，更是迄今为止尚有许多谜团未解的中国现代最大政治事件。狭义的“林彪事件”专指1971年9月12日夜至13日凌晨发生的“林彪出逃”，又称“九·一三”事件，而广义的“林彪事件”涉及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交替发生的林彪集团倒张（春桥）、毛泽东保张进而倒陈（伯达）的活动，以及其后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南巡，林彪之子林立果主谋杀毛不成进而企图南下另立中央的系列阴谋活动。

相应的研究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开始了，最初的动力来自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给林彪集团定性和定罪的需要，以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告一段落。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后，出于“了结过去”的现实政治需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再度审理林彪集团案，并将林案与江青集团案（即“两案”）一起交由重建的中纪委审查。197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8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召开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¹1979年9月3日，邓小平为“两案”审理定调。²尽管“两案”审理显然是用法律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但其审理方针声称重证据，所以对毛泽东时代专案组“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允许当事人翻供，而且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倒张”的活动也不再成为他们的罪证。1980年11月20日“两案”审理正式开庭，1981年1月25日审判完毕。“两案”审判结束的次日，邓小平对外声称：

中共中央正在搞《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这次审判和稍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都了结了，不再纠缠。我们十亿人民一心一意向前看，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³1981年6月下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自此以后，中国大陆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和研究，几乎都在该决议和“两案”审判结果划定的框架内，比如，“两案”审判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林案）审判庭审判长伍修权关于“两案”审理过程的回忆，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关于林彪事件的系列研究。⁵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追求历史真相是人的天性之一，还原历史真相更是历史研究者的天职；另一方面，不平则鸣，无数感到不公的林彪事件涉事人和/或其亲属、部属，为了他们的名声和利益，必然要诉说他们的种种冤情，发出他们的“一面之词”。

此外，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往事》《记忆》和《昨天》等中国大陆电子传媒，为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提供了便易的学术互动平台。近年来，出现在电子传媒上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献，百家争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非同时期传统媒介可比。

笔者意图在此尽可能全面地回顾46年来出现的林彪事件文献，重点放在各种层次当事人的回忆，也涉及不同立场研究者的探讨和相互争论，同时给予适当点评，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以及对这个专题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文献指引。

一、来自毛泽东时代的史料

（一）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三批材料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77号文件，主体内容即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2]4号文件，主体内容即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1972年7月2

日发出中发[1972]4号文件，主要内容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这些材料无疑代表了毛泽东、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对林彪事件的立场和看法，存在着“逼供信”和牵强附会之类的问题。

（二）来自军队的材料

1973年5月空军印发了《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和《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两年后又印发了《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和《林彪死党吴法宪的罪行材料》。⁶

1974年5月，海军政治部发出名为《吴瑞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部分材料（供批林批孔用）》的小册子。

北京军区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下发了郑维山的“罪行材料”。⁷

上述材料虽披露了某些真实细节，但都不乏“逼供信”造成的伪证和牵强附会的说法。

二、来自“两案”审理时期的史料

在“两案”审理期间，毛泽东时代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被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而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了。⁸不过，毛泽东时代关于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阴谋南下另立中央”（即“两谋”）和“叛国投敌”的定性没有变，用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概括就是：“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这个时期关于林彪事件的史料除了收录在《历史的审判》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¹⁰等专集之外，在此后出版的领导“两案”审理的邓小平、彭真、伍修权、黄火青¹¹等人的传记、年谱和/或回忆录也有所提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篇全方位描述林彪事

件的报道，即：刘回年等人的《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和靳大鹰的《“九·一三”事件始末记》。¹²它们后来分别被《历史的审判》《林彪事件真相》和《林彪 1959 年以后》¹³等专题图书多次收录，并被《大动乱的年代》¹⁴、《风云九·一三》¹⁵和《晚年周恩来》¹⁶等著作所引用。笔者认为，这些报道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实问题，比如，引用毛泽东时代中央专案组的不实材料。

三、19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史料

（一）参与“两案”审理报道记者的长篇纪实

解放军记者邵一海在其“两案”审理期间发表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史料，从 1985 年 2 月起，陆续发表在新创刊的

《追求》杂志上¹⁷，后被结集成书以两个版本出版。¹⁸邵一海最早披露了《“571 工程”纪要》的发现过程。¹⁹他还最早披露了林立衡、刘吉纯、林彪内勤小张、林彪内勤小陈、李文普、姜作寿、于仁堂等亲历者在事后的回忆材料，²⁰这些材料对于还原“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北戴河现场的“全景”是很有价值的。

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的空军记者张聿温的《温都尔汗爆炸记》²¹也全方位描述了林彪事件，该书利用了《“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提供的一些素材，对林立果“小舰队”活动的描述尤为详细，对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活动的描述有助于还原空军学院林立果秘密据点的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与《“联合舰队”的覆灭》《温都尔汗爆炸记》同在 1988 年出版的《叶群野史》²²也全面描写了林彪事件，该书的书稿在 1982 年就已经完成，²³该书的部分内容后来被一些杂志选载。²⁴但因其书名以及作者不大为人知的缘故，笔者目力所及，未见任何林彪事件研究者的著述提及该书。实际上，该书的作者“南枝”就是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的人民日报著名记者胡思升，他当年发表的《开庭之日》《元帅之死》《铁骨忠魂》《初审吴法宪》《“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江青的最后表演》《罪该一死》《血压为何偏高》《十名被告面

面观》《可怜的辩护》等报道，其中的前五篇被《历史的审判》所收录。²⁵该书虽名为“野史”，但很多内容是可信的，比如，1971年“七月底，毛泽东向政治局的委员们推荐一本名叫《何典》的书，特别介绍了其中的四句话：‘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²⁶在吴法宪回忆录中得到证实。²⁷笔者认为，该书中关于叶群与黄永胜苟合、林立果窃听的叶群与黄永胜一次通话的内容²⁸颇具史料价值。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时长157分钟的录音录的不只是叶、黄一次通话的内容，更不认为林立果偷录的时间只是“一九七〇年深秋的一个夜晚”。²⁹因为录音中叶群提到叶、黄苟合的时间是6月21日，还提到她可能怀孕了，如果需要流产，希望黄来看看她……，而叶群9月专门为打胎一事从北戴河回过北京，所以不可能“深秋”还在谈论“那个没有来”；再者，那个时代的录音技术有限，而林立果自8月下旬随林彪上庐山起，直到11月下旬张云生离开林办也没有回过毛家湾³⁰；另外，录音中提到的林彪在苏州“哭了”而且是“哭政治上”的，叶群则是既哭“政治”又哭“责任”，显然是1971年2-3月的事，这段内容可能是1971年4月下旬“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偷录的。

（二）林彪家人及与林家密切接触者的回忆

香港《镜报》1988年6月号刊登的《“九·一三”事件前后后的林豆豆：林豆豆访问记》后被国内转载³¹，因而被国人广泛所知。受访的林立衡对“九·一三”事件叙述的核心就是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拉走的，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后来各种公开版本的林立衡式“九·一三”事件叙述的源头。另外，文中提到的程世清、汪东兴的一些说法，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张云生在文革时期给林彪做了四年多的秘书，他撰写的《不堪回首的岁月》³²和《毛家湾纪实》³³，披露了他在林办时的所见所闻，涉及林彪的工作生活、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明争暗斗和林彪家庭内部的严重矛盾，尤其是叶群和林立衡的尖锐对立。关于“林彪事件”，张云生提到了林立果在第一时间对庐山会议的看法：“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指叶群）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

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的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指林彪）的威望也受了损失。”

“在首长跟前，她经常哭鼻子，他妈的，这怪谁？都怪她自己！”“也不能说首长没有一点责任。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是集中批陈，但陈的后台是主任。”³⁴ 张云生还详细回忆了庐山会议后叶群对他的勾引，他当时就把叶群的丑行告诉了林办的于运深、李文普、李春生等人，“大家都对叶群切齿痛恨。这样一来，在毛家湾的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抵制叶群方面抱成了一团。”于是，叶群成了“瞎子”“聋子”。³⁵ 笔者认为，了解了张云生披露的背景后，就不难理解林立衡在“九·一三”事件前夕在叶群眼皮子底下搞事却没人向叶群报告的缘由了。

张宁是被林家认可的林立果未婚妻，她在“九·一三”事件前夕与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立衡都有接触，事件发生后她和林办工作人员在一起被办学习班，因此她的回忆——《扭曲的虹》³⁶ 对于了解“九·一三”事件有一定价值，特别是她亲历亲闻的林立果在9月8日下午和9月12日之夜的言行。

（三）外交部亲历者的回忆

针对美国出版的英文书 *The 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 Biao* 及其台、港中文译本³⁷ 所造的诸多谎言，其核心是林彪被毛泽东策划害死于北京西山，曾经勘察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原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于1987年初以笔名发表了《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³⁸ 证实林彪死于蒙古。随后，中共中央党校于南教授给孙一先看了胡耀邦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其中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二人“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于是孙一先向外交部相关领导和部门建议组织编写有关材料，以驳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³⁹ 此后，去过林彪坠机现场的原驻蒙古使馆大使许文益和三位工作人员（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分别撰文披露了勘察林彪坠机现场以及与蒙方交涉的经过⁴⁰，原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撰文回忆了外交部应对“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提到与上级周恩来以及

下级许文益、孙一先的互动。⁴¹

（四）专题资料汇编

周明主编的六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 年纪实》⁴²在第二卷、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别收录了“两案”审理期间邵一海和靳大鹰的两篇报道、伊白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和张宁的《扭曲的虹》。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为配合建国后党史的教学和研究，编印了十四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 年 10 月至 1985 年 9 月）》，序号从 19 到 32，其中由王年一选编的第 26-28 册，即《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⁴³，收录了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文件、报刊重要文章，并在《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面附录了前面提到的刘回年、许文益、伊白、符浩、张宁等五人的文章。⁴⁴

《林彪事件真相》一书收录了聂荣臻回忆录关于文革林彪的部分，前面提及的邵一海、靳大鹰、许文益、符浩、张宁等人的文章，托名一位林办秘书（名为“何一伟”，实为“张云生”⁴⁵）对叶群的琐忆，以及林彪在文革期间的部分言论。⁴⁶

（五）中共官员的回忆

伍修权的回忆录描述了黄、吴、李、邱和江腾蛟在文革中的罪行，默认黄、吴、李、邱都对“两谋”不知情，比如，1971 年 9 月 10 日那一天，黄永胜与叶群通了五次电话，最长的一次达 135 分钟，通常认为两人是在商量政变的事情，而且黄永胜在法庭上也说不清两人到底谈了什么，但伍修权一言以蔽之：“不可告人的私房话”。⁴⁷

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回忆录介绍了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回忆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春桥、江青等人的嚣张，其朋党的胡乱作为，他们硬说 1971 年 7 月的“北兵南调”是配合林彪的南下另立中央，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⁴⁸林彪事件重要亲历者、原林彪专案组主要负责人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在 1988 年 1 月对人说：“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道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⁴⁹基本上是真实的。我看过。”他还回忆了毛泽东听闻林彪出逃的最初反应，毛泽东在确认林彪之死后

的表态——“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以及毛泽东布置抓捕林彪集团中人的一些细节。⁵⁰

四、1990 年代出现的史料

对于在国内出现的史料，笔者尽可能提供最早、最原始的出处，一个原因是让读者知道当事人最初回忆时的年纪，再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史料在被收录或转载时并非原貌，比如，《作家文摘》1994 年 7 月 8 日刊登的关于汉纳姆对林彪事件真相调查的报道。此外，同一个作者或同一个系列延伸到 21 世纪的同一个专题著述，也放到本章了。

（一）林彪事件重要亲历者的回忆

李德生的《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⁵¹和汪东兴的《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⁵²都是国内影响很大的关于林彪事件的个人回忆，但他们的回忆中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比如：李德生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北戴河林彪驻地的警卫部队“10 点多钟”直接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林豆豆的报告；汪东兴虽然说是他把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打电话告诉周恩来的，但他把林立衡向北戴河警卫部队的报告时间错误地记成“9 点 20 分左右”。对于当夜叶群与周恩来的那次关键通话，李德生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而汪东兴一反他 1980 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说法，改口说电话是周恩来打给叶群的。值得一提的是，熊华源、安建设主编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同时收录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和《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二文，但在他们整理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大事记”中明确提道：“当夜，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⁵³更值得一提的是，汪东兴在他后来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维持了他的说法，⁵⁴而李德生则在他后来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改变了他的说法，⁵⁵《周恩来传》采用的是汪东兴的说法。⁵⁶搞清楚个中缘由对研究者如何辨析林彪事件的史料是很有益的。

吴德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⁵⁷是一篇极具现场感的个

人回忆，提供了很多周恩来、毛泽东应对“九·一三”事件的细节，比如，对于《“571工程”纪要》，因为它用词恶毒，纪登奎认为不宜下发，但毛泽东看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当然，吴德也有对时间记忆不准的错误，比如，把他看到《“571工程”纪要》的时间错记成黄永胜、吴法宪被隔离审查之前了。

张耀祠在林彪事件中的经历与汪东兴类似，而且“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同汪东兴在一起，但《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的有关内容⁵⁸比汪东兴的回忆更具现场感，拥有更多的细节。笔者认为，张耀祠回忆的9月12日深夜叶群、周恩来通话的内容⁵⁹尤其值得研究者注意，张不仅说该次通话是叶群发起的，而且通话结束时叶群的态度也与汪东兴的说法截然不同。需要一提的是，张耀祠回忆录2001年和2008年的两个增修过的版本仍然坚持了原先的说法。⁶⁰

原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忆了他所经历的林彪事件，⁶¹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受到过毛泽东的召见，“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被周恩来紧急召唤到人民大会堂应对惊天事变。不过，笔者认为，陈所回忆的9月13日凌晨1时30分接到李德生的电话、凌晨2点多钟在人民大会堂还见到李德生的说法，显然有误。搞清楚陈先瑞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开会的准确时间对还原“九·一三”事件的场景是有益的。

（二）来自“两案”审理参与者的史料

根据图们亲身经历写成的《超级审判》和《震惊世界的77天》⁶²透露了许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史料，比如，林立果偷录的叶群、黄永胜通话记录，⁶³周恩来对海军的“林彪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问题报告”的有关段落批示“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⁶⁴李文普在1980年1月23日对他1972年写的不实揭发交代进行了更正，⁶⁵吴法宪在“两案”预审期间对他1972年3月交代的他事先知道林彪要搞政变供词的翻供过程。⁶⁶

笔者认为，图们回忆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程世清的交代供述。据程世清交代：1971年9月1日、2日，毛泽东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他“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1. 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

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 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祟，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3. 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林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4. 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假若这份交代的真实程度达百分之七、八十，即可解开毛泽东究竟何时察觉有危险伴随其南巡因而提高警惕之谜！因为据汪东兴讲：“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毛主席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⁶⁷ 张耀祠回忆录提到“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向毛主席谈了三点”。⁶⁸ 这三点与程世清上面的供述类似，显然，这位负责人就是程世清。

不过，图们的回忆中也有毫无证据的内容，比如，1971年9月8日，在林彪给林立果、周宇驰写下手令的“同时，叶群给黄永胜送去密封亲启件——‘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⁶⁹

参与了“两案”审理报道并有两篇报道被《历史的审判》一书所收录的原新华社记者李耐因所写的《“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⁷⁰很有价值，因为其素材来自江青被捕后在江青住处查获的部分电话记录。

伍修权的女婿、《伍修权传》的作者卢弘所写的《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⁷¹也披露了一些林彪事件史料，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一些‘正史’以外的‘野史’或‘花絮’性材料”，即：“虽已‘徐娘半老’却又情欲未减的叶群，因林彪体质太弱干不了那事，就把著名的‘情场老手’正投靠门下的黄永胜拉入她的怀抱，权欲加性欲使他们搞到了一堆缠成了一体，连叶群的儿子林立果也发现并对此进行了‘侦察’和‘取证’，秘密录下了自己母亲与人私通的私房话。”

刘回年在《重大事件亲历》和《“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

中透露：“为了搞清林彪的罪行，我们到专案组翻阅了大量材料；又到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地，了解他和叶群的腐朽生活；还看了林彪一个秘书写的《毛家湾见闻录》。”而且，为了“写得清清楚楚，令人信服，又有现场感”，还采访了汪东兴等当事人。⁷²

（三）中南海摄影师披露的史料

从1992年起，原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杜修贤通过作家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红镜头系列作品，⁷³向公众披露1971年林彪两次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故事。杜修贤的说法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所收录，并被广泛认同和引用，比如，《周恩来传》就说：“林彪对开了半个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怒。这年‘五一’节晚上，勉强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的林彪满脸沮丧，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连招呼也不打。他在城楼上只坐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⁷⁴又如，高文谦拿它来说明林彪“并不按照‘善用兵者隐其形’的常法行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⁷⁵高华则拿它来说明林彪在毛泽东面前大耍“个人英雄主义者”脾气。⁷⁶

不过，近年来一些亲历者的回忆，特别是相关影像被发掘出来，丁凯文、蒋健据此认为杜修贤的说法并不符合史实。⁷⁷

（四）来自境外的史料

从1993年5月开始，两位西方的年轻记者，Peter Hannam（彼得·汉纳姆）和 Susan V. Lawrence（苏珊·劳伦斯），用了半年的时间，在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等地进行调查、采访，并于1994年1月31日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 *Solving a Chinese Puzzle*（《揭开一个中国之谜》）。

笔者认为，这篇报道的最大意义在于西方记者通过独立调查证实了中国官方关于林彪、叶群死在蒙古的说法。不过，笔者还认为王海光对该报道“与当年中方空军专家组根据驻蒙大使馆提供的现场照片进行技术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⁷⁸的评论大谬不然，因为报道中提到的苏联克格勃官员并不认同中方关于飞机燃油即将耗尽才不得不迫降的说法，而且有多位目击者声称林彪的座机在空中已经着火。

需要一提的是，汉纳姆还以 *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 为名将其调查报告发表在 1994 年 2 月 2 日出版的 *Asia week* 上，以《林彪秘辛大公开》为名发表在 1994 年 2 月 6 日出版的《亚洲周刊》上，⁷⁹ 内中解释了叶群的手袋中有避孕药的原因：或许怕怀上与她有染的黄永胜的孩子。

1994 年 5 月 21 日，中国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证实汉纳姆和劳伦斯的报道所言非虚。

1994 年 6 月 8 日，与汉纳姆相熟的中国记者李安定发表长篇报道《一个西方记者采访林彪之死真相的旅行》，详细介绍了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以及汉纳姆的一个观点——“历史和新闻一样，不能埋在故纸堆里闭门造车，而必须走上前线。”⁸⁰ 在这篇报道中，汉纳姆首次提到，他在采访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斯金时，曾询问林彪座机上有没有黑盒子，扎格沃斯金回答，黑盒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笔者认为，正是李文定的这篇报道开始让中国人普遍相信林彪的三叉戟座机装有黑盒子。⁸¹

1997 年 10 月 16 日，林彪专机坠机现场的目击者拉哈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1971 年 9 月 13 日凌晨 2 时，她看到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飞机坠毁后，现场大火连天，机上 9 人全部死了。⁸²

1998 年 2 月 18 日，《参考消息》以《蒙古原高级官员首次披露林彪坠机详情》为题报道了原蒙古副外长云登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关于林彪坠机一事的谈话，云登是当年蒙方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他透露了林彪专机进入蒙古后苏、蒙方动作细节，同时也有一些明显不实的猜测。

（五）林彪警卫大队长的回忆

8341 部队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大队长姜作寿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第一个接到林立衡报告的人，他在《卫队长记忆中的九·一三前夜》一文中回忆了林立衡的报告内容以及他、张宏、张耀祠的相关处理，以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汪东兴对北戴河警卫部队应对突发事件表现的评价。⁸³

姜作寿说，张耀祠曾经指示张宏去向林彪本人直接汇报林立衡报告的内容，但他劝阻了张宏不要去向林彪汇报。

笔者认为，张耀祠的这个指示显然是周恩来授意的，姜作寿的劝阻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就是警卫中队长肖奇明居然在拦挡林彪座车未遂的情况下朝林彪座车开了两枪，而且汪东兴事后还指示不要追查和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姜作寿这个回忆明确说李文甫（普）是被“林彪一伙开枪打伤”，但他后来在接受舒云采访时，以及他后来由舒云整理的口述回忆中，改口说李文普是“自伤”。

另外，姜作寿的回忆搞错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林彪、叶群到北戴河的时间以及“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立衡回北京的时间。

（六）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年谱和传记里的“林彪事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⁸⁴主要收集了毛泽东1969年1月到1976年7月的批语类文字，有许多涉及林彪事件，比如，1970年10月中旬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语和批注，1971年4月11日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还收集了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毛泽东1971年8-9月南巡期间的谈话纪要。

《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的编辑和出版都由中共党史权威部门完成和把关，因此它们提供的史料的可信度应该比国内一般出版物要高。

《周恩来传》大量引用了前面提到的汪东兴、李德生、吴德的回忆，还在多处引用了作者于1983年11月18-25日对吴法宪访谈的内容。⁸⁵显而易见，书中有些说法没有确凿证据，比如，林立果曾把他的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方案报告给林彪和叶群，⁸⁶但它起码有出处——汪东兴的回忆。⁸⁷不过，《周恩来年谱》上“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⁸⁸这段记载以及《周恩来传》上“林彪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却一直称‘病’不出，既不批陈，更不做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他在苏州用南唐后主李煜词中‘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的句子来警告其子林立果等不能‘束手待毙’。于是，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出一份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

纪要》。”这段内容就没有提供出处，因此广受诟病，比如，丁凯文就评论它“活脱脱就是个小说家言，编造得如此离奇、荒诞不经。”⁸⁹但据笔者目力所及，这段内容最早由靳大鹰在1980年“编造”，⁹⁰后来邵一海、张聿温也有类似的表述，⁹¹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原始素材应该来自毛泽东时代某位核心涉事人的揭发材料，至于具体是谁，笔者认为应该从《周恩来传》上林彪“警告其子林立果等”这句话中的“等”去找，看看谁能在林彪面前可与林立果一起称“等”。

当然，也不必迷信年谱、传记，比如，五一节之夜林彪“不辞而别，以致新闻纪录片上也来不及留下他的影子”⁹²的说法表明编纂人员连当年的新闻纪录片都没有看过，再比如，“七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回北戴河”的说法表明编纂人员根本没有看过山海关机场的有关记录，以及李文普等人的有关交代。

（七）周恩来身边人员的回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写的《周恩来的最后十年》涉及林彪事件的内容⁹³值得研究者一读，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周恩来的活动。

吴庆彤在林彪事件期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厅）副主任，实际负责全面工作。虽然他的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林彪事件的很多说法与《周恩来年谱》雷同，但提到“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那个叶、周通话时，则明确说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⁹⁴在后来的两个增、修版回忆录中，吴庆彤维持了该电话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说法。⁹⁵

高振普是周恩来的卫士，“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几天，他始终和周恩来在一起。他在《“九·一三”事件50小时内的周恩来》《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提道：“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那个叶、周通话是叶群打给周恩来的；不同于姜作寿、张耀祠关于林彪座车先停车、肖奇明后开枪的说法，高振普说肖奇明先开枪、林彪座车后停车，而且事后周恩来批评了肖奇明开枪的行为。⁹⁶不过，同姜作寿、张耀祠一样，高振普也没有说肖奇明开枪的事情是何时被报告给中央的。

笔者认为，高振普回忆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周恩来在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前就去向毛泽东报告了，而汪东兴、张耀祠

都回忆说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强行起飞后才去向毛泽东报告的。高振普后来对其相关回忆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但周恩来在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前就去向毛泽东报告的说法始终没变。⁹⁷

另外，发现和分析同一个作者、不同版本的相关回忆中的差异，并读读再版后记，对林彪事件的研究者是大为有益的。

（八）毛泽东身边人员的回忆

毛泽东的生活管家吴连登在《我为毛泽东管家》中，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毛泽东的理发员周福明在《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毛泽东的警卫中队队长陈长江在《毛泽东最后十年》中，提到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九·一三”事件。⁹⁸这四人的回忆中都有“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⁹⁹周恩来面见毛泽东的情节。

笔者认为，分析一下这四人对周恩来见毛泽东时的时间、场景和人物描述的异同，再联系汪东兴、张耀祠和高振普的有关回忆，有助于还原“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中南海的场景。

（九）空军指挥所人员的回忆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在空军指挥所值班的作战参谋朱秉秀和指挥连副指导员张立法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回忆，特别是精确的时间节点。

朱秉秀在《邪不压正：“九·一三”事件纪实》¹⁰⁰中说：9月13日“零点40分，接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央决定，派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立即到你们指挥所，需派人到门口接一下’。”朱秉秀提到了当夜在空军指挥所出现的空军领导人，还提到了当时协助周恩来处理事件的人，比如，9月13日早晨，“接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庆彤电话，是传达周恩来指示，说‘禁止飞行的命令，同样包含民航的国内外班机和其他飞行’。”

张立法在《“九·一三”，我在空军指挥所》¹⁰¹中说：本来零点该换班，但直到零点30分接班人员还没来。“后来才知道，空军司令部大楼和地下指挥所的警卫任务被陆军所代替，一切人员不准进，也不准出。”

笔者认为，张立法披露的信息值得研究人员深究：到底是誰指使陆军在零点之前就接管了空司大楼和地下指挥所的警卫任务？这意味着什么？笔者还认为，朱秉秀、张立法的回忆应

该和李德生、陈先瑞的相关回忆结合起来分析。

另外，张立法回忆的“大约在凌晨一点30分，李德生在四位陆军人员的陪同下，从地铁来到了空军作战室”与朱秉秀回忆的指挥所副所长王级三在空司办公楼大门口接李德生，“随后李德生带警卫参谋进入指挥所”的时间和场景不符，何况坐地铁从人民大会堂到空司很不靠谱，笔者判断张文中的“地铁”乃“电梯”之误，因为李德生本人的回忆说的是：面受周恩来指示后，“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¹⁰²

（十）案中人的回忆

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1988年11月中旬对记者回忆了他亲历的林彪事件：庐山会议开幕前被林立果打过招呼，会议前期攻击过张春桥，后期遭到张春桥的反击；上海会议，即“三国四方会议”，与会者主要是闲扯，从头到尾无人提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更没有提到“571工程”，对于被林立果指定“负责杭州”，陈“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南巡到杭州，在专列上对陈和南萍、熊应堂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林副主席要保”这句话，引起了陈的注意：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全会上讲话有错误”；毛泽东离开杭州时，陈去送行，毛泽东、汪东兴对陈都很友好，“没有一点不正常”；“九·一三”事件一周后陈被王洪文诱捕，起初被关在南京，在逼供者的压力下，陈“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们一看就不相信”；后来陈被押到北京，纪登奎对他说：“鲁珉已经交代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吗？”陈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专案组没再纠缠陈同“571工程”和谋害毛泽东的事，只说他参加了“上海会议”的事。直到“两案”审理，也是如此，最终军事检察院决定对陈免于起诉。¹⁰³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1982年3月10日军事检察院对陈励耘免于起诉的决定书已经表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但汪东兴在其回忆录中仍然捕风捉影地描述了陈励耘1971年9月在杭州想谋害毛泽东的事。¹⁰⁴

原空军干部处长张舜甫，文革前在乡下搞“四清”时就和

叶群熟识了，在文革中调查过叶群的历史，还参加过林家的“选妃”活动，他回忆了叶群说文革怪话的一些实例，以及叶群精力充沛、敏感活泼，爱张罗、爱伸头、话多、会来事，不摆元帅夫人架子的一面。¹⁰⁵

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说林立果“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还能鼓捣一通，他还异想天开，要搞科技方面的名堂，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一直认为他野心大得很。他搞那些事，都是为了扩大影响，捞资本，树形象。不然将来谁听他的？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有些事，在普通老百姓看起来可能是弄虚作假，在林立果的生活环境里可能习以为常。……那时候毛主席对江腾蛟有个批示：此人不可重用。可林立果就给江腾蛟一个条子，说是林彪写的：好好学习，养好身体。江腾蛟感激得不得了，说，拿什么去孝敬林副主席他老人家呢？想了半天把我养在他家的鸽子拿了两对送给林立果，让他转给林彪。林立果回答江说：首长很高兴，谢谢江政委。结果有一天我去曾国华家，一看，那两对鸽子在曾国华家呢。……所以我总想，林立果这个人讲的话，到底有多少是真的？”鲁珉还说周宇驰这个人很狂妄，“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周说，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他又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¹⁰⁶

由陈伯达儿子整理的《陈伯达遗稿》¹⁰⁷收录了陈伯达暮年所写的“从九大到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记忆”等文字。这部分内容如果结合汪东兴、吴法宪等人的有关回忆来看，可以更好地还原庐山会议的场景。在《陈伯达遗稿》出版六年，陈伯达儿子又整理了《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内中加入了陈伯达秘书和其他一些人的有关回忆，提供了关于庐山会议、所谓的“林陈联盟”更多的细节和解读，也澄清了一些误传。¹⁰⁸

原空四军第二政委姬应五说，王维国原本与张春桥的私人关系很好，工作上也合作愉快，但在1970年春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黄永胜和汪东兴一起向王维国进行“路线交底”，特别是汪东兴告诉王维国“张春桥是反军的”。从北京回来以后，王维国就与张春桥疏远了。¹⁰⁹奇怪的是，作为毛泽东身边的人，

汪东兴肯定知道张春桥深受毛泽东信任，可他为什么这样对王维国说张春桥呢？

（十一）林立衡的叙述及其认可的林彪事件版本

香港刊登的《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¹¹⁰披露了新版的林彪事件的林立衡叙述。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他南巡时的那些杀气腾腾的讲话，爸爸闻听后，终日惶恐不已。他曾含着泪对我说：我拥护毛拥过头了……”关于“九·一三”事件，林立衡说：“事前，我知道林立果要挟持爸爸走。于是我通过警卫部队向周恩来做了四次报告，要求中央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这场悲剧发生。不知为什么，他们不但不命令警卫部队制止，反而通知要我也跟着上飞机走。这是为什么？我拒绝了。如若我真的跟了去，这段历史可能再也无法说清了。事件发生后，我又向中央做了如实交代。但几十万字的材料被他们窜改得变了味。”“当年审理‘九·一三’事件的那些专案组……至今还猖獗得很。不仅不让知情人说真话，而且到处抛售当年逼出来的‘档案’材料，任由人加水添料，随意发挥。真真假假愚弄读者……”林立衡还说：“专案组整人十分残酷。他们宁肯错杀一千，不会放走一人。动不动就用刑具惩治。冬天，把您放到冰窟里受冻；夏天，烧稻草给您加温。或让您戴着手铐睡觉；或系着头发让您整天站立；或不给您饭吃；或把您吊着‘包馄饨’。直到您招供为止。在北京，空军系统就有几千人被扫地出门，把您全家撵到外地的城镇或农村，搞得你家破人亡。有上吊的，跳楼的，撞墙的……这些年我东藏西躲，主要是怕被杀人灭口！这绝非耸人听闻。”

另外，《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一书提到林立衡1988年春天和罗点点见面时，谈了“九·一三”事件，她说：“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她还说：她通过警卫部队报告中央后，中央却毫不做为，致使叶群、林立果坐车把林彪带走。¹¹¹林立衡1998年和罗点点再次见面时，推荐了《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并说“我们觉得这本书写了一些实际情况，可以看”；还推荐了《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一文并说该文“对‘九·一三’事件的描述比较客观”。¹¹²

《我所知道的叶群》主要写了原空政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在毛家湾给叶群讲学时的见闻，印证了张云生所写的一些内容，比如，“这些帮忙的‘学者’，大都由叶群直接调用，很少有机会与林彪见面。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叶群恨不得一夜之间吞为己有。但获得知识的过程，却不像滥用权力窃取物质财富那样容易。靠下命令不行，靠变相的‘打砸抢’也不行。于是，叶群就独创了一套‘捷径’，加紧为自己‘适应新形势’做准备。”¹¹³官伟勋也写了文革后林立衡向他谈的一些事情，比如叶群如何蒙骗林彪，此外，在叶群、林立衡的关系上，一边倒地偏向林立衡。不过，笔者觉得官伟勋对“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北戴河、毛家湾和空军领导机关三个现场情景的“报道”¹¹⁴有点价值。

《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¹¹⁵一文结构散乱，东拉西扯，虽然讲了鲁珉经历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他被监禁时受到过非人的虐待，但却用较大篇幅给林立果在空军的前期作为评功摆好，并描述“九·一三”事件之夜林彪住地的场景。该文之所以能被林立衡推荐，显然是文中所说的9月12日深夜迷迷糊糊的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从床上拽起来骗走的。

笔者认为，张宁的《尘劫》和《自己写自己》¹¹⁶中的有关内容，即“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架住毫无生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汽车¹¹⁷，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九·一三”事件的林立衡式叙述。实际上，张宁1993年在纽约接受汉纳姆采访时就说过林立果和叶群一起把吃了安眠药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拖上汽车冲向山海关机场。¹¹⁸

《自己写自己》爆出的新料有两条：李文普左臂上的枪伤经张青霖（张清林）检验是自伤，外勤警卫处长老刘（刘吉纯）会同8341姜队长（姜作寿）等人再次验伤，确认张青霖的诊断；“九·一三”事件发生半年后，李文普在与纪登奎做了笔交易后揭发“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¹¹⁹

（十二）对林彪事件的林立衡式叙述的反驳

为了反驳林彪事件的林立衡式叙述，原空军清查办的一些人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披露了一些史料。

刘世昌、袁正元、高德明和宁焕星联名发表的《〈英雄在

“九·一三”事件中惨变》一文有不实之处》¹²⁰指出：“人证、物证确凿说明‘九·一三’事件的主谋和总后台。没有林彪下决心，林立果和叶群谁也指挥不了谁。”为了否认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胁迫’出走的说法，该文披露了“三个重要材料”：“一是当年林立衡写的《对9月13日事件前后的回忆》”，“二是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写的材料”，“三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的回忆材料”。

不过，该文并没有披露这三个材料的撰写日期。而据笔者目力所及，这三个材料邵一海以前就披露过，所以也就无甚新奇之处，虽然该文提到李文普1996年3月再次向高德明肯定他所写的情况完全属实。另外，该文也有不实之处，比如，林彪1969年9月亲自指示吴法宪安排林立果出任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实际上，这个说法来自吴法宪的伪供。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¹²¹则反驳张宁的《自己写自己》以及张宁背后的林立衡。李文普说9月12日夜里叶群去叫林彪走时，林彪是清醒的，并对李文普说了“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李文普还说林彪是自己走进汽车的，在车上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李文普明确否认开枪自伤，否认张清林给他包扎和验伤，否认刘吉纯在场。

不过，李文普没有回应张宁说他“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这个揭发是“九·一三”事件半年后的事情。另外，李文普说“只是在近几年林立衡才私下对人散布说‘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也不够客观，毕竟姜作寿、刘吉纯、宋德金当年就怀疑他自伤，并且散布过、汇报过他们的怀疑。

高厚良1973年5月出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就兼管了对林彪集团案的清查揭批工作。他的《“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¹²²主要针对《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而述，他披露：“‘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在玉泉山写了不少揭露林彪搞两面派，表面高举紧跟，私下流露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情况，同时认为林彪叛逃是受叶群、林立果的影响，为她父亲开脱。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接见林立衡时，曾对她自以为是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决定让她回空军报社，接触群众，通过学习，正确对待自己。”高厚良坚称空军的帮助小组没有迫害过

林立衡，但也承认林立衡当时就对帮助小组的做法很不满，并为此给他写过两次信，还有过一次“自杀”。高厚良还声称：“林彪的案子……铁证如山，想翻案是翻不了的。林豆豆的许多假话本来不值得过于重视，一一批驳。只是有些报刊还在随意炒作欺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有些人又以假为真，人云亦云。所以才不得不把林立衡的若干材料，都公之于众。……倘有必要，我还有一些材料可以在适当时候公布。”

笔者认为，高文中最大的看点是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霖对林立衡的评论，以及林小霖的一些调查和说法，比如，林小霖对李文普的访谈；又比如，谢静宜 1988 年曾经对找她调查的林小霖说：“当时中央主持清查林彪案件的是周恩来总理，怎么可能逼林立衡揭发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我当时奉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的指示，去玉泉山与林立衡保持联系。她写的材料全部密封送交周总理，我不看，更不敢篡改。……政法机关对笔迹是可以鉴定的，林立衡的字与我不同，她亲笔写的东西都在中央档案馆，怎么能说是我搞逼供信改的呢？”

五、进入 21 世纪后出现的史料

（一）空军亲历者的著述

林彪三叉戟专机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关于“九·一三”事件的著述颇丰，实际上，他在二十世纪末就已经用本名和笔名（广辛、木辛）发表了《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九·一三”大难未死的机组人员》《林彪叛逃座机上没安装超低空飞行设备》《林彪座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九·一三”事件中的林彪专机组》等文章，¹²³进入 21 世纪后又发表了《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 256 号黑匣子》《“林彪座机”机组人员的定性》《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直升机遭劫经过》《“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军专机师指挥所》《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我教周宇驰学飞行》《“9.13”之夜的空军指挥所》《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吗》等几十篇文章，¹²⁴内容既有“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他亲历的从北京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的所见所闻，也有他对专机师老首

长、老战友的采访所得，以及他对有关报道的一些思考和分析。康庭梓这些文章的内容后来全都汇入《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¹²⁵一书，因此现在的读者和研究者只看该书足矣。

林彪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当夜先是与胡萍联手欺骗吴法宪，后又对吴法宪不准起飞的命令阳奉阴违，是林彪一行得以外逃的关键人物。康庭梓所回忆的潘景寅当夜言行，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分析潘景寅这样做的原因，比如，在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以及在山海关机场落地后潘景寅要求给飞机多加油，可见他知道次日南飞广州的安排，再比如，他在飞行后总结会上讲的“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可见他是自觉地站在林立果也就是林彪一边，而把吴法宪当作对立面。康庭梓还说，潘景寅隐瞒了第二天的真实航线，故意造成机组人员4人走5人留的局面，并说潘景寅这样做是林立果的授意。康庭梓认为，林立果是怕飞机上机组人员多了他控制不了局面，康庭梓还给林立果找了一个理由：林彪一行冲出北戴河时，李文普竟因阻止他们的行动被打了一枪，相比之下，年轻力壮的9名机组人员更是他们的心腹之患。¹²⁶

不过，笔者认为，一者，康庭梓的推理显然搞错了事情的顺序，如果林立果真的给潘景寅打电话说过“机组人员越少越好”，那也是在李文普跳车挨枪之前，林立果并非先知先觉，怎么可能会把后来发生的事情作为决断的依据呢？二者，林立果在离开北戴河时已经决定丢下张宁了，他怎么可能还会把他当晚从北京带到山海关机场的小张、小袁这两个“妃子”再丢下呢？如果真有那个“授意”电话，林立果绝对会授意潘景寅让程洪珍和两个“妃子”赶快上飞机！再者，据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在《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¹²⁷的说法，特设师郜起良是在林彪、叶群上飞机后才下来的，笔者认为，当时潘景寅要同林彪、叶群“寒暄”，所以才吩咐郜起良赶紧下去打电话把机组其他人员叫来，因为潘景寅知道那些人还在休息，而在飞机上做准备工作的郜起良并不知道这一点。最后，林立果并不知道哪些人上了飞机，哪些人还没来得及上，从他督促郜起良上飞机来看，他没有甩掉机组人员之意。

另外，康庭梓关于林彪座机“黑匣子”的说法、潘景寅上天后一度反叛逃的分析、坠机现场的蒙古人把着陆灯灯光看成火光的判断也漏洞多多。¹²⁸原空军司令员王海在《我的战斗生

涯》中回忆了“九·一三”事件后，时为空司训练部第二部长的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牵头一个空军专家组，对林彪座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得出“三叉戟 256 号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结论的经过。对于潘景寅，专家组的看法是：“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当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 月 12 日深夜，林彪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驶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机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上进行搏斗。”¹²⁹

原南空司令员刘懋功的《我当军区空军司令的特殊经历》¹³⁰提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南空约有超过半数的师以下部队的主要领导干部被拉下了水”，被架空的他为此曾向吴法宪写信反映“南空‘乱’的根源在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几个坏人的操纵和煽动”，但吴法宪到头来只是“不痛不痒地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许世友让刘懋功主持清查林彪集团在南空的党羽，许世友特别强调：“林立果部署的杀害毛主席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除了广州空军的，就是你们空四军、空五军的王维国、陈励耘一伙乌龟王八蛋！”

原空军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在《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一文中对王海牵头的空军专家组 1972 年的结论表示了异议，或者说对三叉戟飞机带油迫降提出了疑问，他说：“根据我们的测算，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还有 2500 公斤的存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降落呢？这又是一个系列之谜：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吗？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尽么？四、飞机这种带油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吗”¹³¹

驻张家口机场的北空空7师19团副团长周寿星是该师的两个专机指挥员之一，曾经指挥过周恩来、林彪等许多要人的专机。《父亲的空军生涯——913之夜》¹³²披露了周寿星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的一段奇特经历：作为张家口机场的战备值班总指挥，周寿星在深夜被值班的调度员叫醒，并被告知：“有一架三叉戟飞机要到我们机场落地，上级要你指挥。”“上面让我就找你一个人，这架飞机执行的任务是空军首长亲自指挥的，是梁参谋长亲自指挥的！”“上面通知这架飞机是执行任务的，其他的什么都没说；飞机上有什么人和接待规格也没提；只说是完成任务后回来落地，住不住吃不吃都不知道。”周寿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空军指挥所越过北空指挥所、军指挥所、师指挥所，直接调动他这个机场战备值班指挥员。当这架三叉戟飞机飞过张家口机场，到了离机场250公里处的化德一带时，这是飞行控制线——任何飞机都不可超出这条控制线，过去了就算叛逃，可以派战斗机去追，周寿星马上请示空军：“这架飞机到了飞行控制线了，我们怎么办？”空军答复：“你们不要管！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任务的。”过了一会儿，这架飞机在中蒙边境二连浩特附近盘旋了一下后，居然飞出去了，于是周寿星问空军：“飞机为什么飞出去了？！”空军答复：“唉！这架飞机不应该飞出去的！但是它出去了！唉！”周寿星再问：“那我们怎么办？”空军答：“回去睡觉！”没过多久，师指挥所电话通知周寿星：“立即进入一等战备，有一架直升机，里面有5个特务，他们是反动的，是敌人。要求坚决把这架直升机打下来。”这个一等战备的命令是按正常途径经空军—北空—军—师一级级传达下来的。之后，周寿星共指挥了13架次战斗机起飞拦截直升机。天亮时周寿星接到上级通知：从现在开始，任何飞机都不许起飞，飞行员、地勤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与此同时，陆军部队接管了机场，在指挥塔台、跑道两头布置了岗哨，并在跑道两头架设了高炮。

据周寿星的儿子说，这次夜航指挥三叉戟的任务，由于是空军越过北空—军—师指挥，因此直到30多年后，知道这件事的人仍然很少，北空、军、师的领导均不知情，这段经历，周寿星一直守口如瓶，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保密。笔者认为，周寿星这个原汁原味的回忆，一是直接印证了空司参谋长梁璞在听完林彪专机组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的汇报后迅即指示航行局

局长尚登峨通知北京周围所有机场的跑道灯光及夜间降落设备全部打开¹³³；二是印证了周恩来在三叉戟强行起飞后曾要求空军指挥所的调度员向三叉戟喊话“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以及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指示通过周恩来传到了空军指挥所¹³⁴；三是间接印证了张耀祠所说的叶群－周恩来的通话内容。

曾林辉是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长女，“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在空军专机师沙河机场任气象预报员，她的回忆《“九·一三”后的曾国华将军一家》¹³⁵既讲述了她本人 9 月 13 日清晨亲睹的大喇叭呼叫被周宇驰劫持的 3685 号直升机返回，随后机场就被北京卫戍区部队包围，甚至用炮对准了机场的气象楼和调度楼等见闻，更讲述了此后全家老小被管制、被办学习班的不幸遭遇。

“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时任空军专机师服务队副队长的孙福荣曾两次被胡萍派去同周宇驰联系，她一次见到周，另一次没见到。《林彪专机服务队长访谈》¹³⁶讲了孙福荣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一些经历，不过，因为年代久远，孙福荣有不少记忆错误，比如 9 月 7 日她乘 256 号三叉戟专机送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到山海关机场，李德生 12 日深夜来到西郊机场的候机室，而关键的时间等信息则一概没提。笔者认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张宁曾向孙福荣诉苦“林立果对她总是不冷不热，她很闹心”，因为这有助于理解林立果事发当夜为什么甩下张宁而走。

（二）参与应对“九·一三”事件和审理“林案”人员的著述

原空政保卫部长高德明的《将林立果“天才化”的造型内幕》《从绝望走向疯狂的林立果》和《林立果在“九·一三”前的六个昼夜》等文章，透露了一些他在侦查林案时获得的史料，比如，吴法宪 1980 年仍然一再肯定是林彪当面授意他安排林立果出任空司作战部副部长；¹³⁷又比如，空军学院干部王义兰等人发现和上交《“571 工程”纪要》的经过，总政保卫部 1980 年 8 月 19 日对《“571 工程”纪要》的笔迹鉴定书；¹³⁸再比如，“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黄永胜一口咬定林彪和叶群没有向他讲过有关‘两谋’的问题，只讲叶群用色性拉拢他，

两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¹³⁹高德明与肖思科合写的《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¹⁴⁰、《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¹⁴¹两书的主要内容虽然曾在《中华儿女》发表过，但汇编在一起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阅看。

原总政干部刘岩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被派到空军专机师负责清查工作。刘岩的《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¹⁴²提道：专机师在“九·一三”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搞“划线站队”，“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林立果，“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吴法宪：林家准备升潘景寅为专机师政委，等等。笔者认为，刘文中最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的内容就是他1972年春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上听到的周恩来的一个讲话，当时有人提出中央为什么不阻拦林彪的飞机而让他跑掉呢？周恩来回答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叶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到天上转一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在这个情况下，你们哪一个（总理用右手食指指着与会人员）敢下决心把他拦截下来？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¹⁴³在他以前回忆文章的基础上，补充了很多内容，澄清了一些讹传，并对当时的“九·一三”事件的研究进行了概括。书中的一些细节值得注意，比如孙一先曾听梁璞讲，林彪的飞机“出境前在内蒙古上空绕了一下”，¹⁴⁴这个与周寿星的说法一致。至于飞机这么做的原因和目的只能是千古之谜了。

图们的《特别审判》¹⁴⁵实际上是《震惊世界的77天》的修改补充版，对原书内容修补15处，增补三章，其中的“特别军事法庭先期开庭调查”值得林彪事件研究者注意。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的《红色警卫》¹⁴⁶从警卫工作的角度讲了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的一些细节，最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夜他和汪东兴之间的互动。

张思之是“两案”审理时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审判结束后，不服气的李作鹏对张思之说他为律师写了一首诗，但要20年后才给张。20年后，张思之不忘当年之约……《重访李作鹏索诗琐记》¹⁴⁷披露了二人相见之后对当年之事的回顾和感慨，并透露李作鹏已经写好100万字的个人回忆录。

郑振东1980年参加过吴法宪的预审，《我参与审判吴法宪》¹⁴⁸

披露了前前后后都有哪些人参加了对吴法宪的审讯，在同案犯中吴法宪的认罪态度较好，而且吴法宪当时的“精神很好，思路依然清晰”，交代问题滔滔不绝，比如：“‘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叶群给我说过几次，我也表态说：‘我遵照您的指示，坚持到底。’当时我心里就想，林彪说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他想当国家主席才是真的。”

原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的《十年一梦》¹⁴⁹ 自诩“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徐景贤在“九·一三”事件后参加过王维国的专案工作，因而对林立果在上海的活动比较了解，他用很大篇幅描写了林立果及其“上海小组”找“妃子”的活动，揭露了林立果公子哥的一面。¹⁵⁰ 另外，徐景贤对庐山会议期间华东组会场、上海帮私下活动、许世友与张春桥喝酒的描写¹⁵¹ 提供了不少细节，值得研究者注意。《徐景贤最后回忆》¹⁵² 的第十五章专门讲了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亲自下令抓捕王维国、陈励耘，并由王洪文、肖永银和徐景贤具体执行的过程。

原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只有一章专门谈了对林彪集团“两谋”案的审判。¹⁵³ 而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第二部》¹⁵⁴ 专门谈林彪集团案的内容共有五章，更值得一看。

马克昌是“两案”审理时吴法宪的辩护律师，他主编并参与写作的《特别辩护》一书包括“两案”审判的历史背景，律师小组的成立及其工作原则，辩护前的准备工作，律师会见被告人，庭审吴法宪、江腾蛟、李作鹏及其律师的辩护等内容。笔者认为，该书中庭审江腾蛟参与“两谋”活动的内容¹⁵⁵ 最值得研究者注意。另外，该书披露，针对“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山海关场站的电话记录，周恩来“我说要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批示是1971年10月9日做的，图们此前的书只说了周的批示内容，没提批示日期。

《我的丈夫郭玉峰》一书披露了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在申办“九·一三”事件时了解到的林彪集团，特别是林立果一伙活动的一些细节。¹⁵⁶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的武健华写的《“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¹⁵⁷ 首次披露他们在北戴河林彪住处发现林彪的“九八手令”后，“马

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了。由于他们发现的这张完整的“九八手令”肯定不是“九·一三”事件后被当局反复公布的那张不完整的“九八手令”，因此很有研究价值，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央专案组和“两案”审理法庭是否知道北戴河那张“手令”？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完整的“手令”做鉴定，却对那张缺了八个字的“手令”做鉴定？为什么北戴河的“手令”始终没有公布？一旦公布，是不是担心有人拿它去和林彪笔迹去比对，甚至拿它和残缺的“手令”去比对，从而发现破绽呢？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¹⁵⁸是与老首长朱瑞的女儿交谈，无拘无束，透露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其含金量远非他秘书李维赛回忆整理的《吴德、吴忠与林彪、江青集团的覆灭》中的有关内容¹⁵⁹可比。吴忠对“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遭遇的看法与高厚良有很大不同，他直言：“江青整她，在警卫一师实际上是关起来，逼得吃药自杀一次……”笔者认为，吴文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口述给毛泽东一封信的全文，尽管这封信实际上未发出，但它非常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林彪当时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

曾经负责林案审查的中纪委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郝志伟回忆说：“林彪因‘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谋害毛主席’‘叛党叛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对此，在查阅了大量文件、资料后似乎并没有发现林彪直接反毛主席的证据，为此我有了一些疑问，同时也有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不对林彪事件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就武断地说林彪反毛主席有失偏颇，而导致林彪事件最后升级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其与江青集团争权夺利不济有关。为此，我曾经将自己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二办的主任曹老（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曹广化），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复。”¹⁶⁰这表明对林彪是否知道或者授意林立果制订《“571工程”纪要》、图谋杀害毛泽东和南逃广州那些事，就是在“两案”审理机构内部也是有分歧的。

谢静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提及她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奉周恩来之命、经毛泽东同意与林立衡、张清林交往的一段经历。¹⁶¹临去前，毛泽东、周恩来都对谢说林豆豆是有功的，并要谢代他们向林豆豆问好！在谢静宜同武建华一起向林豆豆、张清林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出逃的文件后，林豆豆很

平静，笑了笑说：“他们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谢静宜还说：“几天以后，豆豆自己向我提出她想写出林彪、叶群、林立果逃跑之前的一些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总理看看。”关于林豆豆写的材料送给谁的问题，周恩来指示：“直接送主席，主席看后批给谁看谁就看，主席会批给我看的。”此后，周恩来对谢说“林立衡写的材料不错”，还让谢对林豆豆说“她写的材料，主席很重视……”在谢转达周恩来的赞扬后，林豆豆“高兴地笑了”，“情绪很高，很兴奋”。林豆豆还给江青写了一封称“江妈妈”的信，周恩来看后说：“小谢，把这封信退给林立衡吧，就说是我说的，江青同志身体不好，暂不转为好。”再后来林豆豆又写了一份揭发材料，信封上写着“呈送毛主席”的字样，谢静宜仍同以前一样，当即贴上密封条送毛泽东处了。几天后，吴旭君打电话告诉谢：“主席让你去告诉豆豆，算了，别写啦。”谢向林豆豆传达了，并报告了周恩来。

研究者不妨将谢静宜的说法与刘家驹的《我写林彪传的遭遇》，张聿温的《林豆豆在空军报社的十年》相关内容¹⁶²对照着读，并判断孰真孰假、孰是孰非。

（三）林办秘书的回忆

李德的《林彪读书见闻》和《林彪的读书生活》讲了李德1960年代初亲身经历的林彪爱读书、善读书的情况，不仅读“四论”——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的西方名著，也读中国古代兵书，以及当时连队的政治教材。¹⁶³实际上，林彪爱读书的习惯起码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管理延安的中央图书馆的人都说在延安的中央首长中来借书最多的就是林彪，有借有还，不断换书，所借的书以历史、哲学、军事三类为主，最主要的是哲学。¹⁶⁴

宋德金的《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¹⁶⁵提到他为林彪讲过古代兵书，感觉林彪对这些书很熟悉；还提到他与官伟勋、阎肃等人奉叶群之命修改过林彪的《西江月井冈山》，宋对叶群的评价是“好说假话，善于伪装”。宋文的重点是他亲历的“九·一三”事件：9月10日左右就听刘吉纯讲：林立衡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外逃；9月12日晚上，听刘吉纯讲：林立衡已向张宏、姜作寿报告，他们已经设计几套应变方案；林彪离

开北戴河后，他与刘吉纯同乘一车追到山海关机场。宋德金的《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则增加了很多他对其他当事人的采访内容以及他本人的分析，主基调是同情林彪，明确说李文普的臂伤是自伤。¹⁶⁶

张云生的新版回忆录《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强调：“正视林彪的病，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的‘病’，是理解那场不幸历史的切入点，也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迷宫的一把钥匙。”张书中最引人注意的新史料是八届11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看《郭嘉传》和《范晔传》。¹⁶⁷不过，宋德金认为张云生把“刘晔”错记成“范晔”了。

《林彪秘书关光烈》《关光烈谈林彪》两文¹⁶⁸介绍了一些林彪的身体、工作状况，比如，林彪“不爱交际应酬，从不串门，最烦接见、会见外宾和上天安门之类的活动。”关光烈说：“九·一三”事件前夕，“林立果把我诓到北京，叫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给我看了据说是林彪写的‘手令’。‘手令’不止一份，有横写的，也有竖写的。他们拿出这个东西，我不感到奇怪。我在‘林办’时，叶群就对秘书们说，现在首长写字困难，大家可以模仿首长的笔迹，必要时代批代签。有的秘书很积极，学写林彪的字。……‘小舰队’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需要一提的是，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一处提到“关光烈回忆：林立果给我看的‘林彪手令’是‘横的’，我认为是林立果模仿的”，而在另一处又说“周宇驰给关光烈看林彪‘手令’（横的）”。¹⁶⁹到底是谁给关光烈看的呢？

值得注意的是，据笔者目力所及，几乎所有批林的文章，都说林彪之所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积极迎合毛泽东就是为了上位，然而，关光烈却在这两个当口两次经历过林彪要求不当国防部长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不愿当国防部长，让关光烈给周恩来打电话，请周向毛泽东转报；1962年3月，林彪要关给毛泽东写个报告，说他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当然，由于叶群的干预，林彪的“要求”最终不了了之。关光烈对此评论：“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林彪和叶群是有矛盾的。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办法，她对林彪也有不小影响。叶群干的很

多事情，林彪是蒙在鼓里的。”

李根清的《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¹⁷⁰《毛家湾林彪琐事》¹⁷¹《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¹⁷²《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¹⁷³《目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¹⁷⁴《林彪“紧急指示”前后》¹⁷⁵《林彪对江青的一次发火》¹⁷⁶《谭震林的一封信》¹⁷⁷和《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与林彪的败亡》¹⁷⁸提供了文革期间林彪的言行举止和身体、心理状态方面的大量信息，对叶群的评价相对公允、中性，说她总有办法化解江青给林彪送来的难题，比如，有一次江青挑衅性地让林彪批她送来的一包关于文革评价的文件，林彪气愤地说了一句“纯粹是假马克思主义。我是管打仗的，不要理睬她！”就置之不理了，叶群则告诉李根清：“你替首长批几个字吧，就批‘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这样“既没有硬顶江青，也没有直接把球踢给毛泽东，又让政治局委员们看看江青、姚文元的货色……”。对于林、叶关系，李根清的看法是“林彪喜欢叶群活泼开朗，叶群给林彪讲笑话常使林彪乐不可支。但林彪又受不了叶群‘说事’时的啰唆，常常制止叶群说话，有时甚至一连几天不许叶群见面。林彪相信叶群的精明，一些文件放手让叶群‘把关’，但是又不喜欢叶群的张扬，限制她外出，限制她串门，限制她开会。”

从李根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心态变化的轨迹：1971年新年来临时，“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但是，随着“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林彪不再心安理得了：当叶群某天给林彪念了毛泽东对某文件的批语并评论“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时，林彪冲着叶群大吼：“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不过，林彪总体上还是依然故我，“批陈整风”汇报会后的“五一”焰火晚会，林彪请假，尽管周恩来催促：“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但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只是在叶群跪下哀求“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之后，林彪才答应去，并说“没有那么严重嘛！”当然，林彪也试图缓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当5月20日周恩来来毛家湾看望他时，他事先交待李根清用大字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三句口号，并贴在周恩来

进门必经的西客厅门外的墙上。显然，林彪是想通过周恩来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臣服之意。5月23日，林彪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林彪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他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他内心一度希冀毛泽东高抬贵手。

于运深是林办工作人员中唯一在事发前看过“九八手令”的人，他口述的《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件》¹⁷⁹讲了林立果给他看“九八手令”的经过，并判断他看的那张“手令”就是后来被周宇驰撕碎又被拼起的那张。值得注意的是于运深的下述说法：“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于的口述中“8月23日，刘丰把毛主席在武汉讲的不要让自己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内容，透露给林彪侄子林汉雄。很快叶群也知道了。”这个说法也值得注意，因为这意味着在9月6日晚黄永胜向她透露来自李作鹏的毛泽东谈话内容之前，她已经知悉了毛泽东对刘丰谈话的部分内容。

不过，笔者认为，《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件》在发表前未必经过于运深本人的审核同意，比如该文所述的林彪五月信稿“叶群让谁整理的我不知道。叶群在庐山‘翻了车’，她的‘原则’是不知道庐山情况的秘书坚决不让知道相关的事。很可能像叶群的两次检讨一样，是叶群找军委办公厅的人捉的刀。”明显不合事实，因为一者该信稿当年就是林彪口述、于运深记录整理的，二者2013年10月于运深已经和李根清一起确认该信稿是林彪让他们整理的，三者李根清在2014年11月发表的《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中已经提到“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¹⁸⁰另外，在于运深口述的《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¹⁸¹中也有一些明显不是于运深本人经历的内容。因此，研究者在引用这种口述史料时务必小心谨慎。

（四）林立衡式“九·一三”事件叙述的原始版本

林立衡式“九·一三”事件叙述的原始版本，即《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最早出现在李晨2004出版的《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¹⁸²一书中，后经互联网广泛传播，并得到林立衡本人证实。¹⁸³不过，林立衡起初并没有说明该材料为何时所写及其背景。舒云2012年整理出版的《林豆豆口述》¹⁸⁴表明该材料以及林立衡夫妇的多封申述信写于“两案”审理期间。

林立衡在该材料中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得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志清醒和人身安全。”林立衡详细讲述了9月12日晚至9月13日凌晨她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领导以及北京的张耀祠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的全过程，她的最大不满是，在她报告后，8341部队居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拦阻措施，导致叶群、林立果将林彪带走。林立衡还质疑：“这一切事情的背后有什么目的呢？”

关于如何看待林立衡所写各种材料的真伪性，笔者认为，天穹的《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¹⁸⁵最值得研究者注意。

还需一提的是，林立衡1971年10月在玉泉山写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材料，即《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尚未被人全文披露，只是在邵一海的书中有节选。¹⁸⁶研究者可以对比两个版本对同一时间段人物、情节的描述，看看有哪些差别。

（五）北戴河警卫人员的回忆

刘吉纯9月7日先后被张清林、林立衡找过，可说是最早的知情人，他口述的《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¹⁸⁷主要讲了9月12日之夜他亲历的林立衡报告、林彪一行出逃、警卫部队追赶的全过程。刘吉纯还强调：有许多书报、期刊关于事件的报道，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涉及他本人的文字，往往也不准确。他的相关回忆，以本文为准。

笔者认为，采访和整理者丁丑（宋德金）既是当事人，又是历史学家，而且刘吉纯、宋德金在事发后的学习班中都留有回忆文字，因此刘的这个口述是准确的，可以用来修正林立衡、张宁以及李文普说法中的误记或误传。

吕学文是 8341 部队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是 9 月 12 日夜拦截、追赶林彪座车的人之一，他的《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¹⁸⁸提到叶群曾多次对工作人员说：“豆豆身体虚弱，神经不太好，言谈无度，没有逻辑性。对她说的话，你们一是不要信，二是听到后要及时向我报告。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必须严肃对待。”他还说：9 月 12 日深夜，警卫“队员横排在大道上，分别形成了两道‘人墙式’的卡哨，以便拦截林彪的车辆，阻止其外出。”“当时我在第一道防线”，“中队长肖启（奇）明在第二道防线”。在林彪座车冲过第一道防线，在战士们连连叫喊“停车”无效的情况下，肖向司机开了枪，随后林彪座车急刹车，李文普跳了下来，接着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

笔者认为，吕的回忆的核心是肖开枪在先，李文普跳车在后。

肖奇明是 8341 部队六中队中队长，他的《亲历“九·一三”》¹⁸⁹提到他当夜两次听过林立衡的报告，第一次是和 8341 部队张宏副团长、于仁堂副大队长一起听的，第二次他先听了林立衡的报告，然后又听林立衡向张宏做了同样的报告，并目睹林立衡与张耀祠的通话。另外，肖奇明当夜接李文普通知警卫部队林彪马上要出发的电话，而且他接电话后就做了相应安排。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肖说林彪座车突然停车在前，随后李文普跳车，接着林立果开枪，然后才是他开枪。

笔者认为，肖的回忆对还原“九·一三”事件的北戴河场景非常重要，笔者当年就是在看过肖的回忆后顿悟了诸多“九·一三”事件之谜。

《姜作寿回忆录——我在林彪身边的五年》¹⁹⁰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最新说法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他说周宇驰 9 月 6 日来北戴河后肯定没有见林彪，而于南曾言：“9 月 6 日，周宇驰飞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毛泽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据林立果讲，林彪当时抱着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¹⁹¹二是他说林立果、李文普和肖奇明“三个人用三支不同型号的枪打出四发子弹”，“四颗子弹壳都找到了，而我们却只找到三个弹洞”，林立果那“一枪

的弹着点打在车门摇把上”，肖奇明那两枪的“弹洞在右后车门的防弹玻璃上”，只有李文普的那枪“弹洞找不到，而李文普的左肩部有枪伤。”给李文普包扎的“军医陆正武告诉我，李文普这一枪很奇怪，像是他自己打的……我和张宏、于仁堂分析是李文普可能不好交代，才自己打了自己一枪。”“我向汪东兴同志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当面向汪东兴汇报了上述情况，同时我特意把拾到的四颗子弹壳以及弹头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看也没看，随手丢进身边的纸篓里了。”“汪东兴同志说：‘开枪的事情，接你们报告时，中央文件已经定稿下发了。不理不管了，不要追究了，就按中央已下发的 57 号文件¹⁹²的精神办吧。’”三是毛泽东对肖奇明那两枪的批评：“这个 8341 部队好大的胆子！是哪一个下的命令开枪？……如果把林副主席或他的家人打死了，打伤了，我毛泽东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怎么向全党交代啊？怎么向全军交代啊？究竟是谁害谁啊！我毛泽东能说清楚吗？好在没有打死、打伤人，这多么可怕啊！”

研究者可以拿这些当事人的回忆进行对质或者互证，比如，对同一件事林立衡是怎么说的，肖奇明又是怎么说的；再比如，对于臂伤，李文普是怎么说的，姜作寿又是怎么说的；又比如，李文普、吕学文、肖奇明和姜作寿同在林彪座车遭枪击的现场，他们四人对现场的描绘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哪些为真？哪些为假？

（六）案中人或其亲属的回忆

吴法宪是卷入林彪事件最深的历史见证人，《吴法宪回忆录》是迄今为止关于林彪事件最完整的个人著述，披露了大量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细节，其叙述极具现场感，比如，1970 年“8 月 27 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党章》，说是林彪叫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

但是周恩来不清楚‘九大’《党章》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¹⁹³ 又比如，毛泽东的警卫部队9月13日早上还要求到专机师的机场给毛泽东打野兔子吃，周恩来不得已同意了。¹⁹⁴

吴法宪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协助周恩来处理突发事件的领导人之一，当夜他同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西郊机场的时念堂和胡萍、北戴河的叶群、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中南海的周恩来（汪东兴）、北空司令员李际泰、沈空政委张雍耿以及空司领导……都通过电话，比如，在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吴法宪“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说副帅要到大连去转一转……可能她很快就会给你打电话，先不要答应她，你就说要请示我”后不久，吴法宪就接到叶群要飞机并让胡萍来的电话。¹⁹⁵ 而且，他为了查清林彪三叉戟专机的调动情况，特意从空军大院去了西郊机场。笔者认为，《吴法宪回忆录》最具价值的部分就是对他亲历的“九·一三”事件之夜的准确叙述，因为吴法宪的秘书张叔良曾经“把他主动记录下来的有关十二日晚上和十三日所发生的一些情况记录”给吴法宪看过，包括他在这场听到的一些往来电话和吴法宪当时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措施，而且，吴法宪在9月24日失去自由前还特意“要张叔良把九月十二日晚上的记录整理好，因为那个记录可以清楚地说明我在这天晚上做了什么。”另外，在被关押期间，就那夜的事情，吴法宪被反复提审过，甚至同胡萍对质过，这些无疑强化了吴法宪对那夜的记忆。¹⁹⁶

吴法宪的一些反思也值得注意，比如，他对政敌张春桥并没有一味抹黑，而是“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甚至还讲了张春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对他们表示的友好。¹⁹⁷ 当然，吴法宪最重要的反思就是他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评价：“当我在事情发生十余年后，看到他这些谈话时，心情很不平静。几十年来，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光辉的形象，我始终认为，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我对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义的化身。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想是不是忠于毛主席。但是看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话来说：

毛主席是言行不一。”“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¹⁹⁸

《吴法宪回忆录》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它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吴法宪过去的一些证词，比如，林彪1969年10月初当面授意他安排林立果担任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又比如，叶群1970年7月对他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长时间以来被官方反复引用作为林彪有野心、结党营私的证据。《吴法宪回忆录》对这些假证词进行了澄清，同时也承认：“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¹⁹⁹

当然，也有研究者质疑《吴法宪回忆录》里的翻供内容，比如，王海光就说“在‘两案’审理中，是允许案犯翻供的，吴说的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证词——如关于叶群8月8日回北京问题的假证都推翻了，为什么这句话（笔者注：指叶群对吴法宪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当时不去澄清呢？”²⁰⁰不过，笔者认为，“叶群8月8日回北京问题”涉及邱会作、胡敏两个大活人，连办案人员都觉得吴法宪的供词不靠谱，给办案带来麻烦，实际上，正是在办案人员提示下，吴法宪才翻了供。而无论是叶、吴对话，还是林、吴对话，对话的主动方已经是死人，不存在案犯口供齟齬的问题，办案人员自然不会给吴法宪翻供的机会。吴法宪不敢翻供肯定和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态有关，在这点上可以参考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陈伦和的说法。

《陈伦和自述》²⁰¹中说：“审判就像演一场开演前已对好了台词的戏。在审判前，80年7月23日下午，空军保卫部来了一个高部长（高德明）到秦城监狱，名为找我谈话，实则震慑、训诫，……当我承认自己虽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时，高就立即对我瞪眼睛，拍桌子……”“由于当时已被关押了近九年，这种长期单独关押，不审理，不释放，好像被判了无期徒刑般的绝望境地，常常逼得人要发疯，在监狱里我曾在深夜听到有人精神失常的嚎叫声。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是我秦城监狱中的‘邻居’，我是到他房间打扫卫生，看到他语录本上的名字才知道

是他的。连他有时也会在深夜里用浓重的无锡口音焦虑地叫起来：‘毛主席，毛主席，关了我十年啦！……’在种种高压下，只能按高的要求写了认罪材料。那一天，是个令我深感屈辱和冤屈的日子。不知道有多少人也有此体验！开庭前检察员张留学曾经威胁我说：我的罪行可判死刑，就看我的态度。”

“上访专业户”陈伦和在自述中除了诉说冤情之外，也谈了他眼里的林立果：“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泽东所表扬的那样，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

“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与林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像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日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此外，陈伦和还提到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给他安排的任务，即：“我随王永奎等三个副处长去广州，是九月十二日林立果、周宇驰亲自对我等四人明确下令的，他说：现在八三四一部队也不可靠了，要我们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保护林彪。”

《走近林彪夫人——叶群》²⁰²应是叶群的弟弟妹妹化名所写，所描述的叶群完全正面，也提到叶群、林彪“维护”毛泽东时的种种无奈。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谈了丁盛与林彪、黄永胜的关系，也谈了“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广州军区，强调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南逃”的事情，虽然一度“有人说知道，后来又翻供了，他是被逼的”。²⁰³丁盛说的先作伪供又翻供的人指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卜占亚。

吴法宪之子吴新潮在《你所不知道的吴法宪》²⁰⁴一文中提道：林彪和“黄吴李邱”同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是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

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20世纪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吗？’，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吗？’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吴新潮还提道，“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同为林彪事件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与《吴法宪回忆录》可以形成互证关系，比如，邱会作提到他和李作鹏上庐山的第一天（1970年8月21日）晚上“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吴法宪告诉他们：“主席是八月十九日乘专列到达九江的，我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汪东兴“见到我和程二人后，……很高兴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可后来“为了‘说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吴法宪，结果吴胖子被迫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说成是叶群说的了。吴法宪乱说一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林、叶栽了赃。‘九·一三’之后，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发出多个中央文件。庐山会议本来是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黄、吴、李、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没提国家主席。”²⁰⁵再比如，李德生曾回忆：毛泽东在听取刚从北戴河林彪处回京的黄永胜等人的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²⁰⁶但吴法宪对那次汇报的回忆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

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²⁰⁷ 邱会作的相关回忆是：“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黄、吴、李、邱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可以说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从庐山会议，到‘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已经八个月了，在此期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坐卧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哪有不高兴之理。”²⁰⁸ 从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来看，毛泽东当时并未对他们说狠话。

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的一大特点就是不仅提供史实，而且提供史评，比如，毛泽东质问刚上庐山的黄永胜“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是史实，“毛主席支持张春桥，这是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关系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干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一批人的问题。”就是史评；²⁰⁹ 再比如，9月4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陈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反共……’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面面相觑。”是史实，“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也说过：‘伯达同志最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怎么又是‘托派’，又是‘变节’，又是‘叛徒’，又是‘反共’，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就搞成这个样子？”“林彪揪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主席揪陈伯达就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大会讨论林彪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则是史评。²¹⁰

《邱会作回忆录》的一个看点是，周恩来在“九大”后曾多次从爱护、关心、教育出发，对黄、吴、李、邱讲：“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之间的关系。”但直到“九·一三”事件后，邱会作“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邱会作对周恩来的评价是：“总理这个人，对人还是很诚恳的，而且精力特别充沛，对大局的事，对有利于团结的事，他都会尽力去做，他对党内的团结有美好的愿望，从不好胜。”“当然，只要主席的态度已明确，对总理来说，上面那些就不算数了，他是无条件听毛主席的，总理知道主席是太好胜了。”²¹¹

关于林彪，邱会作回忆说：林彪于1970年9月7日离开庐山时，对送行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后来，邱会作曾经向黄永胜建议，由黄永胜劝林彪向毛泽东表示一下自我批评的态度，为慎重起见，可先向叶群说，如果说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说。过了大约三天，黄向邱透露了叶群转达的林彪对黄永胜建议的答复。林说：“（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式上的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才会说：‘不要奉命讲话，要讲自己的话，才能讲好。’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讲话的。（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林还让叶群转告黄等：“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当邱会作把自己和黄永胜的建议与林彪的答复向周恩来汇报后，周只说了一句：“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²¹²

关于毛泽东，邱会作提到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是：当刘丰1971年8月27日向毛泽东提出“如果因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的意见后，毛泽东立即兴奋地说：“你说得好！”

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员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此前，跟随毛泽东南巡的陈长江曾回忆，8月27日下午2时半，毛泽东离开武汉时，出人意料地要刘丰等人陪同南下。至于毛泽东把刘丰带到长沙是何用意，陈长江也不清楚。²¹³看了邱会作的回忆，就明白毛泽东的用意了。另一件事情是：毛泽东确知林彪死时很高兴，并且说“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²¹⁴

关于“九·一三”事件，邱会作说：“毛主席在各地直指林彪的谈话，叶群是能及时知道的，但叶群对林彪有封锁所有消息的可能，一切都由她作决定了，这就使问题越搞越乱。叶群进入了紧张的阶段，林立果瞎张罗，林彪则照常生活。在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这是我对林彪外逃大致的看法，我始终认为林彪绝不可能外逃的。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²¹⁵也就是说，邱会作的说法与林立衡式“九·一三”事件叙述类似。

笔者认为，邱会作披露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非常有价值，周恩来当时对大家讲：“林彪出走是突然的。”“十二日晚上十一点半的样子，叶群来电话说，一〇一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今晚走，准备空中走。”周则告诉叶群：“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叶群回答：“你知道，那个急性子很难说服得了。”周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周恩来接着告诉大家：“十一点半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接着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指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接到豆豆第三次电话，也是十一点半多了。”“这个人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能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之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林彪上了飞机之后，

机组的人并没有到齐，飞机就发动了，林彪乘坐的飞机，是在没有机场放行命令的情况下，强行起飞的……”“十三日零时左右，还得到住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从北戴河到山海关的途中被打伤了。又据林豆豆的报告，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都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他们上车后，不久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²¹⁶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²¹⁷是邱会作次子程光对邱会作文字回忆、口述录音、父子对话²¹⁸的深度整理，涉及林彪事件部分的内容与《邱会作回忆录》大同小异，但可读性更强。不过，其中披露的部分史料有待验证，比如，“两案”审判后，邱会作在秦城监狱听江腾蛟说：受专案组逼迫，“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²¹⁹笔者认为，邱会作转述的江的这个说法很不可信，毕竟江腾蛟于1971年9月14日被王辉球约谈后，就写了《谋害毛主席阴谋事件的经过》的书面材料，那时江还不知道林彪、林立果已经死亡，专案组也无从谈起。江腾蛟的辩护律师王舜华、周奎正在1980年12月1日的辩护词中专门提到这一点，并说江腾蛟在1971年9月14日的交代中曾表示他的罪行是“万恶不赦”的。²²⁰何况江腾蛟被释放后，迄今为止，他和他的家人都没为此翻过供。

李作鹏在1982年夏秋之际意外看到《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感想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开幕式的讲话被定性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我们在小组发言被定性为‘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和‘地下阴谋活动’。所谓林彪阴谋携带黄、吴、李、邱‘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早已作为事实被定性；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十年后收到的《起诉书》《判决书》中，所指山海关机场256号飞机强行起飞问题与这个文件如出一辙（辙），早被定性。同时，也万万没有想到，吴法宪在隔离审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竟写了两份‘交代’材料。”²²¹笔者认为，《李作鹏回忆录》回忆录的最大看点就是作者对上述罪名的反驳，并澄清吴法宪“交代”材料里涉及传主的不实之词。

同为林彪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李作鹏回忆录》可以与《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起到互证的作用。比如，李作

鹏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周恩来对他讲“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做必要准备”，吴法宪回忆“我请示周恩来，说我要立即到西郊机场，去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周恩来同意了。”²²² 又比如，关于毛远新的嚣张，邱会作回忆毛远新居然如此批判他们——“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利令智昏，毛主席的威信是高于一切的”，李作鹏回忆：“会议中唯一发言最激烈的、政治上纲非常高的是毛远新，他说：庐山会议是一次‘未遂政变’。‘未遂政变’的这种说法，二中全会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因此非常警觉。当时毛远新住在钓鱼台江青那里，与毛主席来往密切，又具有毛主席亲侄子的特殊身份……这样的说法能够是你小小毛远新发明的吗？到底是谁有资格将庐山会议说成是‘未遂政变’呢？”²²³ 不过，邱会作说毛远新的“嚣张”发生在2月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上，李作鹏说毛远新的“嚣张”发生在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笔者倾向于前者。

关于林彪是否策划武装政变，李作鹏与邱会作一样，都持完全否定的看法。²²⁴ 然而，关于林彪出逃的事情，李作鹏的看法与邱会作完全不同，他认为：林彪是主动逃的，但他“‘逃’往苏联不是叛变，而是躲难、躲批斗、逃祸。像朝鲜、越南有的高级干部跑来中国躲难、逃祸一样。”“林彪出走是‘逼上梁山’，是毛泽东秘密策划批斗林彪的结果”。²²⁵

“两案”审理时的起诉书指控李作鹏在给山海关机场的电话中把周恩来的256号专机必须“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在专机准备起飞时未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面对请示只回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借以拖延时间……《李作鹏回忆录》对此进行了辩驳：“核心的问题是：总理在电话里所做的四点指示中，到底有没有‘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明确表述？真相很简单：总理的电话指示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总理电话指示的原话是：‘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

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当时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平和，没有强调‘四个人一起’，更没有提到‘命令’两个字。”“林彪的三叉戟飞机是强行起飞的！不是‘放飞’的！当时不要说‘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挡不住！”“当时我应该怎样采取‘阻止起飞的措施’，你们认为才是对呢？我估计答案是：怎么做都不对。阻止成功，林彪说不对，阻止不成功，毛泽东说不对。结果是阻止起飞是我的‘罪’，不阻止起飞也是我‘罪’，强行起飞还是我的‘罪’。实际上我接受的是一件死路一条、死罪难逃，且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周总理要交给我无法完成的任务呢？”“当我将飞机强行起飞的情况立即报告总理后，总理直至毛主席、党中央都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拦截措施，谁又追究他们的责任？”²²⁶李作鹏进而质疑周恩来当夜的所作所为：“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像叶群所说林彪要到大连‘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得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做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四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事后我一直在反复思索，周总理用电话遥控我来传达他的指示，但又不把当时他所掌握地全面情况告诉我（总理告诉我的情况还不如告诉吴法宪的多），是为什么呢？周恩来是真想在山海关机场拦截林彪的专机吗？是对我的不信任吗？是退身之策吗？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呢？”²²⁷李作鹏最终的结论和判断是：“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 256 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当然，他未能采取果断措施，

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谜团。”²²⁸

不过，笔者认为，李作鹏的推理和判断过程是基于汪东兴的相关回忆。实际上，李作鹏回忆的9月13日凌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12日晚21点左右，是林彪女儿林立衡发现了林彪、叶群要离开北戴河住地的异常情况，首先报告了担任住地警卫的8341部队负责人，由8341部队负责人用电话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立即报告了总理。总理曾打电话给叶群劝阻不要夜航……”²²⁹就是汪东兴回忆的翻版。笔者认为，汪东兴的回忆对时间，特别是对叶、周之间电话的方向和内容，都不准确，甚至错误，因而建立在汪东兴回忆之上的李作鹏的推理和判断难以成立！比如，李作鹏说周恩来先电话给他说了“四条指示”，然后才给叶群去电话。²³⁰又如，李作鹏认为周恩来语气平和地做“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是在林彪一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之后，显然是搞错了两件事情的时间顺序。另外，李作鹏说周恩来那个“四条指示”的电话持续了大约20分钟，即从他23点10分左右打给周恩来，到23点30分左右周恩来放下电话。²³¹笔者认为，无论从时间点看，还是从电话内容看，李作鹏的说法都不对，何况李作鹏根本没有把四条之中的“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这条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这既可从机场的值班记录上看出这点，也可从林彪到达机场后并没有人向林彪转达周恩来的请求上看出。

《我的父亲胡萍》²³²谈了胡萍“九·一三”事件之夜为林彪调专机的大背景。另外，舒云在《回眸1971：再探“571工程”之谜》和《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都提到，林立果9月12日傍晚在西郊机场候机室给胡萍看了横版的林彪“九八手令”，而且这个手令“被林立果带上256号三叉戟”。²³³然而，不管是在中央专案组审查期间，还是“两案”审理期间，胡萍都没有说他9月12日傍晚见过林立果，而他看到“九八手令”的时间是9月8日晚9时40分。²³⁴林立果9月12日晚上是直接到停机坪上三叉戟飞机走的，并没有到过候机室。

在《对话“九·一三”》²³⁵中，邱会作的长子邱路光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史料，比如，1971年“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又比如，“1988年底，……赵紫阳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再比如，“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则透露：40年过去了，“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王维国在“两案”审理期间就表示不服，“判决”后他一直不断地上诉和申诉。若想了解王维国的冤情和林立果在上海的部分活动，《王维国遗稿》²³⁶值得一读。虽然《“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²³⁷的最大看点是王维国遗稿缘何“洋洋万言，从头到尾一个‘错’字，从上到下一个‘冤’字”，但笔者认为，就还原“九·一三”事件林立果、周宇驰一方的行为来看，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述的1971年9月12日下午至深夜他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的互动更具价值，笔者就是从王大章的讲述中发现了周宇驰从布置“南下”到转而“北逃”的时间点。不过，该读解中也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比如，张清林讲述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江青想把李讷介绍给

林立果、把毛远新介绍给林立衡，林彪的态度则是：“搞什么封建联姻？！（毛）要拉人整人了，别理她！”张清林并非当事人，所谓的“这些叶群都有电话记录”，无非是以讹传讹。

就笔者管见所及，不管是林彪事件的案中人，还是他们的儿女，几乎都在为自己或者父辈大声喊冤，说自己或者父辈与林彪一家的“两谋”无涉；有的还为林彪喊冤，把“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暗中搞的贼路鼠道的名堂”²³⁸同林彪分割开来。不过，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是个大大的例外，她在《四十年有感》²³⁹中借用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名言颂扬了周宇驰的行为举止，并直言：“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鉴于周宇驰在林立果小舰队中的地位，以及9月12日之夜他与西郊机场的胡萍、北戴河的林立果、空司大楼的于新野、空军学院据点的李伟信、山海关机场的程洪珍都有过电话联系，后来又带于新野等人“北逃”，所以了解他当夜的言行对还原“九·一三”事件是必需的。虽然“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周向红并不在周宇驰身边，但她事后通过其母亲、哥哥和叔叔了解了周宇驰当夜的部分言行，笔者认为，《四十年有感》披露的周宇驰言行对还原当夜林立果的决策演变过程很有价值。

程光在《我所见到的叶群》²⁴⁰一文中讲述了叶群为人谦和、通情达理的一面，比如：程光的一个战友兼“难友”是1949年战死的叶群之弟（解放军师级指挥员）的遗腹子，他1966年底串联时困在北京，叶群从他母亲处得信后只是去默默照顾他，并未相认，怕的是打扰他和养父（军级干部）一家平静安详的生活。笔者认为，该文的最大看点是林豆豆1988年在和邱会作聊天时表露了“叶群不好，连累了林彪”的看法后，邱会作告诉林豆豆，不同意“叶群不好，连累了林彪”的说法，邱会作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同样是冤案中人，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都是些没有根据的扣帽子，怎么好全怪到叶群头上？其二，对林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邱会作解释说很多是周恩来叫她去的，打听江青那儿的底细，以便应对。叶群在这上帮周恩来办了不少事。其三，“叶

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邱会作在林豆豆走后还对程光评价说：“叶群和江青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里放不下事，但也有不同：江青是不分时间场合，无所顾忌地胡说，只要高兴就瞎吹；叶群理智多了，她只对自己相信的人说，而且有分寸。”“叶群为人热情，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好，人缘不错，做事比较得体，绝不是江青那样耍泼欺人的恶妇。叶群的问题是没有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更没有在长期艰苦的领导岗位中磨炼出来的品性，总是唠唠叨叨……叶群的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林彪脱离实际，叶群遇事不能浑厚深远，影响了林彪，也影响了我们。”

《“九·一三”回望》²⁴¹首次披露了叶群在1970年10月12日和1971年4月9日给毛泽东两次书面检讨的全文，内中提到她在庐山会议前阻挠林彪给毛泽东写信的经过和原因，以及她在庐山会议期间犯错误的经过和原因。

黄春光在《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²⁴²一文中提到：“叶群在做人的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另外，黄春光提到的“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都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啊！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这件事，吴法宪、邱会作都有相应的回忆²⁴³。不过，关于“九·一三”事件，黄春光的某些回忆似是而非，比如，9月13日八点半左右，头天晚上在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林参谋“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实际上，纪登奎在林彪专机出境时还在人民大会堂呢，北空指挥所日志记载纪登奎9月13日10点40分才到指挥所。笔者认为，9月16日夜“他（指黄永胜）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

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回忆表明周恩来起初对林立衡的报告似信非信，这也可从他曾经指示张耀祠让张宏去向林彪报告上看出。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不管是黄、吴、李、邱，还是他们的子女，凡是回忆到军委办事组与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他们支持周恩来，周恩来依靠他们。比如，黄春光就说：“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然而，“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不管是李作鹏，还是黄永胜，都没有感觉到周恩来对他们的倚重，甚至信任；邱会作被通知来开会后，枯等了近三个小时，没被安排任何事；吴法宪当夜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当林彪专机出境后，他听到周恩来要派杨德中到他那里时就明白周恩来不信任他了。²⁴⁴笔者认为，吴法宪还是乐观了，实际上，周恩来此前同意吴法宪离开空司去西郊机场就有顺水推舟实现调虎离山之意，这从他随后就安排李德生坐镇空司可以看出。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一开始就不信任他们呢？这和林立衡的报告内容有关，她不仅告发了叶群、林立果，而且把黄、吴、李、邱一并装了进去。

为了回应一些人对《心灵的对话》的质疑，比如，“笔法较为随意，有点类似于纪实文学。没有交代信息来源”，“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进行那么多交流”，程光编注了《邱会作家书》，目的是“要向世人说出‘信息来源’和相关证据。”²⁴⁵《邱会作家书》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加以细化、深化，而且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文字整理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目的是突显忆述、谈话的真实性。该书披露的邱会作2000年9月与党史研究者对谈形成的《谈九·一三事件》²⁴⁶值得一读，尤其是林彪不可能搞“军事政变”的八点理由。

（七）其他亲历者的回忆

江青秘书杨银禄的《江青与林彪》²⁴⁷、《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²⁴⁸等文章讲述了江青与林彪、叶群交往的一些细节，并称他们“是你来我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又是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关系”。杨银禄的文章有的是针对新说法有感而发，比如，《我所知道的江青提级之事》就是否定丁东在《江青提级》²⁴⁹中的两个说法。²⁵⁰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庐山向毛泽东告状的经过，汪东兴的说法是这样的——8月25日，“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我说：‘刚看到。’……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²⁵¹《毛泽东传》的说法——“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²⁵²徐景贤的说法——“江青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一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画着，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²⁵³陈伯达的说法——周恩来当天告诉我：“江青、张春桥是先到我这里要谈话的，还没有见面，他们却又走了，直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²⁵⁴在与李宇锋等人一起向江青的专车司机李子元核实²⁵⁵之后，并结合自己的经历，杨银禄则说江青当天是独自一人坐车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的，而且原本是去找周恩来的，结果阴差阳错，歪打正着。²⁵⁶后来出

现的吴法宪说法是这样的——“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²⁵⁷此后，吴法宪的说法被研究者广泛引用。后来又出现邱会作的说法——“汪东兴告诉我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毛主席的住处，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住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和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²⁵⁸杨银禄在后来又向江青警卫周金铭调查，得悉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江青确实是一个人坐车去见周恩来的，但车子稀里糊涂开到毛泽东处，弄得张耀祠很不高兴，但江青说：“既然来了，我就进去见见主席吧。”不一会儿，江青从毛的卧室出来，吩咐周金铭：“你给春桥、文元同志打个电话，请他们二位也来主席这里。”没有多长时间，张春桥、姚文元就去了。整个过程，汪东兴始终不在场。²⁵⁹

综合来看，汪东兴的说法属实，但他有意漏掉了他随后向叶群、吴法宪通风报信的关键情节；徐景贤、陈伯达都不是直接当事人，有记忆错误，可以理解；杨银禄2006年的说法反映的是他的所见所闻，虽然真实，但有局限性；吴法宪虽然把汪东兴打电话的时间记错了，但其转述的汪东兴说法中规中矩，符合当时的大背景；邱会作的说法添油加醋过多，明显失真；借助于江青警卫周金铭这个小人物的回忆，杨银禄2014年的

说法还原了真相。同理，要想逼近“九·一三”事件的真相，笔者认为，研究者既要注意李德生、汪东兴、吴法宪这些大人物的回忆，也要给予高振普、张立法、肖奇明这些小人物的回忆足够的重视。

关于庐山会议，另一个小人物，从1970年3月起就参加宪法修改工作的杨福云的《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的序幕》²⁶⁰《“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²⁶¹值得重视。杨福云回忆：

1970年3月17日晚上，康生、张春桥就指示：宪法“序言的语言尽可能与九大通过的党章一致”，宪法“总纲里可以写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毛主席名字前不要加形容词，因为形容词加得越多，毛主席就勾得越厉害”。

杨福云还回忆：

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参加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东北、西南组会议时有针对性地说：“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

当时在中南组旁听会议的杨福云回忆：

8月24日下午，叶群在中南组发言，提道：“有人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下命令收《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人反对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有人反对挂毛主席语录，把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毛主席语录都摘下来了（这时有人插话：‘真是反革命！’）有人反对突出政治……”24日晚上中南组

的会，火药味儿很浓。主要集中攻击两个人：一是指名攻张春桥，二是不指名攻击周恩来。25日上午和下午，中南组的会，都提到了“揪人”，不过，在晚上开会前，叶群、李作鹏给会务人员“来电话要他们自己的发言记录，叫从会议记录本上撕下来给他们送去”。人到齐后，组长曾思玉宣布开会，传达下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曾思玉传达不太清楚，给人的印象，确有人犯了错误，只是不要揪人。所以传达完了以后，有人说：虽然毛主席宽宏大量，但对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还是应该处理，不处理，想不通。

散会后，杨福云向康生秘书李鑫汇报叶群、李作鹏叫工作人员撕会议记录的事情，随后李鑫带杨到康生那里汇报，康生听了杨的汇报后，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康生放下电话后告诉李鑫和杨：“总理马上报告主席。”

8月26日上午，中南组广东小组的中委们，对昨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还不大了解，发言者的思想、情绪还停留在25日晚上以前的状况。有的发言者情绪很大，言辞激烈。他们反复讲，不处理“犯错误”的人想不通，提出来要揪人，至少要让“那几个人”下乡劳动改造。会议基本上按这个调子，开了一上午。在这次小组会上，一些人的发言重提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内容，“不点名”地点了周总理的名，直接点了康生的名。

26日以后，我再也没有到各小组去听会。李鑫通知我，毛主席、周总理要看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的发言，叫我把我记录的他们的发言整理出来。

9月4日下午，周总理参加了中南组会议。他解释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取下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问题，所讲的与他7月18日讲的基本一样。二是关于收《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的问题。周总理说，这是我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收的。前些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三合一”“五合一”的语录本（包括马恩列斯语录、毛主席语录、林彪语

录等），林副主席觉得不好，主要是要宣传毛主席，不要宣传他，叫我发个通知，收一下“三合一”“五合一”的语录本。9月6日晚，康生对宪法修改小组的全体工作人员说，“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下山以后，主席、中央还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庐山发生的事，林副主席是有责任的，主席为了保他，所以没有提他，向你们打个招呼。”

从杨福云的回忆可以推断，林彪、叶群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所以叶群才会在庐山上发言变相攻击了周恩来、毛泽东。而且在叶群的鼓动下，不仅张春桥在中南组会议上遭到攻击，就连康生，甚至周恩来，也受到与会者点名和不点名的攻击。难怪林立果要对张云生说叶群“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呢。

另一个小人物，周恩来秘书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中提道：奉周恩来之命，李作鹏查清256号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后，打过来的电话就是纪东接的，随后纪东就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²⁶²虽然大律师张思之曾经指着相关书稿对李作鹏长子李冰天说过“一个字也不要动！”，但纪东的回忆表明大人物李作鹏的相关回忆确实错了！

朱永嘉在《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和《“九·一三事件”十问十答》二文²⁶³中提到“引发‘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林立果在上海搞的那个《571工程纪要》”，但林立果之所以搞《571工程纪要》是由一系列误会造成的，朱永嘉进而感叹：“回顾‘九·一三’这样一件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却是在一系列小人物、小事情引发的误会等许许多多偶发因素推动下走向了历史悲剧。对林彪而言是走向毁灭之路，对毛泽东而言何尝不是一次重大打击？！”朱永嘉还披露：听徐景贤讲，“事件发生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最后一个到会，毛泽东看到她来，说了一句：‘好久不见，王者无私言’。”朱永嘉进而分析：“‘好久不见’说明九大以后，江青成了政治局委员，毛与她之间是公事的关系。关于林彪的问题，没有与她私下商议过。”“从当时讲，毛如此说是向与会者表示，在林彪事件这一点上，他出于公心，不是出于倾向江青的私心。”另外，朱永嘉说，“九·一三”事件后，许世友主导了对空四军、空五军的严苛清查，这违背

了毛泽东的本意，张春桥、王洪文都不赞同许世友的做法。

《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披露，根据“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夜在人民大会堂当班的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古远兴的回忆：林彪专机出境时，纪登奎、杨德中尚在人民大会堂，他俩还同古远兴对过话；毛泽东是在林彪专机出境后才到人民大会堂的。²⁶⁴这表明舒云、司马清扬关于毛泽东在林彪专机起飞前就到了人民大会堂 118 厅的“调查”或猜测²⁶⁵并不成立。

解学恭的《九届二中全会日记》²⁶⁶“较为全面地记录了会议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华北组讨论的详情，是一份比较难得的史料。”这些日记最好同吴德、汪东兴、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的相关回忆对照着读。

《戚本禹回忆录》提道“因为我专门研究过中央各首长的书法、笔迹（工作需要），所以能够分辨首长的批件。有一次，叶群拿了一份林彪批过的文件让我组织传阅。我一看就说，这字不是林总写的。叶群说，你真厉害。那字确实是林总的秘书代写的，但是经过林总同意的。‘九·一三’事件后，我看到在中央文件里，影印出来的他给林立果的那个手令，那上边的字既不是林彪写的，也不是林彪的那个秘书写的。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模仿着林彪的笔迹写的。”戚还说：“当时并不知道他儿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划谋杀毛主席的阴谋。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儿子的这些阴谋，他教子不严，责无旁贷。”²⁶⁷

（八）来自境外的史料

阎明复的《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²⁶⁸转述了苏联外交官顾达寿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的有关部分，内称：“九·一三”事件后，顾达寿受苏联驻华使馆委派去蒙古的温都尔汗实地查看现场，发现林彪座机是“被击落”的，“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

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达希达瓦在内部发行的《林彪元帅之死》一书中披露了林彪专机发动机和黑匣子被拆走的情况。²⁶⁹

真正有价值的是蒙方解密的《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²⁷⁰，它实际上

否定了顾达寿、达希达瓦的一些不实之词。

另外，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提道：1971年9月13日“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²⁷¹

而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改为：“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还说：‘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后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所附情报是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²⁷²二者的根本差异体现在前者说林彪座机是“坠落焚烧”，即先坠落后着火，而后者说林彪座机是“着火掉下来了”，即先着火后坠落。

对蒙古调查报告以及《毛泽东年谱》相关记述的解读可见余汝信的《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蒋健的《出逃的林彪专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²⁷³

六、水落石出尚需时日

《环球时报》2015年9月14日评论员文章《林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会简单》²⁷⁴认为：关于“九·一三”事件，“当时的中央给出了大致过程，做了结论，之后民间虽有各种演绎及分析，中国官方没有再做回应。”

从《毛泽东年谱》中“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根据林彪的旨意，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拟出《‘571工程’纪要》。”“9月8日当晚，于新野到杭州，陈励耘报告了毛泽东在杭州同他们的谈话内容，于新野向陈励耘传达了在杭州、上海、南京一带谋害毛泽东的方案。”“9月9日，于新野到上海，同王维国密商谋害毛泽东的实施方案后，乘飞机回北京向林立果报告。林立果等人再次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并向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汇报。”等记述²⁷⁵来看，中国官方确实在坚持“当时的中央”的说法，即使对“两案”审理时已经证伪的一些说法也是如此。

《环球时报》评论员还说：林彪“出逃是否还有更多有实

质意义的细节，这是民间长期以来饶有兴味的。除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内幕’的天然兴趣，还有少数人热衷于相关质问，……更像是想从当时轰动的政治变故中榨取对今天政治体制开展批判的价值。”

这表明民间那些对“九·一三”事件官方结论提出质问的研究，很有可能会被官方看成是“对今天政治体制开展批判”。不过，中国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批判实际上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就有了，如《“571工程”纪要》，又如牟宜之的《咏史》——“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秘事谁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²⁷⁶笔者认为，牟宜之的《咏史》与45年后宋永毅的《变异的皇太子政治》²⁷⁷表达的是同一种观点。

古今多少事，最终给真伪、是非做结论的，唯有时间。对于林彪事件，正如牟宜之说的那样：“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²⁷⁸

注释：

1 马克昌：《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西安：长安出版社，2007，页28-29。

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页551—552。

3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同上，页709-710。

4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310-329。

5 于南：《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党的文献》，1992年3期；于南：《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南巡考述》，《党的文献》，1993年5期；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处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实》，《党的文献》，1994年4期。

6 空军大批判组：《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在空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林彪死党吴法宪的罪行材料》，1975年。

7 北京军区党委：《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1974年4月29日。

8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

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44-353。

9 《历史的审判》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历史的审判》（续集）编辑组：《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10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11 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页232-238。

12 刘回年、赵琦、徐心华、周慈朴、杨金洲：《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4日；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没》，《解放军报》，1980年11月24，25，26日；靳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时代的报告》，1980年4期。

13 江波、黎青：《林彪1959年以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1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5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16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17 邵一海：《一个“超天才”的来历》，《追求》，1985年创刊号，72-81页；《一支反革命别动队》，《追求》，1985年2期，73-82页；《庐山风云》，《追求》，1985年3期，页70-81。

18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林彪王朝黑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19 《“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页100-106。

20 《“联合舰队”的覆灭——“九·一三”事件始末》，页270-283。

21 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22 南枝：《叶群野史》，沈阳，沈阳出版社，1988。

23 南枝：《叶群假党员之谜》，《八小时以外》，1982年3期，页46-48。

24 南枝：《〈叶群野史〉三章》，《名人传记》，1989年3期，页84-94；南枝：《毛泽东南巡前后的林家王朝》，《炎黄子孙》，1989年6期，页36-40。

25 《历史的审判》，254-258，369-375，376-381，405-410，页488-493。

26 《叶群野史》，页148。

27 《吴法宪回忆录》，页860。

28 《叶群野史》，页112-125。

29 同上，页 118。

30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页 401、425。

31 萧萧：《“九·一三”事件前前后后的林豆豆》，《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参考资料》，1988 年 21 期，17-28 页；《林豆豆今昔——林彪女儿对林彪出走的披露》，见石翔选编：《中国高干子女沉浮录》，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页 385-406。

32 张云生：《不堪回首的岁月》，《秘书之友》，1986 年 1-5 期。

33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出处同前。

34 《毛家湾纪实》，页 397-398。

35 同上，页 408-420。

36 张宁口述，胡存廉等整理：《扭曲的虹》，《东方纪事》，1988 年 3 期。

37 姚明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台湾，时事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姚明乐《林彪之死——流产政变幕后秘辛》，香港，远东评论出版社，1983。

38 伊白：《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万象》，1987 年 1 期。

39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 318-328。

40 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党的文献》，1988 年 1 期，页 66-73；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一）和（二），《世界知识》，1988 年 1 和 2 期；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党的文献》，1988 年 1 期，页 74-77。

41 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党的文献》，1988 年 1 期，页 62-66；《“九·一三”事件补遗》，《炎黄子孙》，1988 年创刊号，页 43-45。

42 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1-3 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历史在这里沉思》4-6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43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北京，党史出版社，1988。

44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页 559-641。

45 《毛家湾纪实》，页 427。

46 于弓：《林彪事件真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47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页 319-321。

48 《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页 278-313。

49 笔者注：指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和靳大鹰的《“九·一三”

事件始末记》。

50 王灵书：《纪登奎与我的一次谈话》，《瞭望周刊》，1989年Z1期，页42-44。

51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11期，页4-11。

52 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1期，23-35页；《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页10-21。

53 熊华源、安建设：《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44。

54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页205。

55 《李德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页418。

56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97。

57 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页47-62。

58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89-127。

59 同上，页109-110。

60 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163-164；《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页195-196。

61 《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页452-467。

62 肖思科：《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图们、肖思科：《震惊世界的77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63 《超级审判》，页87-91。

64 《震惊世界的77天》，页77。

65 《超级审判》，页192-193。

66 《震惊世界的77天》，页88-90。

67 《超级审判》，页152-154。

68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页104-105。

69 《超级审判》，页157。

70 李耐因：《“九·一三”前林彪、江青470次通话》，《炎黄春秋》，1997年7期，页47-49。

71 卢弘：《林彪江青集团主犯受审记》，《文史春秋》，1999年4期页10-16，5期页34-39，6期页15-21。

72 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15-256页；

《“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百年潮》，2007年6期，页18。

73 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69-90页；
《林彪与毛泽东对峙的一瞬》，《大江南北》，1992年5期，页14-17；
《镜头下的中南海》，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页66-86。

74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92。

7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76 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二十一世纪》，2008年5月号。

77 丁凯文：《寻找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548-550；蒋健：《1971，林彪是否对毛泽东不辞而别？》，《记忆》101期，2013年8月31日。

78 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上），《战略与管理》，2013年1/2期合集。

79 《林彪秘辛大公开》，《亚洲周刊》，1994年2月6日，页52-57。

80 李安定：《一个西方记者采访林彪之死真相的旅行》，《视点》，1994年6月8日，页42-46。

81 蒋健：《历史不忍细究——揭开“九·一三”事件中的黑匣子之谜》，《记忆》119期，2014年9月30日。

82 敖其尔：《今日温都尔汗》，《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第1版。

83 岚叟：《卫队长记忆中的“九·一三”前夜》，《中华儿女》，1994年5期，页28-36。

8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5 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1967-2002。

86 《周恩来传》，页1995。

87 汪东兴：《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1期，页27。

8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440。

89 丁凯文、司马清扬：《找寻真实的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页557。

90 靳大鹰：《“九·一三”事件始末记》，《时代的报告》，1980年4期，页5。

91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页115；张聿温：《温都尔汗爆炸记》，页75-76。

92 《周恩来传》，页 1992。

93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 234-243。

94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 76-85。

95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页 170；《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 2 版》，2013，页 125。

96 高振普：《“九·一三事件” 50 小时内的周恩来》，《炎黄春秋》，1998 年 1 期，页 8-11；《周总理在接到张耀祠报告之后》，《中华儿女》，2000 年 4 期，页 9-13；《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 119-130。

97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1-174，页 286；《周恩来卫士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页 199-214。

98 董保存：《我为毛泽东管家——吴连登同志访谈录》，《党史博览》，1994 年 1 期，26-27 页；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页 513-518；元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 129-130；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页 168-174。

99 笔者注：周福明把“9 月 12 日晚上”误说成“9 月 13 日晚上”了。

100 朱秉秀：《邪不压正：“九·一三”事件纪实》，《上海党史研究》，1996 年 6 期，页 24-26。

101 张立法：《“九·一三”，我在空军指挥所》，《党史博览》，1999 年 12 期，页 47-48。

102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 年 11 期，页 10。

103 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引自司马任主编的《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页 402-419。

104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184-190。

105 张聂尔：《叶群其人》，《八小时以外》，1997 年 5 期，页 77-78。

106 张聂尔：《有关林立果》，《八小时以外》，1997 年 6 期，页 74-76。

107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1998；《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108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页 372-424。

109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页 218-219。

110 李衡：《林彪女儿林豆豆打破沉默，为林彪翻案——林豆豆访谈录》，《天安门》，1998 年 8 月号。

111 罗点点：《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广州，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 283-286。

112 《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页 290-291。

113 《毛家湾纪实》，页 370。

114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 228-244。

115 史小力：《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炎黄春秋》，1998 年 1 期，页 12-18。

116 张宁：《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自己写自己》，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117 《自己写自己》，页 249-250。

118 李安定：《一个西方记者采访林彪之死真相的旅行》，《视点》，1994 年 6 月 8 日，页 44-45。

119 《自己写自己》，页 252，页 295。

120 刘世昌、袁正元、高德明、宁焕星：《〈英雄在“九·一三”事件中惨变〉一文有不实之处》，《炎黄春秋》，1998 年 10 期，页 64-68。

121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 年 2 期。

122 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中华儿女》，2000 年 9 期，页 4-11。

123 广辛：《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传记文学》，1997 年 4 期，页 17-29；康庭梓：《“九·一三”大难未死的机组人员》，《通俗小说报》，1998 年 7 期；康庭梓：《林彪叛逃座机上没安装超低空飞行设备》，《传记文学》，1998 年 8 期，页 63；木辛：《林彪座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北京纪事》，1999 年 3 期，页 4-9；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 年 4 期；木辛：《“九·一三事件”中的林彪专机组》，《党史博览》，1999 年 5 期，页 20-23。

124 康庭梓：《林彪座机副驾驶谈三叉戟 256 号黑匣子》，《文史精华》，2000 年 8 期；康庭梓：《“林彪座机”机组人员的定性》，《文史精华》，2000 年 11 期；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中华儿女》，2001 年 2 期；康庭梓：《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直升机遭劫经过》，《文史博览》，2001 年 2 期；康庭梓：《“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军专机师指挥所》，《湖南文史》，2001 年 3 期；康庭梓：《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

之一、之二、之三，《航空知识》，2002年2期、3期、4期；王焕今、康庭梓：《我教周宇驰学飞行》，《文史博览》，2002年5期；康庭梓：《“九·一三”之夜的空军指挥所》，《中华儿女》，2002年9期；康庭梓：《林彪座机副驾驶细说“九·一三”坠机》，《文史精华》，2004年9期；康庭梓：《“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人员的走与留》，《文史精华》，2006年11期；康庭梓：《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吗》，《法制博览》，2012年3期。

125 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126 《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65-66。

127 佟玉春口述，舒云整理：《我所亲历的“九·一三”事件》，《党史博览》，2012年10期，页44-46。

128 蒋健：《林彪座机上有黑匣子吗》，《文史精华》，2014年1期，页66-71；蒋健：《林彪座机是如何在蒙古坠毁的？》，《汇报》，2016年7月，总第26期，页144-155。

129 王海：《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232-234。

130 刘懋功：《我当军区空军司令的特殊经历》，《人物杂志》，2000年11期，页25-38；《我当军区空军司令的特殊经历》（续），《人物杂志》，2000年12期，页36-48；《我当军区空军司令的特殊经历》（续），《人物杂志》，2001年1期。

131 时念堂：《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民主与法制》，2005年3期。

132 一直在看：《父亲的空军生涯——913之夜》，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05年3月14日。

133 木辛：《“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军指挥所》，《湖南文史》，2001年1期，8页。

134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炎黄春秋》，1993年11期，页10。

135 曾林辉：《女儿的回忆——“九·一三”后的曾国华将军一家》，《记忆》总74期，2011年8月30日。

136 陈雷、黄建河：《林彪专机服务队长访谈》，《党史纵横》，2013年11期，页44-46。

137 高德明：《将林立果“天才化”的造型内幕》，《中华儿女》，2000年1期，页91。

138 高德明：《从绝望走向疯狂的林立果》，《中华儿女》，2000年2期，页94-96。

139 高德明：《林立果在“九·一三”前的六个昼夜》，《中华儿女》，2000年12期，页49。

- 140 明晓、赤男：《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
- 141 赤男、明晓：《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
- 142 刘岩：《我参与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回顾》，《中华儿女》，2000年9期，页47-56。
- 143 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 144 《在大漠那边》，页258。
- 145 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46 鄂吉成、王凡：《红色警卫》，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 147 张思之：《重访李作鹏索诗琐记》，《文史精华》，2004年1期，页37-41。
- 148 郑振东：《我参与审判吴法宪》，《党史博览》，2004年1期，页49-53。
- 149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
- 150 《十年一梦》，页156-163，页182-186。
- 151 同上，页206-208，页211-225。
- 152 《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3。
- 153 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页254-267。
- 154 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第二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页254-267。
- 155 马克昌：《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页162-170。
- 156 闫晶明：《我的丈夫郭玉峰》，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页52-54。
- 157 武健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党史博览》，2011年12期，页42-45。
- 158 吴忠口述，陈楚三、李大震整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1期，页22-27。
- 159 李维赛：《吴德、吴忠与林彪、江青集团的覆灭》，《军事历史》，2004年3期，页46-47。
- 160 郝志伟：《黄土高原的清风》，2014年，页225-226。
- 161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页62-69。

162 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炎黄春秋》，2013年3期，页46-47；张聿温：《林豆豆在空军报社的十年》（下篇），《党史博览》，2017年5期，页38-39。

163 李德：《林彪读书见闻》，当代中国研究所林彪问题研讨会发言稿，2000年6月；李德、舒云：《林彪的读书生活》，《同舟共进》，2012年4期，页60-63。

164 曾彦修：《林彪的喜读书与“政变经”》，《纵横》，2003年12期，页34。

165 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百年潮》，2000年9期，页52-62。

166 宋德金：《真实的林彪——林彪秘书最后的回忆录》，香港，皇福图书有限公司，2008，页279。

167 张云生、张丛莖：《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页445。

168 迟泽厚：《林彪秘书关光烈》；《关光烈谈林彪》，《南方周末》，2012年2月16日。

169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页460、481。

170 李根清：《我仿林彪字体批文件》，《炎黄春秋》，2014年2期，页58-62。

171 李根清：《毛家湾林彪琐事》，《炎黄春秋》，2014年5期，59-64，页58。

172 李根清：《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炎黄春秋》，2014年8期，页32-36。

173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11期，页47-53。

174 李根清：《目睹林彪题写“四个伟大”》，《炎黄春秋》，2015年6期，页23-24。

175 李根清：《林彪“紧急指示”前后》，《炎黄春秋》，2015年11期，页44-48。

176 李根清：《林彪对江青的一次发火》，《炎黄春秋》，2016年2期，页73-75。

177 李根清：《谭震林的一封信》，《炎黄春秋》，2016年7期，页54-57。

178 李根清：《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与林彪的败亡》，《党史博览》，2017年2期，页38-41。

179 于运深、舒云：《林彪秘书亲述“九·一三”事件》，《同舟共进》，2016年6期，页44-49。

180 余汝信：《1971年5月信稿辨析》，《记忆》总166期，2016

年8月31日；《炎黄春秋》，2014年11期，页53。

181 于运深、舒云：《林彪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同舟共进》，2015年11期，页61-63。

182 李晨：《世纪风铃——当代中国重大事件解密》，台北，天箭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237-255。

183 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转自《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25页，页62。

184 舒云：《林豆豆口述》，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

185 天穹：《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见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

186 邵一海：《“联合舰队”的覆灭》，页270-273。

187 刘吉纯，丁丑：《难忘的“九·一三”前夜——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见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2005年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页74-77。

188 吕学文：《我所亲历的林彪出逃》，《文史精华》，2005年4期，页42-46。

189 肖奇明：《亲历“九·一三”》，《军休之友》，2006年7期，页48-50。

190 姜作寿、舒云：《姜作寿回忆录——我在林彪身边的五年》，《新史记》总35期，2017年。

191 于南：《惊心动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处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实》，《党的文献》，1994年4期，页89。

192 “57号文件”的开头就是“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

193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页804-805。

194 同上，页866。

195 同上，页862-863。

196 同上，页878，880，886，889。

197 同上，页782，843。

198 同上，页859-860。

199 同上，页769-770，788。

200 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2013年3/4期合集。

201 陈伦和：《陈伦和自述》，《文革博物馆通讯（531）》，2006年10月4日。

202 罗浮山：《走近林彪夫人——叶群》，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页612-639。

203 丁盛口述，金光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落难英雄丁盛将军

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9，页 95-96。

204 吴新潮、程诉：《吴新潮眼中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吴法宪》，《文史参考》，2011 年 1 期，页 67-71。

205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 1 月，页 688，679-680。

206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207 《吴法宪回忆录》，页 839。

208 《邱会作回忆录》，页 761-762。

209 同上，页 718，715。

210 同上，页 721-722。

211 同上，页 680，716。

212 同上，页 723，779-780。

213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页 146-148。

214 《邱会作回忆录》，页 784，798。

215 同上，页 787。

216 同上，页 792-794。

217 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218 程光在《心灵的对话》前言中说：“1996 年我因病在家中住了三个月，和父亲天天畅谈，‘对话’形成了最早的初稿，第一个读者当然是父亲。”

219 《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页 861。

220 《历史的审判》，页 146-148。

221 《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页 846-847。

222 《李作鹏回忆录》，页 694；《吴法宪回忆录》，页 863。

223 《邱会作回忆录》，页 749-750；《李作鹏回忆录》，页 681。

224 《李作鹏回忆录》，页 886-887；《邱会作回忆录》，页 787-788。

225 同上，页 885。

226 同上，页 783，786-787。

227 同上，页 790-791。

228 同上，页 792。

229 同上，页 698。

230 同上，页 789。

231 同上，页 693-694。

232 胡耀萍：《我的父亲胡萍》，见《老照片》第 76 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页 97-113。

233 舒云：《回眸 1971：再探“571 工程”之谜》，时代文学，2004 年 4 期，页 30-31；《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 456-457。

- 234 《历史的审判》（续集）编辑组：《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页 319，327。
- 235 黄春光、邱路光：《对话“九·一三”》，《记忆》总 75 期，2011 年 9 月 13 日。
- 236 《王维国遗稿》，《记忆》总 76 期，2011 年 9 月 30 日。
- 237 于鹏飞、杜鹃：《“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一）》，《记忆》总 91 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但悲不见九州同”——王维国遗稿读解（二）》，《记忆》总 92 期，2013 年 1 月 31 日。
- 238 程光：《邱会作家书》，香港，明镜出版社，2014，页 278。
- 239 向红：《四十年有感》，《记忆》总 77 期，2011 年 10 月 21 日。
- 240 程光：《我所见到的叶群》，见程光著《往事回眸》，香港，北星出版社，2012，页 16-29。
- 241 余汝信：《“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
- 242 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炎黄春秋》，2013 年 9 期，页 36-44。
- 243 《吴法宪回忆录》，页 775-776；《邱会作回忆录》，页 675-676。
- 244 《吴法宪回忆录》，页 864-865。
- 245 吴法宪：《毛泽东林彪恩仇记》，香港，哈耶出版社，2016，页 80-81。
- 246 程光：《邱会作家书》，香港，明镜出版社，2014，页 271-288。
- 247 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四）——江青与林彪》，《百年潮》，1999 年 4 期，页 69-73。
- 248 杨银禄：《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党史博览》，2010 年 1 期，页 51-53。
- 249 丁东：《江青提级》，《文史参考》，2011 年 11 期，页 51；《心灵的对话》，页 282-283。
- 250 杨银禄：《我所知道的江青提级之事》，《党史博览》，2012 年 9 期，页 53-54。
- 251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页 45-46。
- 252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 1575。
- 253 徐景贤：《十年一梦》，页 218-219。
- 254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页 375。
- 255 李子元、阎长贵、李宇锋：《专车司机谈江青》（下），《党史博览》，2014 年 8 期，38-39 页；根据李宇锋等人 2004 年 10 月 28 日、2005 年 11 月 8 日和 12 月 13 日对江青专车司机的访谈，庐山会议期间江青并没有带

张春桥、姚文元去见过毛泽东。

256 杨银禄：《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党史博览》，2006年1期，页50-51。

257 《吴法宪回忆录》，页800。

258 《邱会作回忆录》，页708-709。

259 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页151-152。

260 杨福云：《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的序幕》，《中国人大》，2003年11期。

261 杨福云：《“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上），《中国人大》，2004年11期，51-54页；《“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中），《中国人大》，2004年12期，页32-35；《“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下），《中国人大》，2004年13期，页50-52。

262 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页122。

263 朱永嘉、顾训中：《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10期；《“九·一三事件”十问十答》，《领导者》，2011年11期。

264 刘辉山、古远兴：《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页218。

265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页520-521；司马清扬：《周恩来与林彪》，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页569-574。

266 解学恭：《九届二中全会日记》，《炎黄春秋》，2015年6期，页63-70。

267 《戚本禹回忆录》，北京，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593，页712-713。

268 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炎黄春秋》，2009年10期，页27-28。

269 孙一先：《林彪坠机后，因何没找黑匣子？》，《文史博览》，2010年10期，页16。

270 余汝信收集整理：《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新史记》总31期，2016年，页77-82。

271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602-1603。

272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页 405-406。

273 余汝信：《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南方周末》副刊，2016年3月31日；蒋健：《出逃的林彪专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兼谈蒙古对中国三叉戟飞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的解读》，《记忆》166期，2016年8月31日，页 21-34。

274 单仁平：《林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会简单》，环球时报，2015年9月14日。

27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页 298，316，399-401。

276 牟宜之：《牟宜之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页 183。

277 宋永毅：《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新史记》，2016年总第33期，页 59-75。

278 清秋子：《国士——牟宜之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页 354-356；《牟宜之诗》，页 185。

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刍议

唐少杰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帶引号）时期的著述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一般是指毛泽东在1966年5月至1976年9月期间亲自写下的专门文稿，这类文稿已收录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一套共计十三册的文稿，只有第十二册、第十三册收录了毛泽东1966年1月至1976年7月的文稿，这两册文稿还包括毛泽东在此期间的一部分讲话稿（或部分谈话纪要）、批注、批示、短信、对有关文章文件的修改评语、以毛泽东名义发布的声明和以毛泽东等人名义给外国有关人士发送的电报，以及两首诗（《有所思》《呈郭老》），等等。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文革时期著述”，特指毛泽东文革时期亲自写下的，不同于上述讲话稿的，篇幅在数百字以上的文稿。根据这两册文稿的收录，毛泽东的这类文稿共有五篇，这五篇文稿关系到文革的指示、策略、进程、转向、方向等，目录如下：

1. 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即《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780余字），亦即著名的“五七指示”。

2. 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1800余字）。

3. 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490余字）。¹

4. 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50余字）。

5. 1970年8月31日《我的一点意见》（780余字）。

已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十三册还

没有完整地发表或收录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全部文稿以及全部讲话稿（或谈话纪要）、批示或批注等。已经发表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文稿约计 560 篇（自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7 月），没有公开的或者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表的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文稿，数目不详，究竟是多于还是少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文稿，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其每一册的“出版说明”中云：“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² 例如，这一文稿就没有发表或收录毛泽东 1967 年 8 月 4 日写给江青的信。关于这封信，只是在有关文革史著作中有所提及，³ 据披露，毛泽东的这封信提到了文革初期两个著名的举措：一、“武装左派”，二、群众专政。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这一封信在文革时期和文革之后，都没有公开发表。据悉，这一封信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由江青传达过。⁴ 还有，收录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的“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⁵ 实际上是没有经过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之一，这些批评是在 1976 年 10 月 18 日之后作为“四人帮”的罪证材料而公布发表的，把它们收录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分必要，非常重要，但与上述“出版说明”的那种说法却有所出入。

因而，根据至今已有的发表情况和资料统计，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亲自写下的著述至少有六篇。这种著述的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 1966 年（实际上主要集中在 5 月至 8 月），共计 4 篇，即《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五七指示”）、《给江青的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70 年 1 篇，即《我的一点意见》。由此可见，一方面，毛泽东在 1968 年至 1969 年，在 1971 年至 1976 年，亲自写下的专门文稿成为“空白”。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在文革所有年份的有关批注、评语不重要，例如，1966 年 5 月对后来成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又如，1968 年 8 月对姚文元关于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领导文革的文章的题目修改和大段补充。另一方面，自 1970 年之后，毛泽东没有写下什么专门文稿或著述。

下面，对上述五篇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逐一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五七指示”

它在严格的时间意义上还不属于毛泽东文革时期的著述，因为文革此时还没有正式爆发，但由于这篇著述对于整个文革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甚至成为文革的社会建设的某种“蓝图”，所以有理由把这一著述归到毛泽东的文革著述之中。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的、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⁶毛泽东所向往的这种社会实质上是与传统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勾画的理想社会相抵触的。这种社会的境界其实正如毛泽东在这一指示所提及的，还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军事斗争的经验生活层面。毛泽东所确定的“五七指示”精神，为他的文革社会建设勾勒出一个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各自兼学别样而同时功能齐全的乌托邦目标，这与他青年时期在湖南就有的“新村”“新民”的理想和活动密切相连，⁷更与他一生所奉行的具有平均主义取向、民粹主义底色和民本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理念息息相关。邱会作认为，“《五七指示》正是解决全民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陈伯达起草的《人民日报》当时为了宣传“五七指示”而发表的社论《共产主义宏图》“也正是着力宣传了这个问题”。⁸从“五七指示”不难看出毛泽东一以贯之追求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诸多特性。“五七指示”既与毛泽东1950年代后期激进的乌托邦理念和他“大跃进”的初衷没有什么差别，也对毛泽东所怀念的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只不过是毛泽东把他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推进到了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无论怎样，“五七指示”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领导文革和实施文革所追求、所建设的新世界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着政治上或权力斗争上的因素，但是它更深刻的意义是其意识形态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思想革命或意识形态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文化革命具有最根本的性质。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永久地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创建理想社会的问题。‘五七指示’成为‘文

化大革命’重要的意识形态依据，就在于它体现毛泽东对新人新社会的基本构想，是‘文化大革命’的理想目标。”⁹ 据戚本禹回顾，1966年5月中旬，陈伯达和他等到上海毛泽东住处，负责整理毛泽东的这个“五七指示”，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起草中共中央下发学习、贯彻和落实毛泽东这一指示的通知。毛泽东说：解放军总后勤部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¹⁰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¹¹

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五七指示”应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成为由托马斯·莫尔（More）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念在文革中的生动体现和具体实践。从“五七指示”中，不难看出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城》，圣西门（Saint-Simon）的《论实业制度》，傅立叶（Fourier）的《新的工业世界和社会事业》，欧文（Owen）的《新社会观》，以及卡贝（Cabet）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等著作的影子，不难看出张鲁的“五斗米道”，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大同书》，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规划”等主张的痕迹。¹² 尽管“五七指示”言简意赅，但它可谓人类乌托邦史上的一部政治代表作。更重要的是，“五七指示”是文革十余年历史的一部社会实践“纲领”，这一“纲领”在“红色高棉”得到了比中国更加直接具体而又极其残暴的实现。

二、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这封信是目前对毛泽东文革著述争论颇大、歧义颇多的一篇著述。王年一认为，“‘天下大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的核心和要害。”¹³ “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的‘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的‘破’的意见。”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¹⁴ 孙万国对于这封信的真实性和原创性提出了质疑。¹⁵ 刘林元的评论很有见地，这封信是毛泽东在文革“决战前的犹豫和不安心态的袒露。”¹⁶ 但是，王年一下面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说《五七指示》

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则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是姊妹篇。”¹⁷在我看来，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及或者没有直接论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这封信是毛泽东发动和推动文革的一个“秘笈”，可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加以解读。毛泽东对文革这样的“天下大乱”似乎信心满满而又前瞻后顾，他充分意识到他自己会被左派、右派加以利用，但是他的决心已定，“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¹⁸

毛泽东给妻子写下的这封信，可谓“黑话自说”。这封信的原件被销毁而留下了其他人的抄写件，这也说明公开不公开、何时公开、甚至怎样公开这封信都视形势而定。只是到了1972年5月，为了批判林彪，为了表明毛对林有“先见之明”，此信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会议文件之一，才得以正式公布。但是，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毛泽东给江青写这封信，而不是直接给其当时的“亲密战友”林彪或周恩来等写这样的信，畅谈他推动文革的决心、策略、谋划、预想等等，充分表明他对于党内同事已不完全信任了。毛泽东的一番内心话似乎只能直接说给自己的妻子听，正如他在酝酿文革之际把江青放出来，把江青置于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江青就具有了所赋予的独一无二的革命角色和无出其右的权威功能。这就有可能造成文革初期独有的某种局面：毛泽东不便说的话，江青来说；毛泽东不便做的事，江青来做。文革初期，人们很难辨别分清文革的某些策略和举措哪些是毛泽东和江青共同决定和实施的，而哪些又是毛泽东和江青各自决定和实施的。这也就表明毛泽东在文革之初在某种意义上真正有可能告别昔日“右派”分子所批评的“党天下”，趋向毛泽东与江青政治夫妻店的“家天下”。总之，在谋划文革、发动文革和推动文革中，江青起到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起不到的作用！

值得提及的一点，一位海外研究文革的朋友曾经问过我，对于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党委及其领导人被“打倒”，毛泽东本人有什么样的表态？正是在给江青的这封信里，

毛泽东在谈及这次文革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后写道：“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¹⁹毛泽东对于打倒陆平、蒋南翔等人和瓦解北大、清华党委的做法是完全首肯的。这也间接地给清华大学两派论战时有人质疑蒋南翔到底是被“抛”出来的还是被“揪”出来的问题，做出了确凿的回答。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中，指责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进驻大学镇压学生：“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²⁰实际上，陆平、蒋南翔的倒台都是中共上层政治力量的决定，而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问题。

三、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当时，毛泽东的这封信只是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还没有在全党全国传达，但是，包括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内的北京红卫兵不久得知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在全国不胫而走。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显然也是为了要天下大乱。”²¹

此信是毛泽东在看到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两篇文章而写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不仅是文革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是文革最早的青年学生造反组织和造反运动的开路先锋。他们所写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受到了进驻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的批评。这两篇文章由江青转交给毛，毛泽东对于红卫兵及其精神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红卫兵精神”就是上述两篇文章所强调的而很快就成为文革的宗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²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²³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应用的这后一段“造反有理”的话出自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军民纪念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²⁴毛泽东独特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造反文化结合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举”。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遇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统的、按部就班的、党的逐级而又垂直领导的模式的“阻力”，遇到了党内传统的干部秩序和运作机制的某种“遏制”，毛泽

东以三个“很”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极大不满，即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许多干部对于文革的发动群众和深入开展，“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²⁵毛泽东始料不及而又喜出望外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提供的一大批把文革推向全国的、年龄差不多与新中国同龄的（近20岁）、正处在人生最旺盛的生理期和最活跃的心理期的“天兵天将”。

毛泽东这封信不仅对清华大学附属中的红卫兵给予赞许，还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彭小蒙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给予肯定，他在信中向红卫兵所强调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实际上正是红卫兵的固有弊端。红卫兵当时所要进行的首要任务不是什么团结的问题，而是冲向更大的天地，打打杀杀，开创出文革的新天地。毛泽东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似乎一语成谶，红卫兵几乎横扫了一切而最终也横扫了自己，走向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

以毛泽东的这封信和毛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为标志，毛不仅仅成为当时的红卫兵所赞誉的“我们红卫兵的最高红司令”，而且还是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的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发动者和引导者。

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毛与刘少奇决裂的标志，也是他的文革政治与当时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文革政治区别开来的标记。由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²⁶这张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一的大字报，在当时并没有作为真正的大字报张贴出来，而只是毛泽东以大字报的文体发射出了“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文革政策和文革举措的重磅炮弹，致使文革在形式上成为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由中共党的领导转变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²⁷的“大革命”。如果说毛泽东在几天前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是要唤出文革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政治推土机”，那么这张大字报则是毛要更大更广更高地掀起文革群众运动的“排头浪”。

在王年一看来，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²⁸这值得商榷，因为毛只是与刘、邓等部

分第一线领导人决裂。卜伟华也说：“这张大字表标志着毛泽东正式与刘少奇的决裂，标志着毛泽东正式与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决裂。”²⁹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是错的，因为毛毕竟没有与周恩来等决裂。“炮打”一词在文革初期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政治用词，它不同于“打倒”，它和文革初期所用的政治上的“火烧”一词比较接近。在这张大字报发表之际，刘、邓还没有立即被打倒，只是政治上的失势，他们是在1966年10月之后被打倒的。

这张大字报的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主要在于它确定了毛泽东文革所要指向的最大的对象，它第一次表明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层有一个与毛泽东本人格格不入的所谓“司令部”，因而，由这张大字报所开启的毛泽东的文革运作和文革逻辑，打倒、整治、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就浑然成势，势在必行。这张大字报似乎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尽管没有张贴出去的大字报那种形式），在文革整个历史上可谓力敌千钧，并且在文革伊始第一次直接导致了中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改换和重组。

五、《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以批判、斥责文革初期的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这篇檄文写于1970年8月31日，扭转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进程，还在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上打下了难以修补的“楔子”，也直接开启了文革中期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内讧。周恩来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庐山会议上考虑了三天之后才写出来的。³⁰这里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毛泽东在8月30日把在北京值守的黄永胜召到庐山谈话，他对黄永胜的态度大为失望，即黄永胜当时直言不讳地指责张春桥、批评江青，这就使得“毛当时已经很清楚：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³¹

《我的一点意见》，故意夸大其词，敲山震虎，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于陈伯达的数落和痛斥无以复加：“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

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³² 这种说法罔顾事实。邱会作后来回忆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解释说：‘主席说他和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没有配合。’周还举出例子。与其说周恩来为人厚道，还不如说他是在为毛泽东‘打圆场’。”³³ 陈伯达本人似乎把《我的一点意见》当成了“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³⁴ “毛泽东这篇短短七百字的文章，是毛泽东生命最后十年中亲笔所写的最长文字。文章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极尽夸张之能事；初一看，金刚怒目，气冲牛斗；细分析，处处矛盾，似是而非；与第一张大字报相比，确有异曲同工、珠联璧合之妙，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特点，很值得研究。”³⁵

据吴法宪回忆，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原先点名吴法宪，把吴法宪与陈伯达放在一起加以指责，经过周恩来的解释，毛泽东把吴法宪的名字删掉。但是，周恩来还是要吴法宪检讨，为的是保护“副帅”林彪。³⁶ 在写作《我的一点意见》之际，毛泽东的策略是牺牲陈伯达，敲打吴法宪等人，暂时稳住林彪。吴法宪认为，“这次我们打了个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³⁷ 实际上，对林彪、吴法宪等人来说，也是政治上致命的一次。³⁸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谈及所谓的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的不同、唯物论反映论与唯心论先验论的对立，确有实用主义的做法之嫌，这种谈及远远不是指向文革初期广为流行的、在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对他的迷信和崇拜，而是站在所谓“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判处了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的政治死刑。“《我的一点意见》是严厉批判陈伯达有‘野心’，为什么要‘揪出’陈伯达，陈伯达的‘野心’是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这篇文献稳住了林彪，而林彪绝不会不有感于心。”³⁹ 由《我的一点意见》为基点，从陈伯达的倒台到次年林彪的灭亡，就有了特定的历史连贯性和具体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初看起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决不容许未经他认可由林彪等众人围攻张春桥，决不允许由此来动摇文革直至否定文革。在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与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之间，毛选择后者、遗弃前者致使文革不可逆转地全盘衰败。

通过毛对陈伯达——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领班”，毛诸

多重要文章和思想的起草者、编纂者、表述者的弃如敝屣，不难看出，毛保卫文革的决心。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五篇著述在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特定阶段具有独特的取向和意义。具体说来，“五七指示”是文革伊始的社会建设的“勾画图”；给“江青的信”仿佛是全力掀起文革狂澜的“投名状”；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是对文革生力军和突击队发出的“动员令”；《炮打司令部》是直指文革最大的整肃对象的“进军令”；《我的一点意见》是毛泽东开始疏远并敲打林彪军人集团而庇护江青文人集团的“界标”，也是文革中期中共领导层有所裂变的“分水岭”。除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文革时期的四篇著述之间有一定的、相对内在的关联性或互动性，即这四篇著述集中于发动文革、实施文革的谋划、策略、布局和推动等问题。

毛泽东文革著述的发表或公布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些著述在写出之后，往往不是立刻在很大的范围公之于众，而是根据文革的特殊形势和不同要求，或者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式内部传达，或者以《人民日报》等报刊社论的方式加以宣传，或者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之后以“马后炮”的方式在党内逐级传达，或者由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以口头传达的方式告知相关的人员。上述特征，给人们应用和“发挥”这些著述带来了“解释”“再解释”“过度解释”乃至“创新解释”的契机和可能。尤其是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那封信（当时见过或读过这封信的仅有数人），只是在 1972 年 5 月才首次公布，这就必然带来了毛泽东文革著述的写出与其在传播中所出现的信息质量互变的事实，必然带来了人们对这些信息的不同理解。

质言之，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没有撰写任何关于文革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性文章。上述的几篇著述对于文革来说更多的是策略性的、应付性的和工具性的。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兼最高领导者，他对文革的思想指引和精神主导，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对于文革具有特定意义的文件、社论、专文、报告、讲话稿的修改或批注体现出来的。其中，比较著名而对文革的进程具有相当重要作用的有：1966 年 4 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即对“五·一六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⁴⁰ 1968 年 8 月，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

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⁴¹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⁴²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⁴³ 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⁴⁴ 等等。

毛文革时期的著述能力的退化既与毛的年老有关，更可能是因为他在文革之际的地位和权威，使他已经没有必要为文革的诸多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论证了。他主要通过其麾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御用文人或写作班子（例如，“梁效”大批判组）等来传达他的主张和理念，这就使得他的文革著述活动显得七零八落，短小简单，具有了随机应变、有感而发、因时应付等特点。毛的文革著述没有什么系统性、完整性、严谨性，甚至没有什么思想的自洽和逻辑的严密。毛文革时期旨在全面推行和深化他的文革实践，因而他的文革著述直至他的文革理论与这种实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甚至有了不可弥补的裂隙。

毛的文革著述在毛泽东一生的著作史上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并具有了格外反常的意义。这类著述在毛泽东一生的著作中数量不足百分之一，字数只有几千字，但是这类著述成为毛晚年的文革历程的仅有的思想“标记”。实际上，自1958年之后（特别是进入文革之后），毛泽东的著述就与他之前的著述在数量、范围、题材和内容上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有时设问，毛发动和领导文革这场横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大革命”，在理论上、在著述上，有没有什么可真正建树的东西呢？

例如，构成文革意识形态的三大理论“阶级斗争论”“继续革命论”和“全面专政论”，毛就没有什么系统的、像样的论述，他更多的是对他手下的御用文人和写作班子的相关文章的修改和批注来加以发挥和凸显他的文革主张和思想。

显然，由于毛泽东本人在文革时期没有一本或者一篇专门的文革著述，由此，也就不难从某个侧面映现出文革的精神生机之劣、思想活力之低和理论创造之差。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和思想与文革实践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可弥补的矛盾和不可克服的张力（tension），它彰显了文革精神世界的贫瘠和破败。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的今天，重新解读毛文革思想的“活标本”和文革精神的“活化石”，对我们理解文革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435页此信手迹照片下面标明的时间是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十二册第87—88页全文发表的此信，经过修改。毛泽东向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交此信所标明写作的时间是8月1日。此信实际上已在7月31日写出。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至第十三册，每册第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至1998。

3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第57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另注：见到过此信全文复印件的卜伟华先生告知我，毛泽东这封用铅笔写出的信，篇幅也只有两三百页。引自卜伟华2016年4月1日致唐少杰的电子信件。另据高文谦披露：1967年，“八月四日，避居上海的毛以‘毛润之’的署名单独写信给江青，表示同意林彪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两个问题，称‘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232，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4 参见王力：《王力反思录》（下），页1012—1013，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页394—39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5，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7 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页406—412，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二版。参见逢先知主编、冯蕙等副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上卷，页4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8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上），页341，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实际上，《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发表的社论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该社论用黑体字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勾勒出了一幅文革按照“五七指示”所要奋斗的前景：“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

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 62，内部发行，北京，1988。

9 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页 208，台北，洪业文化有限公司，2000。

10 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下），页 397，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

11 同上，页 401。

12 参见陈伯达的说法，同上，页 399。

1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4 同上，页 2。

15 Warren Sun, “Half-Truths and Half Fake in the making of Mao’s letter to Jiang Qing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办的“写毛泽东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之一，2013 年 10 月 25 日。

16 刘林元：《决战前的犹豫和不安心态的袒露——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解读》，《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5 年第 11 期，页 24 至 31。

1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8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 55，内部发行，北京，1988。

19 同上，页 56。

20 转引自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页 444，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

2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2，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2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 65，内部发行，北京，1988。

23 清华大的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上，页 66。

24 毛泽东的这一讲话以及这一名言没有收录到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

25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 73，内

部发行，北京，1988。

26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7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页 73，内部发行，北京，1988。

2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55，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9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页 194，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卷，页 1023，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1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页 718，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

32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页 476，内部发行，北京，1988。

33 程光著：《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页 487，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34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修订版）》，页 391，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35 同上，第 393 页。

36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 811，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另可参见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页 719，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

37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 817，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38 按照吴法宪的说法：“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参见：《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页 823，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按照邱会作的说法：“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问题。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林彪不能独吞果实。”参见：《邱会作回忆录》（下），页 81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

‘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页 157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9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 404,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 40—4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1 同上,页 526—532。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页 163—18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3 同上,页 242—250。

44 同上,页 486—490。

近十年文革口述史一瞥

丁 东

本文所讨论的口述史指采访人与口述者共同完成的史学作品。历史当事人独立撰写的回忆录不属于口述史。有的回忆录在完成过程中有口述史环节的参与。比如《戚本禹回忆录》（文革出版社 2016 年）在形成过程中，戚本禹接受过大量口述采访，孟繁华等在录入基础上参与文字整理，最后署名戚本禹著，在书末对孟繁华等表示感谢。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注释的《亲历重庆大武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1 年）一书，形成之初有过口述环节，最终何蜀是在李木森自撰文稿基础上完成的。《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含文革回忆，是冀朝铸用英文写成初稿，家人用中文转述，再由苏为群记录整理。本文暂不将这些特殊情况列入考察范围。

口述历史的记录手段有文字、录音、影像等形式，本文主要考察见诸文字的口述史。

口述史在抢救文革史料，推动文革研究中，呈现出特殊的意义。文革距今半个世纪，一些历史当事人在世，有口述回忆的可能。档案部门掌握的文献受到严格管控，越是关键的档案开放程度越低，一般学者难以查阅，这种特殊的国情，提升了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权重，通过采访当事挖掘第一手的文革史料，已经成为文革研究的常见途径。有关文革史的许多空白，都是通过口述史渠道破题的。虽然口述史由于受到当事人记忆力局限和主观意识的左右，与文献档案相比有自身的弱点，但口述史的优势在文革研究中已经不可忽视。

一些口述历史的著作已在 2006 年以前出版。如吴德口述，朱元石采访《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口述》（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陈晓农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刘小萌采访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杨健、贺黎采访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等书和李海文采访，李雪峰口述的《文革十年》部分章节，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版文革研究著作越来越难。报纸杂志等等媒体发表文革口述史著作空间也很小。有些文革口述史著作只好谋求在香港等地出版。有些则以自印本的方式在小范围流传。还有一部分文革口述史通过网站、博客、微信等方式在网络上流传。

一、两案有关人员的口述史

审判林彪、江青集团被称为“两案”。受到两案牵连的人员，文革中大多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他们口述文革经历，有特殊价值。

《己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由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邓杰整理，大风出版社2014年出版。口述史和整理者都是史学家。金光耀是复旦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邓杰是其博士生。他们2004年开始，大约用两年时间完成此书的采访和整理。朱永嘉文革中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两案审判被判有期徒刑14年。他的回忆主要是两段，一是以明史专家的身份协助姚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二是参与上海一月革命。官方正史的说法，姚文元文章的写作是江青和张春桥背着上海市委进行的。其实，陈丕显和上海市委对姚文元文章的写作不但知情，而且全力支持。朱永嘉的口述提供了翔实的细节。上海市委写作班作为机关干部决定造反，参加一月革命，朱永嘉的口述也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这些事情虽然发生在上海，却与文革全局相关。朱永嘉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被采访者。他本人也是一个有特殊政治经历的饱学之士。他对文革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本书在香港出版，给朱永嘉提供了表达观点的机会。

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是两案主犯之一，被判有期徒刑18年。和他命运相似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晚年都撰写出版了回忆录，受到史家重视。而

黄永胜从秦城监狱到青岛保外就医不到两年，就于1984年病逝，没有机会写回忆录。但他晚年和儿子黄正的若干谈话，以“答问录”为题，收入黄正所著《军人永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一书，这一节虽然只有几千字，但由于黄永胜地位特殊，亦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可惜作者是作家，不是史家，记述黄永胜晚年谈话没有采用规范的史笔。

刘庆棠原来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饰演洪常青，文革中被提拔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两案时被判有期徒刑17年，2010年病逝。学者陈徒手在他晚年作了采访，形成《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一文，在《信睿》杂志公开发表，网上也有转载。虽然篇幅不足万字，但讲述了对江青的印象和王洪文被捕后的独特细节，受到关注。

丁盛在文革期间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1972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广州军区司令员，1973年底调任南京军区司令，是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十届中央委员。

1977年3月被停职审查。检方认为他1976年春天在上海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半夜密谈，是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意图参加上海武装叛乱，视为从犯，1982年7月决定免于起诉，开除党籍，退出现役，降格安置地方，直到逝世。他生前留下口述，由金光整理、余汝信编注为《落难英雄》一书，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出版。丁盛和江青集团没有历史渊源，认定他参与上海武装叛乱证据牵强。他晚年不服，到北京上访遭到冷遇，向老上级聂荣臻求助未果。他虽抑郁而终，毕竟把自己内心的记忆留了下来。

施义之文革前是21军政委。1966年8月，被中央调到公安部任副部长级政治部主任，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77年5月，施义之被停职审查。1983年12月，公安部以施义之在“清查公安部档案”“伪党案”事件中，参与诬陷迫害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活动，给“四人帮”报送材料等五大罪状，上报中央，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批复，将他开除党籍、军籍，只发少量生活费。他晚年口述，由夫人陈枫整理，完成《特殊环境下的十年经历》。他1995年10月29日逝世。十年后，由陈枫主编的《血与火的历练——施义之纪念文集》出版，将这部口述史收入其中，《炎黄春秋》选发了《李震之死》等章节。施义

之的口述没有过多地纠结于个人的冤屈，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叙述文革期间在公安部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内情。如关于“砸烂公检法”口号的扩散经过，施回忆：“1966年底我到公安部时，‘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内部大字报和批斗会场上时有出现，但听到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是在‘七·二〇’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7月22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机场迎接。公安部有李震、于桑和我去了。谢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联络站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还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李震致辞，谢富治讲了话。会后部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谢富治对李震讲：‘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还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办的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看来除了这个办法外，没有其他办法了’。第二天联络站的马文华拿来稿子要我审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后，由联络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分发到各省、市、自治区。‘7.20’事件以前，各级公检法部门已被冲击、被破坏，这个口号捅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谢富治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这就说明，‘砸烂公检法’其实也就是‘最高指示’。由于这句影响甚巨，在1970年11月至1971年春的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争议颇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其实毛泽东也是为自己打圆场，“公检法彻底闹革命”与“砸烂公检法”哪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施回忆，“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是周恩来的推断，往此一方向查案，是周恩来本人的意见，将于桑、刘复之“保护审查”，发动公安部的干部揭发于、刘也是周恩来的决定。文革结束后，这些“罪责”却推到施义之等执行者身上。

丁盛、施义之虽然没有判刑，却丢失了所看中的党籍军籍，成为政治牺牲品。和他们同时参加革命的高级将领，晚年享受体制规定的厚待，他们却晚景凄凉，求告无门。好在社会舆论

已经不是墙倒众人推，他们得到了一些战友和熟人的同情，这也成为他们口述真言的心理动力。

林启予文革中是天津市工代会负责人。他文革前毕业于天津大学，是一个青年技术员。文革中参加造反，任天津市工代会核心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6985 工厂建设工程副总指挥，天津市总工会副主任，1973 年加入中共。1975 年 1 月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又任天津市地震局局长。虽然以天津工人运动代表性人物的身份进入政界，后来已经是干部行列中的一员，参与了天津市的多项重大政治经济活动，与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康生、江青、王曼恬、姚文元、郑维山、戚本禹、杨成武、李雪峰、解学恭、华国锋等均有接触。文革结束后，主持天津“揭批查”运动的张淮三报复心重，不但将林启予开除党籍，而且赶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正式实行之前，将林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林启予 1988 年释放后经商。经王端阳促成，由周新民、杨祁整理的《尘封的岁月——林启予口述》，于 2011 年出了自印本。全书共八章，标题分别是关于我、造反的缘由、卷入文革大潮、中央首长的 11 次接见、进入市革委会、离开五代会、造反的结局、十年监狱生涯，为研究天津的文革史填补了空白。

程铁军所著的《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则由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7 年出版。

二、受迫害的高级领导人亲属的口述

刘少奇是文革的头号目标，于 1969 年去世，夫人王光美活到了刘少奇平反以后，得以口述全家遭遇。《王光美访谈录》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采访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全书共 72 节，其中有 6 节系文革回忆，加上其他与文革相关的内容，总共大约五万字。作者采访王光美是刘少奇研究的相关部分。叙述内容从中央结论出发，提供了不少感受高层政治脉搏的线索。王光美口述的细节可能多于出版物，整理时也许作了筛选。

张闻天是毛泽东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的中共总书记。1959 年被打入彭黄张周集团，1976 年 7 月病逝。夫人刘英活到平反以后。刘英曾在中共中央中枢工作，亲历高层政治，有“活

党史”之誉。她在1990年代接受何方多次采访，由宋以敏整理成《刘英同志跟我谈党史》，记述了中共高层人际关系的大量珍贵细节，全文8万字，分十节，第十节是刘英对文革期间她和张闻天受到审查、冲击和流放经历的回忆，有一万余字曾在《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选登。全文收入何方的《党史真相》一书，于2017年在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

何方以国际问题和党史研究的成就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是刷新党史研究的重镇，又是张闻天生前的助手。刘英与何方交谈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宋以敏是何方夫人，研究国际问题的资深专家，也是访谈的参加者。她的整理稿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历史细节信息，高于内地公开出版时的另一本《刘英自述》。

三、文革中某些群体的专题口述史

米鹤都从1980年代就介入红卫兵一代的研究。后来北京传奇公司动议，开展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口述史，由米鹤都主编。笔者和邢小群、赵诚等也参与了一些采访。出版两卷《红卫兵时代的风云人物》之后，米鹤都独立坚持这一选题，又出版了四卷，题目分别为《难得本色任天然》《光环与阴影》《往事与尘埃》《当时年少曾轻狂》。其中大部分在香港出版，只有《当时年少曾轻狂》在大陆公开出版。他先后采访的人物包括卜大华、秦晓、李冬民、王宇、侯瑛、伊林、涤西、谭力夫、蒯大富、陈小鲁、刘龙江、叶维丽、贺延光、章立凡、李大同、老鬼、傅红、任志强、孔丹、刘辉宣、章盾之、成小秦等，都是北京市大中学生在文革中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老红卫兵、西纠、四三、四四派和大学生中五大领袖成员。米鹤都对文革史和这一代人的命运有系统的思考和研究，采访规模较大，涉及面宽，也有深度。

邢小群采访的李大同、贺延光二人，也是红卫兵一代，收入米鹤都主编的书中，也收入邢小群自著的《我们曾历经沧桑》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李大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文革中到内蒙古插队。贺延光是《中国青年报》摄影总监，1976年参与四五运动而入狱。他们都是红卫兵一代中的较早觉醒者。邢小群此书还收入了她对数学家杨乐的采访，

请他口述文革时期和张广厚共同数学研究的经历和文革结束后受到国家层面重视的原因。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原有的科学研究秩序受到冲击，有条件开展的项目很少。杨乐、张广厚从事的数学研究，不需要特别的实验条件，主要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天赋与努力，而且他们在文革前读研究生时已经接近了国际数学研究的前沿。在文革中期，他们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论文成为来华访问的美国数学家看重的极少高水平成果之一，因而在文革结束后恢复专业职称评定和学部委员评选时成为正面典型。

邢小群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口述史还有《小谈往事》（中信出版社 2013 年出版），本书不是文革口述史专题著作，其中收入了纪坡民口述的《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披露了文革高层政治生活的一些重要细节。

邢小群还与笔者合著了口述史著作《八十年代中国政改夭折内幕》，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 2015 出版。本书主旨是由历史当事人讲述 80 年代的政治改革，但关志豪讲述文革后期《中国青年》杂志筹备复刊的情况等等部分细节也发生在文革时期。

熊卫民现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从 2000 年开始对中国当代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人员进行口述采访，已经采访百人以上。其中部分采访涉及文革。他出版了口述史著作有《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出版）。沈善炯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化学和分子遗传学家，自述共十章，第七、八两章为文革回忆。1976 年，中国科学院派分子生物学代表团赴英法访问，沈善炯任团长。当时出国规矩很多，不能一人独自外出，至少要三人同行。沈善炯虽是留美博士，多年不说英语，也不看书，与英国科学家交流已缺底气，另外几位团员更不具备语言交流能力。沈善炯作为团长，为了顾全面子，只好提几个问题。但和外国人说了什么话都要向使馆汇报，他只好逐日把当天的情况记下来。别的团员可以逛街、采购、游览，沈善炯却要准备给使馆的汇报提纲，十分疲乏，在团内显得很孤立。访问法国时正好赶上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代表团 10 月 21 日离开巴黎，经贝尔格莱德回国。在机场，驻南斯拉夫大使张海峰专门约见沈善炯，告诉他到布加勒斯特后，同机将有一个教育代表团，团员有张铁生及“梁效”成员等。现在他们不准备访罗了，要从布加勒斯特打道回府，为 6666 号，让他注意。

沈善炯在飞机上看到了体格魁梧的张铁生。“24日上午10点左右抵达北京。一出机场，这些所谓教育代表团的人就都遭到逮捕。我因为坐在前排和这些人在一起，所以杂在他们中间走下机舱，空中小姐把我推开，叫我慢点走，对来捕人的警察说‘这个不是’。”

邹承鲁等20余位科学家的口述形成了《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项目时间跨度从1958年到1984年，其中包含文革十年中这一科研项目的相关活动。熊卫民还出版了科学家口述史自选集《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要说》（东方出版社2017年），全书18篇，其中有一些篇目涉及文革时期中国科学院的活动。比如宋振能关于1972年全国科技工作的回忆，关于胡耀邦1975年到中科院主持工作，关于华国锋倡议召开百家争鸣座谈会等，都有补充文献之缺的意义。

董国强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他原来在南京大学任教，完成了《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纽约柯捷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访谈对象都毕业于南京大学，其中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是南大前身“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友。他们接受采访时的年龄在54岁至83岁之间。除了耿昌贤后来到工厂工作，其他十三位都长期在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任职。董国强2005年在给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上“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课程时，学生提出南大文革问题。南京大学文革爆发早，中央人民广播播发聂元梓大字报第二天以后，南大就发生了“六·二事件”。

6月16日《人民日报》进行报道，将南大校长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黑帮”。诞生于南大的组织“红色造反队”与“八·二七革命串联会”被称为“江苏‘文革’的发动机”。“一·二六夺权”以后，江苏各地群众组织唯南大两派马首是瞻。两派群众组织的领袖与中央高层和江苏省的主政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76年发源于南大的南京“三·二九运动”是全国性的“四五运动”的先声。本书访谈对象包括“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和“逍遥派”等类型，合在一起，大致呈现那个时代的整体面貌。

《小三线建设》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徐有威主编，陈锦华等多人口述。小三线建设

是全国性的行为，本书采访的范围是文革初期实施的将一批上海市军工企业和研究所迁到皖南的活动。到1984年结束，人员撤回。本书采访的对象有数十位，包括上海市的领导干部，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以客观的语境展示了小三线建设付出的巨大代价。为口述上海丛书之一种，201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

阎长贵、李宇锋对周淑英、赵柳恩做了关于江青的系列采访。周、赵都长期担任过江青的服务员，全文有五万字。《炎黄春秋》登了其中三个部分，第四部分在其他媒体发表。讲的都是江青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江青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位置，了解她如何为人处事，有助于从一斑认识体制的全豹。这些当年为江青服务过的人，都是中央机关的退休干部，口风很严。主持电子杂志的李宇锋已经于2016年去世，本文成为他的遗作之一。

李宇锋还采访过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请他讲述他所了解的周恩来让301医院成立专家组，用人工手段解决毛岸青和邵华不育问题的往事，发表于《炎黄春秋》。

戴为伟也围绕文革史进行过多次采访。她采访的对象有郑仲兵，刘秀莹、冷卫等等。郑仲兵是对文革有整体性独立思考的学者，刘秀莹文革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教师，后任北京四中校长，冷卫亲历了文革年代贵州的民间读书活动。这些口述都在《记忆》发表。

陈墨、启之主编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四卷2011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受访人有200多位中国电影工作者。其中有一些篇目涉及文革时期的电影文化。比如戴光晰回忆了中央领导人文革中看内参片，她担任现场口译时目睹的细节。从朱德、叶剑英、宋庆龄到江青、王洪文等，都让她担任过现场口译。当时这些人在什么地方看电影，看什么片子，怎样待人接物，都有细节介绍，呈现了鲜为人知的高层氛围。

作家陈秉安采访过多位湖南道县大屠杀的幸存者。其中周群口述在《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发表。周群原是道县蚣坝乡中心学校教师，1936年生。因家庭出身夫妻被学校辞退，到丈夫家务农。1967年8月，她和丈夫蒋汉镇及三个孩子被处死，打昏投入很深的天坑，丈夫孩子均死，她7天后侥幸被救。为了生存，只得同意嫁给丧偶的道县蚣坝大队党支部书记李自贵。

李自贵在当时也参与过杀人。文革结束后周群恢复公职，成为县政协委员，李自贵参与杀人受到党内处分。一个女人的两次婚姻，包含了多重悲剧因素。陈履安采访道县杀人幸存者的全书尚未出版。

还有潘鸣啸、白夏等法国学者接受徐友渔采访，弗朗西斯卡接受邢小群采访，口述他们对中国文革的感受和亲历。潘鸣啸和白夏的口述由影响力中国以微信公众号发表。弗朗西斯卡的口述以《工农兵学员时代的留学经历》为题，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98辑发表。

四、名人口述自传里的文革章节

由于口述历史受到读者欢迎。各界名人以口述方式自述生平，整理成书，成为一个趋势。在这些口述自传中，不少都包含着文革年代的经历。因为不算专门的文革著作，在大陆对文革出版物严格的管理中，尚有一定的空间。

郭影秋口述，王俊义整理的《往事漫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是郭影秋对一生经历的回忆。全书共十八章，其中第十六章回忆的是文革经历。郭影秋在文革初曾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虽然很快出局，还是亲历了1966年5月到8月间的高层政治活动。他的讲述，是重要的一家之言。第十八章有一节“百味人生”，回忆的是文革期间住医院的见闻，也有文革期间高级干部情况的生动细节。

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的《行者思之》，共31章，讲述个人文革经历的是其中第九章一部分和第十章的全部，与文革相关的是第十二章：出任林彪、江青两案辩护小组组长。

江平口述、陈夏红整理的《沉浮与枯荣》2010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江平是法学家，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书分三卷三十三章，其中第二卷第九章为文革十年，约两万字。

彭剑整理的《章开源口述自传》201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章开源是历史学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全书共三十二章，其中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章回忆了文革时期的经历。

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的《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一

书由时代国际出版社出版，康国雄是民国时代银行家康心如之子，此书中有“在北京破四旧的恐怖日子里”等章节记录了文革经历。

阎长贵的长篇口述自传也已完成，分别由史义军、向继东采访，尚未出版。阎长贵现年80岁，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随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1966年和戚本禹联名发表过批判文章。1966年后半年，他先后被抽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直到1968年1月蒙冤入狱，1975年才背负罪名，走出监狱，下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冤案平反以后，阎长贵重新从事理论工作。退休以后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研究文革。阎长贵不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高层政治生态是他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他记忆力很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时下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他的许多研究文章甫一问世，内行的读者眼睛都为之一亮。他的口述史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五、口述史作品的选本与合集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口述史选集或合集很少以文革为专题，王钧主编的《口述历史：我的1976》（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出版）算是聚焦于文革后期的一本合集。采访对象有林若、张根生等省级领导干部，回忆了1976年政治风云。曲青山高永中主编的《新中国口述史》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身为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掌握着文革出版物的审查权力。在目前情况下，同类选题别人很难问津。此书中相当多的篇目并非口述史，而是回忆录。与文革相关的口述史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且早已出版或发表过。此书的问世，并不能说明有关文革的口述史敞开了出版空间。

以上仅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范围内简述近十年有关文革的口述史。挂一漏万，有待方家补充指正。

北京“老红卫兵”研究（1964—1967）

——一个学术史的回顾

杨 隼

一、问题提出

“派系分化”或者说“派性”（factionalism）问题是红卫兵运动（也可以说是群众运动）中的一个核心问题，¹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围绕着同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人为什么会分成不同的派系？这些人又是如何分派的？海内外的研究者们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尤其在西方，其研究范式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型。但是，这些研究都缺乏对派系本身的考察，尤其是缺乏对保守派的研究。事实上，只有深入派系本身才能更进一步地回答人们为什么分派？又如何分派？才能更贴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在范式的转换中逐渐远离历史真相，成为理论的游戏，使整个研究误入歧途陷入停滞状态。

现有研究认为“老红卫兵”（北京人又称“老兵”）即是保守派中一支较为特殊的派系，它是最早兴起的红卫兵，以八一八毛泽东接见为标志，主要由中学的干部子弟构成，基本只在北京有，存在时间并不长，大概半年左右，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既有保守派的一般特点，保卫既有政治秩序，又有造反派的一些特征，在客观上“推进”了文革及红卫兵运动。这种特性在北京表现的尤为明显，因为只有北京的中学里才能聚集起如此之多的干部子弟。况且，北京的“老红卫兵”又与文革初期的众多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如对联——“血统论”争论、“破四旧”运动，“红八月”暴力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涉及北京“老红卫兵”，但或是浅尝辄止，

或是点到即止，没有进一步地深入下去。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量翔实比对资料，力图超越“造反”与“保守”之惑，跳出“社会冲突论”与“反社会冲突论”之争，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相，并对“派性”问题做出一点探索，希望能推动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研究现状回顾：一个中外学术史的评述

1. 西方老红卫兵研究评述

文革研究肇始于西方，自然，作为文革标志性事件之一的红卫兵运动也早早地纳入了西方学界的视野，尤其是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最早得到学者探讨，比如，在红卫兵运动尚如火如荼的1967年，易社强（John Israel）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The Red Guar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 的论文，探讨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勾勒了到1967年为止的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过程，并认为红卫兵运动的重要性到1967年年中的时候已经降低了。他还特地指出了中学红卫兵和大学红卫兵的不同，北京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之间的矛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将红卫兵运动和德国纳粹的冲锋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王朝官僚机构中的御史台，国民党的“蓝衣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进行了对比，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认为用这些类比红卫兵运动都不合适，红卫兵运动有着自己继承自共产主义革命的独特逻辑，不好随意比较。²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易社强的论文也不算离谱，对红卫兵运动的评价和观察也还大致准确。不过，西方在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还是时事政策研究，谈不上学术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供政府决策层阅读的马可波罗文件（The Macro Polo Papers），³ 这个系列的文件是文革爆发之初到尼克松访华前，西方最好的对文革的解读。⁴ 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这个时候的西方学术界往往不得不借重于来自日本的二手资料了解红卫兵运动，⁵ 这种情况直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Eugene Wu）受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简称JCCC）之托牵头组建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简称CCRM）才得以改

变，大量由美国政府收藏的有关红卫兵运动的资料以胶卷的形式流通于美国各个大学之中，⁶ 西方学术界可以直接接触到原始材料，这就为七十年代中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1963年在香港成立的“大学服务中心”（USC, 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最接近中国大陆的落脚点，使得西方学者可以直接采访从中国大陆逃港的难民，⁷ 这些难民中不乏在派系斗争中失利的红卫兵，⁸ 有些人甚至是红卫兵派系里举足轻重的人物，⁹ 这些当事人的叙述毫无疑问的为西方的红卫兵研究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经过如此的资料准备，加之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巨大发展，¹⁰ 正如安戈（Jonathan Unger）所说“从七十年代中期到末期，许多有关六十年代文革的重要著作纷纷面世。”¹¹ 红卫兵运动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诞生了西方的第一个研究范式——社会冲突论。

社会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永（Hong Yung Lee）、骆思典、陈佩华（Anita Chan）¹²、安戈等。¹³ 其中，李鸿永写于1975年的论文是开山之作，¹⁴ 而骆思典等人紧随其后的论文和著作则是进一步为“社会冲突论”奠基。¹⁵ 李鸿永的论文和著作并没有完全地将视野转到红卫兵运动本身之上，还在试图构建一个能够将高层与基层贯通的宏大理论模型，而骆思典等则把笔墨都放到了广州的红卫兵运动本身上，将广州中学的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分析的是一清二楚条分缕析。¹⁶ 在材料的运用上，李鸿永偏重于红卫兵小报等文字材料，而骆思典等则较好的将口述和文字资料结合起来。虽然社会冲突论者之间有所差别，¹⁷ 但总的来说，通过他们对北京和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解释范式，而正如董国强所指出的，这个范式的基本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¹⁸ 这种范式很有效的解释了中学红卫兵里的派系分野，其中骆思典最严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通过对广东中学红卫兵

运动的研究，他发现文革之前的教育以家庭出身将学生分化成了两大互有敌意的群体，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中学里的学生就沿着文革前的分野，形成了保守和造反两大派系，这两大派系互相冲突，构成了广东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基本内容。可以说，骆思典的研究是社会冲突论者中最扎实的，近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谓“前无古人”是因为李鸿永在论证和材料上远没有达到骆思典那样严密的程度，骆思典不仅仅做到了平衡口述和文字材料，还采访了保守和造反两派红卫兵，最后的结论上形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洽观点。而“后无来者”则是据笔者目前眼力所及，海内外尚无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博硕士论文超越了骆思典对广东中学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学红卫兵两派起源问题上。可以说，社会冲突论对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分派研究是最严谨的，而老红卫兵们则被理所当然地归入到保守派阵营之中。¹⁹但是，社会冲突论在解释其他社会群体的分派上就不那么有效，甚至对大学生分派的解释也是很不足的。尽管骆思典²⁰已经注意到大学分派跟中学分派的不同，²¹但是他也没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大学分派不同于中学分派，²²而这就为新的解释提供了空间。

尽管学界对社会冲突论的批评早已存在，如1990年澳大利亚学者傅斯德（Keith Forster）²³就指出“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概念本身过于武断，浙江两大主要派别的头头们在运动初期都有向其所在单位当权派造反的经历。导致他们分裂的唯一显而易见的因素，是在省委领导人中支持谁、反对谁。”²⁴又比如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林伟然，他指出社会冲突论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对资料的曲解，李鸿永和骆思典所列举出来的数据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他认为派性是一个动态过程，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点，其派性认同是会不一样的，而社会冲突论则把它理解成了一个静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也是社会冲突论的第二个问题，社会冲突论对历史事实的描述有问题，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并不是引发文革的主要原因。另外，失利和得利阶层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若是放眼整个社会，这一划分未必正确，因为当时受损最严重的是黑五类和农民阶层，但是农民阶层恰恰是文革中是最保守的，也就是说社会利益并非分派的最根本原因，为此，他列举了五个影响人们分派的因素。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分派法，即阶级斗争理论分派

法，林伟然认为毛泽东有个毛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同于文革前主流的阶级划分法，而文革中接受了毛泽东的阶级理论的人就变成了造反派，而没有接受的人就变成了保守派。²⁵然而，总的来说并没有形成一个挑战社会冲突论的解释，²⁶加之社会冲突论者基本都离开了文革研究领域，红卫兵运动研究陷入停滞，故而社会冲突论一直是主导范式，直到原社会冲突论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于本世纪初期“叛变”，对社会冲突论“反戈一击”，这才使得新解释浮出水面。

从2002年开始，魏昂德通过一系列的论文来挑战传统的社会冲突论观点。²⁷2009年出版的《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则是最终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通过主要分析北京的大学红卫兵运动，魏昂德认为一个人的政治出身，和其最后是否加入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没有必然关系。社会冲突论所隐含的前提，即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所处的社会位置“理性”地选择自己的政治行动，是错误的。因为在1966年这个政治环境剧烈变动、政治前景模糊不定的时间点上，人们是无法理性计算自己应该采用要采取的政治行动策略。魏昂德还进一步提出多变的政治环境才是决定分派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冲突论所得出的派系的社会起源并不是分派的原因，是分派的结果。²⁸由于否定了社会冲突论，在魏昂德的解释里缺乏对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义，²⁹故而在《分裂的造反》一书里涉及中学的部分，一直被社会冲突论者视为保守派的老红卫兵³⁰也成了造反派的一员，而所谓的保守一词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及其所支持的造反派对他们妖魔化的结果。³¹可事实上，很显然不管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派，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老红卫兵造反”说，³²总的看来，魏昂德对中学红卫兵运动及老红卫兵的研究并没有超越社会冲突论，他并没有解决为什么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分派会不同于大学红卫兵分派这个问题。事实上，魏昂德的前提也有问题，文革初期的环境真的就是不确定和多变吗？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是如此，但对于信息量远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干部子弟来说，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然而，魏昂德在中学红卫兵运动部分并没有把这点考虑进去，而完全采信了老红卫兵的口述，这使得他的论述实际上是偏向老红卫兵群体的。另外，魏昂德在批评社会冲突论时忽略了社会冲突论的另一个前提，即实际上社会冲突论要解

决的是普通大众为什么参加这一派而不是参加那一派，并不仅仅是运动中的精英分子为什么会分成这一派而不是那一派，如果撇开群众组织中的一把手，稍微统计一下各派系中的普通成员状况就会明白其实社会冲突论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存在着种种不足，因此，在2016年西雅图的亚洲年会（AAS 2016 - Seattle）的讨论上魏昂德的观点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遥相呼应。³³ 不过，魏昂德对“社会冲突论”的批评却也反映出简单的利益集团论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复杂的文革和红卫兵运动。

在老红卫兵问题上持与魏昂德类似观点的还有安舟（Joel Andreas），他并非魏昂德观点的赞同者。³⁴ 在其论文和著作中也一样没有把老红卫兵当作保守派。在2002年的论文³⁵中，通过研究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他称早期红卫兵运动因为攻击文化资本在学校的特权和权力，所以也是种类型的造反。³⁶ 另外，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在安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屡屡提及老红卫兵，但是在根据论文修改的于2009年著作中却没怎么提起老红卫兵。³⁷

除去以上所提到的研究者，西方还有些研究者的著作与老红卫兵有所关系，比如邝泽倩（Julia Kwong）的两本关于中学文革的著作《变迁中的中国教育：文化大革命的序幕》（*Chinese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Prelud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和《中国学校的文革（1966.5—1969.4）》（*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April 1969*），第一本是文革前史，讲述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及教育如何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本则是叙述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运动基本过程，总的来说并没有超越社会冲突论的范畴；又比如臧小伟（Zangxiao Wei）的《文革之子：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家庭生活与青少年的政治行为》（*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注重将社会冲突论中所提及的阶层进行细化分析研究，同时还把文化和规范设置为了一个中间变量，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则是自变量，而政治行为是因变量。这些是社会冲突论所未提及的；还比如大卫·M. 拉道克（David M. Raddock）的《中国青少年的政治态度，文化革命在广州》（*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gchow*）和林静（Lin Jing）的《红卫兵的暴力之路》（*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家庭和社会政治观念是如何影响中学生在红卫兵运动中的所作所为的。不过，这些著作偏重于社会科学，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读红卫兵运动，虽不乏精彩之处，但终究不过是社会冲突论的进一步细化。

通过以上对西方老红卫兵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西方首创红卫兵分派的研究，以大到一省或一地区，小到一学校为案例，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出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抓住了中国人“习以为常”³⁸却未进行深入研究的关键特征。然而，西方的红卫兵运动研究缺乏对派系本身特别是保守派的深入细致的考察，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整个研究无法继续深入突破，研究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然不大，从2016年西雅图的亚洲年会上的讨论也能看出此点。³⁹加之文革研究的热潮⁴⁰早就已经过去，很多社会冲突论者转行研究其他课题，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在西方陷入停滞状态。派性（factionalism）问题的研究成为个别研究者的“独角戏”。

2. 中国老红卫兵研究评述⁴¹

“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学却在外国。”⁴²这句话虽令人不快，却基本是事实。不管是官方的文革研究，还是民间⁴³的文革研究，都要晚于西方。而官方政策相对宽松的十多年中，即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后的数十年里，⁴⁴主流的文革研究被圈定在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⁴⁵所划定的范畴之中。尽管这段时期对文革研究定下的条条框框是最少的，但民间文革研究没有形成气候，国外文革研究的成果对国内主流也无多少影响力。自然，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被束缚在主流叙事之中，老红卫兵研究则更不能“幸免”，谈不上什么独立的研究成果，只不过是时事政策的附庸，提供一些史料。而相对宽松期结束之后，官方政策收紧，主流的文革研究基本停止。

这段时间主流的红卫兵运动研究有着两个大问题：1. 将红卫兵运动看成一个整体，“分派”或者说“派性”问题基本不予提及，这既符合《历史问题决议》中“‘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精神，也迎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引入的将“群众运动”视为“乌合之众”的思

潮；2. 与前一点紧密相连，故意忽略形成“造反派”红卫兵的“文革五十天”历史，及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以上两点结合就扭曲了整个历史的图景，并形成了一套主流的历史叙事。其中最典型的两篇⁴⁶就是苏采青在1987年内部发表的《红卫兵运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⁴⁷和署名何为⁴⁸的发表于1986年的美国《知识分子》杂志上的《老“红卫兵”叙评》⁴⁹一文。虽然这两篇文章作者立场或许不完全一致，所针对的读者群也不相同，然而其叙事模式却基本一致。在苏采青一文中，红卫兵运动是一个有着“起承转合”不同阶段的有机整体，在某些人的“反革命阴谋”策划下，红卫兵运动最终误入歧途打倒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种叙事模式下，红卫兵运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老红卫兵运动，而为了掩盖叙事和历史的极大不同，甚至不得不曲解“老红卫兵”一词的本意，只将其作为区别于后来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基本不顾老红卫兵与后来红卫兵的巨大不同。何为一文则更是如此，尽管标题提及了老红卫兵，但是在正文中竟然根本未提及老红卫兵，基本上是按照“红卫兵运动就是老红卫兵运动”的模式进行叙事。当然，这段时间的研究也并非毫无收获，至少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⁵⁰以及研究的起点，比如南开大学的江沛就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以红卫兵运动为主题的研究性著作——《红卫兵狂飙》，⁵¹尽管是官方观点的再重复，但总还是提供了不少史料和研究的起点。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官方的政策日益收紧，主流对红卫兵的研究已经停止，体制内不再有新的著作面世，只有零星的文章面世，⁵²而在体制外继续积累老红卫兵材料出版著作的则是原师大一附中的学生米鹤都，他的十本关于红卫兵运动（主要是老红卫兵）的专著⁵³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不过，由于主流话语的影响，对这些材料还需要做进一步仔细的考辨。

主流研究的停滞并不意味着民间研究也跟着停顿了。事实上，一直以来还存在着一套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文革解释和研究体系，这套体系并不与主流观点完全对立，但却始终保持独立，并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主流还能对文革进行研究的十多年中，民间文革观点影响甚微，主要是两个人打下基础。一位是刘国凯，一位是王希哲。刘国凯是广州的造反派成员，王希哲则是大名鼎鼎的“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早在1971年年底刘国凯就写成了《文化革命简析》并油印成小册子在朋友之中传播。

1980年刘国凯将其修改之后再次发表在民办刊物上，⁵⁴后收入台湾所编的《大陆地下刊物汇编》之中。同年，王希哲也在民办刊物上发表了题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论文，稍后刊发在香港的出版物上。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刘国凯的视角迥异于官方，他认为“尽管高级领导阶层的某些内部动作对文革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社会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表现并不一定都以此为转移，而且，当那些内部动作一旦影响于社会时，便也就以某些社会事件表现出来，使我们平民百姓亦可观察了解到了。”⁵⁵正是因为从社会这个视角出发，刘把主要的笔墨都放在了“群众为什么参与文革？及如何参与文革？”这两个问题上，对群众中的分派也做出了从今日来看都较为深入的探讨，比如他以为“文化革命中两派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归纳起来有两个因素。一是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二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从而造成愈来愈严重的互相复仇攻杀。前一个因素是事情的本质，它决定了矛盾难以调和。后一个因素是事情的量，它使矛盾斗争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⁵⁶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不同派系，刘国凯更是洞若观火，他称那些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即老红卫兵）⁵⁷叫作“红五类”红卫兵，称那些后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为“革命派”红卫兵。⁵⁸他指出早期的这些“红五类”红卫兵“大都是高、军干子弟，他们组织‘红卫兵’并非出于成熟的政治目的，仅仅是一种政治狂热和政治优越感的表现。”⁵⁹秉承的是“血统论”的原则，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破四旧”之类。可以说刘的这些观点与西方的社会冲突论是不谋而合，⁶⁰甚至在文革时限的划分上刘跟社会冲突论者也一模一样。⁶¹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刘只把六六年到六九年视为“文革时期”。可以说刘国凯是中国从社会角度分析研究文革的第一人。

如果说刘国凯是专注于社会，那么王希哲则是从毛泽东的角度出发，通过剖析文革前毛泽东和体制的矛盾，毛泽东和社会的矛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及毛泽东在文革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在最后的结论（也就是后记）部分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他说：“那么，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又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便是可取的了。这场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开始的……于是：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西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你叫它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⁶²

2006年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王希哲又发表了三篇文章进一步解释了当初的“人民文革”概念。⁶³在《也论人民文革》一文中，王说“人民文革，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异化，产生和发展起来与之对立的为争取和维护人民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运动。它的延续，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人权和民主制度的政治运动。”⁶⁴而在《“人民文革”简要问答》一文中，王对“人民文革”的定义则是，“作为毛泽东文革的反面，一切文革中自觉的不自觉的（或从不自决走向自觉的）人民反毛，反官僚集团，反中央文革，旨在维护自己或自己阶级政治经济人身权利和利益的反叛运动，我称之为‘人民文革’。”⁶⁵综合1980年和2006年王希哲对“人民文革”的定义，可以看出两个很重要的点：1. 与毛泽东相对，凡是反对毛泽东的，就可以被纳入“人民文革”的概念，这是最重要的，也是为什么王希哲后来称“联动”为造反派的原因。社会矛盾则指的是人民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2. 与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民间的民主运动诉求相连，为民主运动寻找历史渊源和合法性。故而，王的“人民文革”的概念是和十年文革的分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王是十年文革下的“人民文革”。尽管王的“人民文革”论看起来和刘国凯的社会冲突论很相似，都强调“社会矛盾”，然而这两个概念有相当大的区别。刘国凯的社会冲突指的是“始自1966年10月批‘资反线’后，至1968年夏季镇压前的群众反抗运动”，而王希哲却认为“这证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

人民群众反官僚主义的利益还从属于毛泽东发展专制主义的利益，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官僚制度的要求却被毛泽东披上了为国家更加专制独裁而战的战袍。”⁶⁶换言之，王希哲不认为1966年下半年的反“资反路线”是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国凯和王希哲都透露出厌恶毛泽东，“告别革命”之意，对当时中国时局的变化抱有很大的期望，这些倒和主流不谋而合，跟现今对毛泽东普遍抱有好奇的左翼是不一样的。以后的民间文革研究正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进入九十年代，因为九零年前一年的政治形势，大批民间人士出走海外，在新的环境中，少了旧的束缚又急于建立新的解释体系。这些人士中的一些前造反派成员将王希哲的“人民文革”与刘国凯的“社会冲突”结合起来：取王希哲之名，采刘国凯之实。最终形成了今日广为所知的“三年人民文革论”

（两个文革论），⁶⁷这一观点大大推动了民间文革的研究，触发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是“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是“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⁶⁸“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最著名的两位代表人物⁶⁹是著名作家原清华附中的造反派郑义（原名郑光召）和著名的经济学家原湖南长沙地区文革时的“极左”派成员杨小凯（原名杨曦光）。

最早提出“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是郑义。据笔者所查，他最早见诸众的文字⁷⁰是1992年发表于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关于‘两个文革’的思想，数年前我就在文章中明确表述过……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政治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和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⁷¹稍后，郑义在写于1989年出版于1993年的《历史的一部分——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中再次重复了这段话，仅仅修改了几个字和标点符号。⁷²同年的《红色纪念碑》一书中，他对这段话做出了修改，修改后的版本是：“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

反抗暴政却是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最根本动因。”⁷³很显然，修改后的“三年人民文革”在意义上被提升为了“民主斗争”，将原先为一整体的文革运动分裂开来。或许是觉得这个定义还不够准确清楚，有过分拔高之嫌，在1996年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郑义撰写专文讨论“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并发表于美国的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上。在此文中，郑义又一次对两个文革论进行了修改，将“人民的文革”的定义改为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⁷⁴此后，郑义基本坚持了这个定义，尽管在众多的批评之下有所调整，但没有放弃“三年人民文革论”。⁷⁵

虽然杨小凯并未提出“三年人民文革论”，而是提出了造反派准政党论，但是杨小凯的意涵与郑义是相同的，也被人们一般认作“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提出者。杨小凯首先化名习广⁷⁶于1986年（即文革爆发二十周年）在美国的《知识分子》月刊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⁷⁷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杨小凯认为1966年9月以后毛泽东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大打民意牌，并且默许群众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准政党活动，而群众，包括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党内受到压制的派系则抓住这个机会，尽可能地找回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受剥夺和压制的权利，并最终导致了1968年的“极左思潮”。这篇文章已有“准政党论”的雏形。进入九十年代，1990年8月杨小凯又在香港和海外的杂志上提出“文革应该被视为社会矛盾的体现，而非一场精英的权力之争”⁷⁸的观点。其后，又先后在海外杂志上刊发了《再谈“文革”》《再谈造反派》《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等文章，并以《狱中回忆》为名连载自己的文革回忆录，即大名鼎鼎的《牛鬼蛇神录》。⁷⁹在这些文章中，杨小凯再一次声明“文革不是一个整体”“毛泽东和群众有结盟的关系”“造反派是因为反对政治压迫而起”等观点。到1997年，杨小凯将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正式提出了造反派准政党政治实验的观点，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控制下的准政党政治试验》⁸⁰一文中，他采纳了“三年文革”之说，认为从十六条开始，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调整策略，默许共产党之外的群众性自发组织成立，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份以后又默许跨行业跨地区性的准政党组织成立，这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人群利益的政治

诉求”，类似于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政党，而不是共产党式的革命党。但是因为没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及游戏规则，这场准政党实验很快就陷于派性斗争而失败。很明显，杨小凯的造反派准政党论是“三年人民文革论”的一个变种。

除了郑义和杨小凯，具有华人背景的西方学者陈佩华也持“三年人民文革论”的观点，她在《摒除对红卫兵运动的歧见——重新检讨文革派性根源和文革分期问题》一文中强调“造反派参加文革是为了追求从政治迫害中自我解放出来。如果说造反派被中央文革小组操纵，这只是文革第一年的事。不久，造反派组织便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纲领。”⁸¹同时，她还认为十年文革论是官方为了“掩盖历史真相”的说辞。不过，在文革爆发三十周年之际，她又表示要重新考虑文革的分期问题，因为“在1973年到1974年间，社会的确再次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普通老百姓确实为追求社会公义，重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集团（虽然这些集团是以不同名目出现的……），而谱写了另一段文革插曲。”⁸²值得注意的是陈佩华在此文中首次给老红卫兵下了定义，她称“第一批红卫兵即贬低共青团，指其阶级成分不纯，声称他们比共青团更加优秀。后来被叫作老红卫兵（在这里老的意思即是第一批建立红卫兵组织的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既得利益者特种俱乐部”。

“三年人民文革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化名萧喜东的新左派童小溪。⁸³在郑义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论的同一年（1996年），萧喜东在美国的网络杂志《四大广场》上连发两篇论文（即《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和《“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当年稍晚一些，又将这两篇稍加修改合成一篇文章，即《“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准备发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文革专辑上，未果，后转发于《明报》并编入罗金龙和郑文龙主编的《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一书中。从这三篇文章来看，萧喜东实际是赞同“三年文革”和社会冲突之说，⁸⁴他所不满的是“三年人民文革论”在对待毛的问题上与主流的一致，甚至更加否定，故而，他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者”（两个文革论）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的思想与文革中的群众造反运动割裂开来，而不承认在中央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和社会上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有着脉络清楚的联盟和对立的关系”，“持

囿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对来自群众的自发的左倾思想，和群众对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追求这些事实，感到无法接受。”⁸⁵进而认为“三年人民文革”还是跟主流妥协的结果。可是萧喜东并没有提出一套有别于“三年人民文革论”的解释，对“三年人民文革论”者的批评也有故意“歪曲”和“臆测”之嫌，比如认为“三年人民文革论”者否认造反派与毛泽东的联盟，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不管是杨小凯还是郑义乃至王希哲都没有否认毛泽东与造反派双方结盟这个事实，他们只是强调造反派与毛泽东意图的不一致。又比如萧喜东认为这些“三年人民文革论”的造反派“在清算文革、保守复旧的风潮的影响和压力下……在心理上对官方‘彻底否定’的观点让步和妥协”，⁸⁶可事实上这种看法毫无根据，很多造反派是通过实践和思考自主远离了毛泽东的所谓左派理论，这不仅仅是1968年前后的“极左”，更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萧自然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否认”文革。更令人奇怪的是萧尽管是赞同社会冲突论，却在老红卫兵的问题上显出了矛盾性，一方面他认为老红卫兵“带着革命形式、披着革命外衣来维护‘红色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种典型的形‘左’实右”；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开始，老红卫兵冲向社会，给暴力、武斗等形式造成了一定合法性，也就破坏了共产党官僚社会的稳定秩序和公检法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保守、极右的老红卫兵也是运动的点火者和传播者。”⁸⁷而萧对此的解释则是“贵族发难法国大革命，而平民完成了它。”⁸⁸这显然太过于简单了，而且这个话送给毛泽东才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只有毛才是真正的点火者。

官方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也进行了批判，并完全持否定态度。中共中央党校的金春明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化分别在1998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刊发文章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金春明在《“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再次对文革定义，并列三点反驳“三年人民文革论”，他称：“‘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10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此其一……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动机各不相同，行为千差万别，但总体上没有超出毛泽东划定的大框框，更没有人公开明确地提出任何独立于毛

泽东的理论、方针之外的政治纲领和不同目标。此其二。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反抗和斗争……目的恰恰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此其三。”⁸⁹ 张化则直斥“所谓‘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两个文革说’在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中没有得到认同。……这场运动中也不存在‘两个文革’。在提出‘真正的群众运动’和‘两个文革’的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追求，或冲击、批判现实社会的要求。”⁹⁰ 同时，张化也在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新左的文革论。从上可看出，毫无疑问，官方是完全否定“三年人民文革论”，也是否定社会冲突论的。而金春明的一句私下里的话或许更能代表官方的一些态度，他说：“两派都是计划体制的产物，所以到改革开放彻底失落了”。⁹¹

一些学院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对“三年人民文革论”及“社会冲突论”持否定态度，主要代表人物有徐友渔和董国强。徐友渔在2011年共识网发表的文章上说“我认为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就没有后面的造反派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人民的文革’基本上是毛泽东文革一个派生物，一个副产品。我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认为从统计的意义上，从涉及的人数上说，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自觉不自觉的真正要反官僚、反特权的人……相比而言，人数和力量就太少、太小，我觉得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意义上我就不同意‘两个文革说’。”⁹² 尽管，他在其后又表示“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意义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的观点稍微靠近“三年人民文革论”，但还是基本同意“一个文革”说。徐友渔不仅不同意“三年人民文革论”，也不同意与“三年人民文革论”相关联的“社会冲突论”，从1995年的第一篇有关文革的文章开始起，徐就对“社会冲突论”持否定态度。在《评〈剑桥中国史〉第15卷关于文革的描述和观点》一文中，徐友渔称西方社会冲突论的学者有两大不足之处，一是看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派别斗争，而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保守派被彻底打垮后，学生的派性斗争主要表现为造反派内部两派的斗争；二是对学生参加什么派别的原因分析太简单，不全面。⁹³ 并从五个方面否定了“社会冲突论”。⁹⁴ 以后，徐友渔虽对自己的论断有所修改，但基本坚持原观点。董国强一开始并不反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

革论)和社会冲突论。在2002年发表于港中文网刊《公法评论》上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一文里,董国强只是冷静叙述并说:“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释‘文革’,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无情揭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柔面纱”。⁹⁵但是到了2006年5月,董国强对社会冲突论的评价就产生了变化,⁹⁶在同年5月号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的《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中,董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社会冲突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盲目乐观;在‘两个文革’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他们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简单偏执”,并称赞这些学者“关于社会冲突理论的修正和对‘两个文革’观点的否定,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认知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革’的本质属性。”⁹⁷可以看出,此时董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和“社会冲突论”的评价就不高了。到2011年8月的《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红卫兵运动》中时,董则较为赞许魏昂德对社会冲突论和两个文革论的颠覆。⁹⁸至2012年,在《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里,董对社会冲突论和两个文革论做出了最后的“定性”,他称:“‘社会冲突理论’显然忽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体上的非理性特征。……南京个案显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理念本身的含糊性与单位内部固有矛盾的存在,群众派性斗争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概念具有显著的交互性和兼容性——关键问题是看‘为什么造反’和‘向谁造反’。”“两个文革说的偏误,在于过分强调了群众性‘造反’运动的主观自觉性,过于强调了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和反抗的勇气。这显然是基于某些激进的个体经验所得出的对群众心理的严重误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是在思想愚昧和强权胁迫双重作用下发生的动乱。”彻底否定了“两个文革论”和社会冲突论。两位学院派研究者在老红卫兵的问题上,自然也得出跟魏昂德及童小溪一样的结论——老红卫兵是最早的造反者。⁹⁹

还有一些研究者未参与论战但偏向于否定“三年人民文革论”,代表人物有宋永毅、印红标和王友琴。宋永毅¹⁰⁰的否定较为明显,尽管他并未对社会冲突论和“三年人民文革论”进

行直接的批评。1997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的《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一文即可看出宋的态度。在此文中，宋认为不能“滞留于三十余年前的‘造反派’，‘保守派’的派别立场”，这会“丧失了历史研究对其的客观真实性的起码要求”，而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史实是：文革中的多数的造反派在运动中只注重于打倒某些具体的走资派，并设法使自己或自己这一派取而代之。夺取权力后，造反派头头们又大都迷恋于权力本身，很快成为新官僚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从来没有挑战过毛泽东的正统地位和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只是设法使自己成为毛泽东所建立的更专制的专制制度中的一员”。¹⁰¹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三年人民文革论”。不过，到2015年，宋永毅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在对吴一庆文革著作的短评中，他赞同吴书中所提出的“文革‘边缘层’的概念”，认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运动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离开了‘最高指示’，甚至有意识地利用了毛的指示来追求自己的阶层和团体的利益的。因而、它们常常是‘离开了毛的文革’（吴著）。应当说该书在这方面还是颇有洞见的。”¹⁰²值得注意的是宋永毅认为“北京的老红卫兵划为‘保守派’是一个大可商榷的论点，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只不过他们大都以更正统的立场去造‘正统’的反罢了。”¹⁰³这就和前面所提到的否定“三年人民文革论”者一样了。

与宋永毅相比，印红标对“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未予置评。¹⁰⁴不过，他是最早提倡红卫兵应按派系而不能以整体来研究的中国学者，¹⁰⁵且在1996年时提出了文革的“三类基本矛盾”说：即三类基本矛盾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是至关重要的；这三类矛盾是中共党内矛盾、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和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矛盾；三者之中，党内斗争是核心，而知识分子问题和干部群众矛盾的卷入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有区别于其他政治运动的显著特征；而这三类矛盾的充分展现集中在前三年，即1966—1969年。¹⁰⁶同时，他也肯定了毛泽东与造反派是结盟的关系，称“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¹⁰⁷可以看出，实际上印的主张与西方的社会冲突论尤其是李鸿永的理论极为类似，就是比李鸿永多增加了一个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也很接近“三年人民文革论”的立场。不过，与“三年人民文革论”

不同，也是与前面所提及的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者相同的，印红标也倾向认为老红卫兵是最初的造反者，¹⁰⁸ 并认为老红卫兵基本只限于北京市。他对老红卫兵也作出了自己的定义，即“那些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¹⁰⁹

王友琴则与前面所提到的研究者都不一样，她的出发点则是“文革受难者”，她认为“受难者的悲惨经历是关于文革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¹¹⁰“大规模迫害人、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¹¹¹ 不研究这样的历史谈不上逼近历史的真相。故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她就着手调查文革中的种种丑恶暴行，尤其是发生在学校的“学生打老师”事件。¹¹² 王友琴对红卫兵运动研究中的“派性”问题不感兴趣，因为在她看来，不管造反派还是老红卫兵抑或保守派，对制止暴行都毫无兴趣，她说“当‘北航红旗’这一类新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兴起的时候，他们和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冲突。但是，显然，这种冲突的内容是要不要把革命对象扩大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去，而不是他们反对‘老红卫兵’的非人道的残酷的迫害。当他们得到权力和毛泽东的‘清队’指令的时候，他们和他们反对过的‘老红卫兵’一样残酷无情”¹¹³ 既然如此，那么区分他们到底是保皇还是造反的又有什么意义呢？争论三年还是十年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与某些研究者认为的王“视角单一”“伤痕文学”恰恰相反，王友琴并不是只找受害者，而是“不但收集所有可能找到的当时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而且用更大的力气做调查和访谈。着力寻找‘未被报告的历史’以避免一面之词。也尽可能让不同的人讲同一事情，这样可以交叉核实并比较全面叙述事实。”¹¹⁴ 尽管不与红卫兵运动中的“派性”问题相对话，但是王友琴还是触碰到了现有研究所忽略的一点，即暴力与派性的问题。不过，尽管王友琴的研究极具开拓性，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王友琴过分强调自己研究的独特性，而忽略了在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其实都有人在关注暴行，只不过不如王友琴那么有系统而已。所以，王的研究缺乏与其他研究者对话的意识，在写作风格上更类似于八十年代的文学纪实，而不是学术文章，这实际上阻碍了王的进一步研究。

不过，仍然不可否认王友琴为老红卫兵研究提供了很多可信的素材。

除去上面所提到的研究者，还有些文革亲历者也表达了自己态度，例如，中国科学院退休研究员王龙（笔名杜钧福）、四川的前造反派周伦佐及原北京地派的二把手聂树人。王龙并不完全认同“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但是他也不满意徐友渔等的批评，认为徐友渔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了”，没有必要再否定两个文革的同时也否定社会冲突论，研究文革“必须摒弃好/坏两元论的思维习惯”，要“承认很好的东西和很坏的东西常常融于一体。二者经常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评论是非常到位的。同时，他对这场争论也有个非常精准的判断，即“社会冲突论包含‘两个文革’论，但不一定得出‘两个文革’论；支持社会冲突论的人不一定支持‘两个文革’论，但反对社会冲突论的人必定反对‘两个文革’论”。¹¹⁵周伦佐赞同徐友渔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批评，但是在老红卫兵的问题上，他不赞成徐友渔将老红卫兵也标上造反的标签，认为老红卫兵的“造反”创举并不属于那个时期造反的本义。从实质上来说，老红卫兵是属于保守派的。¹¹⁶聂树人则直斥老红卫兵完全不能算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也不相同，将老红卫兵算成造反派不符合历史事实。¹¹⁷以上可以看出尽管这三人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对老红卫兵的态度是一致的，不赞同现有研究中将老红卫兵视为最先造反者的观点。

2006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记忆》《往事》《昨天》等研究刊物通过网络的发行，国内民间研究开始可以绕开官方的审查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关于“三年人民文革论”的争论反而渐趋平静，最新的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批评还是来自美籍华人乔晞华¹¹⁸和郭建，¹¹⁹“地方文革”的研究思路逐渐兴起。¹²⁰尽管有关“三年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的争论并未有最终的结果，对其否定和批评的声音一直很多，但是这场争论在客观上促进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一批主要研究造反派的著作因此面世。如童小溪在其批评“三年人民文革论”文章的基础上扩充成了《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徐友渔则在1999年出版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印红标则在2009年出版了《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周

伦佐则在2006年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了《“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2015年乔晞华出版了《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这些著作大大丰富了对造反派的研究。

反观未进入这场争论的老红卫兵们，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过去也有所回顾，¹²¹但影响甚微。较有影响力引起公众争议的是卡玛（Carma Hinton）¹²²于2004年左右拍摄的红卫兵运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这部影片虽然采访了一些造反派和大学红卫兵，但受访者绝大多数都是中学的红卫兵，基本观点和老红卫兵派一致，并间接引发了宋彬彬和王友琴就卞仲耘被打死事件的争论。北京八中的老红卫兵陈小鲁也组织过道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反响来看，显然人们不认为道歉就离历史的真实情况近了一步。而较有学术性的则是原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卜伟华，¹²³尽管他因研究文革而遭到刑罚，著作更无法公开出版，但他仍坚持为红卫兵运动尤其是老红卫兵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材料。他倾向于把老红卫兵算作保守派组织。¹²⁴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的老红卫兵都保持沉默，¹²⁵小部分老红卫兵的回顾和研究离揭开历史的真相还有相当的距离。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的老红卫兵研究主要围绕着老红卫兵是“造反”还是“保守”而展开，但区分“造反”或“保皇”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是文革时的标准，有的则是文革后的标准，¹²⁶讨论时常陷入“鸡同鸭讲”的情况。除了“造反”还是“保守”外，思想史也涉及较多，如关于血统论的讨论，很少涉及其他的主题，例如老红卫兵与暴力的关系、老红卫兵与高层的关系、老红卫兵自身的组织情况、老红卫兵与文革前教育的关系，等等，这也使得关于“派性”的争论变得十分狭隘，丧失了其本来应有的意义。

三、概念辩证：干部子弟（女）、老红卫兵及分野

干部子弟（女）似乎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很多研究并没有去做到辨别，故而，很容易使人顾名思义，以为干部子弟（女）就是干部的小孩，凡是父母属于干部编制的学生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就可以填写“革干”¹²⁷“革军”¹²⁸或“革烈”。¹²⁹也契合了当时的宣传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即干部子弟（女）是个相

当广泛的概念，其中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甚至还有老红军、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¹³⁰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并不是如此，干部子弟（女）有着其特定的意指。据山东实验中学的学生回忆说：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在解释出身填表时就说“革干”不能随便填写，只有像该校校长一样的干部才可以算是“革干”。¹³¹而又据王绍光¹³²说“在北京中央各部，十六、七级的干部可以视为‘群众’，但到一个县里，十六、七级的干部可以成为本县头号当权派。”¹³³著名媒体人当时在北京上学的马鼎盛也回忆说：“家庭出身，在育才学校¹³⁴绝对讲究。1949年之前参加党的工作的，才叫革命干部。这种家庭子弟，能上育才学校的也是凤毛麟角。1938年参加革命的，叫‘三八式干部’，也算最基本的‘消费’。抗战前的老红军家庭，算是拿得出手。省级、中央部级、大军区级的高干子弟，校园中比比皆是。”¹³⁵王友琴则点明了“革命干部”的真实含义，她指出“革命干部”一开始的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1949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她还列举了清华附中的例子，说“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1945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并引述了一位受访者的话：“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¹³⁶吴洵和妮娜也点出了干部子弟（女）的实质就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干部子弟，主要还是指的高干子女。文革以前，高级干部通常指十三级（司局级）以上的干部。”¹³⁷故而，在本论文中，干部子弟（女）其实就是“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子女”，这些人一般来说，当时都还在中学。

但是，干部子弟（女）并不一定会加入老红卫兵，比如师大一附中的何方方与陈永康，甚至不一定愿意加入红卫兵，比如八中的陈小鲁和四中的孔丹，也不一定拥护血统论，如张郎郎，尽管老红卫兵一定会是由干部子弟（女）组成，而且是中学的干部子弟（女）。也就是说，老红卫兵的范畴比干部子弟（女）更狭窄。那么什么是老红卫兵呢？在当时还有一种老红

卫兵，比如在八一八接见时周恩来就说：“我是个老‘红卫兵’。你们听从指挥，坐好。等会儿，毛主席来和你们照相！”，“老‘红卫兵’带着小‘红卫兵’，一齐干革命。”¹³⁸ 又比如刘志坚接见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时说“昨天在天安门我带了一个红袖章，也成了一个老红卫兵”。¹³⁹ 很显然，这种语境下的“老红卫兵”跟红卫兵运动中广为流行的“老红卫兵”不是一个概念，这里的“老红卫兵”主要指的是年纪大，和“小”是一对反义词。老红卫兵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目前，除去前文提到的陈佩华和印红标外，徐友渔将老红卫兵定义为“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成员当然是‘红五类’，核心为干部子女。”，苏采青则定义为“最初的一批红卫兵组织。他们在运动中与8月份一哄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颇有不同，与红卫兵运动结束后，直到1978年8月前，在中学生中保持的那种红卫兵组织，更是不同，因而又称他们为老红卫兵，以示区别”。¹⁴⁰ 可以看出，陈佩华、徐友渔和苏采青在两点上与印红标相当不一样：一、时间上不同，陈、徐和苏都将老红卫兵定义为最初或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其中，苏采青给出了一个很严格的时间范畴，即八月份以前。而印红标则是放到了只要是八一八接见之前成立的就算是老红卫兵，也没有附加上“最初”或“最早”之类的条件；二、陈佩华、徐友渔和苏采青都倾向于认为是“老红卫兵”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印红标则是自称，是特意要和“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相区别。

印红标的说法更受老红卫兵的支持，比如清华附中的卜伟华就将老红卫兵定义为“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一种通俗的称谓，也称作‘老兵’”。¹⁴¹ 又比如原东纠成员方广胜、方新阳兄弟认为老红卫兵指的是“毛主席‘8·18’戴上三字红卫兵袖章前，成立的早期红卫兵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第二个是北大附中成立的红旗战斗小组”。¹⁴² 有回忆也支持了印红标的定义，比如北京二十五中东纠成员白克刚的哥哥白克明¹⁴³ 在1967年的一次远足中就问同行的二十五中红卫兵刘力：“红卫兵、四四派、四三派是怎么回事？”而刘力的回答则是：“红卫兵、四四派、四三派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中学生的三派组织，他们因文革而兴起，他们也必将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落幕……”¹⁴⁴ 双方都没有称老红卫兵的意思。但是，印红标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正确，因为，8

月1日毛泽东首肯红卫兵组织之前，北京的中学里红卫兵组织是少数，将所有的自发性质的学生组织都一概纳入红卫兵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忽略了红卫兵名称在中学干部子弟中扩散的过程。¹⁴⁵而在8月1日之后，8月18日接见之前，北京的大学里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¹⁴⁶这些红卫兵组织显然并不属于老红卫兵。因此，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本文修改印红标的定义，将北京的老红卫兵定义为“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中学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基本由干部子弟构成，鼓吹血统论”，但在论述上将老红卫兵分成两个群体，¹⁴⁷即保守翼和激进翼，¹⁴⁸其中保守翼是成立于8月1日到8月18日之间，更偏向于保守派，或者说其就是保守派的前身，基本不存在造反的任何特征，而激进翼则是最早成立的那批红卫兵，在8月1日之前就已经存在，还带有一些造反的特征，比如反抗中央文革的压制。这样的定义和论述或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因为北京的老红卫兵从来没有统一组织统一行动过。

注释：

1 魏昂德（又译作华尔德或安德鲁·维尔德 Andrew G. Walder）特别指出动员问题不是红卫兵运动研究的核心问题。见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4.

2 John Israel, The Red Guar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30, April-June 1967, pp.26-32.

3 下载地址见 <https://archive.org/details/POLO-CIA>

4 李洁明著，林添贵译：《李洁明回忆录——美、中、台三角关系大揭秘》，台北，时报文化社，2003年1月，页109-110。

5 高雨莘：《哈佛文革专家评当年毛主席与今日习主席（下）》，2016年4月28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428/cc28macfarquhar2/>，2017年5月15日。

6 据李鸿永在1975年5月的统计，美国大学所藏的红卫兵资料共有2100种之多，含小册子、传单、小报等，时间跨度是从1966年8月21日到1970年2月，其中，按小报出版地排名，前四位的是北京、广东、上海和新疆，北京小报有207种740期，广东有218种426期，上海有32种72期，新疆有21种56期。参见 Hong Yung Lee, “Utility and Limitation of the Red Guard Publications as Source Publications: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4, No. 3 (May, 1975), pp. 779-793.

7 (美) 薛龙著, 路克利译, 陈松校: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 1955-2005》, 新星出版社, 2012 年, 页 13。

8 比如 1966 年 12 月经香港到台湾的黑龙江红卫兵王朝天 (本名季水生), 王朝天可能也是第一个广为外界所知的外逃红卫兵, 他还携带了一些红卫兵资料。参见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出版新闻短片: 《红卫兵王朝天投奔自由》, 1966 年 12 月 17 日-28 日,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1/9f/d5.html>, 2017 年 5 月 15 日。

9 比如骆思典 (Stanley Rosen) 博士论文的助手就是广州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的头。见包淳亮: 《骆思典 (Stanley Rosen) 访谈》, 2011 年 3 月 24 日,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 2017 年 5 月 15 日。

10 董国强: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 2012 年 2 期。

11 *Unger Jonatha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 2007, pp. 109.

12 在中国大陆 Anita Chan 又常被翻译成“阿妮达·陈”, 但其实陈佩华生长于香港, 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13 他们的主要著作有: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2. Jonathan Unger,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1960-198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14 参见 Hong Yung Lee,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4 (Dec., 1975), pp. 645-683.

15 参见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pp.390-406. 及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Sep., 1980), pp. 397-446.

16 但是, 骆思典并非不涉及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 他专辟一章用近百页的篇幅描述北京的红卫兵运动, 见 Rosen Stanle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in China 1960-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issertation, 1979, pp. 150-239.

17 比如陈佩华就基本认同中国大陆部分民间研究者所提出的“人民文革论”，但其他的研究者则未必认同。

18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2期。

19 骆思典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特意提到了老红卫兵的“造反”行为，他认为老红卫兵（他在博士论文里用的是 the children of cadre origin at middle schools 一词）对工作组的“造反”是暂时的，仅仅就是那么一段很短的时期，不能被认为是造反派。（原文为 The children of cadre origin at middle schools rebelling against the work team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Rebels" in our account because their "rebellion" at this early stage was only temporary.）参见 Rosen Stanle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Guard Movement in China, 1960-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Dissertation, 1979, pp. 134.

20 陈佩华也提到了这一点，大学中的派系分野并不是因血统论和阶级路线而划分。参见陈佩华：《毛泽东与红卫兵》，新潮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新北市，2011年，页204-214。英文版（Children of Mao）出版于1985年。

21 骆思典已经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指出大学生分派是依据工作组及文革的目标问题，比中学生分派要早，中学生分派则是在八九月间的血统论之争，他还特地指出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见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pp. 397-398.

22 骆思典的解释是大学生已经成功的跨越了高考这道门槛，中学里的阶级路线已经没有办法对他们施加影响了，他们毕业之后就可以保证分配，所以，大学生分派跟中学生分派不同。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了。见 Stanley Rosen. "The Radical Students in Kwangtung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nt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0 (June 1977): pp. 398.

23 又译为吉斯·佛斯特。

24 董国强、Andrew G. Walder：《南京“文化大革命”冲突的起源》，《昨天》，2012年8月30日第8期，<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2012%E5%B9%B4-8%E6%9C%88-30%E6%97%A5%E7%AC%AC-8%E6%9C%9F.pdf>。

25 林伟然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他对社会冲突论的批判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参见林伟然著，李玉华译《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出版年份不详，页9-15。

26 徐友渔曾提到1994年陈佩华、安德佳夫妇来华作政治学课题，他在北京光华饭店与他们见面，曾提及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关于“文革”的研讨会。陈佩华说，要开会，筹款倒有办法，问题是没有新东西好讲，枉自浪费时间和精力。徐友渔事后细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就拿对于红卫兵的研究来说，我们有多少东西超过了他们在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水平呢？老实说，许多人现在可以写出点东西，无非是仗着不知道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胆大。徐友渔著：《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版，页280-281。

27 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是 Andrew G. Walder,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1, No. 2 (May, 2002), pp. 437-471 及 Andrew G. Walder,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3 (Nov. 2006): 710-750.

28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9, An Introduction.

29 社会冲突论者对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义是造反派的矛头通常向上，攻击的是整个政治体制，而保守派的则矛头向下，倾向于保护整个政治体制，即使攻击领导，那也是这个领导已经被抛出倒台了，见 Stanley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2, pp.95-96.

30 魏昂德似乎是英语学界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 old red guard 的学者，但是正文中的 old red guard 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上的老红卫兵，自然就更谈不上给其定义了。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9, pp.158.

31 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9, Chap.7.

32 笔者目前查到只有王希哲于2006年认为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然而王的这个看法似乎更是政治宣言，而不是历史事实。他的原话是“那么若问，联动，林立果们也可以算是造反派吗？为什么不算？造毛泽东的反，不是造反派，还有谁敢说自己是造反派？非要蒯大富是造反派？王洪文是造反派？不发生转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派宁有种乎？也讲血统？昨天如何不论，今天造反，今天就是造反派！”见王希哲：《文化大革命十批判书（纪念文革40周年）》，2006年6月7日，<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70502.shtml>, 2017年5月22日。

33 Felix Wemheuer, “Grassroots Factionalism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aradigm”, published on August 26, 2016,

<https://networks.h-net.org/node/3544/discussions/141257/transcript-grassroots-factionalism-china%E2%80%99s-cultural-revolution>, May 22, 2017.

34 安舟也不是社会冲突论者，但是其提出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及其论述框架基本没有超越社会冲突论的基本概念和框架。

35 这篇论文可能是英语学界第一篇提及老红卫兵的论文，但是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对老红卫兵进行定义。见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 No. 4 (Aug., 2002), pp. 463-519.

36 Joel Andreas, *Battling ove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wer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31, No. 4 (Aug., 2002), pp. 479-481.

37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8 王绍光称群众运动中的“分派”是文革中一个妇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西方文革研究者来发现，只有没有经历文革的人才会视之为“发现”，这种说法是种带着“民族自尊心”的虚骄，和学术批评没有关系，因为只要仔细看过社会冲突论的著作和论文都不会得出社会冲突论是为了“发现分派”这种说法。参见王绍光：《文革“故事”从何说起？兼答陈佩华的批评》，《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39 这些学者中包括西方文革研究学界的新秀吴一庆（Yiching Wu）等人。

40 在2006年时，宋永毅介绍了当时海外文革研究的基本现状，称美国汉学界对文革研究有三句话：“对历史学来说太年轻，文革时间不远才四十年，西方史学界更愿意研究先秦、老子等等。作为政治学来说，又太老；不如乡村研究、选举问题、金融改革等，这些项目在美国很容易获得资源。作为社会学，缺少必要的信息。”参见《动向》杂志：《宋永毅谈文革研究新动向》，2006年3月号，http://blog.bboxun.com/hero/wuys/51_1.shtml，2017年5月23日。

41 我在这里对中国的定义是“以中国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学者，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中国人，无一例外的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尽管他们的国籍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了。

42 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二十一世纪》总第31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5年10月。

43 韩钢曾提及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虽然他并未对“民间研究”下定义，也只是列举了沈志华一人作为民间学者的代表，但是，我认为他的提法是很正确的，的确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主流范式之外的研究。在这里的我对文革“民间研究”所下的定义是区别于主流官

方文革观点，独立但又不绝对和官方观点对立的研究，不包括十年文革期间的官方主流观点，虽然这个“官方”是被现今的主流所否定的。不以在朝或在野划分。需知，很多不在体制内的人士自觉或不自觉的就接受了“两个”官方的观点，如乌有之乡。韩钢：《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6日，第八版。

44 著名学者邢小群将1996年即文革爆发30周年定为官方态度的转折点。从此，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至于，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她认为是“一是因为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思考的触角已经伸向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见邢小群：《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2016年4月30日，<http://mingpaomonthly.com/%E6%95%8F%E6%84%9F%E7%9A%84%E6%96%87%E9%9D%A9%E4%BA%94%E5%8D%81%E5%91%A8%E5%B9%B4%E3%80%80%E5%BC%88%E9%82%A2%E5%B0%8F%E7%BE%A4%E5%BC%89/>，2017年5月27日。

4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7/71588/4854598.html>，2017年5月23日。

46 还有一篇略微不那么典型的则是关海庭的《红卫兵运动始末》，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五十六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页114-138。

47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座》，内部出版，1987年8月，页172-190。

48 我曾以为“何为”是米鹤都先生的笔名，后询问米先生，米先生表示自己从未写过《老“红卫兵”叙评》一文，并指“何为”或许是何维凌的笔名。可能此事还要再询问《知识分子》的主编梁恒（索罗斯高徒，《革命之子》的作者）和宦国仓之后才能有最后的答案。

49 此文后来又以《红卫兵运动的源流》为名发表在团中央的《当代青年研究》上并收入于辉的《红卫兵秘录》一书，参见何为：《红卫兵运动的源流》，《当代青年研究》，1989年第3期。及于辉编著：《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页333-348。

50 比如三本通史尽当时条件之可能地提供了一些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史料，即1986年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1989年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和1995年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又比如一些纪实性的作品也提供了可供继

续研究的资料，如《历史在这里沉思》系列等。

51 江沛著：《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月。

52 这些文章大都分布在党史性质的通书里，一如既往地偏离历史真相，比如在说到“造反派”时，冠以“新红卫兵”的名称，并说“老红卫兵奉行‘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动手’；那么，‘新红卫兵’造反的形式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如果说老红卫兵的造反及其矛头所向有一点自发性的话；那么，新红卫兵斗争方向则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指使，他们自身也已完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造反工具。”张文和、李艳：《口号与中国》，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页407。

53 这十本书包括三本带有学术性的著作和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口述历史系列。三本带有学术性的著作分别是《红卫兵这一代》（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聚焦红卫兵》（200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和《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口述史系列则是《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这个系列已经出到了第七本，米先生打算出到十一本。

54 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前言页18-19。

55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92。

56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171。

57 纵观《文化革命简析》全文只有一处用了“老红卫兵”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刘国凯如主流一般将老红卫兵等同于红卫兵，恰恰相反，刘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老红卫兵的本质。见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124。

58 在重印的《文化革命简析》中刘国凯将“革命派”红卫兵全部改成了“平民派”红卫兵。见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 后记、出版后记、两点说明、》，2006年，http://blog.boxun.com/hero/liugk/89_2.shtml，2017年5月26日。

59 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第十七辑）》，1984年，页106。

60 陈佩华坦承社会冲突论的观点是偏向造反派的。因为七十年代的政治形势就是这样：大部分逃到香港的红卫兵都是造反派，其中很大比例的人曾被下放农村，他们感到幻灭和不满，当时难以接触到保守派红卫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阶级成分较好，个人的处境比造反派好很多。见陈佩华：《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61 西方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又译为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曾经不无幽默的说道：“我们原来认为是三年，不过为了与你们国内的口径一致，而且也为了我们的书能在中国更好地销售，我们把它改成了十年。”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文化出版中心，2008年，页793。

62 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1年，页138-140。

63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王希哲：《希哲的文革观前后几乎相反吗？》2006年7月18日，<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615658>，2017年5月26日；王希哲：《“人民文革”简要问答》，2006年6月19日，<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190005.shtml>，2017年5月26日。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2006年1月6日，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49391，2017年5月26日。

64 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2006年1月6日，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149391，2017年5月26日。

65 王希哲：《“人民文革”简要问答》，2006年6月19日，<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190005.shtml>，2017年5月26日。

66 王希哲：《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1年，页108。

67 为了便于与王希哲的人民文革作区别，突出现今的“人民文革论”的实质，本文特用“三年人民文革论”，所谓的“两个文革”其实主要着力点在“三年人民文革论”上。

68 徐友渔说这场争论是文革研究中所引起争议是最集中、最激烈的。见宋永毅编：《历史的真相与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出版社，第9页。及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年10月19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2.html>，2017年5月28日。

69 前文所述刘国凯和王希哲也转向了“人民文革论”，尤其是刘国凯，他于1996年撰文《三年文革与两条线》时，他是持“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的观点，并没有应和当时已颇有影响力的人民文革论。但是到2006年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之际，他却出版了一套《人民文革》系列丛书，并称“决意放弃文革‘人民线索’之说，而择取政治意向更鲜明的人民文革论。”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研究者，刘国凯和王希哲都已无多大的影响力了，故不在此赘述。

70 郑义曾屡次提及他于八十年代后期在《作家》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首提“两个文革”的观点，但是笔者查遍1985-1990年的《作家》

月刊，只登载有一篇郑义的文章，即《永恒的流浪》，里面未提及“两个文革”或类似的说法，倒是提到知青时代使他生出异端想法。见郑义：《永恒的流浪》，《作家》月刊，1988年第5期。及郑义：《两个文革箴议：仅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罹难者》，《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996年第83期，<http://www.cnd.org/HXWZ/ZK96/zk83.hz8.html>，2017年5月29日。

71 郑义：《逃亡生涯勾起了一段回忆》，香港，《九十年代》，1992年第6期。

72 郑义的原话是：“一个文革，统治者的文革：利用群众运动，摧毁政敌，攫取权力；一个文革，被统治者的文革：利用合法条件，反抗封建特权和政治的压迫。——这是两个互相利用、同时又互相冲突的文革。而共同的时、空把二者融为一体，就使得这融合体成了一个说不清、弄不懂的政治怪物……”转引自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四大广场》第6期，1996年3月5日，<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2017年5月29日。

73 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1993年，页181-182。

74 郑义的原文是：“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权力结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旁落大权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打倒贪官污吏，争取自身权力的不自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人民起义。”见郑义：《两个文革箴议：仅以此文纪念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罹难者》，《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996年4月16日第83期，<http://www.cnd.org/HXWZ/ZK96/zk83.hz8.html>，2017年5月29日。

75 在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之际，郑义谈到“人民文革论”（两个文革论）时，这样说到：“我所谓‘两个文革’‘人民文革’的提法，不过是提请注意文革中人民反抗暴政之因素，不可跟在人家屁股后鹦鹉学舌式地‘彻底否定’。控诉‘造反派’暴行我也竭诚拥护，但请不要虚指，最好附上那个‘造反派’的组织名称。这样一来，人们一查，多半会发现那原是‘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可作会心一笑。说白了，用最极端的话来讲，各地大杀‘地富反坏右’的，不都是‘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吗？”参见郑义：《在文革50周年反思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2016年5月18日，<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53595>，2017年5月29日。

76 参见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1998年12月3日，第160期，<http://www.cnd.org/HXWZ/ZK98/zk160.hz8.html>，2017年5月30日。

77 据宋永毅说此文也被转载到了1986年的《中国之春》上。见习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知识份子》，1986年第3期。

78 转引自陈佩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香港，《香港

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79 杨小凯称《牛鬼蛇神录》在分篇发表时未经他的同意就删改了很多内容。参加杨小凯著：《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言页7-9。

80 罗金龙、郑文龙主编：《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3月，页273-287。

81 陈佩华：《摒除对红卫兵运动的歧见——重新检讨文革派性根源和文革分期问题》，《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1993年6月第四卷第六期。

82 陈佩华：《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83 为北师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之子，现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参见田延：《“群众政治”还是“公民政治”？——评童小溪〈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2017年4月4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4-04/134445.html#SOHUCS>，2017年5月30日。

84 比如萧喜东说：“‘两个文革’论和一元化的‘彻底否定’的主流观点比较起来，注意到了精英之外的群众和群众政治，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也深受主流观点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对主流观点的妥协；实际上主流观点形成的过程，也是‘两个文革’论形成的过程。”参见转引自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龙、郑文龙主编：《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3月，页138。

85 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四大广场》第6期，1996年3月5日，<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2017年5月31日。

86 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四大广场》第6期，1996年3月5日，<http://www.netix.com/sdgc/sdgc06/6-sdgc05.html>，2017年5月31日。

87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龙、郑文龙主编：《浩劫之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3月，页161-162。

88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2001年8月2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5.html>，2017年5月31日。

89 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0 张化：《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1 此话系转，或许不够准确。

92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年在《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2011年10月19日，<http://>

//www.aisixiang.com/data/45366.html, 2017年6月1日。

93 徐友渔著：《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精神生成语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页307。

94 这五个方面分别是：1、对派别斗争过程不清楚，一开始是老红卫兵一统天下，造反派是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才出现，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并未被派性所困扰；2、完全不知道派别的分化与发展情况，在大多数地方，66年底67年初保守派基本都被打散了，派系斗争在66年以后其实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3、对学生派别归属原因误解，大学里的红卫兵分派就不是以“血统论”为主；4、不知道两派分野的焦点，两派焦点其实是工作组；5、对派别和后台的关系不清楚，军队不可能违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志站在保守派一边，只能在造反派的不同派系之间进行选择，周恩来也是这样，尽管他们或许更倾向保守派。在我看来，徐友渔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有道理，在某些方面则是属于对社会冲突论的一种误读。参见徐友渔著：《当代学术：川籍学者文丛 精神生成语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页307-310。

95 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革”研究——徐有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简介》，《公法评论》2002年02月06日，<http://www.gongfa.com/xuyiwengejianjie.htm>，2017年6月2日。

96 这个变化或许跟董国强与魏昂德的合作有些关系。

97 董国强：《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1068.pdf>，2017年6月2日。

98 董国强：《一个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红卫兵运动》，《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总第126期。

99 参见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3。

100 原上海中学的学生造反派，1989年出国，1995年开始以图书馆员的身份研究文革，因其在整理出版文革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史料上贡献极大而闻名于世。他于1997年出版的第一本研究著作《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即是一本文革史料的汇编。这本书的底本是他文革中编辑的一本名为《思潮集》的油印文集，宋出国时将这本文集带出。在2015年又以《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文革”中异端思潮文献档案》（上下两册）之名由明镜出版社制成网络电子书出版。《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49-1976》是他最新的最新成果。参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后记，《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专题），<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7/220/20031215170312.htm>，2017年6月3日。

101 宋永毅：《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102 不过，据笔者与吴一庆教授的所谈，吴一庆教授是不赞成“人民文革论”的，这也算是宋永毅先生仍不赞成“人民文革论”的一个曲笔吧。参见宋永毅：《从边缘层反思文革和文革后的中国——读吴一庆的〈边缘层的文革：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动向》，2015年3月号。

103 宋永毅：《派别，史实与文革异端思潮——答云林》，《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104 据笔者所见，印红标对“三年人民文革论”的唯一一次表态是在2015年年初的复旦大学“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上，当一位老师断然否定“两个文革论”时，印红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

105 在1990年以前，印红标对红卫兵运动的观点还基本是官方的，即把红卫兵运动看成一个整体，以时间段来划分，不过，也稍微有了点以派系研究的影响。直到92年的时候，印红标才彻底的转向以派系研究的观点。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第1卷 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页831-874。

106 印红标：《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记忆》，2014年5月31日第114期。

107 印红标：《如不彻底反思群众还会用文革方式解决矛盾》，《凤凰网历史》，2014年4月6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duihuayinhongbiao2/detail_2014_04/08/35570682_0.shtml，2017年6月4日。

108 不过，董国强认为印红标在1992年论述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流派时，老红卫兵其实很像保守派。董国强：《大陆学界红卫兵运动研究述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期，2006年5月30日，<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1068.pdf>，2017年6月2日。

109 在《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印红标也有个类似的定义，不过，我觉得他1997年文章的定义更加完整，故而采纳1997年的定义。见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页；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110 王友琴：《寻找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2003年九月号。

111 高伐林：《大规模迫害人、残害生命是“文革”最主要罪恶——王友琴博士问答录》，《多维时报》，2004年8月23日。

112 徐小棣编：《历史的义工——〈文革受难者〉书评文集》，电子文稿，页48。

11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页148。

114 王友琴、周志兴：《从普通受难者的角度来书写和反思文革》，共识网，2013年8月5日，http://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13_08_05.pdf，2017年6月4日。

115 王龙（杜钧福）：《读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说的文章》，2014年9月26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2v27t.html，2017年6月5日。

116 周伦佐：《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记忆》，2009年2月第五期（总第十五期），2009年2月21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REMEMBRANCE-No-15-2009%E5%B9%B42%E6%9C%8821%E6%97%A5.pdf>，2017年6月5日。

117 聂树人：《“老红卫兵”是造反派吗？》，2014年7月23日，<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9954>，2017年6月5日。

118 乔晞华：《既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台北，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页183-217。

119 郭建的批评较为到位，但是他忽略了郑义和杨小凯所提出的人民文革论是划定了时间范围的，即1966-1969年。参见郭建：《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昨天》，2017年2月总第86期。

120 不过，中外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研究基本都以案例为主，从来就是“地方文革”研究。关于中国的“地方文革”研究思路，可参见金大陆、启之：《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金大陆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2期。

121 联动成员邹建新曾在香港出书为联动“辩护”，但是观邹书不仅是重复了官方的既有论调，还带着浓浓的派性色彩，这个派性色彩是老红卫兵的。实难称得上研究。钟雪（邹建新）著：《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命抗争纪实》，香港联合出版社，2011年出版。

122 中文名韩惊，文革爆发时就读于101中，参加了文革，当时较为倾向于造反派观点，后回美国念书，母亲是史可（Bertha Sneck），她的圈子可能还是以当时的老红卫兵为主。有关她家庭的情况可参见王立礼：《我的美国老师史》，2012年6月2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50cbcd01011foa.html，2017年6月6日。

123 原名卜二华，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卜大华的弟弟。

124 卜伟华：《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问题（一）》，2007年10月11日，<http://bwh2006.bokee.com/18608287.html>，2017年6月11日。

125 这种沉默恐怕并不是王绍光所说的不能或不愿意说，而是不想说。

126 我不认为文革后的标准就一定胜过文革中的标准，因为派性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就消失，从很多回忆文章都可以看出，不管是保守派的成员还是造反派的成员都带着各自浓厚的派性，如果把“造反”的标签安在保守派身上，那保守派的成员是不会接受的，同理，“保守”的标签放到造反派身上，造反派也不会接受。

127 家庭出身代码（标准号GB 4765-1984）中标出的是“干部”，但是这个标准制订于1984年还不大能反应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公安部科技局编：《公安信息化标准汇编：国家标准部分（1）》，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1年12月，页642-643。

128 值得注意的是1965年6月起，取消了军衔制，将军官薪金制改为国家干部工资制，这样军队干部才基本和国家干部对等起来

129 毛泽东时代红五类中的红三类。

130 吴洵、妮娜等编：《中国知青总纪实（上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页210。

131 刘堃主编：《实验回忆录》，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9月，页260。

132 据说王绍光的父亲是原武汉市公安局局长。

133 王绍光：《文革“故事”从何说起？兼答陈佩华的批评》，《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6期。

134 北京一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135 马鼎盛著：《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1月，第48页。又可参见马鼎盛著：《蒙眬的年代》，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页55-56。

136 王友琴此文发表于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后收入2001年1月出版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一书。王友琴：《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香港，《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

137 印红标也认为“文革以前，高级干部通常指十三级（司局级）以上的干部。”参见吴洵、妮娜等编：《中国知青总纪实（上卷）》，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页210。又见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63。

138 宋永毅主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1966年8月21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4（第三版）。

139 宋永毅主编：《刘志坚接见北京工业学院部分同志时的讲话》，1966年8月19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4（第三版）。

140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座》，内部出版，1987年8月，页173。

14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八十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页127。

142 方广胜著；方新阳修订：《红卫兵长征日记》，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4年10月，页220。

143 时为哈军工的大学生。

144 刘力：《1967年：上方山云水洞之游（全）》，2013年11月19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b16c24010101o95o.html，2017年6月11日。

145 陈闯创对此有不错但稍嫌过短的论述，参见陈闯创：《略谈文革初期没有“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昨天》，2015年3月30

日第 48 期。

146 方迪的文章在此论述颇足。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8 年 6 月 30 日第六五四期，<http://www.cnd.org/CR/ZK08/cr486.gb.html>，2017 年 6 月 11 日。

147 米鹤都曾有类似的分法，他称老红卫兵“也包含两个派别，即支持‘对联’的一派和反对‘对联’的一派。他们基本上都参与了红八月的‘破四旧’，但是在行为方式上略有不同。我们姑且把其称为老兵中的激进派和策略派。但是，由于策略派的红卫兵组织数量很少，因此在一般研究中对这一区别略而不谈。”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 8 月，页 250。

148 此处不宜用派，因为这两部分红卫兵虽然摩擦矛盾不小，但始终没有发展成类似于保守派与造反派那样的矛盾，故而此处不用派更好。

作者简介

王 芳

1983 年生，湖北潜江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现在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为文革史、当代中国史，在《二十一世纪》《复旦政治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口述作品十余篇。

徐友渔

1947 年生，四川成都人。当代西方哲学和文革研究学者，1995-2007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2015-2017 年任美国纽约 New School 驻校学者，参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6 年起分别为牛津大学、英国 Bristol 大学、哈佛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语言》《形形色色的造反》《自由的言说》《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哲学》等，著有关于文革的论文多篇。

余汝信

1950 年生，广州人。文革研究者。著有《香港，1967》（2012），编著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2006）、《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2008）、《“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2013）、《罗瑞卿案》（2014）等书，现居香港。

石名岗

1948 年生，山西太原人。太原机械职工大学毕业，机电高

级工程师。博客中国网专栏作家，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文革史。著有《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等书。

卜伟华

1950年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退休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编辑过多种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合著：《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等。发表文章：《红卫兵运动与文革前的学校教育工作者》《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始末》《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等。

吴迪

1951年生，北京人。独立学者。主要著作：《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

周孜仁

1944年生，四川成都人。1961年就读于重庆大学电机系，文革中任《815战报》主编。1969年发配云南，先后作新闻、秘书、电工多种职务，最后收官于高级工程师。1990年代开始研究文革，著有《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岁月回望录》《云南文革笔记》等书。

蒋健

1959年生，宁波人。中共党史独立业余研究者。自2003年以来，在《文史精华》《记忆》《新史记》等媒体上，发表《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的早期接触》《林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统战生涯》《回望“九·一三”——偶然的摔死，必然的失败》《林彪卷入“两谋”有多深？》《〈“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再谈林彪专机的“黑匣子”》等文。

唐少杰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2002年8月至2003年7月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0年为瑞典隆德大学语言与文

学研究中心访问教授。代表作：《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百日大武斗”》《哲学中革命变革的实现》《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等。译有《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崇拜毛——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和仪式崇拜》等。

丁 东

1951 年生，北京人。著有《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杨 隽

80 后生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即将进入清华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方向是文革史，毕业博士论文以北京老红卫兵为题。硕士阶段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论文《重探红卫兵运动的“预演”：以北京六中“中学生要求进行教育革命”事件为中心》载入明镜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下）》，还曾内部出版《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历史资料汇编》（第三卷文革卷）（内部资料）等书。

美国华忆出版图书书目

(标*为即将出版)

1. 乔晞华、张程：社会问题 40 问——西方社会学面面观
2. 张程、乔晞华：总统制造——美国大选
3. 启之编：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1-4）
- *4. 周孜仁：云南文革史（1-2）
- *5. 胡宗式、陆水林、章铎编著：北京大学文革史权（1-4）
- *6. 张程、乔晞华：我的美国公务员之路
- *7. 刘若：非常年代
- *8. 吴迪：一个制度和观念的历史：中国电影（1-2）
- *9. 王复兴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
- *10. 韦陀编：流年碎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一辑）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不敢让人说话，其实就是保护造成浩劫的制度、思想和文化。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在不懈的努力下，由文革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们共同撰写的“文化大革命论文集”终于要出版了，这是一个庞大群体的呐喊：中国人决不能忘记血的教训！中国人决不允许文革的灾难重演！

——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李锐

有关文革的记忆和研究，已经成为专制政权和独立知识分子之间博弈的焦点。我要强调的是：要充分认识到这场博弈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尽管大权在握的人有“武器的批判”，而独立学者仅有一支笔，天平仍可能导向学者一边。这套四卷本的文革研究专著历经坎坷，最终在美国出版，正是编者和作者们坚持不屈的明证。同时，它们也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发展。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宋永毅

这套丛书的许多作者是中国国内著名的文革研究专家。一些青年作者也在关于文革的专题研究中崭露头角。书中各章节的论述内容十分广泛，历史叙述生动详实，理论分析富含洞见，代表着中国国内文革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该书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很强的历史借鉴意义。

——Stanford University Andrew G. Walder

这五十多篇文章，篇篇都高扬着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四十多位作者，人人都是鲁迅所说的，改革思想学术的“前驱和闯将”。这四卷本的论文集经磨历难，终于在文革 53 周年问世，这事实本身就说明，文革研究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是多么重要，而这部书的编撰、出版经过，也将与此书一同载入历史。

——文革研究学者 王复兴

ISBN 978-1-951135-04-1



9 781951 135041